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血渍红土—弋阳横峰暴动纪实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篇

方志敏将手枪紧紧地抵住了太阳穴，
只要一扣扳机，生命便将消失……

1935年1月，出奇的寒冷。位于皖浙赣三省搭界之处的怀玉山，已被一片冰雪所覆盖。方志敏、刘畴西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后的二千余人，被国民党军14个团的重兵所包围，分割零散成几段，困在这峰险壁峭的大山里已有十多天了。

几个月前，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时的气氛是多么的高涨，场面是多么的热烈。中央是否真正对这支队伍寄予厚望尚不能定，但是赋予它的任务是十分明确清楚的。

任务一共有四条：

“一、最高度地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

“二、最高度地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

“四、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中央和中革军委所发的这一训令在当时是绝密的。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的领导们在努力执行这几个任务时才意识到，自己这支一千多条枪、六千余人的队伍要想冲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铁壁铜墙，实在是势单力孤了，几乎就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臆想。

怀玉山差不多就是这支英勇队伍的最后一站。方志敏也差不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躺在一堆烂草与树叶上，浑身被雨雪浇透，彻骨地寒冷，可是腹内却是一片燥热。七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这会儿似乎也已经饿得麻木了，辘辘饥肠连叫唤一声的力气都没有。心里所剩只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与无奈。

电台与文件已全部销毁，电报员已经牺牲。方志敏与外界的联系全部隔断，耳边只有零星的枪声和延续着的风声，孤独无援的感觉此时非常强烈地升腾起来。可惜，他不能及时地得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在几天前，中央在贵州的遵义召开了很重要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博古与李德在这次会议以后几乎就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有他们说话的位置了。这次会议是红军转折的开始。如果是提前半年召开，那这支抗日先遣队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

方志敏已经来不及知道这一天大的喜讯，来不及知道这一重大的事变。他看到的，是战士们饥寒交迫，弹尽粮绝，成群成队地被敌人所俘获，所枪杀。眼看着自己所领导的这支队伍被肢解、被吞噬，一股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心痛得喘不上气来。

责不可卸啊……

他慢慢地举起了手枪，冰冷的枪身贴在冰冷的脸颊上，毫无知觉。他把手枪死死地抵在了右侧的太阳穴上，食指微微颤动着，轻轻地搭在了扳机上。

此时，只要一扣扳机，生命便将消灭，一切痛苦便不复存在。也许，这也是一种解脱。然而，他不能……

血渍红土

上 篇

第一章

一个崭新的革命的广州 毛泽东说，
彭湃出生的那个家庭就视他为怪物 方
志敏吐起血来

在 1926 年的学校、街市、军营中，有一首通俗流行歌曲。它用四句不断重复的音节加强了它那坚定不移的雄壮气氛，号召老百姓与士兵们：“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中国的两个大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携起手来，合作进行战争。这次合作，从共产党这一方面来讲，在某种意义与某种程度上可谓是真心投入。从战略决策的提出，到战略方针的制定，从作战计划的确定到战斗的具体部署，以及从先遣队的北

上，主攻两湖、攻取江西、克复福建、占领江浙、夺取陕甘、进军河南等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将领与士兵如同兄弟一般，肩并肩地战斗在同一战壕里，其情景感人之真切，非以往历次战争中的军队可比。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与颇富经验的国民党尚不可同日而语，实在是很年轻，年轻人的特性是热情高万丈。曾担任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苏联人达林看出，中国共产党除了年轻之外，“主要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在年轻这一特性上又加上了知识分子的特性。他们的热情像是一团团的烈焰火种，急速地鼓舞起一拨又一拨的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乃至拥有中小资本的商人，在一大片中国南方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新局面。

广州成了这片奇异土地的中心。

自 1842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成了开放城市，与外国通商。门户开放使广州变得与其他内地城埠不同。苏联人达林对这里观察的挺仔细：南方的男人不留辫子，而妇女大多数也不缠足。最重要的是“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真是连呼吸的空气都比北方军阀统治下的区域要新鲜了许多。

所以，当前来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江西农民代表方志敏一到广州，便被这股新鲜空气所陶醉。

当他乘坐的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道环绕要塞的粉白围墙，围墙上赫然书写着醒目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力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确实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江西九江、南昌等地迥然不同。船靠岸停泊后，方志敏所看到的情景就更令他兴奋不已了。码头上，在停泊的商船上，一队队的武装起来的工人在检查帝国主义的劣货；墙壁与建筑上，满涂着色彩鲜艳的口号标语；不论高矮屋顶，一面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在风中招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此起彼落。在街市上所遇到的外国人，也全然没有了在中国上海或是九江租界才显露出来的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久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方志敏被这里的新鲜气氛鼓舞刺激得彻夜难眠。

广州的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表现出了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饱满的政治积极性，并且已经具备了可贵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省港工人大罢工证实了这一点，工人罢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

多，为世界工运史所罕见，切切实实地教训了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者一下。在省港大罢工之前，工人们组织的形式是带有部分帮会色彩的行会，作坊主、小业主们混杂其内。革命使这些都发生了变化，行会已不复存在，小业主们被赶出去，代替行会的是工会。人力车夫工会、茶居工会、厨业工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海员工会等等，各行各业几乎都有工会，仅广州一地便有工会一百三十多个。更要紧的是，工人都必须取得工会会籍，因为录用单位首先要看的就是有没有工会会员证，就像现在求职栏中第一条就赫然标明“必须是本市户口”一样。而工会会员证也可谓非常独特，广州的工人习惯戴宽大的芦苇编的斗笠，既遮阳又挡雨，很是便利，就在这几乎是人人必备的斗笠上，都用醒目的黑漆标明其所在工会会籍，凭着这样的斗笠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组织起来的工人形成了一只只强有力的拳头，虽尚未完全武装起来，仍是赤手空拳，即便如此，也是令帝国主义与旧军阀们心惊胆颤一阵了。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只是一只手的拳头，另一只拳头是它必不可分的同盟军——农民兄弟。

此时，广东的农民兄弟也开始形成势头，全省半数以上的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们在乡间见了面首先要问：“唔有入会？”串联起来的农民便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都加入了农民协会。

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三万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农民们很兴奋，终于可以拿着手铳对着地主老财们吼上一吼了。昔日的世道翻转了过来，进了祠堂可以坐上座了，连租息都开始减免，真是上辈子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农民们打心眼里觉着这个农民协会还真管用，于是心甘情愿地替农民协会做事，支援省港大罢工、协助工人纠察队检查商货、制止粮食运港、协同军队作战……农民们和工人、士兵们站在了一起，形成了另一只强有力的拳头。共产党人先看到了这一着棋：“‘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代表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有两个人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一是在当时可算得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农民运动革命家彭湃。广东省的海丰县与陆丰县是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彭湃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会，即赤山农会。这个新生的农会开始时只有六名会员，就这一丁点毫不招眼的火星一旦燃着了干柴，真是让地主豪绅们瞠目结舌跌破眼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丰县与陆丰县先后宣告成立总农会，农民协会实际上控制了各级政权。随后，在彭湃等人的领导下，又创立了第一支常备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在枪杆子撑腰后，农民自卫军与地主豪绅展开了以减租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可谓是两手过得硬。

没有见到彭湃之前，不知道这样一位在海陆丰家喻户晓的人，是怎样一个奇特的人物，见了才知晓，平常得很嘛。

越看他平平常常，方志敏越是对他敬重如兄长，心里好生佩服。彭湃是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且在会上作了广东省农运概况的报告，发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经验”的谈话。方志敏从他的报告与谈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收益匪浅，学到了许多做农民运动的办法。彭湃与方志敏虽然是初次相识，却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一来年纪相仿，二来志同道合，于是要谈的话题很多。以后无论是在武汉筹备全国农协期间，还是“四一二”后白

色恐怖笼罩南昌城的艰苦岁月，他们都一直互相支持，互相敬重。到 1927 年，彭湃在打下深厚农运基础的海陆丰地区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自卫军武装起义，而方志敏于同年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发动了弋横起义。两下呼应，也算得上是不谋而合。1929 年，彭湃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得知噩耗后心情悲痛已极，他后来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里写道：“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 1929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

若干年后，方志敏也是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在广州遇到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时年 33 岁，基本上过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酋”的年龄段，已经是一个步步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不同，他没有上过科班的专业大学，没有留过洋，不会说外语且一直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他认真地研究中国，认真地研究农民，最最可以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恐怕就数他了。他与方志敏的会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文字，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主题依然是围绕两个人既熟悉而又都关切的农民运动问题。

方志敏：“我读了不少您写的文章，有的话真是说得好极了，尤其是说到农民的那些问题，可算得上是分析得准确，解剖得犀利。”

毛泽东心情很好，盯着方志敏看了一会儿，然后微微笑了：“我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对农民我是熟悉的。农民做田做得很苦，现在慢慢地有点晓得了，光是骂骂人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方志敏点点头：“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的农民更苦的阶级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变一变，但是他们一是不晓得应该怎样去变，二是农民不像工人那样具备团结性与坚定性。”

毛泽东：“很是。我去年写了一篇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作了一个分析，里面说到了各个阶层的革命性，总的来说，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斗争性。”

方志敏：“越是穷苦，日子过得越艰难，斗争性就越坚定，是这样吧？”

毛泽东渐渐他说得兴奋起来，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了个来回：“有许多人看不清这个事情，一味地主张与国民党合作，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看看人家的脸色怎样。再说有的人，嘴上说要依靠这个依靠那个，恰恰也是忘记了我们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

方志敏也被毛泽东的情绪所感染，不觉抬高了声音：“不单单是同盟军呢，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才是！”

毛泽东：“要做农民的工作，肩上的担子不轻哟。”

方志敏：“农民有农民的特性，这个特性很复杂，几句话都说不清楚。我和彭湃同志交谈过，他在农民问题上感触很深呢。”

彭湃是富家子弟出身，家境殷厚，不愁吃穿，是广东海丰县

的首富。像他这样的人投身于革命，造起自己娘老子的反来，有两种人都不能理解。

“首先是他出身的那个阶级，”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了一支给方志敏，“视他是个怪物。”

方志敏因为肺部有毛病，一直不敢吸烟，这次谈兴正浓、倒忘了自己的

病，顺手接过，缓缓地吸着，点点头说：“是这样的家里出钱供他念书，日子过的舒舒但但，在旁人看来，真是求之不得的享福。可他偏偏有福不肯享，还觉得过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后来闹得厉害了，他的大哥索性分家，把他分了出去，再也不认他这个亲兄弟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他被生他养他供他白米饭的那个阶级一脚踢出来啦。我们有不少的同志都是本阶级的‘叛徒’‘弃儿’呢。”

方志敏没有笑，接着说：“这个好像还在情理中，也还能想得通。最让人想不通的反倒是最最贫苦的农民们，见了他躲都躲不及，同样视他是怪物。彭湃把自己分得的那一份田地契拿出来，要分给佃农们，佃农们谁都不肯伸手拿。所以这才叫咄咄怪事，佃农们最最思想的就是自己能种上自家的几分地，可一旦真要把地分给他们，他们反倒怀疑起来，退缩起来了。”

毛泽东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这才说：“农民也有点小小的狡猾性呢，农民祖祖辈辈只有吃亏、上当、受苦、受穷，这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若想有点改变，反倒是不正常的了。所以最严峻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是这样的，我们工作的重点也要转移到教育农民上来。”方志敏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启示，自己也已深深地沉浸到这场对话中，连烟头烧着了手指头都不晓得，“广州的这种革命气氛真是让人兴奋得很，全国的形势都要变得像广州这样，革命就有望了。”

在广州呆的这段时间，使方志敏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热潮的炽热。他参加了许多活动，公祭黄花岗与沙基死难烈士、罢工纠察队死难烈士以及廖仲愷先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慰问、参观；到广东革命的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此外还多次出席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各界革命群众大团结的联欢大会。每天紧张的活动使得方志敏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在心里急切地呼吁，大革命的高潮早一点来临吧！他满怀信心，摩拳擦掌，准备回到江西大干一番，把家乡的农友们切切实实地组织起来，把反帝反封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切切实实地贯彻下去。真是恨不得立刻能使家乡改变面貌，像广州一样变成革命的土地，变出一个崭新的江西来。

方志敏怀着迫切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却不料事与愿违。在归途中方志敏的肺病复发，又吐起血来，高热不退，几濒于死。这场大病险些要了他的命。

第二章

大上海亭子间里的朋友；方志敏头一回看到了一堂锃亮的西洋家具 赵醒依说，我身兼数职，重任在身，何须要再做你的官

大病未愈，另一个突然袭来的消息又几乎将方志敏击倒：赵醒依被江西军阀杀害了。

方志敏离开广州后途经上海回江西，不想旧疾复发，高热加上咳血，病得九死一生，多亏得到中国济难会的朋友们的帮助，把他送进上海医院抢救，这才捡回一条命来。在上海医院里治疗了两个月，渐渐地能挪得动脚步了，朋友们又想方设法把他转移到江西庐山枯岭的普仁医院。

“肺病就是富贵病，专门欺负穷人和劳累过度之人，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好好治病，等治疗好了再下山去干你的革命。急不得！”朋友们这样安慰他。

重病缠身，身不由己。方志敏在当穷学生时落下的病根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要干革命，没有一副硬朗朗的身子骨真是不行，方志敏想，平时也得不到闲空，不如趁这个机会把病养好。听了朋友们的劝告，他也就答应下来了。

答应归答应，真的一静下来，又觉得静得烦躁。天天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的，跟自己坚持要打倒的寄生虫有什么两样？试图下山走走，却不料一爬起来，身子骨竟觉得软软的，腿脚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方志敏急得直跺脚。

此时，广东革命的国民政府发表了征讨军阀的《北上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紧接着，中共中央公布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统一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于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直接参与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便打响了。

黎明前的黑暗虽说短暂，却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残酷。

北伐军长驱北上，会战泊罗江畔，决战鄂南两桥，紧接着攻克武汉三镇后，锋芒所向，直逼江西。

江西地处江南内地，在皖、浙、闽、粤、鄂、湘六省环抱之中，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地理位置之重要也是首屈一指。二次革命时湖口一战后，江西大权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备受蹂躏，苦不堪言。早先孙中山为打倒北洋军阀，曾雄心勃勃两次组兵进攻江西，但均未能克复。

北伐开始，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鉴于北洋军阀把江西作为屏障东南数省的大门与要塞，更是进攻湖广的前哨阵地，于是定下了必攻江西的作战计划。在攻打武汉后，便立即将军事重心从两湖战场转移到江西战场。

在江西的共产党员们便积极地行动起来策应北伐，打倒军阀。赵醒依便是其中最坚定最积极的一分子。

赵醒依家境贫寒，中学没有毕业便被迫失学。为了生计，他远离家乡，到汉口、长沙等地去给人当学徒，指望学一门手艺，也能养家糊口。谁知道学手艺也是那样的不易，一天到晚要劳动十多个小时，吃的是残羹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衫，睡的是门板，冬天要早起生炉子，夏天要给老板打扇。帮老板娘抱小孩，也成了学徒仔的任务，倘若小孩子发脾气哭起来，一顿藤条就当头打来。赵醒依实在忍受不下去，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上海。上海的十里

洋场、灯红酒绿更是“有钱人的大地”。赵醒依想求学，然而他身无分文，连每日糊口都难，更付不起昂贵的学费；他想找份工作，却不料比登天还难。赵醒依吃尽了苦，他后来告诉方志敏：那时，只能白天到街头去卖报，晚上到戏院去跑龙套。夜深了无处住宿，就蜷缩在小菜场或屋檐下。遇到巡捕凶神恶煞地来驱赶，只好在马路上步行达旦。赵醒依感叹不已，上海之大，却没有自己的一寸立足之地。

饱尝颠波之苦，看尽人间冷暖，困苦的日子磨砺出赵醒依坚定刚毅、不屈不挠的性格。他苦苦思索，寻觅答案，逐渐认识到一条道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穷苦大众。赵醒依像一支燃着火焰的离弦之箭，笔直地奔着他认定的目标而去，决无反顾。

方志敏是在上海同赵醒依认识的。

方志敏在上海时处境与赵醒依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与几个倾向革命的穷朋友在法租界的贝蒂麇路矩鹿里合租了一间狭小的亭子间当“寓所”，有了一个落脚之处。并且在民国日报社找了份校对工作，薪金每月20块钱。工作是很累的，而且每天都是在夜间当班，常常到天亮才能校完清样。不过，毕竟有了个勉强可以糊口的工作。这段时间，他晚上到《民国日报》去上班，白天就到上海一所大学去旁听。得闲时，赵醒依便常来，这帮热血青年便聚在一起针贬国政，抨击时弊，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年轻人热血衷肠，思想活跃，在低矮狭小的亭子间里席地而坐，大发议论。七月天热得出奇，因为是在屋里，方志敏舍不得自己惟一的一件粗布长衫，便脱下来细心地叠好，自己光着背斜坐在地铺上。

同室住的洪宏义笑道：“这件长衫是方兄求饭的行头，可谓‘衣食父母’呢，在上海这个鬼地方，你有一身的力气也没用，有满腹经纶也没用，抵不上一套鲜亮的衣衫来的管用，否则，连洋行门都进不去。”

新从江西内地来上海的徐先兆突然一拳砸在地板上，气愤地说：“简直让人咽不下这口气！我刚到上海，因为向法租界的安南巡捕问一下路，竟平白无故地挨了他一记耳光！不就因为我衣着简朴像个乡下人嘛？他有什么了不起？安南巡捕也是亚洲人嘛！也是给人当差嘛！难道身价就高了？”徐先兆说一句砸一拳，砸得小楼地板咚咚直响。

大家都很气愤。赵醒依说：“在上海，欺负中国人的事可谓见怪不怪，因为他是给帝国主义当差。只要是帝国主义的一条狗，就可以随便咬人。”

“就是中国人，只要是吃上了洋人这口饭，马上味道就变了，也是恨不能要把眼珠子染蓝了才好。”方志敏感慨万分，便把自己初来上海四处求职的遭遇告诉大家。

1921年秋季，方志敏到九江报考了南伟烈大学，插入该校旧制中学二年级就读。

南伟烈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学校严格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因为它提倡信教，所以学校里基督教的祷告仪式搞得很频繁，学生们每天早晨要集中到教堂作一次“小礼拜”，每周四和周日还要作一次“大礼拜”，冗长枯燥，浪费去许多时间。方志敏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搞了个“读书会”，大讲时事，讲俄国十月革命，讲《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入门》，方志敏被同学们戏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哪里去了？”“‘社会主义’今天准备给我们讲些什么理论问题呢？”总是这么说。

“社会主义”终于惹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义”。北洋军阀驻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对方志敏视为眼中钉，亲自找到南伟烈的校长张鸾佰，要求学校开除激进分子方志敏。

张鸾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既赏识方志敏的大资与学识，又恼恨方志敏热衷共产主义与政治，并且考虑到方志敏一向学习成绩优良，在学生中颇有威信，担心万一开除了他，很可能会引起学潮和麻烦。所以对吴金彪的要求迟迟没有允诺，但是对方志敏等人的管理却更加严格了。不过这时，方志敏却自动提出了退学。

方志敏退学，完全是因为家境困难，为了他外出求学，家里欠下了六七百块钱的债务。这笔高利贷，像块千斤重石，压得全家人透不出气来。方志敏毅然退学，不想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

张鸾佰知道他准备去上海求职，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上海后可以去找一位牧师，说通过这位牧师能帮他找个谋生的职业。方志敏本想去求这牧师，但初到上海后四处碰壁，弄得囊空如洗，无奈中决定去找这位牧师试试看。

讲到这里，方志敏卖了个关子，问大家：“你们猜猜，下文如何？”自己走过去倒了一杯白水来喝。

赵醒依淡淡一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帝国主义豢养的每一条狗，只是毛色有所不同而已，本质一样。”

徐先兆摇摇头，犹犹豫豫他说：“不会吧，方兄有校长的推荐信，好歹人家会帮这个忙的。”

洪宏义问方志敏：“你到底去了没有呢？”

方志敏去了。

牧师住在一所教会办的医院的花园里，一幢两层的精致洋楼，深深地包围在绿的树、红的花之中。

方志敏按了一下门铃，仆人出来开门。他说明了要会牧师，仆人便引他到一间会客室去等候。屋里的装饰更是华丽，一套意大利风格的客厅家具被擦得锃亮，映得出人影儿来。墙上钉着一具耶稣受难的木像，木像底下的欧式矮桌上却放着一架时下最流行的手摇唱机。

等了好一会儿，身着西装革履的牧师才从楼上下来，面对粗布衣衫的方志敏，满脸是不屑一顾与惊愕：“你到底是谁？找我干什么？”

方志敏说明了来意，并且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介绍信来，双手递给牧师。

牧师飞快地浏览了一遍那封不长的信，自己先坐了下来，用手捋了捋笔直的裤缝，这才说：“呵，原来你想谋事，那可很难呀！”

方志敏说：“我并没有什么奢望，只希望能有个尽够生活的工作就满意了；在南伟烈我们学的是英语，文字上也算可以

那位牧师打断了方志敏的自我介绍，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很难很难，此地找事全靠路子，没有路子，光有本领也不成。”摇了半天头，突然定睛看着方志敏发问道，“那么你在上海有亲戚没有？有没有资助？带了多少钱来呢？”

方志敏老实地回答：“并没有亲戚，也没有许多钱，带的一点点钱因为用来做盘缠，差不多全用完了。”

牧师的神情重新又变得淡淡的，依然还是摇头、摆手：“哦，既是这样，在上海滩混碗饭吃哪有那么容易，还是早点回家乡去吧。”说罢，走到木桌

前，仔细地拣了张唱片放到留声机上，使劲地摇了几下把柄，这才扭过脸来又说道，“我告诉你，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屋子里慢慢地响起一支听也听不懂的曲子来。

方志敏讪笑了一下，对亭子间地板上坐着的几位朋友说：“就这样，就被打发出来了。很简单吧？”

赵醒依说：“这种难堪的事发生在一个贫穷的中国学生身上算不得什么。你到租界地带去转转，到处可见比我们江西、比内地更浓厚更鲜明的殖民地色彩，喝得烂醉的水兵，坐在黄包车上的高鼻梁洋人，手舞着哭丧棒的安南巡捕，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半殖民地的民众了！”

“正是这样，”方志敏陷入深切的忧虑之中，“中国自从被帝国主义侵入后，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结核菌侵入一样，一天天地精枯血衰，一天天地瘦弱下来。现在这个病人的疾病已经进入三期了，血肉俱竭，剩下的只有一把瘦骨，死期也日益迫近了。所有这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只不过是肺疾病脸颊上泛起一阵桃红罢了，表面上好看，其实是快要死亡了！”

亭子间里一阵沉默，几个人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深切沉重的长叹。徐先兆不由得流出眼泪来：“中国要亡了，中国要亡了！”

赵醒依递过去一条粗布巾给徐先兆，把手亲切地搭在他的肩膀上，说：“怎么这么想呢？有你，有我，有他，有大家，有千千万万血气方刚的中国人，中国是亡不了的！”

“那么，”洪宏义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于是，话题又围绕着“中国的出路”这一题目展开。大家争论得很热烈。有的认为，今日中国之如此孱弱，实质是工业落后，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救国救民；有的却觉得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赵醒依和方志敏却一致认为，现时的中国青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是最最危险的。

说得时间已渐渐地晚了，方志敏从地铺上站了起来，摸摸瘪瘪的肚皮说：“我们的‘时事沙龙’今天就说到这里，先去解决一下肚皮危机。”

赵醒依躺着不动，两眼看着天花板。方志敏知道他大概是又闹“赤贫”了，于是走过去一边拉他起来，一边说：“走吧，今天我请客，刚刚发饷，请你去上海有名的城隍庙，尝尝那里的特色点心南翔小笼包，好不好？我也只是听说过，从来也没有尝过呢，今天去开开洋荤。”

闻听此言，赵醒依一骨碌翻身起来，笑着说：“就等你这句话呢，不瞒你说，从早上只吃了一个烧饼，到现在已经是前心贴后心了。”

几个人说说笑笑地往外走。

从城隍庙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几个人也不觉累，沿着黄浦江慢慢地走到外滩去看景致。

1922年时的外滩，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个暴发户的繁华迹象来。沿江一排摩天大楼，全用上等的花岗岩打底座，气派中透着冰冷，气虚的人往底下一站，自己就先把腰弓起来了。黄浦江上挨个儿停泊着好几艘挂着米字旗的军舰，附近的一些水上人家赖以生存的木船早已被驱逐到江那边去了。外滩无比杂乱肮脏，抹着浓艳脂粉的妖烧女人，喝得东倒西歪的外国水兵，身着黑色香姜纱短打的地痞流氓，还有跪在路边求爷爷告奶奶的街头乞丐，组合成了上海外滩独特的一个混杂世界。

暮色已渐渐降临，有“不夜城”之称的海上海也突然抖擞起精神，一盞接

着一盏的霓虹灯相继而亮，花里胡哨地闪着光彩，晚间街道上的行人一下子也暴增了许多，马路似乎变得拥挤窄小起来。

方志敏闪身躲过一辆轰隆轰隆开来的有轨电车，喘息了一下，说：“这地方怎么这么乱？”

徐先兆四下张望了一阵说：“真的，这一条街上的人比我们一个县城的人还要多呢！真是繁华哩。”

赵醒依走到黄浦江边，叹了口气，说：“这种繁华还是没有才好，有钱人一宵掷千金，连眉毛都不抖动一下，而我们呢，吃一碗阳春面还要犹豫半天。难道是我们流的汗少吗？难道是我们出的力少吗？”赵醒依的嗓音十分低沉，但一字一句却像重磅铁锤一样砸在众人心上。

江面上吹过一阵带着凉意的风来，给酷热了一大的上海带来丝丝爽气。可是不知为什么，方志敏忽然感到一阵燥热，他厌恶这眼前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他憎恨眼前的反差那样强烈的豪富与贫穷，他再也没有心思在凉风习习的外滩逗留了，他只想一步迈回那间窄狭闷气的亭子间去。

上海时的赵醒依给方志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充满朝气，充满干劲的赵醒依像兄长一样关心着自己、引导着自己。方志敏就是在上海，就是经过赵醒依的介绍，正式地加入了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团体，当时被简称为C·Y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方志敏几乎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根本不能、也不愿意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兄长和战友已经不在人世。他伏在病床上，不住地咳喘着，好一阵子才平息下来。停了一会儿，他又问从山上下来送消息的进步青年小罗：“你一直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强逼他离开南昌呢？”话语中大有责备之意。

“赵先生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说话他哪里肯听！认定了一个道理，九头牛也拉不转来的。”小罗满腹委屈。

方志敏知道自己太急躁，引得小罗误解了，于是歉意地笑了一下，说：“我并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醒依的脾气我是太知道了。来，你声音小一点，把最后的情况慢慢地给我说说。”

其实，对于被捕和牺牲，赵醒依早已暗自做好了思想准备。

7月间，南昌出奇的热。不久，传来消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已经占领长沙，直接威逼到江西。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眼瞅着形势紧迫，于是下了狠心，把自己的20万主力军统统集中在江西一线，准备孤注一掷，和北伐军斗个鱼死网破。驻守南昌的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得到孙传芳的密报，加紧摧毁江西的革命力量。

邓如琢先是以检查户口为名，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并且抓走了好几名办事人员，查抄了全部重要文件。一时间，南昌城里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邮电信件要受检查，来往行人要受盘查，军警便衣四出活动，随便抓人，集会、结社全被禁止。

赵醒依的身份很特殊，说起来，他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属江西支部的创建人，又是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的组建者。当时在江西初步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当时的江西军阀，视国共两党皆是洪水猛兽，并且取缔国民党的一切活动，国民党党员在他们眼里是“赤化党”、“过激分子”，捉到国民党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像赵醒依这样的“双料党员”，更是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要彻底消灭的主要目标。

江西邓如琢的查封，原指望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消除异党，好一心一意对外御敌。却不料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为不满，各地纷纷函电谴责。邓如琢考虑再三，决定欲擒故纵，外松内紧，命令暂时启封国民党省党部，并且释放了被捕人员。表面上做足了文章，暗地里查处得更紧了。赵醒依，显赫地被列在首先要处置的极危险人员名单的首位。大家劝他暂时隐蔽一下，他沉思片刻，坚定他说：“我负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并且把以后的工作都作了安排。他要别人到九江去，自己却留下来做联络工作，秘密发动群众，作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

说到这里，小罗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嗓音哽咽。方志敏背过脸去，悄悄地擦掉夺眶而出的泪珠，转过身来紧紧地扶住了小罗的肩膀。小罗不由得大声地抽泣起来，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说：“老方，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不！”方志敏坚定他说，“我要知道，我要知道醒依是怎样的坚强，更要知道敌人是怎样的残暴！”

小罗点了点头，想了一下，轻轻他说：“那一天我再也忘不了，是8月10日……”

那一天好热好热，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毫无遮掩地直射下来，树叶子都被烈日烤焦而卷起了叶边，连蝉仿佛也热得口干舌燥发不出半声鸣叫了。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赵醒依支撑着病后屠弱的身体，急匆匆地向明星书店赶去。

两年前，明星书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个书店楼下卖书，大都是半公开地销售一些进步书刊与读物。楼上比较宽敞，从临街的窗口可以看到外面街面上的动静，说是店员宿舍，其实这儿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点。赵醒依常来，有时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工作，有时和前来购买书籍的青年学生谈心。他一方面可了解各地的革命活动情况，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做宣传工作，动员向往真理的青年学生热心投身革命。

这么一个十分活跃的工作点，自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1925年冬天，北洋军阀方本仁就派军警搜查过明星书店，并且宣布凡是署有“青年”二字的书报一概没收，不许发售。并且在同一天扣留了正准备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赵醒依等仁人。赵醒依被捕后即送交军法处过堂，一次又一次的审讯并没有使他退缩屈服，他还从狱中带出一封简短的信来，嘱咐战友说：万一他牺牲，留在南昌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继续奋斗，决不能与反对势力妥协。赵醒依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一点情况，方本仁也无法判他的“罪”。又因为党组织的营救和公正舆论的压力，在关押数日后，赵醒依等仁人被释放了出来。

坐了一次牢，赵醒依毫无畏缩之意，反而更加拼命地工作，连晚上也常常到明星书店去，点上一盏煤油灯，戴上一副近视眼镜，便在昏暗的灯光下处理各地寄来的“做生意的信”和“普通”书籍。这些信件与书籍的空白处，都用明矾水写着许多字，有上级的指示精神，也有各地的情况报告，用煤油灯一烘烤，便会在字里行间显出密密麻麻的黄色字迹来。赵醒依看完这些材料后，也同样用毛笔蘸着明矾水在信上或书页上，再写上他们的工作汇报或会议的有关决议，寄往党的上级组织或分发各基层组织。夜深了，四周一片寂静，谁能猜想到在明星书店的阁楼上还有这样一位为了革命工作而日以继夜的人？

赵醒侬对于被捕、坐牢是有所思想准备的，但要让他为此而放弃他的工作则是绝不可能的。这几天，他正患着痢疾，走起路来脚下如同踩着一片云，软绵无力，飘摇不定。妻子劝他休息一天，他不肯。妻子叹了口气，紧紧地抱着他那件出门穿的蓝布长衫说：“你每日出去做事，我可曾拦过你一回？今天你看你自己病的成什么样子？脱了个人形似的，就这副样子还要出去吗？外面的风声也不对头，军警抓人可疯了。你不替你自己想想，也要替我们想想啊！你要是又被抓了去，我们怎么办呢？”

赵醒侬坐在木凳上，静静地听妻子说完，耐心他说：“其实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们将来的日子能过得更好，能吃上一口安逸的饭，等世道变了，等北伐军来了，就再也不用跟着我担惊受怕了。”

妻子依旧不肯将蓝布衫给他，固执他说：“你说的这些，我也全懂，可是今天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右眼皮子从早上跳到现在。”

赵醒侬扑味一声笑了：“用片树叶子上就不跳了！你瞧你怕的。”说着，又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几个铜板来递了过去，说，“得，今天又是‘无户赤贫’了，你先将就着买几个烧饼，回头我给你带银子回来。”

妻子被他说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无可奈何地帮赵醒侬穿上长衫，眼看着他摇晃着虚弱的步履走出了家门，没想到这一去竟是再也没能回来。

赵醒侬心里有事着急，刚刚走到离书店不远的百花洲时，路边突然蹿出来好几个便衣侦探，拦住他的去路。赵醒侬大声呵斥道：“你们要干什么？青天白日的乱抓人吗？”

几个身材高大的便衣不由分说，上来便把他包围了，推推搡搡押送到稽查处。紧接着他们开始了早已计划好的全面行动，搜查并封闭了明星书店、黎明中学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又抓了一批工作人员。

江西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专门设有一间审讯室，屋子不大，刑具却不少，满满当当挂了一墙。赵醒侬被捕以后，几乎每天都要被带到这里来过堂，所有的刑具都已尝遍，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乎连路都不能走。赵醒侬每次受刑后回到狱中，连疼痛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了，趴在草铺上半天都不能动弹。难友们见了佩服又伤心，找来盐水为他洗伤口，他仍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牢房里开饭，他每次都挣扎着起来，将一碗夹着许多石子的霉米饭吞咽下去。难友不解，他解释说要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后来有几天没有来传讯他，赵醒侬的体质和精神慢慢地恢复了些，难友们说：“是不是敌人对你不感兴趣了？你的性子那么硬。”赵醒侬在草铺上坐正，说：“敌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未曾得到，怎舍放弃？无非是在琢磨着变个招数罢了。不去管他！”说罢仍然是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果不出他所料，过了几天，来了个满面和气的狱吏，对赵醒侬开口便用了个“请”字。说是江西警备司令刘焕飞亲自来了，想要见他，请赵先生去谈谈。

赵醒侬被带到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客厅里。他在一张雕花红木太师椅上刚刚坐下，接着就送上来了杯热气腾腾的香茶。赵醒侬稳稳地坐在那里呷茶。

走廊上一阵皮靴乱响，刘焕飞里面穿了一身土黄色的哗叽军服，外面却套了一件素缎长袍，脚登一双齐膝的马靴进来。刘焕飞说：“是赵先生吧？早就很仰慕你，有学有识，才志过人，终于可以谈谈了。”

赵醒侬说：“素不相识，志不同道不合，有什么可谈的呢？谈也是没有

结果的。”

刘焕飞笑着摆手道：“此话差矣。还未曾谈，怎知就没有结果呢？”

赵醒侬也笑笑说：“我是决不会听从你们的，难道你会听从我们吗？”

刘焕飞说：“赵先生说笑话了。”

赵醒侬更笑：“所以，谈也是没有结果的。”

刘焕飞说：“其实赵先生是最聪明不过的，为什么不肯为孙总司令做事呢？孙总司令还是非常赏识你这样的人材的，知道你只是宣传赤化、误人了歧途。你不是跟着共产党这么瞎闹乱闹，怎会闹到这种田地？衣衫没得穿，饭也没得吃，更不要说盖屋置地了。你家父母妻儿恐怕也不忍看到你这样子吧？”刘焕飞说得起劲，手一挥一挥的，“七尺男儿立在人世，要么立马挥戈当将军，像我这样；要么熟读百书做学问，当学者啦，做商人啦，路也很多哟，何苦要一条黑道走到底，执迷不悟呢？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迷途知返，悬崖勒马，我们都是同样的欢迎。”

赵醒侬说：“你那个孙总司令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北伐军已经到了武汉三镇，打得他节节败退，眼看是朝不保夕，你跟着他，不还是死路一条吗？此时倒戈起义，我们也是欢迎的。”

刘焕飞说：“我是说话算话的，从不放空炮，现在就可以委任你一个官做。”

赵醒侬说：“我身兼数职，重任在身，何须要再做你的官！”

刘焕飞费尽口舌，一无所获，只得叹了口气说：“赵先生太固执了。像赵先生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

赵醒侬复又端起茶杯，慢慢地呷了一口，从容地说：“不敢瞒刘司令，从醒侬立志投身革命时起，就做好了死的准备。”

到了9月中旬，湖南、湖北两省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南昌郊外，已可隐隐约约听见北伐军隆隆的炮声了。

这一天凌晨，赵醒侬正在草铺上熟睡之际，被狱吏轻轻摇醒，告诉他，要给他换个地方。

难友们也都纷纷醒了，对这时传他出去疑惑不解，多数难友往好处想：兴许是因为北伐军快到了，所以要先将赵醒侬这样的要犯转移走？

赵醒侬从容不迫，穿上自己惟一的那件蓝布长衫，跟难友们一一告别后，他被押上一辆马车。马车四周被布帘围住，看不清路，只有马蹄声敲击街道的嘚嘚声。

马车停住了。赵醒侬下来，抬眼望去，四周一片漆黑，在微微显露的晨曦中可以看见不远处一排高大的城门楼子，那是南昌城的德胜门。脚下是一片芝麻地，芝麻正开着花，被众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踩踏得枝断叶残。赵醒侬心里明白，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他随即要求给家人写一信留作遗嘱，并没有得到同意。

1926年9月16日，赵醒侬被邓如琢下令枪杀。

三日，北伐军一举攻克南昌城。11月8日，再克南昌。南昌二十余万人集会，悼念赵醒侬烈士。方志敏抱病下山到会，对天悲号痛悼亡友，称赵醒侬为：“大革命以来在江西为人民牺牲的第一人！”

第三章

邵家三仔到京域念书去了 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邵式乎拿出一件“宝贝”来给方志敏看 咄咄怪事，李钧烈下令解散了农民自卫军 “张天师”府上闹暴动

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询问中共中央，如何看待蒋介石？张国焘说：我们的方针是既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与陈独秀那股子忧心忡忡、生怕开罪了蒋介石的做法截然不同，各地的农民运动倒是进行得蓬蓬勃勃、如火如荼。不过，这“痞子运动”越是搞得热火朝天，陈独秀不知怎弄的就越加担惊受怕。

1927年初夏时的南昌。

虽然还未入伏，天气却变得燥热起来。这一年的雨季似乎也来得比往年早，细雨濛濛，总也不爽，下雨的时候，既粘又湿，不下雨的时候，且闷而热。

天已近傍晚，淋淋漓漓地又下起雨来，时缓时急，时大时小，屋檐下仿佛织起了一道透明的珠帘，雨点敲打青石板上，丁丁冬冬连续不断地演奏着一曲“夏雨小调”。

方志敏忙完了一天的公务，离开省农协，回到了自己的一间临时住处。这个住处的院子小而僻静，房东都到乡下去了，把一间闲着的西屋让出来给方志敏住。其实方志敏从来没个一定的住处，忙起来，就在省农协过夜算了。饿了，也就是叫勤杂员到街口去买两个烧饼，就着凉茶算一餐。这一次回到住处，是因为他老惦记着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白日里忙而乱，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今天好不容易挤出点时间来，他给勤杂员说了一句，就冒雨跑回来了。

路不太远，但衣裤却全湿了，只得脱下挂起来吹干，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好在无人，便扯过床单裹在身上，急急忙忙地找出笔砚，坐在八仙桌前写起来，没有多一会儿，千把字的一篇文章便挥就而成。

阴雨天本来就黑得早，再加上南昌城里时常断电，有灯也不亮。方志敏找出一截蜡烛点上，就着烛光又将文章修改了几处，然后找了个信封写上，打算明日投送到民国日报社。

“有人吗？”院子里有人在敲门，停了一会儿，又问了一句：“正鹄在这里住吗？”

方志敏挺纳闷，这个住处没有几个人晓得，外人一般是从来不来的。可要说是外人吧，怎么又叫出他的小名来了呢？他轻轻推开窗户望去，院子里果然站了一个人，身板很是高大魁梧，赤了一双脚，但是一柄油纸伞遮了半个脸，所以横竖瞧不出是谁来。

方志敏问：“谁呀？”

门外那人藏住笑说：“查户口的。”

这一句话暴露了口音，方志敏脑子转得很快，立即猜出了来人是谁，便笑着迎了出去，一边说：“查户口，先把你给查掉才对！是不是？邵大哥。”

油纸伞下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方志敏没有猜错，来的果然是省农代会的特派员邵式平。

其实要论年龄，方志敏还要比邵式平大一岁，只是因为邵式平长得身材高大，哪怕是融入人群之中，他那高人一头的目标也十分醒目，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邵大个”。叫着叫着，后来不知怎的演变成了“邵大哥”，连方志敏也随着大家这样叫起来。

他们两个是同乡，都是弋阳县人。邵式平家在弋阳县境内最北端的邵家畈村，家境中等，人口众多，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过书，吃了许多不识字的苦楚。其父邵茂癸狠下心要在这一代中培养出一个能认字会记账的人，勒紧腰带供邵式平念私塾。念了两年之后，私塾先生教不了他了，回邵茂癸的话说：“你家这个三仔可以送到别处去念吧，我只能教到他这一层了。”邵茂癸又喜又愁，喜的是儿子天性聪慧，不负父望，果真是块念书的材料；愁的是家道中落，一日不如一日，打长工挣不得几个钱，种稻谷收不上几担禾，自己又病重在身，要供三仔再念下去，怕是难啰。但是邵茂癸是个人穷志不短的庄稼人，直到自己临终，也没有放弃让三仔再念书的念头。谁料他一去世，家道更难，邵式平的母亲王氏一人拉扯着五个孩子，全靠亲戚邻居帮忙，勉强把个家支撑了下来。直到邵式平满了18岁，家中的状况略略有所改善，王氏终于还是狠下心来，央求亲戚们资助，送三仔邵式平考上了弋阳县立的高等小学。邵式平在这里认识了同校的方志敏，并且分在一个班。同窗三年，结为挚友。

后来，邵式平小学毕业，又考上了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学。说来也巧，与此同时，方志敏也考上了江西省立南昌甲等工业学校。两个人从弋阳念书又一起念到了省城。方志敏积极参加闹学潮、读新书、讨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种行动，也给了邵式平很大的影响。

到了1922年秋，邵式平从南昌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农家娃子终于要到京城去念书了。母亲王氏激动得眼泪纵横，虔诚地在亡夫邵茂癸的灵位前点上了三炷香，感谢亡夫在天之灵的保佑，祖坟上冒出了青烟，三仔真的当上状元，到京城去念书了，真是几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哩。邵茂癸死不瞑目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的的确确没有看错，他家这个三仔大有出息。但是有一点邵茂癸却决没有料到，他家的三仔读了一肚子的书，一肚子的学问，却并没有再回到邵家畈给自家盘算打点怎样过日子，倒是甘愿拎着脑袋走上了一条充满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崎岖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1922年的北京，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念书的地方了。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批传播者。他们热血沸腾，摇旗呐喊，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首先在北京的知识界、学生界掀起了一股新浪潮，力图要做到让新鲜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他们向中国工人呼吁，“起！起！起！！勤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觉醒的日子了！”工人们并不知道“今天”应该是自己觉醒的日子，用茫然、沉默与不信任来回应学生。学生们毫不气馁，革命热情比打足了气的皮球还膨胀，他们重新走进人力车夫、铁路工人、煤矿工人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去，把好不容易才学会的学生腔改掉，从体贴关心工人们最切身的利益出发，逐渐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与支持。用“雨后春笋”这个词来描写当时在北京的党、团组织的建立恰到好处，甚至可以听得见那鲜嫩的竹笋在浇灌了马克思主义春雨后的噼噼啪啪的抽竿拔节声。一大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热血青年云集在北京，把个古老沉寂的京都搅得沸沸扬扬。二十多岁的邵式平在这个时候来到这种情形下的

北京，真是如鱼得水，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都注定他将要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同他后来在入党宣誓中所说。

邵式平常去北大红楼听党课。这是座现在已是很普通陈旧的二层楼的红砖木建筑，坐落在北京一个名叫沙滩的闹市区。红楼在周围一片破旧低矮的民舍中显得十分簇新耀眼。这里是北京的最高等的学府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最高等的学府之一。李大钊、赵世炎、瞿秋白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无一不是穿着长衫、戴着眼镜在这里进进出出，频频地站立在讲台前，耐心地告诉坐在下面的学子们，什么是“问题与主义”，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什么是“空想与温情”，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为了培育、浇灌这些初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新苗，他们不能不花费更多的一些气力。

好在这些气力没有白费。

邵式平受熏陶与感染颇深，他知识丰富，有自己的见地，又加上性情豪爽，为人厚道，每与同学相聚，总好评论时政，并且乐于助人，在周围同学中很有声望，被大家戏称为“无穷大博士”。由于同学们的选举拥戴，他又担任了北师大的学生会主席。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北京各界开始声援。学生们手挽着手，臂靠着臂，排着雄赳赳的队伍到街上去游行，高呼着口号，群情激奋。邵式平作为北师大学生头领，当仁不让地走在队伍前列。再接下来，是一队全副武装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警出现。这帮俗称为“黑狗”的军警一个个高举警棍冲进学生队伍，劈头盖脸地打来。学生们不免学生气又浓了一点，想事到临头却还打算与这帮军警讲讲道理，企图以理服人。哪知“黑狗”们不信理，只信警棍，包括邵式平在内，许多人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打得头破血流，整个队伍溃不成伍。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了1926年3月18日。

在这一天，人们集中地看到了北洋军阀段祺瑞的两副面孔：欺骗与残暴。当反对八国通牒的游行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口时，曾经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表示过要“保护”这次和平示威和请愿行动的北洋政府军警们，却以排枪和子弹“迎接”手无寸铁的群众与学生。鲁迅先生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立即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李大钊等人列为段祺瑞执政府的缉捕名单榜首，一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与学生领袖被冠上“暴徒”之名，排入通缉范围之内。邵式平也在其中。为了保存革命的骨干力量，同时也为了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罪恶暴行，有相当一批骨干分子被安排撤离北京，派往南方各地开展工作。邵式平以北京沪案后援会湘鄂赣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回江西。这以后，邵式平便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开始踏上“职业革命者”更为艰难的道路。

邵式平回到南昌的时候，正值北伐军入赣前夕。南昌与北京一样，反动军阀在作最后的挣扎，缉捕革命者的风声甚紧，南昌城里军警密布。

方志敏看到邵式平“打”回老家，喜出望外，多了一个密友，也多了一个帮手。邵式平果然不负众望，回来后没多久，便在贵溪干了件惊动四方的大事。

读过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水讲》的人都知道，若不是那个喝多了酒变得自说自话的洪太尉揭起了压盖在一百零八个魔褐头顶上那块至关重要的井盖，《水浒》的故事，恐怕就得改写成另一副套路了。知道这个起因还不算

什么，重要的是谁用这块井盖镇压了一百零八个魔羯？

是张天师。

说起来还真有其人，这就是早在东汉时期就被皇帝御书丹诏册封为“嗣汉天师”的道教头目张道陵。因为是被皇帝所册封，他与他的家族便都具有了当然的法定保护，这种保护持之以恒，现在传到了他的第 63 代子孙张恩溥。

贵溪境内的西南面，有一座秀丽山峰，其山两峰对峙，状如一龙一虎，因此被人称作为龙虎山。张道陵的后人就世代地居住在龙虎山上的“上清宫”里。这“上清宫”依山而建，修得气势宏大，院落重重，一般人根本是难以入内的。传到张恩溥这一代，有封建迷信作他的护身符，反动统治阶级把他们家族奉若“神明”、实际上张恩溥已经成了江西省境内极有势力的一方恶霸地主了。除了上清宫，他还拥有十多处庄园巨宅，占据着五千多亩不上官税的良田，面积遍及附近八个县的范围。老百姓说，张恩溥若是生气跺一跺脚，八个县的地皮都要颤一颤呢。不论荒年饥岁，佃农们要缴纳的粮租是一粒也不能短少的。稍有迟误，轻则严刑拷打，重则扣押监禁。张恩溥自己住在“天师府”里，武装警卫、厨子佣人、丫头保镖、粗细杂役，有上百个人侍候。他顿顿鸡鸭鱼肉，日日人参燕窝，吃饱喝足了便画符打醮、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这样的封建地主恶霸不打倒，要把贵溪周围几个县的农民们从封建剥削和封建家法制度下解放出来就成了一句空话。

原先在北伐军刚到南昌时，方志敏曾经委派了专人到贵溪去没收张恩溥的财产。可是由于事先对难处估计不足，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动群众，张恩溥得到消息跑掉了，使方志敏的计划落了个空。这一次邵式平回来了，他既熟悉当地的情况，脑袋瓜里又有主意，方志敏就又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邵式平到贵溪先找到了中共贵溪党组织的负责人江宗海。两个人一核计，决定先发动群众，打消老百姓和农民自卫队员的顾虑。这一步工作可不好做。只要一提起张恩溥，老百姓们便举着两个巴掌连摇四摇：“莫提！莫提！要想捉张‘天师’哇，那是瘦鸡母屙硬屎——难着哩！张‘天师’是娘娘脚，摸不得的。”年龄大一点的就贴着邵式平的耳朵，神神秘秘他说：“晓得啵？这个张‘天师’可不是一般的老道呢，他能呼风唤雨，还有点豆成兵的一手绝招，非常人可比。你们想去捉他，不是拿个鸡蛋往硬石头上撞，白白捅一个马蜂窝吗？弄到后头，怕是连你们自己都保不牢呢。千万莫去做这等险恶的事！”

邵式平和江宗海真是哭笑不得。封建迷信织成的无形的网络比用真刀真枪地干还费力气。它成了束缚农民的枷锁，同时也成了邵式平企图前进的障碍。

邵式平苦口婆心地去做工作，毫不舍弃地去做宣传。邵式平操着他的家乡话和农民们摆龙门阵，提出了几个问题叫他的老表们答：“你们说这个张‘天师’会点豆成兵，谁见着了？要是他会这一手，那为何还要用那许多的护宅乡丁？摆上一把豆子不就成了？多便当的事他怎就不会做呢？他是个傻子？不晓得养着那么多的人要耗费粮财？”

老表们答不出来，只是讪笑。

邵式平也笑，又说：“好，这个说不上来那就先莫说。我再问一个，你们说他能呼风唤雨，这般了得，可又有谁见了？”

一个老表冒了一句：“那是听人家传的。”

邵式平说：“所以啊，都是传来传去的，谁也没有真正见到。假如说真有这般了不得的本事，那为什么不缺雨时唤雨，缺风时呼风呢？眼巴巴地瞅着每年种庄稼旱时旱、涝时涝，他有法子怎么就不显显神威呢？庄稼收成好了对他收租子也有利呀，省得催租子又劳神又劳时，他怎么又做傻事呢？”

老表们不再言语，只管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竖着耳朵听讲，脑子里在飞快地运转、分析，觉得这个邵老表说的还真是占着几分理。

江宗海接上来说：“其实要我说呀，这个张恩溥就是贵溪的一霸！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大家哪一个不是瞧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有说张恩溥做过一件人事的，请把手举起来！”

屋子里没一个人举手。

江宗海又提问：“有谁没有种他家的田，没交他家的租，没吃过他的苦头的，也请把手举起来！”

仍然没有一人举手。

邵式平收住了笑，从条凳上站了起来，说：“这就是说，大家都是他的佃户，都受过他的欺压，对不？”

老表们声音低沉着：“是这样子的。”

邵式平说：“怕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总受这种欺压吧？世道不平等，就是因为有张恩溥这样的人欺骗压榨我们穷苦做田人，不是我们命苦，是这个世道太不公！要想变世道，只有老表找老表，绑在一起闹。谁能救我们？张‘天师’不能，李‘天师’也不能。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拔除了这个恶钉子，老表们的日子才会好过些。现在，北伐军节节胜利，邓如琢也败了，张恩溥的靠山倒了，现在不拔掉他，更待何时呢？”

农民们终于给鼓动起来了。邵式平和江宗海趁热打铁，在严密的组织下，选拔了一部分最坚定的农民骨干，成立了暴动队。他们又联系了北伐军。北伐军表示大力支持，立刻调来了一个团的兵力协助农民暴动队。农民们的情绪更高涨了，一时大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了。

按照计划，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邵式平、江宗海率领着一支农民暴动队，带着梭镖、马刀、锄头、棒棍，高举着火把，冲上了龙虎山，打进了上清宫。农民们这才发现，原来捉拿这个“神权皇帝”是这样的简单便当，这样的轻而易举。他们把“嗣汉天师府”的朱红漆金牌额扯了下来，将张恩溥奉为至宝的天书符箓搜了出来，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农民们在地窖里发现了成百上千个空空的陶瓷罐，据说这就是张“天师”用来镇魔装妖的。农民们气愤极了，一扁担狠狠地砸过去，泥巴做的罐子掉在地下摔个粉碎。老表们得意洋洋，坐在了上清宫镇妖堂的红木雕花太师椅上，指着缩成一团的张恩溥说：“今天老子来镇妖，先镇镇你这个欺世的妖魔！看你还敢不敢玩弄花招欺负我们老百姓了？”

一个农民暴动队员说：“哎，张‘天师’，怎么不点豆成兵来跟我们打呀？”

另一个农民暴动队员苦着脸说：“哎呀呀，今天是忘了带豆子啦！”

“那你不会呼风唤雨？吓唬吓唬我们也好呀！”

“哎呀呀，碰上你们，天王老子什么都不灵啦！”

大家一阵接一阵地哄笑，笑声震得上清宫的四壁嗡嗡作响。那个驼子张恩溥低着头一声也不吭，往日里的威风连点影子也找不见了。

邵式平坐下，把这次去贵溪搞农运的情况讲给方志敏听，乐得方志敏哈

哈哈大笑，说：“农民们为自己的几亩地而劳作的时候就像一盘散沙，一旦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成了一只铁拳。这只拳头可以砸得碎一切呢！”

邵式平也笑不拢口，拿出一个小布包包来，用手捂拢着，卖关子说：“这回还得了个宝贝呢，你猜也猜不到！”

方志敏说：“是张恩溥的金银细软呀？”随后自己又否定了自己，“金银细软也不止这么一点点啊，张恩溥是多大的家业哩，打掉了这个地头蛇，够几乡的农民吃上好几年呢。”

邵式平说：“莫把话岔开，猜！”

方志敏把被单布围了围紧，头一歪说：“开头你就说我猜也猜不到，我还花力气猜它做什么。”

邵式平洋洋得意地笑道：“自然你是猜不到的，还是亲眼瞧瞧吧。”说着，打开手中的布包，左一层右一层，揭开来，是一方羊脂玉的印章。“这东西，是张恩溥家祖传的‘玉玺’，也不知是传了多少代了，瞧这玉的成色已经很老了哩。”

方志敏接过“玉玺”来，细细地看了一遍，叹了口气说：“这么个拳头大的东西，就是权力的象征哩。有了它，张恩溥就可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随心所欲。这个东西要得保存好，这是我们的战斗成果，还要拿给四乡的老百姓看，让他们都晓得，什么‘天师’‘鬼师’的都靠不住，要信共产党，信老表们自己的力量。要用这件事再对农民们进行一次教育。”

邵式平说：“现在贵溪四围几个县的农民们都晓得这件事了，都跑来看张恩溥戴着高帽子在县城游街呢，而且都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农会。”

自古中国的农民就笃信这一条：百闻不如一见。要让他们相信一个新的标杆，首先要把旧的打破踏在脚下，不破不立。你给他画一桌子的山珍海味，不如端给他一个蒸好的白面馒头。中国的农民是最少幻想、最讲实际的。农民们对改朝换代的事情总是表现得兴趣不大，他们讲，不管是哪个皇帝坐了金銮殿，农民依旧还是农民，还是要种田种禾过日子。但是，如果他们连“种田过日子”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么他们也会思忖着改朝换代的可能性了。

半截蜡烛的明亮火苗在活泼地跳跃着，映照得这间小屋子里暖融融的，外面的雨也渐渐地收住了落势，天已经全黑了，从不远处传来卖馄饨小贩清晰的叫卖声。

方志敏忽然跳起来，匆忙地收下晾得仍是半湿不干的衣裤穿着，一边笑嘻嘻他说：“不瞞你说，我还不曾吃晚饭呢，肚子里早已唱开了空城计。你是远道而来的客，理应我作东，请你吃夜宵。要几碗馄饨？”

邵式平也笑：“我也是带了个空肚子来的，不客气啰，来三碗吧。”

方志敏说：“行！喂饱了你，还求你看篇文章呢。”说罢，拎了只锅子就跑出去了。

不一会，馄饨买来了，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片刻之间，风卷残云般锅子已经见了底。邵式平抹了抹嘴说：“勉强够得。把文章拿来看看。”

方志敏便把锅碗推到一边，将方才写得那篇东西拿出来。邵式平凑到蜡烛光下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有几处还念出声来。

文章的题目是：《李烈钧原来如此》。

李烈钧的资历很老，早年在日本留学，1907年便加入了同盟会，可谓是国民党里的元老派，后来做到安徽、江西都督，护国军二路总司令。北伐开始后，他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他对北洋军阀是投反对票，对共产党也

是投反对票。江西的老百姓把“督军李烈钧”差不多当成了一个偶像来供，却不晓得李烈钧的骨子里只钟情蒋介石。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左派元老纷纷指责批判，誓不与蒋共天，李烈钧却把屁股彻底地挪到了蒋介石的右派行列里。

方志敏第一次和李烈钧唱对手戏是在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欢迎农工代表大会上。方志敏代表农民向省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要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第二要取消名不符实的保卫团，把枪支和经费拨归农民协会办自卫军用；第三是各县的农民协会经费应该由各县政府津贴。

此时的李烈钧，挂的头衔是江西省政府主席。在会上，他便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给了方志敏一个回答。他慢慢地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不急不恼，面带笑容他说开了。讲到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点头道：“当然、当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固然要惩办的，不过不用那么着急，此事也得得宽容一点儿。另外，取消保卫团，再去办自卫军，这也很没有必要嘛！”讲到关于自卫军经费的事，这个老国民党政客的滑头手腕更显露出来，云里雾里足足说了好几分钟，也没人听得懂这经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方志敏倒是听明白了，实质就是一个子儿也不给你农民自卫军。

这还不算什么，过不了多久，李烈钧变本加厉，公然又指示省政府下令解散全省各地的农民自卫军。方志敏一下子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是反革命派攫取革命民众的武器准备屠杀革命民众的一件极为严重的事件！

农民自卫军是江西农民的枪杆子拥有者。农民自卫军被解散，也就意味着丢失了枪杆子。丢失了枪杆子，也就等于丧失了农民自己的权力。没有了权力，没有了枪杆子，还谈什么农民革命与改造旧世界？

方志敏抓枪，李烈钧深谙此道，也拼命在抓枪。

方志敏气愤之极，一心要揭露李烈钧的暗藏嘴脸。原先还要顾及一点国共合作、方方面面的关系及缘由。这下可好，李烈钧自己跳将出来了。方志敏于是写了这篇《李烈钧原来如此》。

邵式平拍案叫好，说：“读起来很痛快、很有分量，尤其是这几句，‘……李烈钧本来是个三教九流的江湖派——他在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中自己说的。他不知党，不知道国民政府，当然更不知道民众。他是我们民众的敌人——尤其是我们农民的敌人！我们再不要为李烈钧所骗了！李烈钧原是个摧残工农阶级的反革命派’！”稍停了一下又念道，……李在汉口说，跟着蒋介石倒是值得的。好吧！赶快去跟那位青洪帮的老蒋吧！尽量去反动。我们民众好一块把你们送到坟墓里去！”这个结尾结得干脆、有分量！”念完，邵式平赞不绝口，“不愧是南伟烈大学的优等生呢，文章做得好！”

方志敏也笑：“什么优等生，是叛逆生，差点没被开除呢。”

方志敏的这篇文章，4月12日在武汉的《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5月8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南昌市肃反讨蒋大会，号召群众一致向左转，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打倒蒋介石。

5月20日，南昌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声讨蒋介石，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李烈钧的国民党党籍等决议案，同时选举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为执监委员。

这一段时间里，方志敏、邵式平他们真可谓是忙得不亦乐乎，有这么多

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使他们觉得每一天的时间仿佛都不够用。蒋介石虽然在上海已经撕下了蒙在面孔上的那层薄薄的假膜，但在其他范围内，尤其是在一些基层与边远地区，他的势力触角还尚未达到。方志敏们的工作势态一时间显得那样蓬蓬勃勃，热气腾腾。他们不是不知道形势的严峻，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翻手云覆手雨的嘴脸。但他们仍在努力地干着，心里的那一团烈焰般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由于信息并不是像今天一样的灵便，他们一时间并不晓得陈独秀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又说了什么。这些，也都造成了当时的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便是陈独秀越来越忧心忡忡、步步忍让，交枪、交权时有发生，严重地阻碍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可是在另一面，在基层，农民运动由各地的方志敏们推动着、鼓噪着，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主老财们能跑的都跑到城里去了，农村中大多成了农会会员们的天地。

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已经形成一种势态的时候，如果有人能顺势利导，牢牢地把握住前进方向的舵盘时，那这一股前进的势流恐怕再有十个蒋介石也难以抵挡。那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进程又会是怎样的呢？

不过，历史仍是不可假设的。

1924年时，共产党的“家长”是陈独秀，而陈独秀则比较听从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遥控制和指挥着中国的这场崭新的革命。

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的一员，而其宗旨在于“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这会令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全中国的革命分子要集中到国民党里去？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集中在共产党里去呢？其实当时的情况真是很特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也喋喋不休地给大家做工作，一遍又一遍地阐述他们的理由。这个理由很简单，其一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目前尚还幼弱，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肩膀头子还担当不了指挥全中国革命这副重担；理由的第二点就是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只有国民党才能唱红这一主角。所以，年轻的共产党要做的事，便是竭尽全力，捧红主角，角儿红了，戏才能红。后来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口号，则“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孙中山雄心勃勃，他信任和依靠共产党及苏联人，他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里来，他支持出现两党一制的局面，他一心一意要改组原先那个腐败、落后、迟暮的国民党。他倒是差不多快要做到这一点了，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迈开穿着草鞋、布鞋的双脚，斗志昂扬地跨入到国民党里来了。像是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一个重病患者的肌体里，使这个重病患者渐渐地增强了体质，面色变得红润起来，双腿有力，站立了起来，开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行走，展开了双臂呼吸起新鲜的空气。不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孙中山自己被病魔击倒了。人终究敌不过

自然与命运。

蒋介石亲奉汤药，侍奉周旋于孙中山病榻之际，又一次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如履薄冰似的在向权力的中心靠近，他急于想把那根权杖揽在怀里，尤其是在孙中山死后，他的这个念头就像是掺合了活性干酵母剂的湿面团般急速膨胀起来。此时在他自己的党内，蒋介石尚未形成中坚，他的脸上始终对共产党人挂着迷人真挚的微笑，他穿着笔挺的军服站在黄埔军校的演讲台上，语气肯切地告诫军校全体学员：“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个

口号，是帝国主义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的

口号，还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什么？总而言之，总理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以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不过事隔不久，他就把自己的话抛到九霄云外，自己也煞费心计地玩起毒计来。

国共首次合作，国民党得益匪浅。在这之前，国民党的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人数颇少，品位也不同。共产党则是最擅长于发动基层，大搞群众运动的。当共产党员们一跨入国民党后，看到国民党的组织这样单薄脆弱，立刻摩拳擦掌地帮忙操作起来，不到一年，便取得了空前惊人的大发展。国民党的组织机构从原先的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几个地区呼啦一下布满半大中国，人数猛增，遍地开花结果，并且逐步建立了一支属于国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国民党的队伍立刻变得雄赳赳气昂昂起来，有了本钱，脸色和语调也就不一样了。

到了1926年的7月，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中国贫瘠、混战的大地上，这时，开始了中国的南北大战。中国民众渴望了几辈子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便是这次北伐出师的目的，要求北伐的空气浓烈百倍，要求打倒北洋军阀的口号响彻云天。不论在何处，若是集会，必定是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北洋军阀；若是与人交谈时政，议论的中心必定也是北伐如何如何。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蒋介石高兴死了。此时，他已经是集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等数项要职于一身，后来，又当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他聪明地抓住了眼下这一大好时机，他要做的就是，取代北洋军阀，自己来坐第一把金交椅。

这显然和中共想像和要求的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可不敢恭维。他也算得上是行伍出身，早年总是军服笔挺地挺着腰板在众人面前亮相，可是他实在是个很蹩脚的军事指挥家。这一点，在北伐战争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后来，与手执长矛大刀的赤脚红军作战，费尽心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成为赢家；日本人端着膏药旗气势汹汹地来、丢魂落魄地走，这也不是他的功劳；到了真正与中共交手过招的解放战争，这更是人所皆知的事了，流水无意落花无情，他最后住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所以，北伐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共产党实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伐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激起了一朵灿烂夺目的浪花。战幕拉开以后，有着许多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横扫千军，旌旗指处，势如破竹。不到一年的时间，这股狂飚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击败了北洋军阀的两大主力：吴佩孚与孙传芳。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尽管他本人在打仗上显得缺乏聪明才智，屡屡受挫，可是在其他方面，例如通过收编军阀部队以便扩充实力等等，他可是一点也不缺乏智商。北伐军的胜利理所当然地为总司令赢得了很高的个人声望，蒋介石一下子如日中天。他很兴奋，在兴奋之余他已经在考虑下一个动手的目标了。

共产党并不是说连蒋介石这一点小小的鬼蜮伎俩都瞧不出来，恰恰相反，他们三番五次地开会、决议、商讨，究竟如何对待这个或左或右的军阀新贵呢？问题就出在这里。

在北伐出师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曾请周恩来询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你们是准备帮助蒋介石呢，还是打算削弱蒋介石？周恩来立即到上海请示。陈独秀让张国焘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大方脸的张国焘在会上用了一句玩政治与外交的人常用的语汇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你怎么理解这个方针？

过了若干年，周恩来评论说：“在北伐战争中，由于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所以，蒋介石就伸手摘了北伐这个大桃子。

事情就是这样，蒋介石先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这时便有了三四分；其后，他还是以左的面貌蹿上蹿下地在各种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这时便又有了五六分；等他羽翼逐渐丰满起来，连陈独秀也感到忧心忡忡了，处处对他小心呵护，把他视为完成北伐大业而不可替代的领袖，怕他恼了脸去，这时便更有了七八分；蒋介石的牙也长出来，刀也磨得锃亮飞快，他逐步扎稳了根基，已不是一阵毛毛雨而能动撼得了了，这时的十分便全了。蒋介石不再是 1925 年的那副谦恭的嘴脸了，他以迅猛之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一股屠杀共产党人的狂风恶浪，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陈独秀的错误，被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后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失败原因时，有这样几句话说得十分精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错就错在“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以前的辛苦劳碌，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现在，共产党开始抓武装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的确是真理。

1926 年年尾时的陈独秀，已经开始出现了他那种忍让、退缩、犹豫的征兆。

这一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中心议题便是试图分析在首次国共合作中出现的许多危险倾向，试图寻找一种对付这种局面的有效办法。陈独秀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里，对于蒋介石的貌左实右的行为已经流露出了无可奈何的情绪，可是最要命的还是他又以家长式的作派喋喋不休地批评起了所谓党内的左倾。

陈独秀充满幻想地放出了一只五彩斑斓的希望气球，似乎已经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向共产党开刀的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又似乎只要依靠那位软弱动摇、投机摇摆着的汪精卫，就能重新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之重任。

这只气球不久便破灭了。

1927 年 4 月 12 日，天尚未亮，一大批早就作好准备的上海青洪帮武装流氓手执枪械，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直奔上海总工会，向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激战中，开来大批全副武装的国民革命军，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并且迅速地收缴了武装流氓的枪械。工人纠察队对蒋介石的军队充满了信任，鼓掌欢呼喊口号，十分天真地欢迎这批“调解者”的到来。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工人纠察队被强行缴械，等他们发现被骗上当时，已经晚了。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是被

这批青洪帮秘密扣留，在杜月笙家的客厅里被“做掉”。次日上午，举行群众游行大会，遭到埋伏在里弄内的国民革命军袭击，死百余人，伤不计其数。这便是使中国政治风云骤然变色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以后一连串的反革命政变中，陈独秀依然是重重禁忌，怕这怕那，幻想“和平解决”，致使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与破坏。

第四章

《弋阳县志》上不足百字的记载 方远
杰与黄镇中打掉了余麻子，树起了第一
面武装斗争的旗帜

翻开厚重如砖的《弋阳县志》一书，在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栏：

“民国 15 年（1926）……”

“冬，黄镇中、方远杰组织暴动队，攻打漆工镇警察派出所，缴获‘两条半枪’，赶走巡官余麻子，这就是‘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

不足百字，就这么简练。

在中国的农民革命暴动史上，发生过不下几十、几百、几千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造反，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策划下的起义暴动有记载的也不下几十次。这次“漆工镇暴动”便是其中的一个。可以断言，不是研究赣东北革命发展史的学者，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的年长老乡，恐怕已经很少有人知晓这次名不见经传的暴动，更是很少有人去注目这次小不起眼的暴动了。可是在弋阳，在赣东北，正因为这次暴动，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因此，应该浓墨重彩地补充上这一笔。漆工镇位于弋阳县境内的北端，紧靠着方志敏的老家湖塘村。方志敏对这里的情况也相当的熟悉。

在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况下，漆工镇地区自然也不例外，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打土豪，斗地主，抗租，抗息，抗债，抗税，“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标语随处可见。可是漆工镇却还被军阀盘踞着。这个镇子不大，却直接通着省府。江西省警察厅专门在镇上设立了派出所，巡官由省里直接委派。小小的派出所拿着鸡毛当令箭，扯着大旗作虎皮，不但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另外还有十几支枪的武装。就凭着这个，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并且破坏农运。

方志敏后来被捕在狱中，曾经满怀痛心与憎恶地回忆起他那故乡的黑暗。

赣东弋阳县，共分为九个区。出城北行三十里，即为九区辖地。九区纵七十余里，横四十余里，共有七十余村，以漆工镇为中心地。全区共有四千余户，约二万几千人。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哪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

方志敏还剖析了这块黑暗而贫穷的小地方的历史：

……在清朝皇帝统治时代，那时，我生世未久，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说了。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地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对于侵略中国十分凶恶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但没有动它的毫毛，就连打倒它铲除它的口号，也没有明白地提出来。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在清军和会党中活动，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劳动群众中，就根本没有怎样注意，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势力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了，所谓南北议和，实际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就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了。从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不过去掉了溥仪，换上另一个统治代表袁世凯而已。

因此，在乡村中，也并没有因这次革命而有过任何新的改变，一切都照旧样，没有什么与前不同的地方。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如果硬要找出革命后与革命前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般人都剪掉了辫子，变成和尚头（起初还是用警察的强力）；做官的人，不穿马蹄袖的礼服，换上了长袍马褂，也不戴拖条毛的顶子，换上了呢大礼帽罢了。乡村中的工农群众，看不出这次革命与本身利益有一点什么关系。身陷囹圄的方志敏，非常冷静而条理清晰地一笔一笔写下去。

弋阳九区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后，直到1926年，情形也正是如此。现将这一小块地方的各种黑暗情形，条述于下：

（一）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弋阳县衙门的官吏差役，在一般群众看来，简直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你只要碰到他们的手里就好，如果有点什么事碰到他们的手里，就算不弄得你家破人亡，也要弄得你妻离子散；衙门就是一只老虎口，吃人不吐骨头的！县衙门官吏千方百计压榨民众的事情，多到数不胜数，暂不去说它。我只谈一谈漆工镇警察所的情形，漆工镇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所内设了一个巡官。照官职说来，这个巡官，本是一个不值置齿的芝麻小官；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什么事都不许有道理讲，这个芝麻小官，居然成了九区一个无上威权的统治者！我记得有一个巡官姓余，他是北方人，他做巡官不到半年，就赚得脏洋一万多元。这似乎是一种不能令人相信的奇闻，然而这却是中华民国国土内确实实有的事实。他榨取冤枉钱财的方法，就是他无法无天的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兼而一手包办之，他成了一个道地无二的独裁魔王。他受理区内的一切刑事诉讼，并派出巡警四处招徕诉讼，像商人招徕生意一样。人民的禀贴，一进到了他的公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钱和钱多的就有理；无钱和钱少的就无理，就得坐拘留所，脱裤子打屁股！一场冤枉官司，原、被告两方出的钱，多可得洋一百元或二百元，少也可得洋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一二千元是靠得住有的。区内的土豪劣绅，早已与他串通一气，协同作恶，民众冤抑无处诉，叫苦连天！

我那时在南昌读书，听到这种事情，不禁一肚子的愤激，马上邀集几个学生，写了张禀贴送到江西警察厅，控告他的劣迹。我们以为余某胆敢做出这些罪恶，一定是警察厅不知道，如果我们禀贴进去了，厅长知道了，那还不会立即下令去拿办他那混账的坏物。我们下了课后，常常跑到警察厅的指示处去看看，看我们的禀贴批示了没有。等了十天，批示处贴出一张“据禀悉，候查明办理可以，此批。”官样文章的批词，一点什么实际效力也没有发生。因为这位土皇帝的余巡官，听到有人控告他，他就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脏款来进贿，天大的事，也就化为无事了。后来我知道当时对警察厅的那种认识，只是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学生们的稚气，不禁失笑。我只要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写出来，当时政治上的昏天黑地，也就可想而知了……

和余麻子清算老账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1926年的秋天，虽已入秋但夏暑未退，让人感到一片燥热。此时，国民革命军的队伍已进入江西，北伐呼声极高。蒋介石却在南昌暗中动作，阴谋

叛变革命。这时的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残部抵挡不住北伐革命军凌厉的攻势，开始由赣东北分别向皖南、浙西撤退。这使得赣东北地区的政局出现了一片混乱，你争我夺，都企望能在乱中取胜。

此时的弋阳局面也很复杂，一下子出现了三种势力。一种是以原来旧的县知事为代表的被称作是“原当权派”，自然是地方豪绅、地主官僚等结合在一起，代表的自然也是这一群人的利益。他们搞了个名堂，让手下人四处拉拢活动，要老百姓签名挽留县知事，换汤不换药，惟一的改动是将旧称呼“县知事”更变为“革命的县长”。第二种是流氓匪棍派。这一帮人与乐平、景德镇、浮梁等地的土匪们相联络，信奉的是“有枪便是草头王”，仗着有几枝破枪便也想弄顶乌纱帽戴戴。这帮乌合之众往往也是地主乡绅们的爪牙。

最后一种，便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派。但在当时当地，革命的力量尚处于发展阶段，势单力薄，条件尚不成熟。此时，邵式平已经回到了大阳开展工作多日，作为韬光养晦的策略，他提出六条作战原则：

- 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中间分子，孤立一切反革命派；
- 二、革命力量和时机尚未成熟之前，避免过早决战；
- 三、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时机；
- 四、对当权派和匪棍派应区别对待；
- 五、在各种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地运用革命的影响，争取中间人物；
- 六、想方设法和省委、方志敏取得联系，以取得上级党和方志敏的及时领导。

这六条对于保存实力，伺机发展无疑是很正确的。他们迅速行动起来。邵式平召集了方志纯、雷夏、黄镇中等坚定骨干力量组成了“共产党大阳县特别支部”。很快，这个刚刚成立起来的秘密特别支部就在斗争中崭露头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年11月底，秋风乍起，欲寒还暖。投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途经弋阳。这是一个宣传、扩大革命影响的好时机，他们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时机。

共产党弋阳特别支部立即动员和组织了数千名的学生、农民、工人和市民到城外去夹道欢迎北伐军。老百姓腾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屋让军队住宿，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来慰劳鞍马劳顿的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的领导者自然很受感动，在那个时期，北伐军和共产党还可算是一家人，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政治上，北伐军都是应该并且愿意支持这个特别党支部的。所以在听取和了解了弋阳县的基本情况 after，立即采取了号称“一文一武”的两手行动。

第一师的头儿派去四个身材高大的马弁，把那个想由“知事”改“县长”的原旧县太爷连请带押地领到了北伐军的住处，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后，严厉警告道：“如果你以后胆敢有一点违抗县党部的意见，胆敢不按照县党部规定的去做，我们就立即派人枪毙了你！”

第一师接着派出一批部队，帮助农友兄弟消灭了盘踞在芳家墩的乐平、景德镇、浮梁三个地方的地痞流氓组织，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拨子土匪流氓也是欺软怕硬，一见正规军来了，大势所趋，有的假意倒向农会，有的解

散回家，作鸟兽散了。

趁着这番有利的形势，特别党支部趁热打铁，以二区、八区、九区的农民为骨干打进县城，关押了那个还在企图捣乱反抗的北洋军阀所派的县知事，组织了自己说了算的县政务委员会，四处颁发张贴盖着新县党部鲜红大印的公告、法令和条例。同时，派出一大批共产党的农民干部到各区去任职。

弋阳的事儿似乎就这么挺麻利地解决了。

可是还有一片灯下黑，这就是漆工镇上的那个“毒瘤”。

头一个按捺不住的是方远杰。

方远杰是方志敏的亲戚，家住漆工乡的湖塘村。他比方志敏小两三岁，方志敏从事革命工作，对他的影响甚大。1928年夏天，他听说方志敏在湖塘村要办一个贫民夜校，便积极地要求参加。在荷塘边一间安静的茅草屋里，在火光跳跃着的油灯下，他听到了许多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新名词、新观念，逐渐地弄明白了一个道理：“穷人为什么穷，是因为有地主豪绅。”方志敏又进一步地启发教育他，“地主豪绅为什么能够这样欺压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武器，有政权。而我们要翻身、要革命，就必须掌握武器，建立政权。”方志敏的这些话，总是在他的心头盘绕。

“怎样才算掌握武器？怎样才算建立政权？”现在，身为弋阳九区农民协会主任的方远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他的议事日程上。

这一天，黄镇中急急火火地从县里赶回来找他，见面就说：“远杰，好好准备一下，看来要大干一场啦！”

方远杰看了看院外没动静，连忙把门关上，有点责怪道：“你好大的胆，没看见余麻子这几天老是背了枝枪在街口上转吗？你怕不暴露哇？大白天就敢闯到我家里来！”

黄镇中也是漆工乡人，不过家在武石坞村，离这儿不太远。他18岁那一年就因参加爱国青年抵制日货的进步活动，在县城被地方豪绅串通官府栽赃诬陷，坐了十个月的牢，吃尽了苦。后来是方志敏、邵式平他们想尽了办法，才将他营救出来。这一进一出，更加坚定了他献身革命、推翻旧世道的决心。他工作积极认真，不久又送他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理论家”。他和方远杰很熟，所以听到方远杰的话，一点也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还余麻子呢！我这次回来找你，就是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情。”

方远杰倒了一碗水递给黄镇中，又拉了条木凳子凑到他跟前：“快说快说，看你跑路跑得这般急吼吼的，讲话怎么这样慢腾腾呢！”

黄镇中接过水来先喝了一半，这才抹抹嘴，压低了嗓门告诉方远杰：“志敏指示我们，端掉漆工镇派出所这个黑窝，做掉余麻子！”

方远杰兴奋得往后一仰，差点没折个跟头，他大叫了一声：“好！”立即又嚷声道，“志敏是怎样说的？细细讲一遍，细细讲一遍。”

黄镇中从鞋底里掏出一张细长的字条来，递给方远杰。上面是密密的一排蝇头小楷：“要设法夺取漆工镇派出所的枪支。”方远杰认得，这是方志敏的字。他反反复复地又念了好几遍，兴奋地拍着腿说：“这正是我天天在念叨的事，怎么这么灵验呢？志敏竟知道我想的事？”

黄镇中把字条细心地叠好，又塞回鞋底里，道：“光是你想的事？你还有志敏他们想得远、想得深、想得深多哇？大言不惭，说出来不怕人笑。”

方远杰被他说得真的不好意思起来，连忙把话岔开道：“好好，莫说这

些无用的话。先细想想，做掉余麻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黄镇中正色道：“是。我来的时候，还遇上了邵式平邵大哥，邵大哥的意思也是这样，拔掉这颗毒瘤子也要靠胆大心细才行。”

方远杰不言语了，坐在那里只顾吧嗒吧嗒地抽烟，两道眉毛锁得紧紧的，几乎连成了一线。黄镇中晓得，他每次动脑筋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事情不想清楚了是不肯开口的。于是黄镇中也掏出自己的铜烟锅，塞上一锅烟丝抽了起来，眼睛却一直盯着方远杰看。

方远杰沉得住气，连着抽了三锅烟，抽得嘴巴都发苦，这才眉毛一挑，抿了抿发麻的舌头说：“要跟余麻子这种险恶凶狠的家伙斗，依我说，头一条，就是我们也得有枪！”

“可以去抢他们的枪，抢来了我们用！”黄镇中说。

方远杰摇头：“那不一样。你手上没有武器，他就不会怕你。他若是先头就不怕你，硬作对，要想缴他的枪就不那般容易了，到底他手上有真家伙呀！”

黄镇中问：“那你说怎么弄好？”

方远杰说：“要想办法去买些枪回来，步枪、手枪不好买，价钱也贵得很，我们可以买花枪，买鸟铳嘛，一样用得。”

黄镇中哼了一声道：“哪个不晓得！没有的东西可以去买嘛，钱呢？”

方远杰一屁股又坐在了凳子上：“就是这个钱没有着落。”

两个人又闷头抽起烟来。少顷，方远杰又自言自语地说：“光我们两个是没有钱的，得想法子筹钱买枪。”

黄镇中说：“你一说买枪筹钱，那我们的意图不是全让人家晓得了吗？”

方远杰说：“那是自然，不能那么直露露他说。我们就说是因为要……”他眼珠子一转，很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好点子而得意，“对外就说是要修桥铺路，要筹款筹粮。怎么样？”

黄镇中点头道：“这个说法倒是可以。”

方远杰接着说：“我们也要分清对象，一般老百姓，乡里乡亲的，我们就请他们自愿捐款，当然要做说服教育工作，把道理讲给他们听，是为了我们农民穷人自己的事情嘛。我想，他们一旦明白事理，多多少少都会拿一些出来，拿多少就是多少啰。对于那些土豪劣绅嘛……”

黄镇中抢过话头，伸出一只拳头晃动着说：“那就不客气啰！而且要他们多多地出钱。”

方远杰拦住他的拳头说：“莫要一上来就动武，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呀。要先礼后兵才对。我们农会是最讲道理的，先跟你讲道理，你乖乖地把钱拿出来，那就没事。你要胆敢不捐款，破坏我们农会的行动，那就不客气了。到了这步田地他还敢不捐，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了也得交，不交不放。”

黄镇中说：“对付最最顽固的，是不是可以杀掉一两个？土豪劣绅中的最最顽固分子，始终是我们农会的死对头，杀一个，一大批就老实了。”

方远杰说：“可以。对于这帮子土豪劣绅，拳头硬一点也不过分。他们平时欺负我们穷人时讲不讲情面？没有的事嘛。”

黄镇中很高兴，说：“好得很，我们就用这笔款子购置花枪、鸟铳，这类枪要便宜许多，也容易买到手。”

方远杰说：“土豪劣绅要怀疑，农会为哪桩买枪买炮的？要问，就告诉他们，我们要保乡保族，最近土匪也闹得凶呢，这样说他们就不会起疑了。”

黄镇中点头称是，又说：“再挑上一批最最坚定的农会骨干，借着打猎的由头，我们把队伍拉出去训练，组成一支敢攻能打的暴动队，神不知鬼不晓的，练得差不多了，等时机一成熟，一家伙就把余麻子的老巢给它端个底朝天！”

两个人越说越起劲，把计划想得尽量周密一点。不晓得天已经黑了下來。方远杰的婆娘弄饭来吃，两个人匆匆忙忙喝了一碗稀饭，就趁着天黑分头去找农协骨干串事去了。

买枪的款子很快凑齐了一部分，方远杰和黄镇中给每个农民协会的骨干配齐了三大件：花枪、腰刀和匕首。

余麻子在漆工镇得罪的穷苦百姓实在是太多了。一听说要铲除这个恶棍，几乎每个农会会员都要举手报名。方远杰乐不可支，从中挑了二百多名骨干分子，身体又好、觉悟又高的，组成了一支特别暴动队。反正已经入冬，农田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了，乡亲们就眼瞅着这支人马天天分几路出去“打猎”，到山里边去练枪法，每天倒也有些野猪、山鸡什么的猎物拖回来。到了晚上，平日经常是半年粮半年糠的穷苦人家的锅台上又飘起了肉香。

转眼已快到农历的小雪，此时间的风从山野里吹来，已经有了些小钢挫子在面孔上挫的味道了。太阳落山也比秋日里落得早了，漫长的冬夜就要开始了。再有一个多月就要过阳历年。

方远杰和黄镇中约了几个农协骨干商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教育，暴动队队员们的士气都被鼓舞了起来，再加上北伐的空气正浓，正是革命派大长威风的时候，端掉漆工镇派出所这个毒瘤的时机应该说是成熟了。

大家说：“远杰，你定个日子吧，越早越好，趁热打铁嘛，我们的队员就等着去抓余麻子，缴余麻子的枪呢！”

方远杰沉思了一会，咬了咬牙下了决心：“好！有大家这么支持，这事一定成功！三天以后，立即动手！”

黄镇中说：“回去告诉大家，吃得饱饱的，养足精神，大后天的晚上，去缴余麻子的洋枪！”

方远杰想得细，最后又提醒大家：“务必要守住秘密，不能让余麻子他们先得了消息去。”

漆工镇派出所的余麻子只觉得这几天眼皮直跳，很不安心，找了个算命先生去看。算命先生说他近日里有点朦胧，看不清前途。余麻子半信半疑地回到了派出所。由于不放心，他便常常到镇上乡里地去转，打听点风声动静。从表面上也真瞧不出什么来，农民佃户们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可是从骨子里，余麻子觉得还是要出事，因为他瞧出来了农民们的那股子潜在而又遮掩不住的兴奋心气，走起路来那种轻快的步子，说起话来那种提了气的腔调，处处都和从前不一样了。余麻子不傻，他从心底里感到了害怕。“怕又怎样？”余麻子恶狠狠地想，“我不能让穷鬼们瞧出我的心虚害怕来，我要怕他们，就更得让他们怕了我才行！”他变本加厉地去欺诈老实的农民。农民们已不是从前的农民了，要发作，是农会干部压住了火头，说：“忍不了几天了，余麻子也就是秋后的蚂蚱，跳不上几跳了。我们不能坏了远杰他们的大事。”农民这才忍了下去，朝着余麻子的背影狠狠地阵了一口，送他走。

这一天夜里，刮起了一阵接一阵的北风，赛过小狼崽子嚎，刮得沙土一层一层地扑打在窗户上。没有事的庄户人，关紧了门都睡了。田埂上，一支队伍从湖塘村出发，脚下生风，一个接着一个的身影飞快地向前奔去。没有

半袋烟的工夫，这支举着大刀、扛着梭镖、端着鸟铳的暴动队，已经逼近了漆工镇派出所的几间院落。

可恶的狗先吠叫起来，一声接一声，紧接着镇上的狗全叫了起来。

余麻子听到狗叫得紧，心说不好，立即翻身起床。他还是作了准备的，将身边的细软金银打了个不大的包裹，睡前放在伸手就能捞着的地方。他一跃而起，头一个动作便去抓钱褡子，另一只手又立刻去摸枪，待这两样东西都抓到手，听得院外街道上的狗是越叫越凶了。余麻子一转念，拼是拼不过的，不晓得这帮穷鬼有多少人呢，何苦白白地送了性命，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个主意想定，他一翻身就上了窗台，一家伙就从窗户里翻了出去，也顾不得摔得青紫一片，泥土满身，爬起来就跑，转眼间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漆工镇的这帮土警察平日里只会鱼肉乡里，欺压老实乡民，哪里真刀真枪地干过？听见门外狗叫得急，心里直发慌发毛，一个胆大点的跑去敲余麻子的门，敲了好一阵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心说外边都闹炸窝了，余麻子总不能睡这么死吧？壮着胆子推门进去一看，才发现屋内早已空无一人。此时他可是真慌了，颤抖地叫了一声：“余麻子丢下我们跑了！”声音都变了调。

想跑已经是来不及了。暴动队的农民们带着一团团的寒气阵风似地刮了进来，院里院外、屋里屋外，梭镖、大刀举成了一片高高低低的林子，一只只的火把也点亮了，把个寒冷的冬夜照得通亮。亮光下，土警察们禁不住地哆嗦起来。

方远杰和黄镇中一人手执一片雪亮的大刀拨开人群走了进来。方远杰厉声问道：“余麻子呢？”

“余麻子不知啥辰光早已跑了……”土警察平素惯于吆喝训斥人的高嗓门一下子变得低得不能再低了。

黄镇中说：“搜！”

一位暴动队员立即报告：“已经搜过，真跑了。”“那就赶紧追！”黄镇中把大刀一横，带着人就要追出去。

方远杰摆摆手，说：“追怕是追不上了。不过可以断定，余麻子今番夜里跑了，他是再也不敢回来了，我们打赢了他！”

屋里屋外顿时一片欢呼，震得屋梁上的土都扑扑簌簌地往下掉，门前树上夜宿的鸟也被惊动得扑扑啦啦地飞动起来。反倒是刚才狂吠不停的狗被这欢呼声所慑住，一下子没有了声息。

这次暴动，缴了土枪七枝，洋枪三枝。其中有一枝是“汉阳造”，一枝是“三八式”，一枝是“九响毛瑟枪”。这枝“九响毛瑟枪”没有退子钩，截去了半截，只是勉强能用。这在农民暴动队看

来，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不管枪的好孬，它毕竟是真正的枪呵。消息传到方志敏和邵式平那里，让他们兴奋得又是一夜没睡好。漆工镇的暴动是一个标志，它写下了赣东北地区武装斗争开始的序页。

第二天，在漆工镇召开了庆祝会。全镇的人都跑出来看农民暴动队。暴动队的队员们神气极了，举着新缴获来的枪向乡亲们炫耀着，把昨天夜里的情景加油添醋他说给大家听。年长的乡亲们看到平素里作威作福的巡官警察狗腿子居然也有这一天，真是感慨万分，世道真是变了，穷人真是要从地狱里一个跟头翻到九重天上了。

方远杰讲话。刮了一夜的北风已经消停了，初冬的太阳暖融融地照在他那因为兴奋而显得红扑扑的脸庞上。他站在一个高台阶上，背后的大刀柄上

挂着一束红绸子，在微风中飘动着像是一团鲜红的火苗。他清了清嗓门，大声他说：“老表们，大家都听说了，也都看见了，余麻子被我们赶跑啦！”

人群一片欢呼，方远杰也在笑，但随即又严肃起来说：“从此以后，漆工镇是我们农民协会的天下了！要晓得，打这样一个小胜仗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要扩大胜利。一个漆工镇不是我们的最后目标，我们要解放赣东北！以后还要解放全中国！”

农民们确实被鼓舞起来了，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明天的胜利，欢呼声一阵高似一阵。

方远杰最后说：“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

这几条口号很快就由镇里教书的先生写了出来，贴在镇派出所门口。这里已经改为农民协会的办公所在地，进进出出的全是农民。方远杰、黄镇中等请示了上级领导，邵式平派来了共产党员雷夏担任漆工镇派出所的巡官。

第五章

陈独秀做了“婆婆”，方志敏好生苦恼，
这革命工作怎么这么难做 蒋介石告诉
段锡朋，我们也很难啊，要跟孙传芳打，
还要跟共产党打 中央农委的复电字字
强硬：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也决不
可屈服于圈定的办法

方志敏在省农民协会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

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是明摆着的对头，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他们成为共产党人的对立面，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方志敏对他们采取的斗争方针是针锋相对，毫不退缩。

可是事情难办还难办在阻力不是单一的，在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同时，自己上头还有个“婆婆”管着，这就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后来，狱中的方志敏痛定思痛，用犀利的笔锋解剖和分析了那一时期的工作：

自北伐军到江西以后，我是做了近十个月的公开工作。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地去进行工作——总之，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哪里会积聚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翻开尘封的历史，使你感到重新认识到的史实是何等的沉重。最要命、最顽固的敌人并不只是那位明火执仗的蒋介石。方志敏们必须用几倍的精力来对付他们的裹着小脚的“婆婆”。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误导到失败。

方志敏无可奈何，但又不甘心，努力地在这种“婆婆”的领导下挣扎着工作，但也可谓是杯水车薪，干事无补。此时的方志敏身兼数职，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委员长兼秘书长，又是中共

江西省委委员、省农委书记。既要领导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工作，又要负责共产党内的工作，还要参加清理逆产、裁判逆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和革命烈士等一系列的社会活动。方志敏忙累倒不怕，愁的是工作太难做了。

为了配合北伐军东征，方志敏他们在“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平均地权”的口号下，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了起来。各地的农民协会干得十分出色，在这一阶段里，农民们为北伐军侦探敌情、输送给养、带路送信、送茶送饭、做鞋洗衣、慰劳伤员……什么都做了。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影响颇深的弋阳、横峰等县，农民运动搞得尤其活跃。这些地方的区乡一切政权，在实际上已经归属了农民协会。有的农民协会还收

缴了军阀溃兵的一些枪械，武装了农民自卫队。农民运动促进了大革命的高潮发展，同时，大革命高潮又推动了农民运动。可是，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之下，却潜伏着几股来势凶猛的黑色逆流。

1927年1月，蒋介石进驻南昌。他在指挥北伐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百忙之中，并没有忘记如何控制江西党政大权这一要害问题。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加上北伐军总司令的职权，给江西省派了个省党部党务整理委员段锡朋，又把李烈钧派来做江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老谋深算，一手抓党，一手抓政，想把江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但事态的发展，未必如愿。

早先的江西，并没有国民党什么势力。少数有限的一些国民党员也是散落各地，意志消沉，毫无作为。只是在赵醒依参加了国民党的“一大”以后，偕邓鹤鸣回到南昌，才帮他搭起个省党部的架子。当时没有下属组织，赵醒依、邓鹤鸣以及方志敏、曾天宇等人，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国民党，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发展组织。赵醒依负责南昌、吉安、永修等地的组建工作；邓鹤鸣负责波阳、九江一带；方志敏及曾天宇负责赣东地区和万安一带。这样，策划建立了17个国民党的县、市党部，到1925年7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才算得以召开。如果不是因为国共合作，如果没有共产党人无私热心地帮助与操劳，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恐怕还不知踪影何处。可是，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摧毁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中心后，不过两个月，庆祝胜利的锣鼓声、鞭炮声、笑声，还音犹在耳，事端便接连不断发生了。

最先开始发端的，是段锡朋操纵指挥的“AB团”。

“AB团”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英文原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新成立的一个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秘密组织。

1月初，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会上，方志敏以重建江西国民党以来的业绩与威望，仍被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同时，积极坚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代表也仍继续当选。

蒋介石把段锡朋叫到了他在南昌的行辕官邸。

“你是怎么弄的？一点控制局面的能力也没有。”蒋介石的脸色阴沉难看，责问段锡朋，“共产党是很厉害的，你到底是晓不晓得？为了选举，他们是做了好多工作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他们。可是你是干什么的？我叫你去就是让你回来告诉我这么一个糟糕透顶的事情啊？”蒋介石连连拍着桌子，共产党的潜在的威慑力量使他坐立不安。在蒋介石的盘算中，北洋军阀已经不是占首要的敌对位置，取而代之是渐成气候的共产党。天无二日，国无两党。蒋介石雄心勃勃，大有一统中国之江山的气概与意愿，怎么能容忍共产党人来插上一足。

段锡朋恭敬地站着，他想把事情陈述得再清楚一些，因此他要解释一下：“总司令，这种选举是控制不住的。你说你的，他投他的票，共产党把局面搞得很乱。”

蒋介石说：“我晓得这帮人不好对付，否则怎么会派你去？”

这是一句责备话，又是一句信任话，段锡朋心里有了底。蒋介石看了他一眼，接着说：“可是你晓不晓得事态的严重？这几年，共产党是一步一步地把脚伸进来，我们自家党内党外，都有人帮助它说话，弄得儿媳妇快要当了婆婆的家。国民党的事，老是要靠共产党来帮忙、来作主，这岂不成了咄咄怪事，岂不贻笑大方？国民党应该是个独立的、强大的政党，只有我们来

指挥其他人，没有让别人来指挥我们的道理！”

段锡朋诚恐诚惶，额头上的汗渐渐地沁了出来。从蒋介石焦虑的语调中，他似乎开始理解到了总司令的良苦用心。“我懂，总司令。”段锡朋的语气也变得坚定起来。

“嗯。”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我们也很难呵，要跟孙传芳打，也要跟共产党打，腹背受敌哇。”

段锡朋说：“江西省党部的局面怎么扭转，还请总司令指教。”

蒋介石沉默着，慢慢地在客厅里踱着方步，许久，他收住了脚步，注视着墙上的一幅画，那幅画是一个署名“山野之人”画的，跋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看了一会儿说：“靠选举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们不肯选我们，我们难道不会自己确定人员吗？”他转过身子，盯住段锡朋说，“你是党务整理委员，你有你的职权，要他们把代表的名单报到你那里，然后圈定。”蒋介石抬起手轻轻地一挥，“把他们统统地圈掉。”

段锡朋领旨而行，果真用了“圈定”这一招。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一时不及防备，竟都被排斥在国民党新组成的省党部执监委之外。方志敏既然“落选”，于是段锡朋又派了王礼锡来取代方志敏的农民部长职务。

方志敏剩下的阵地，只是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了。

段锡朋的不安分渐渐地明显起来。省农协的筹备会“圈定”不掉，于是他弄了个“逐步进逼”、“渐次代替”的手段。总是打着省党部的名义，对“农协”这个眼中钉，今日来一个决议，明日来一个训令，又是削减农运的经费预算，又是限制农协的活动，还到处散布“农协非法”的言论。总而言之，是要把方志敏他们的工作搅乱。

方志敏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当天的《晨报》上匆忙地寻找有没有国民党省党部新想出的与省农协作对捣乱的消息。这件事弄得他也感到神经十分的紧张。

果真，一行很醒目的竖排黑体字刺目地跳入他的眼帘：省党部新决议，为加速农民协会筹备工作之进展，特增派邹莫为筹备委员。

“哼！”方志敏气愤地把报纸一扔，“果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直接把爪牙派进来了。”

邹莫很快走马上任。他来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破坏省农协筹备会的正常工作。方志敏明白这一点，邹莫也明白，双方毫无掩饰，也不客套，倒是省去了许多的虚伪。

邹莫自以为是省党部派来的，后台老板硬，到职没两天，便安排自己的亲信进农协会筹备处，同时排挤筹备处中革命工作积极坚定的人。为了这些事，邹莫也是绞尽了脑汁。一开会，总是他声先夺人，找个由头便开始莫名其妙地训斥，哇啦哇啦一说便是半天。方志敏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便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同他拍桌子对阵。闹得每次开会总是不欢而散。

方志敏心想，光是这么吵闹也不行，工作无法开展，正好中了他的计。情急之中，他抽了半天的空，跑去找共产党江西省委负责人王力生。

王力生请了个理发匠正在修面。不大的办公室中间放着一

副剃头担子，他一嘴白呼呼的肥皂沫，见急匆匆走进来的方志敏，一时不好开口。

方志敏就拉了个方凳坐在他跟前，说：“力生同志，你晓得不晓得，这个国民党段锡朋新派来的邹莫，哪里是来工作的，分明是来搞破坏；哪里是

来支持农民运动，分明是来搞摧残；哪里是在帮助农运，分明是来打击农运。你看看他这几天干的事……”于是方志敏把邹莫这几天的所作所为一一汇报给王力生听。

王力生性子倒稳，听方志敏说完，等剃头师傅为他修好面，洗完了头，又洗了脸，才挺着个铁青的下巴对方志敏说：“志敏同志，你这种急急躁躁、见风是风、见雨是雨的脾气，什么时候改啊？”

这与脾气有什么相干？方志敏心里说，分明是与敌人的斗争问题嘛。不过这回他没马上开口，听王力生往下说。

王力生说：“晓不晓得最近的时局？”

“晓得。”方志敏回答道，一时有点闹不清王力生到底想说什么。

“晓得就好。”王力生换了一种口气，语调十分沉重他说：“时局很严峻啊，蒋介石忽左忽右，十分把握不住，北伐进展到此时，也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汪精卫的态度也暧昧得很，令人十分担心，北伐还是要靠他们啊。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你拉他一把，蒋介石就能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同革命；你推他一把，他就有可能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反过来打我们。我们一直讲联合战线，联合嘛，当然工作要往好的方面做。不能一动就吵起来，就顶起来，这样不是把矛盾激化了，把事情搞复杂了吗？”

“不是我们要激化、要搞复杂的嘛。”方志敏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根本没办法沟通嘛，你要往东他偏要往西，你要打狗他偏要撵鸡，说穿了，根本就是为捣乱而来。”

“你们似乎都带有成见嘛，有成见还怎么能坐到一条凳上谈事情？还怎么讲联合战线？”王力生的眼珠子微微有点瞪起，“恐怕首先还得在自家身上找找原因吧？”

这话说得不但分量很重，还有责备的意思在里面，这让方志敏更迷茫了。蒋介石与段锡朋们难道真是共产党人与农民协会的同盟者？难道真的与他们共坐一条板凳议事的可能？这个“联合战线”究竟要联合些什么人？听了王力生的这番话，方志敏忽然觉得原本很清楚的事，怎么一时间连自己也都有点把握不住了。

一个悖谬。一个困惑。

王力生仔细地将沾落在布鞋上的头发屑子掸拍掉，又脱下上衣抖落了一阵，然后穿上，看见方志敏半晌不开口，便倒了杯茶喝着，两眼盯住茶碗里漂浮着的一片绿叶，半晌才说：“志敏同志，势态复杂，斗争复杂，我们的脑筋转得也要复杂一些才是，光晓得吵吵闹闹、冲冲杀杀的，那是没有见识、没有水平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对立面也要靠我们去影响他们，改变他们。”

方志敏压住心里的急火，尽量心平气和和他说：“力生同志，事情你也是晓得的，遵照你的指示，省党部已经容忍掉了，农民部长也已经容忍掉了，这个农协筹备处如果再容忍掉，我们就连斗争的阵地也没有了，还能用什么去‘影响’段锡朋，‘改变’段锡朋？不是成了‘痴人说梦’的一句空话了么？”

王力生平稳的脸色凝固住了，他放下茶碗，看着方志敏正色他说：“首先要纠正你这个提法上的严重错误，不是遵照我的指示，是遵照总书记陈独秀同志的指示！陈独秀同志说过，当前农运在各地都表现出‘左倾’来，以后应采取温和态度，以免妨碍联合战线的巩固。中央的精神就是要以退让求得团结，这就是指导我们现在工作的原则！志敏同志，头脑不能发热呀。”

没有办法再说下去了，方志敏深深地感到了失望与心酸，生怕自己气得控制不住，会在王力生这里拍起桌子来，便起身而去。

回到农协筹备处，方志敏的心情仍是不能平静。和段锡朋、邹莫斗争，拍桌子也好，摔板凳也好，总还可以出一口气。可是遇上这样一位满嘴妥协、容忍的省委领导，你能说什么呢？若是按照他的话去做，这个许多同志辛苦筹建创办的农协筹备处肯定又是“妥协”到段锡朋与邹莫们的手中去，等于又打了一个败仗，又丢失了一个阵地；可若不按照他的话去做，那又怎么办才好呢？方志敏一时拿不出好的主意，急得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转圈。

窗外有人说：“怎么回事？遇到什么难题了？一个人在‘推磨’？”话音未落，几个人已经推开门走了进来。

方志敏抬头一看，进来的是和自己一起在农协筹备处的共产党员涂克鹤、汪辰和丘倜几个人。他不由得大喜过望，连连地拍打着涂克鹤的肩膀，说：“你们可回来了，下面怎么样？”

风尘扑扑的涂克鹤是去广州参加农运讲习所学习的，而汪辰与丘倜则是去各县调查农会运动的，都是刚刚下船，就几路兵马赶到农协筹备处来找方志敏。几个人见了面又说又笑，大有士别一日如隔三秋的感觉。

涂克鹤问方志敏：“刚才看你心思很重长吁短叹的样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方志敏叹了口气，就把农协筹备处遇到的困难、王力生的说法、邹莫等人的捣乱一一他说了一遍。说完，又叹了一口气，苦着脸说：“这工作真是难做，有人拿绳子来捆你的脚，有人拿绳子来捆你的手，把你束缚得像只粽子，五花大绑捆牢牢地左右动弹不了，怎么干工作？”

涂克鹤说：“根据我在广东的耳闻目睹，蒋介石这个人，是绝对靠不住的。你越让他，他越是得寸进尺，欺负共产党人只是个面上的事，据我看，骨子里他是要吃掉我们，他在广州不就玩了个中山舰事件的鬼把戏？”

去年的3月6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的主任欧阳钟给海军局代局长、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打了一个电话，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蒋介石所住的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不知其中有诈，于是派出中山舰，开到黄埔。不料顿时谣言蜂起，传出共产党人李之龙要劫持蒋介石的传闻。事态立时变得严重起来。蒋介石的动作很快，3月20日，便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了李之龙。李之龙要分辩，说出是奉欧阳钟主任之命，欧阳钟一口否认，哪里肯承认有这么一个电话。两边争执不下。蒋介石也没心思来听他们打舌仗，抓了李之龙，同时监视和软禁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也同时监视着苏联顾问。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尚没有足够的力量能立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他是带有试探性与冒险性地走在了一根钢丝上。蒋介石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一个紧张局面，然后又玩弄两面派手法来缓和。他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呈文，“自请从严处分”，言由于事起仓猝，“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原来由中立观望的实力派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人开始转向支持蒋介石。并且在黄埔军校与共产党人最多的第一军中开始了清除共产党的行动。

中共中央对于这个突然事变，既无精神准备，也无应付的经验。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初也没弄清楚广州到底是怎么回事，倒是具有严以律己的态

度，认为事变是同广州的共产党人的工作错误有关，言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总还是抱着那条一错再错的老观点，认为蒋介石这个人，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支持，共产党只有退让才能继续团结蒋介石北伐。于是派了张国焘到广州来处理，结果是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顺畅地走过了这根钢丝，踏在了平地上，他不但打击了汪精卫与国民党左派，更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与基本的想法。在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是最大的获益者。

听涂克鹤说完，大家都沉默着，过了好一阵子，还是方志敏开口打破了沉默：“看起来，我们江西省委的这几个人执行中央路线倒是蛮坚决的，真是叫人想不大通。”

涂克鹤说：“想不通的何止是你。你不晓得，看上去广东是执行了中央的退让路线，可是反对的，也是大有人在哩。”

于是涂克鹤又将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是如何拍桌子砸板凳地反“家长”陈独秀的退让妥协政策，恽代英、毛泽覃在气愤之极是如何主张要把蒋介石干掉，毛泽东怎样慷慨陈词阐述自己的观点，力主给蒋介石以坚决有力的回击，细细地给大家讲述了一遍。

他这一讲，方志敏他们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屋子里的空气也仿佛变得活跃起来。

汪辰搓着手说：“好啊，还是这样干有劲。我们恐怕也得另外想想办法，不能只是听王力生的，这家伙软不拉塌的脾气，看上去都急死人。要指望他能硬狠一点，恐怕难啰。”

丘侗说：“你说的有一点不全面，王力生这个人，对党内同志还是蛮狠的，执行那条‘退让妥协’路线也是一丝不苟的。”

汪辰摇着头说：“对于这些人，我也常常有个问题弄不通，你说他们到底意识得到还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是是与非，对与错。他能意识得到自己的错吗？”

涂克鹤说：“恐怕不能。”

丘侗说：“他会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别有用心了，破坏党的工作，不就成了国民党右派的奸细了吗？”

方志敏觉得这样在背后议论一位省委领导人似乎有点不好，于是打断话头道：“说这些就扯远了。我们还是来商议一下，眼前农协筹备会的工作怎么做？”

涂克鹤反过来问他：“我们都是好些日子不在南昌了，客观与主观的情况都没有你了解，你说怎么做更好？”

方志敏咬了咬牙，很干脆他说：“横逆既来，就应该针锋相对！”

大家都一齐点头。涂克鹤说：“从现在的种种现象来看，蒋介石已经不是什么‘友党’了，完全是站到了敌人的位置上去了，我们要再让，恐怕最后连脑袋都要让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丘侗说：“志敏，你说说下面的打算。”

方志敏说：“我们一直在做召开省农协代表大会的准备，邹莫他们是肯定要插手的。鉴于上次选举省党部的教训，这些家伙一定又会重复地玩那套‘圈定’的把戏。我们就是要想个好主意出来，粉碎他们的计划。”

汪辰说：“这还不好办，不理他们就是了，我们干我们的。”

丘侗瞪了他一眼：“哪有这么简单的事？邹莫大天在这里，哪里躲得过他去？他只要在，还不又是捣乱？”

方志敏眼睛一亮，拍了一下汪辰的肩膀说：“这倒提醒了我。我们不会也弄个调虎离山计？”

丘侗不解地问：“怎么个调虎离山？莫非让邹莫离开南昌？尽着我们自己去搞筹备？”

方志敏笑着说：“刚才我说的不准确，应该是声东击西之计。丘侗，你说的有点靠近我的意思了。”

丘侗更不解了：“邹莫能听我们调遣呀？你让他离开南昌他就肯离开了？越说我倒越糊涂了。”

方志敏瞧着他那副纳闷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南昌呢？我们就要把他留在南昌，钉在南昌，让他蒙在鼓里。我们自己离开南昌，分头到下面去，关键是把住下面的选举关。选举出我们农民最相信的人来，选举出我们共产党人的骨干来。都选这样的人做代表，等农协大会一召开，还有他们说话的位置么？”

三个人笑了起来，齐声道：“志敏，这个主意好，亏你想的出来。等开会那天，邹莫与段锡朋他们一定要气昏过去！”

涂克鹤非常高兴，说：“志敏的脑筋真是管用，书没白念。我想，兵贵神速，讲究的就是个‘快’字。我们这一手，肯定是让段锡朋他们大大地出乎意料，可是一定要保密好，不能让他们得了消息，先下手。”

方志敏说：“你们几个辛苦一趟，明天就下去，分赴各区县，做选代表的事。我仍留在南昌，处理这里的事务。”又扳着手指头想了一下，“给你们十天的时间，来得及吗？2月中旬，我们就开会，搞民主选举，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汪辰说：“好得很，就这么定了。说老实话，这样干工作反倒不觉得累了，心里蛮开心。”

丘侗说：“好比打了一个大胜仗，所以很高兴。”

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和大会的其他各项准备工作，由于方志敏与大家的齐心协力，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快。按照他们原订的计划，在2月中旬，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南昌。

这事完全出乎段锡朋、王礼锡们的意料。不过他们的脑筋也没有糊涂，拿着方志敏他们报上来的代表名单细看，就一目了然了。这些代表多数是生活在农村最底层的，可算是苦大仇深的世代农民，也有些是各地农运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斗争骨干，党团员占有很大的比重。段锡朋清楚地知道，这些真正来自农村的代表对于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对于共产党提倡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竭诚拥护的，对于方志敏这些江西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和倡导者更是仰慕不止。反过来对他们，恐怕就要相差甚远了。他们自己的一伙人，在社会上名声可谓差矣，也没有什么牢固的群众基础。倘若由这些农民代表进行民主选举，不但没有当选的可能，弄得不好，除了招来非议，恐怕还会在选举场上出现令自己非常难堪的局面。

段锡朋想，事到如今，也没有再好的办法了，还是拿起老蒋的法宝来，如果连这个法宝也不灵，那老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他连夜起草了一份以省党部的名义向筹备处下达的正式指令。指令上说，关于省农协执委人选，将由省党部遴选干练人才圈定产生，此次大会毋庸进行选举。写完之后，

他觉得松了口气，心想，我有上方宝剑，不怕你们这帮穷鬼造反。第二天便急急差人给方志敏送去。

虽然段锡朋的这一举措早在方志敏的意料之中，不过当他看到这份指令时，还是按捺不住心头蹿上来的一股股怒火。

“什么‘圈定’，还不如就叫做‘官定’更为直截了当些呢！”方志敏一扬手，把来文扔在一边。

方志敏有点犯愁。要让自己听段锡朋的指令，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自己之所以要这么积极迅速地筹备召开这次大会，就是为了搞民主选举，就是为了要让段锡朋的企图落空。要是依了他的指令，那不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就算自己答应，同志们也不会答应。

去跟王力生说，求得他的理解与支持？这似乎也是件雾里看花的事。王力生的态度与立场恐怕也是轻易不会改变的。弄得不好，他来个明确表态，一定要照段锡朋的指令去办，反倒弄巧成拙了。

方志敏苦苦思索着可行的办法。忽然心里一亮，自己是搞农民运动的，可以直接去找农民运动的上级中央农委嘛，可以找毛泽东嘛。现在，毛泽东在武汉担任中央农委书记，还兼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的职务。毛泽东是最关心农民运动，最支持农民运动的。方志敏听过毛泽东的讲演，感觉到他对农民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颇有见解，阐述得十分详细；对农民遭受压迫的根源，剖析得透彻深刻，让人心悦诚服。求得中央农委与毛泽东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什么话可说？

方志敏想定立即给武汉拍了份电报。

武汉的消息反馈得很快。中央农委复电，字字强硬：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也决不可屈服于圈定的办法。

方志敏欣喜若狂，立即拿复电给涂克鹤他们看了。涂克鹤说：“这下子我们手中也有了上方宝剑，腰板也硬了，怕他做甚？”

汪辰和丘倜一致说：“不要理段锡朋，也不要理王力生，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干我们的。”

方志敏说：“对，我们干我们的。现在就是这句话我听了最舒心！”

省农代会如期在2月20日开幕，到会的有全省45个县的农协代表，共141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隆重了。方志敏主持大会，并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又作了“会务总报告”。用涂克鹤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说多点，让邹莫少说点，甚至不说。”方志敏在报告中列举了农村中广大雇农、佃农、半自耕农的悲惨境遇，详细深刻地分析了造成他们贫困破产的种种原因，并且提出了铲除农民痛苦的办法。

他说：“我们不要说自己无用，不要说自己命苦，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将数千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推翻，将盘踞石头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起跌死，这样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生活。”

段锡朋的嗅觉也算灵敏，不过还是迟了一步。当他得悉大会议程中仍有举行民主选举这一项内容时，真是不得不大动肝火了。怎么可以这样不把他省党部的指示当回事呢？除了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邹莫外，你是得指派邹莫去大会现场解决问题。

邹莫听完了段锡朋的一通臭骂，窝着一肚子的火，出了省党部的门，扭脸直奔农代会会场。情急之中没顾上审时度势，一头闯进会场就气势汹汹地

质问：“谁同意你们搞选举的，嗯？”

说完这话，飞快地扫了一眼各位农民代表冷冰冰的脸，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冒失了？邹莫不由得腿有点发软。他咬了咬牙，只好扯大旗作虎皮，硬着头皮提高了嗓音道：“省党部作了决定，省农协执委人选，统由省党部遴选干练人才，另行圈定，不须在大会上再搞什么选举了。怎么，你们不知道吗？”

这个话题不提还罢，一提反而将代表们激怒了。因为搞“圈定”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方志敏、涂克鹤都已跟农民代表说过，代表们都晓得了段锡朋的阴谋。邹莫冒冒失失闯进来，自然是成了众矢之的。

农民代表听方志敏们讲过几堂课，读了几本小册子，又有新理论武装头脑，满嘴的新词汇，讲起来赛过一挺马克沁轻机枪：

“于今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民主共和，怎么，省党部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么？”

“我们要选我们自己信得过的、能为全省农民办事的人，你倒说说看，我们农民代表有没有这个权利呀？”

“孙中山先生不是提倡民权么？说这种权力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那么请问，现在谁是少数，谁是多数呢？”

更有人高声说：“不是主张‘唤起民众’么？民众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违背了省党部的哪条章程？”

会场上如浇了油的开水锅炸开了。邹莫的耳膜嗡嗡作响，一时间也听不清楚代表们都说了些什么，只是一张张愤怒的脸在眼前晃动。他恐慌地扒开人群，逃命似地离开会场。

段锡朋得知后长叹了口气。硬的一手不行，他又拿出软的一手。

连着好几晚上，农民代表住处来访的人突然急剧增多，有称之为同乡的，有称之为朋友的，有的说是亲戚，有的则说是同学，五花八门，名义繁多。涂克鹤告诉方志敏，这些人的花样也多，或邀请代表上街看戏，或拉着代表下馆子，或馈赠礼品，或举行家庭宴会。最后抖落出自己的那一点目的要求，便是请求代表们投上“AB”团成员的一票，每张票的酬劳是五块光洋。五块光洋在当时可以够一个贫苦农民半年的费用。如果再能影响其他代表也来投“AB”团成员一票，待他们当选后还许诺帮助介绍工作。这条农转非的出路也是颇具有诱惑力的。现在有些代表碍于吃请的情面，又被这些人的花言巧语诱惑，开始犹豫不决了。

方志敏吃了一惊，明摆着这是谋划好的贿选活动。段锡朋见“圈定”不成，于是便想来拉选票。

“怎么办呢？现在代表们的思想显得有些混乱。”涂克鹤紧皱着眉头，等着方志敏拿主意。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老办法，充分相信代表，放心发动群众，戳穿敌人阴谋。”方志敏斩钉截铁他说，“‘AB’团企图用光洋来收买选票，我们没有这许多的钱，我们只有用革命的正义来说服代表。为什么说要充分相信代表？因为代表是经过农民群众推选出来的优秀人物，我们不相信他们还能去相信谁？再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让代表们起来揭发，敌人是诱之以利，我们则是晓之以理，在代表们中间广泛揭露这些无耻的阴谋和卑劣的行为。绝大多数代表是不会上当受‘AB’团的欺骗的。莫说是五块光洋，就是五十块光洋，怕也买不走他们的心！”

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农会骨干纷纷行动起来，分别在代表们中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思想教育。果真效果很好，这以后的会就变成了揭发会，把“AB”团分子闹的那些小伎俩统统给抖落了出来，私下的交易一旦袒露在公众面前，就得老着脸皮承受住舆论的攻击。一些“AB”团分子也知怕丑，再也不肯来做说客；也有不甘心的，还想一试，结果一踏进代表们的住处，便遭到一片嘘声，周围又发出了一片“狗来啦，打狗呀！”的叫喊声和哄笑声。他们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离开。

邹莫气得拍桌子、跺脚把手下的人骂了一顿，握着自己那枝锃亮的勃朗宁小手枪拍着胸脯对段锡朋说：“这帮种田的泥腿子叫共产党教唆得真够恶的，尤其是那个方志敏，事事与我作对！不如送他一颗‘花生米’，杀一做百，看谁还敢闹！”

段锡朋白了他一眼道：“方志敏能吃这套么？他是那种铁了心的共产党，死是不怕的。此时要把他杀了，农民们还不得炸窝？还不曾到撕开脸皮闹翻的地步。再想别的办法吧。”

省农民协会的阵地终于没有流落到“AB”团分子的手里。方志敏被大会选为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负责主持农协的全面工作。共产党提名的其他几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也全部当选。大会开了九天，作了“统一农民协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军”、“惩办土豪劣绅”、“减轻田赋”、“清除县政积弊”等26个决议案。

第六章

老话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方志敏
欠了毛泽东一条鱼 “AB”团被揍得一败
涂地，从此销声匿迹

在民国 17 年 2 月 16 日那张发黄的《中央日报》上，几个大大的黑体字很是醒目。这篇不长的文章用的题目是《江西民众运动的过去》，副标题用了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扰害不浅》；另一条是《老百姓畏党如虎》。文章如下：

自从党军克复南昌后，民众运动，亦随党务而活动，如省农会筹备处，省工会筹备处，一个个在 15 年 10 月间，次第成立。但是此时共产党借着民国的党的招牌，就不少的混入民众去了，散布共产的种子。如总工会筹备处的常委肖努锋，省学生总会执委邹努、姜铁英，省农会的委员方志敏、涂克鹤等，尽量地把他的马克思信徒派到各地去组织民众团体，把持操纵，所有忠实党员，反挤得没有立足之余地。于是他们竭力宣传赤化，利诱威逼，把一班无知愚民，当做个人换卢布的牺牲品。

到了去年二三月间，到处的乱子起来了，工人绑厂主游街，店伙杀死店东，农民不交租，流氓捣毁县政府……一类的事，数不胜数，闹得一塌糊涂。共党的首领刘九峰、方志敏等，借着保护农工的幌子，对于这种杀人放火的行为，反大吹特吹他说：农民工人已经起来了，国民革命快要成功了！结果使一般老百姓叫苦连天。去年 3 月 14 日，正式的江西省党部，被涂振农、肖努锋……等，统率一班流氓地痞，捣毁后，所谓纠察队，还在到处捉人，捉到就杀；把所有忠实党员，捉的捉，逃的逃。他们乃奏乐凯旋，高唱《国际歌》。一班民众的劫逃，从此开始了。

舆论的导向在不明真相的民众面前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可以帮助你作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也可以混淆你的视听，以至你如坠十里云雾。一旦真相明了，你后悔不迭地叹息：“原来是这样！”

翻完《民国日报》，又从别的资料上看到了另外的消息：

3 月 6 日，国民党右派出动武装，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绑架到县公署，随即开枪残杀，陈身中十八弹。晚上，又捣毁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由于县党部是国民党左派掌权，也遭捣毁。

3 月 7 日，永丰县右派强迫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县工会、县农协解散，吊打了这些团体的负责人。

3 月 14 日，右派省党部作出决议，将左派南昌市党部解散，并通缉执行委员。同时，封闭学生会，搜捕工人纠察队。

3 月 15 日，蒋介石在南昌市 20 万人民面前，公然发表为右派省党部撑腰的言论。

3 月 17 日，蒋介石由南昌抵九江市的第二天，发生了九江惨案。左派市党部、市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九江国民新闻社被捣毁，当场杀害市党部三人，市总工会一人，六军政治部重伤九人，工人纠察队队长曹炳元惨遭杀害，工人被打死十余人，抛河致死十余人，市民重伤垂危的六十余人。……

多方面的资料综合起来，能否在脑海中形成一个连贯的真实的画面？能否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印象？七十多年前的事态发展的究竟原因与轨迹面

貌，只能是从字里行间去寻觅了。一个叫田中忠夫的日本人，在 1934 年搞了一篇题为《中国农业经济资料》的文章出来，他对当时江西的农民运动是这样写的：

江西农民，也因为如此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不安定，时常发生反抗运动。1925 年，都昌县的农民因县知事吞没农民的钱，集合数千人，高喊打倒贪官污吏，将县知事留在县厅上，强制的要县知事清算。同年，因为水灾，九江、吉安、永修、星子等各县，都有热烈的示威运动，提出正当的要求，这时，各地的劣绅俱为多数群众所殴打或烧杀。同年 2 月以后，开始了农民运动，并且有了组织……据 1926 年 10 月省农民部的报告，在永修、都昌、吉安、九江、万安、弋阳、星子、南康、吉水、德安新建等各县，都有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全

省达六千人以上。各县农民协会的活动，注重于设立农民补习学校，采取温和的改良政策。但省农民部，当江西战云一起，派特派员三十余人到 20 县中去，开始活泼的运动，准备革命军攻入时的农民的援助与攻入后的农民运动的发展。……

当时的运动大致就是这样，具有暴力性，互相抑制生存，不但要从精神上，而且也要从肉体上消灭对方。当然这并不是惟一的手段。但这一定是相当重要的手段。毛泽东作出过这样的断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只有弄清当时尖锐的阶级对立，才能深刻理解革命者所采取的一切近似残酷的过激行动。老话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到了 4 月间，全国的革命运动，又掀起一个小高潮。

毛泽东穿着布鞋，手执一柄布油伞，悄悄地在湖南乡下转了一圈，在窄如羊肠的田埂边和泥腿子老乡们交谈，在破漏茅草屋中间的火塘边还是和他们交谈，历时 32 天，回来后写了一份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此文发表时作了序，认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则在苏联人的会议上推荐这本小册子，发表的读后感是“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方志敏赶紧找来读，先睹为快，读毕果真是不由得拍案叫好。湖南与江西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小册子里所提到的湖南农民兴冲冲干的十四件事情，江西件件都有，就连湖南土豪劣绅所说的怪言怪语，仿佛也是同江西的如出一辙。方志敏感慨万分，毛泽东对于农民运动发展中各个层次做的深入了解与剖析，真是笔锋犀利，入木三分。他为眼下还是有些粗糙的农民运动呐喊叫好，对幼稚的农民新生事物给予满怀热情的支持。在当时共产党内，当陈独秀一意把希望寄托在联蒋上，而张国焘又一意强调依靠工人阶级。毛泽东则独树一帜，不能不看出他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

方志敏与毛泽东是心心相印的。在读完毛泽东的小册子后，他提起毛笔在小册子的结尾空白处写道：“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之对，种田没有犁耙不行，闹革命没有武装也不行！”

这期间，虽然时有恶劣现象与事件发生，但是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里，还算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也还算得上是目前革命的新都。所以在这时候的武汉，革命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

接连召开了几个规格颇高的大会。

一个是中央农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3月27日正式在武汉开幕，主持人是毛泽东与邓演达。会议地点选在武昌大朝街59号。方志敏自南昌经南浔路转由水路到武汉，不顾鞍马劳顿，便在会上作发言，介绍了江西省农协筹备成立情况，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在江西扶植土豪劣绅，勾结地痞流氓，摧残工农运动，破坏三大政策的种种事实。方志敏指出：“现在江西农运发生的反动，就是右派捣乱，右派不打倒，农民的组织就要完全破坏。”他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势力的自戕！”

毛泽东很是器重这位江西农运的同行。在革命队伍处于动摇、分化、犹豫、观望的情况下，像方志敏这样对农运坚定不移的人真是求之不得。会后毛泽东邀请方志敏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全体学员作了一次讲演。方志敏欣然允诺前往。

这两位倾心于农运的职业革命家的第二次见面，谈论的话题自然是围绕着中国的农民。

难得见面，一述起来话就长，方志敏总觉得谈兴犹酣，聊得忘了钟点，直到夜幕降临，街口上华灯齐亮，方志敏要请毛泽东去尝尝武汉有名的干煸武昌鱼。他知道毛泽东总以辣子佐饭，对清蒸红烧的菜总觉不过瘾，就特意进了家湖南馆子。然而这顿饭却没有吃成，因为到门口看了菜的牌价，方志敏一掏口袋才发现自己所带的铜钿不够这道菜钱，只好怯而止步。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他俩是“临阵脱逃”，方老表是未有充分准备、低估了敌情上阵。方志敏也笑了，说：“欠你一条鱼，以后补上。”于是俩人在街口小摊上吃了两笼煎包，一人又来了一碗过桥米线。

毛泽东舀了一大勺辣子搅和在汤里，吃得满头是汗，连呼“痛快”，说：“有了辣子，鱼不鱼的都在其次了。”方志敏胃也不太好，不敢吃得十分刺激，毛泽东边吃边鼓励他说：“革命要彻底，吃辣子也要彻底，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扭扭捏捏。”最后连红辣辣的汤都喝了。

在这次的中央农委扩大会上，议决了建立农民自己武装、土地重新分配等三十多个提案，推选了毛泽东、彭湃、邓演达、谭平山、方志敏等13人为中华全国农协的临时执行委员。

在这些提案中，比较重要的是“武装农民”的问题。会议完全同意关于建立农民自卫武装的主张，认为“要使农民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就一定要武装起来，故农民武装问题，是个重要的要求。”不过此时的“建立农民武装”，也只是一纸空文，并没有认识到这已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后来也来不及认真有效地去做这件事。“农民武装”就被“反革命武装”压制下去了。而且就所有决议和通过的提案，所收到的效果也就是扩大了一些政治影响，做了一些书面上的文章。很快人们发现，没有一条是能办得到的。

因为这只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一厢情愿。

在方志敏到达武汉的前后，江西各革命团体已就赣州惨案及其后各地发生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纷纷发出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革命的国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惩办凶手，质问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赣州工人、省陈赞贤惨案委员会、南昌和九江市党部，还相继派出代表来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陈述赣州、南昌、九江等地发生惨案和反革命事件的

经过，揭露蒋介石及其爪牙段锡朋等在江西反革命活动猖獗的情形，要求立即解散非法产生的右派省党部，改组反动的省政府，制止反革命活动；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全国各界各民众团体声援江西人民反击反革命的正义斗争。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赣籍学生也全体列队，渡江到南洋大楼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改组非法的江西省党部、枪决凶手、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解散赣州反动组织、质问蒋介石等五项要求。

毛泽东热情地支持江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的追悼江西赣州和湖北阳新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说：“在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封建残余势力正进行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呀！”他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发出号召，“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进攻，务期达到真正之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当时，在毛泽东的号召与组织下，农讲所的全体学生召开了讨蒋大会，会后结队请愿，强烈要求依法惩办蒋介石。

另一个重要的会议，是国民党召开的常委扩大会。在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撤销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在重新规定总司令职权的基础上，专门作出了关于江西事件的决议。决议有这几项：停止江西省党部执监委职权，听候查办；恢复南昌市党部，由国民政府电令江西省政府取消对南昌市党部执监委的通缉令，释放拘禁人员，训令九江驻军保护九江市党部和民众团体，严惩凶手和反革命暴徒；开除段锡朋等的国民党党籍，并由政府通令拿办。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宣布免除李烈钧的省长职务，改组省政府。随后，又发表了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等八人为中央特派员、代行江西省党部职权的决定；委派当时还服从武汉中央的朱培德，改组江西省政府。

这是令革命派欢欣鼓舞的消息。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也立即提笔撰写了一篇题为《请看今日蒋介石》的文章。这篇文章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将蒋介石的种种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结果在脱稿付印时就首先在印刷工人中争相传阅开了。方志敏等人则在武汉会议一结束，立即返程南昌，着手将武汉中央的指令付诸于行动。

4月2日上午，南昌各界在钟鼓楼新舞台举行反“AB”团的群众示威大会。大会的程序是安排好了的，会上控诉和声讨“AB”团反共罪行，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结果这次大会开得十分有成效。群众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一路上口号震天，群情激奋，像一股股愤怒的火焰，一齐拥向百花洲。

百花洲位于南昌市中心，地临湖滨，风景优美。段锡朋要组建省党部，于是就占了这么一处好地方。现在，游行的群众已经抑制不住满腔的激情与怒火了，右派省党部所在的那幢灰墙红瓦西式楼房在众目睽睽之中显得那样地刺眼。有人喊：“打倒AB团，活捉段锡朋！”这幢在当时算得上是很气派很时髦的洋房立即就被愤怒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

段锡朋的耳目颇长，武汉中央会议的决定他第二天就知道了消息，段锡朋自恃有蒋介石的上方宝剑，并没有把这些纸面上的文章当回事。在那个时期，这样的笔墨官司多如牛毛，今天你发个宣言，罢免了我，明天我发个公告，开除了你，数不胜数。只要枪杆子和印把子仍在手中，别人闹什么就只当个青蛙吵塘。段锡朋也狠，把子弹发了下去，下令守卫，不管白天黑夜，

动静一不对头就开枪，敢来寻事者，格杀勿论。

这是4月1日上午的事。到了下午，武汉方面又有消息接踵而来：蒋介石被撤职，李烈钧被免职；更要紧的是，负责改组省党部的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已兼程返赣。

段锡朋把整个局势又盘算了几遍，心里委实感到了不踏实。尤其是方志敏等人要回来，这个消息使段锡朋沮丧之极。和方志敏打交道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差不多也没占过什么便宜，有蒋介石撑腰，才算打了个平手。这次方志敏回来，挂的头衔不算小，这就是钦差御使呀，奉旨行事，违命不得的。段锡朋的后台再硬，这回上方宝剑在人家手里，何况连蒋介石不是也让人家撤了职吗？方志敏在当地相当有威望，原先也是因为畏惧他的个人威望，所以动他不得。这下由他来负责改组省党部，就等于要把自家的身家性命交于他来主宰了。段锡朋叹了口气，方志敏与自己是不共戴天的，要是继续留在这里，那只有等着做泥腿子们的阶下囚，危巢之下岂有完卵？段锡朋又给南京方面发了份加急电报，但不知什么缘故，南京方面迟迟没有回音。这下更坚定了段锡朋要开溜的决心。

谁也不晓得段锡朋是什么时候开溜的，也闹不清他是怎样溜开的。到了4月2日这一天，负责守卫省党部洋房的几十个雇佣来的地痞流氓还蒙在鼓里，以为段锡朋的牌子还能唬住人，又仗着手中有枪，挡着愤怒的人群不让冲进去。混乱中也不知是谁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带着唿哨声从人群头上飞过，击中了一块窗户玻璃。玻璃当时就碎开了。这下人群炸了窝。

戴着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一马当先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那几十个武艺不强的地痞们冲散了。接着人们赛过潮水般涌了进来，紧跟在工人纠察队后面的农民与学生，以石头和木棍作为战斗武器。只听得楼里边乒乒乓乓的响成一片，门窗桌椅被砸碎，文书表册丢了遍地，转眼之间，“AB”团把待的省党部巢穴已是一败涂地，破惨不堪。留在楼里未能出去的“AB”团分子，真如同丧家犬一般，有的上屋，有的跳墙，无处可躲的跪着求饶。

离省党部不远就是省农民协会的驻地。工人纠察队员和农民、学生一起，把抓住的二三十个“AB”团分子押到了省农会。刚从武汉赶回来的方志敏等人立即赶到现场。他看见往日飞扬跋扈的“AB”团分子在这里被群众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书写着“AB”团分子字样的纸牌，被工人纠察队雄赳赳的队员监押着游街。而后被押往总工会加岗看守。在总工会大厅的一角，“AB”团的头目被麻绳绑得结结实实，其他的小喽啰零零散散地靠坐在墙角地下，说不出的垂头丧气，昔日不可一世的威风荡然无存。方志敏感受到从来未曾有过的痛快与高兴。虽然段锡朋没有抓到，但由“AB”团把持了三个月的省党部到底寿终正寝了；李烈钧连同他的短命省政府星夜往上饶方向逃迁；蒋介石安插在南昌总部的留守总参议张群也逃之夭夭。原先由各地逃到南昌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此时失去庇护，也只得纷纷作鸟兽散了。

4月3日，在南昌的公共体育场又举行了3万人大会，欢迎方志敏、朱培德等特派员回赣，改组省党部和省政府。会上，把捉到的“AB”团分子押到会场示众，鼓舞斗志。一时万头攒动，彩旗飘舞，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群众到会之踊跃，情绪之热烈，前所未有的。

大会决定成立由方志敏等八人组成的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置“AB”团反革命案件，并交政府惩办。会上又以省市各民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宣布“四·二”经过；通电全省各地，对于右派省党部所派出的

特派员和指导员，一律拘拿送省，听候查办。

5月8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全市肃反讨蒋大会，号召群众一致向左转，打倒蒋介石。不久，又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声讨蒋介石，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李烈钧的国民党党籍等决议案。选举出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邵式平、黄道、罗石冰、涂振农等为执监委员。至此，除赣东和赣南的少数地方尚为反动分子窃踞而外，全省各级党部重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方志敏仍以省党部执委身份，兼任农民部部长。

第七章

朱培德听了杨慧君之言后笑道：夫人提醒得好 邵式平与胡德兰一面之缘订下终身 方志敏在黄家巷五十八号举行了秘密婚礼

江西的农民运动一时间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他决不能容忍大权旁落至他人之手，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另一方面与武汉汪精卫们开始了拖泥带水的讨价还价。这一来，新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大犯踌躇，感到了进退两难。

朱培德在国民党中的资历比较老。最初他就读于云南讲武堂，1914年夏天以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此踏上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涯。诸侯称霸的战乱年代，军人是一种很吃得开的职业。在两次护法运动中，朱培德升升降降，游刃于滇、粤、桂、川各系之间，转战于三省之野，算得上是从容应付。1923年夏秋，孙中山指挥进攻陈炯明作战，朱培德率部相从，并奉命回驻广州，为大本营近卫军军长兼大本营参军长并代理军政部长。10月，陈炯明军来犯广州，朱培德率部会同诸军阻击陈部于罗浮山下，战而大败，各军溃退如潮，孙中山亲自督师也未能挽回败局。朱培德于乱军之中，只身拽马尾渡河而逃，方幸免于难。朱培德败而不馁，随即收容散军，于沙河龙眼洞修筑工事阻敌。陈炯明部以精锐兵勇冲锋数次均未能奏效。朱培德见时机正好，立即集中主力迂回至侧翼，大破陈炯明军。广州转危而安。孙中山以“虎将”称赞朱培德，敬服有加。翌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开始，广东各军国改编，朱培德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后又被任命为北伐军中路总指挥。这可谓是朱培德军事生涯的辉煌时期。

北伐军控制江西后，朱培德负责警备江西地区。这时候，一连串的事态变化使得南昌在国民党左右两派之中变得十分特殊起来，朱培德也处在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上。

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短期内迁至武汉。

四天之后，即同月12日，蒋介石电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江西临时政治会议，并委任朱培德为代理主任委员。

11月27日，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成立。

12月4日，蒋介石一行抵达南昌，直接参与控制南昌态势。

到了1927年的1月，国民政府明令迁都武汉。蒋介石则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反对迁都武汉，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同时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讨论研究长江中下游作战计划，朱培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任命为总预备队总指挥。

3月3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虽勉强同意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部迁往武汉，而蒋介石却仍控制着南昌，并在这里制造了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摧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等惨案。朱培德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月18日，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宣布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样，宁汉对立的形势公开化。朱培德则以中立态度周旋于宁汉之间。

朱培德的政治态度十分含糊，甚至表现得还有些偏左。1927年初，曾经

是滇军将领的共产党员朱德来到南昌，朱培德与他同窗于云南讲武堂。有念旧情，朱培德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个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军官教育团开始训练的一千名干部，两个月后，训练团毕业的学员大部派到江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朱德在他眼皮子底下搞这些近“赤色”活动，朱培德也不曾反对，反而对朱德很尊重，连政治上、军事教育上的问题都会提出来向他请教；同时，接收部分共产党员充当各级政工人员。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江西省主席的当天，他又委任了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随着蒋介石的反共步履日趋紧迫，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从安庆脱离蒋介石来到九江，受到朱培德的欢迎接待。郭沫若在南昌发表慷慨激昂的付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也未受到朱培德的反对与阻拦。当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捉拿江西省政府教育委员会程天放等二十多个“AB”团分子时，朱培德采取的是静观态度，不置可否。

随后，蒋介石宣布建都南京，朱培德也不表态，表面上仍归属并接受武汉政府的领导。而当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桂系将领李宗仁奉命向江西进军时，乃请朱培德会面磋商。朱培德曾一度指挥过第七军，与李宗仁私人关系特殊，俩人便连续密谈两日，达成临时协议，宣布江西为“中立”地区。这样，江西便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小气候。

可惜，这种小气候维持没有多久。随着武汉政府态度的变化，蒋介石压力与诱惑的增加，朱培德发现自己渐渐地处在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依靠汪精卫，还是追随蒋介石，使得朱培德举棋难定。倒是他的夫人杨慧君，轻轻巧巧几句话就将这个让他左右为难的死扣给解开来了。真可谓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杨慧君出身望族，从小读书识字，颇有见识，非一般寻常人家女子。跟随朱培德十几年，看人看事，人木三分。有时连朱培德都自叹不如，很愿听夫人指教。

杨慧君说：“其实汪蒋俩人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两个最恼恨的，不都是共产党吗？这件事，你尽着去做，都不会做错。”

朱培德问：“可有合的苗头？”

杨慧君沉吟片刻：“怕也不能。有人推算过，这俩人所属星相不同，但所谋求到手的东西却是一样的，必有一番你争我夺。”

朱培德说：“江西的共产党闹得也实在过火，但碍着其中有许多是相知相熟，似乎不便着手处理。”

杨慧君说：“益之今天怎么说起这样软弱的话来，亏你还是行伍出身呢。要学宋襄公么？”

朱培德笑了起来：“夫人提醒得好，宋襄公的优柔寡断自然是断送了他自己，宋襄公的仁义忠信不妨借来一用。”

朱培德自谓天算不如人算，做人做事方正不如圆润，蒋、汪与共产党这三方面，他都不想开罪，同时为自己留几条后路。世道很乱，谁知明朝会出怎样的太阳？所以朱培德的做法，真真是费了心思，搞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套路。

南昌的小气候急骤降温。5月29日，朱培德派出第三军第七师参谋长冯焯勋，召集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训话。会上，冯焯勋和颜悦色地告诉大家：“数月以来，江西境内种种革命活动过频，言动过激，外界对朱主席压力颇

大，对江西势态十分不满。目前解释一切怀疑之惟一方法，只有请诸位政治工作人员立即离开第三军及江西，以平息舆论。”

几句话讲完，到会的人员一时间瞠目结舌，如坠雾里。未等他们反应过来，两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已经全副武装地迅速进入会场，将个儿不大的会场团团围住。一时间，人员骚动，气氛骤然紧张。

冯焯勋抬高了声音：“诸位！诸位！诸位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明白。服从则罢，如若胆敢违令……”

话还未说完，只听炸耳的一声枪响，一发子弹从人们头顶上飞过，打穿了天花板。冯焯勋厉声喝斥：“是谁走火？！”立即有副官上前将“走火”的士兵推出会场。经过这一番折腾，会场倒是安静下来。

冯焯勋放缓语调接着又说：“朱主席体谅大家革命辛苦，已经准备好了专车、专轮，欢送大家到武汉休息。诸位要闹革命，也请到武汉去闹吧！”

言毕，士兵们立即持枪列队，将参加会的一百四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重新组队，押解往车站。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先乘火车到九江，再押送上开往汉口的江轮，直等轮船起锚后方可允许自由行动。

与此同时，南昌的几条主要街道森严壁垒。尤其是从军部大门一直到牛行车站，四下里张贴着标语，有的写着“欢送共产党出境”，有的写着“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有的甚至很不客气地写着“共产党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的对付”。朱培德为防乱子，事先亲自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自己的态度，把驱逐政工人员的具体安排布置了下去，要求各部军官对自己所属的下级军官与士兵要严密防范，停止上操，禁止外出。一时间南昌城里大有“风雨欲来云满楼”之势。

紧跟着，朱培德又采取了几个步骤，更显得风头大转。先是将矛头对住在赣东剿匪刚刚回到南昌后的朱德。朱培德以其“同党部及各民众团体来往很密切”为由，请其“自行辞职”。接着，“四·二”中被抓的“AB”团分子程大放等人获得朱培德的释放，连贵溪龙虎山那个张“天师”也逍遥法外。于是各地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捣乱反动的“AB”团分子也都接着探头探脑地活动起来。这股风是越刮越烈，杀害革命党人的事件则是愈演愈凶。

在永修开展工作的中共永修县负责人兼任国民党江西党部执行委员、工人部长的张朝燮，被豪绅大富收买的土匪绑到河边打昏，尸体在水雅中被舂成肉泥。

万年县的农协负责人胡完生被反动的地主劣绅捉去，毒打之后又用棉花裹着缚在木柱上，浇上煤油活活地烧死。

贵溪县的农民领袖、共产党员江宗海没有让老财土匪们捉住，可是却被李烈钧的卫队凶残地枪杀了，尸首被子弹打得如同蜂窝一般。

朱培德的风向一变，江西的形势已开始出人意料地迅速恶化，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濒于破裂的边缘。

当这股恶风初露端倪时，方志敏就已敏感地意识到：朱培德很靠不住，是个骑墙派，风一刮大了，他就会倒向反革命的一边去。所以，在朱培德玩弄“礼送出境”的把戏之后，他又去找王力生，一是想反映情况，二是想从上级省委领导那里讨个主意，也好早些有个准备。

方志敏问王力生：“看没看出朱培德的脸要变？这家伙很靠不住，我们要是还相信他，迟早要吃大亏。”

王力生不急不慢他说：“朱培德是国民党在江西的台柱子，他在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是起调和作用的，对共产党的态度目前也是友善的，就算让你离开，那也是‘礼送出境’嘛。江西要是没有这么一个撑得住的角色，反动势力则会更嚣张。这一点你想过没有？”

方志敏说：“你说的那个‘礼送’，和我见到的不大一样。”

王力生说：“有什么不一样？总比蒋介石在上海开戒杀人强吧。对于朱培德这样有一定军事实力、思想上又可左可右的人来说，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争取、感化，千万不能刺激他！”

方志敏哭笑不得，说：“哎，还不能刺激他呢，他不刺激你就算不错了。你上街头巷尾去看看，满是反动的标语口号，都是他那个第三军里的什么‘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写的。他不支持，下面谁敢这样做？明摆着他是在向右边转嘛，把我们在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礼送’出境，这只是第一个举动，是一个信号。下次他就该对着全省的党组织下手了。”

王力生将信将疑他说：“哪有这么严重。”

方志敏恨不得拉他到车站码头上去看：“怎么没有，这趟被‘礼送出境’的政工干部，连自己的行李东西都不容回去拿，直接被枪押着送上车。现在要是朱培德他们还存有幻想，我看差不多就是近乎于自杀了。”

王力生不以为然：“你说的也太吓唬人了。我晓得你这个人思想是很激进的，对革命倒也忠诚。否则你这种情绪太危险。像你这样偏激，怎样去做国共合作的工作？再退一万步说，朱培德就是不革命，我们也要去做争取他的工作。”

方志敏拍着桌子角说：“同志啊，这叫断送革命！他要不革命，他就要来杀你了，哪还容得你坐在这里说三道四？”他也意识到自己每次和王力生谈话都不免激动，这样似乎也不大好，于是忍住性子，压住火气缓了缓又说，“你细想想，朱培德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是实实在在地和我们一条心？什么时候能真心真意的和我们合作？只怕是睡到一张床上，他的枕头底下也要掖一把刀哩。对国民党里的这种人，实在是信不得的，不要等吃了大亏才醒悟。”

王力生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我说你是说不过。那你说怎么办好呢？”

方志敏说：“‘礼送出境’只是朱培德反革命活动的前奏，后面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的，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也不能让我们的组织和同志们遭受太大的损失。应该早做准备才好，”

王力生说：“那就先把党的机关逐渐地秘密起来吧，前段日子搞工人农民运动，目标也着实大大了，差不多全落在人家眼里了。至于你嘛，还是要坚持工作，用自己的言行，去尽力拉拢和影响朱培德的人。”

作为省委负责人的王力生，自然是要十分忠实地执行陈独秀关于联合国民党、不刺激国民党的指示，所以，关于隐蔽党的机关的想法也没有很好去落实。而方志敏个人在当时那样的领导路线下想要扭转局面或作一些漏补，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逆流冲来，转舵顺流，只有一退千里。

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6月5日上午，方志敏刚刚参加完在南昌召开的贵溪县旅省人士为悼念江宗海遇难的大会，回到农协尚未坐定，只见一位在朱培德部工作的“眼线”匆忙跑来，喘息不止他说：“志敏兄，快快离开这里！朱培德要查封农民协会了，要用武装押解你们去武汉。派出的武装军队已经分头出动了，我也是刚刚得了消息。你赶快走吧！”

方志敏一惊，知道事态严重，这位朋友若不是事出紧迫，是不会暴露身份亲自跑来通知自己的。他赶紧把来人送出后门，自己回到办公处，匆忙地收拾了一下文件，听到街道上已经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这才转身闪出了后门，悄悄地转到黄家巷 58 号去了。

方志敏刚离开不久，朱培德派的一营兵前脚踩着后脚就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将省农协会团团围住，先收缴了农民自卫军中队的全部枪弹器械，随后又在楼上楼下到处搜查，没有找到方志敏。为了回去复命，他们在方志敏的卧室和办公室翻箱倒柜，把能翻出来的文件杂信统统地搜走了。

朱培德这一天采取的行动规模不小。他首先派出宪兵及士兵在南昌全城广布岗哨，断绝交通，封锁路面，实行戒严。接着又分别查封了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市学联、南昌市党部等共产党所控制的机关团体，同时封闭了共产党人所办报馆。朱培德依然用的是“礼送”的一套。他用开会的名义，把省市党政机关和各民众团体内著名的共产党人员，其中也包括几位积极共事的国民党左派人员，强行用武装“请”到军部软禁起来。朱培德宣布：“江西共产党人限期出境”，并且要“停止全省的工农运动，听候中央指导”。

朱培德很会做戏，他设了一桌酒，说是为共产党人“摆酒饯行”。他客客气气地要大家体谅他有为难之处，语调肯切他说：“诸位，我也是有一肚子的苦衷啊。南昌这个地方处于宁汉对立的最前哨，情况相当复杂。北伐大业尚未完成，我们不能先在这里发生磨擦，为了避免出现流血事件而影响社会治安，我这一介地方父母官也要为百姓黎民着想。出于无奈，只得请你们离开此地，我是以礼相送，每位除了赠送旅费，还赠送安家费，每人 1600 元。拜托拜托！”朱培德拱手作揖，又在军乐队的吹打声中，全副武装的士兵将 24 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送上了火车。朱培德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江西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大革命面临着挫折与失败。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方志敏却准备结婚了。新娘子是方志敏的同乡，叫缪敏。

方志敏是在一次宣传聚会上见到缪敏的。在局势宽松时，南昌各群众团体与学校经常搞一些宣传聚会活动。方志敏和其他组织负责人一起，经常被请去参加，作革命宣传。有时候专题讲课，有时候开座谈会。这一次是南昌广信旅省同乡会召集的聚会，请方志敏去讲讲眼下革命发展的形势与农民运动发展的趋势。

缪敏很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并不多说话，只是很注意地听取别人的发言。所以一开始，方志敏也没有注意到她。

方志敏说到最后，见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听他讲，于是说：“怎么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呀？大家都可以说说嘛，有不清楚的地方，有怀疑责问的，都可以说。”

有人说：“方主席，你已经讲得很好了，我们听你讲就行。”

方志敏笑了起来：“那真的是成了‘包讲’了，现在‘包办’的事情都做不好，‘包讲’怎么行？你们要是没有问题，我可要问你们了。”

屋子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大家开始在底下议论。这时，有一个很纤细的嗓音从角落里传过来：“方主席，我想问问，您是怎样选择了走革命这一条道路的？”

方志敏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衣着十分朴素的女学生很不自然地站了起来，一双明亮的眼睛羞涩地望着自己，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脸上已是涨得通

红了。她怕方志敏没有听明白自己的意思，连忙又解释道：“我只是想问问，您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又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方志敏点点头，鼓励她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光是问我，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哩。我们参加革命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我们又是怎样迈上这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的？”

于是方志敏讲述了自己是怎样由一个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经历，讲到了赵醒依的英勇牺牲，讲到了彭湃与封建家庭的斗争，讲述了他们因为出身不同、家庭环境不同，但最后将一生都倾注于革命事业的过程。因为是讲自家感触最深的一段经过，所以方志敏讲得十分投入、动情，使听众很感动。讲到许多战友被敌人杀害、为革命捐躯时，方志敏注意到，那位眉目清秀的女学生已经是眼泪汪汪了。

方志敏最后说：“现在有人把革命当做一种时髦，当做是下菜的佐料，好像因为流行得很，就学了满嘴的新名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革命家。其实革命是很残酷的，是会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躺在软榻上，喊几句革命的口号，那就叫革命了吗？地主老财、反动军阀就会被打倒了吗？只有搞清楚为什么要革命，心里有了一个目标，才会坚定地做下去，遇到困难、遇到杀头，也就会毫不迟疑地迎上去！”

听到这里大家一齐鼓起掌来。

散会的时候，方志敏叫住了那位女学生：“你是叫缪敏吧？”

缪敏愣了一下，脸又红了：“是。我是南昌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

站在方志敏旁边的丘侗说：“志敏，你晓得不？你们俩还是同乡呢，她也是弋阳县人。”

缪敏更显得有点局促了：“我老家是葛溪缪家村的。”

方志敏点点头说：“离我们那儿不太远，我是漆公镇湖塘村的。”

缪敏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晓得。”

丘侗说：“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位女学生，她在她们学校品学优良，是我们新发展的共青团员，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呢。”

方志敏很高兴他说：“那真是太好了，现在革命太需要你这样有知识的积极分子参加哩。”

缪敏鼓了鼓勇气说：“还要请你们以后多帮助我。”

丘侗说：“那是一定啰。”

方志敏说：“刚才你的问题提得很好，许多人都闹不清楚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跟着潮流走。等到反革命一来，这些人就容易变成动摇分子。”

说着话，缪敏渐渐地恢复了自然，甩了甩齐耳的短发说：“您刚才讲得也真好，使我明白了许多的道理，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丘侗在一边所得笑了起来：“这两个人，一说起革命来，话倒多了起来。说说别的不成吗？要是你们说别的话题，也能谈得这么起劲就好了！”

缪敏的脸腾地一下又红了起来，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尴尬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停了会儿，这才轻轻他说了一句：“我先走了。”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他俩。

方志敏埋怨道：“丘侗，要给你嘴巴上也派个哨兵才行。你看你说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人家只是个要求进步的女学生仔呀。”

丘侗哈哈大笑起来，反过来问方志敏：“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你看把你紧张的。告诉你，要我说呀，她不光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仔，而且

还是我们革命的‘同路人’哩！”方志敏拿他也没办法，无可奈何他说了句：“要给你加‘双岗’，禁止你言论！”便撇下他先走了。

丘侗笑得更厉害了，指着方志敏的背影说：“跟老蒋一样。没法子了，就禁止民众言论自由！”

这一次的谈话给方志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缪敏的音容笑貌就常常浮现在脑海中。方志敏为此变得有点兴奋，又有点苦恼。他对自己眼下的地位与处境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一个立志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职业革命家，如果要陷入谈情说爱、恩恩怨怨的圈子里，会是个什么结果呢？方志敏真是有点把握不住这个问题了。

过了一段时间，邵式平从弋阳县城到南昌来汇报工作，晚上就和方志敏挤在一间屋里睡。方志敏知道邵式平眼下正处在“热切的恋爱”之中，于是拐弯抹角地就套起邵式平的话来。谁知道邵式平一点也不遮遮掩掩，一说起自己的未婚妻胡德兰来，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胡德兰是江西星子县蛟塘乡龙溪胡村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读书识礼。但因父亲去世早，家境贫落下来，靠伯父的接济，她和弟弟才得以上学读书。因此，13岁那年到南昌投考江西省甲种女子职业学校，经过一年预科进入蚕桑专门班学习。胡德兰觉得种桑养蚕是门很用得着的学问，因此学习起来一点也不敢放松，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方志敏扳着指头算了算，问邵式平：“照你这个说法，胡德兰在南昌读书的时候，你也正好考入南昌一中，你们倒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邵式平双手枕在脑后，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回忆起那段刚开始恋爱的光景，脸上洋溢着一片幸福灿烂的光彩：“同在南昌是不错，不过开始并不认识，我读我的书，她上她的学，要是在大街上碰见，谁也不知道对方姓谁名啥。”

方志敏盯问：“其中必有缘故，是什么道理让你们俩认识的？”

邵式平说：“不是‘道理’。”

“不是道理是什么？快说！”

“说来也巧，这个中间人，是胡德兰的堂弟胡德珍。胡德珍与我同校，只是低我一班，我们俩处得十分融洽，不是亲兄弟而胜似亲兄弟。我就是在胡德珍那儿认识德兰的。”

其实所谓认识，当时也就是一面之缘。正逢胡德兰毕业离校，乘船回星子老家。胡德珍和邵式平一同来送行，从干家巷学校所在地一直送到了江边码头，等到胡德兰坐的那只船离开了码头渐渐驶远看不见了，他俩才慢慢地踱回学校。

“胡德兰小姐是被船载走了，可是哪晓得邵大公子的心也被载走了！”方志敏开玩笑说。

“真的是这样！”邵式平倒挺坦白，“这才叫一面之缘定终身呢。码头上这一别，我怎么也放不下心去。我也晓得，她对我的印象也是很好的。胡德珍晓得我的心思，给我出点子，叫我写信。”

方志敏不由得赞美他说：“这倒是自由恋爱呢，想不到你老兄还有点勇敢精神。”

邵式平摆了摆手说：“你又弄岔了。这第一封信，是胡德珍叫我写给德兰的母亲。德兰姐弟全靠她母亲拉扯大，所以非常听她母亲的话，胡德珍认为，这桩事只要征得她母亲的同意，那就成功了一半。但如果她母亲不肯，

那胡德兰自己愿意也没得用。”

方志敏说：“在战术上这是叫迂回吧？你倒也是蛮狡猾的。”

邵式平笑眯眯他说：“只要能达到目标取得胜利，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嘛！她母亲可是十分认真的，拿着我的信跟德兰的祖父、伯父商量，又去问德兰的意见。”

方志敏憋不住又插嘴：“胡德兰当然不会反对啦！这问都不须要得去问。”

邵式平很得意：“对，她是一丁点反对意见也没有。通过了这么一道手续，我们就开始通信了。”

这一年的秋天，邵式平到北京去念书了，而胡德兰在景德镇市的女子公学找了个教书的职业，后来跟随伯父到了德安县，依然是教书。俩人虽然一南一北，远隔千里，可是靠着鸿雁传书，感情升温很快。胡德兰几乎每天都能收到邵式平的信。邵式平则是把每天的见闻、感受等等统统写下来，告诉给胡德兰。写信成了他们爱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一通就是好几年。听到这里，方志敏真是羡慕不已，可是，他马上想起了那个困扰自己多日的问题，于是吞吞吐吐地又问邵式平：“邵大个，你把心思、时间都花在恋爱通信上，那革命怎么搞呢？恋爱和革命，怎样才能兼顾呢？”

邵式平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说：“这两者之间只要摆平了，一点事都没得，而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方志敏从床上坐起来问：“何为只有好处，没得坏处？”邵式平说：“一是互相鼓励，都要在革命工作上做出成绩来，谁也不能丢脸，只有做好，没有做糟的道理；二是互相学习，你有一条革命经验，我也有一条，把你的那条传授给我，我就有了两条，你也有了两条，这不是互相补充么？第三条是互相帮助，有的时候你有了错，别人的意见不大容易听得入耳，爱人的话总是容易听进去。帮你指出错来，不是金钱难买么？你看，这几条都是对革命工作很有益的吧？还有最后一条，就是你可以把精力更好地、全部地投放到革命上去，有老婆给你做饭，有老婆给你洗衣服，我是最怕做这两件事的。”

方志敏听得呵呵直笑，邵式平的理论让他有些茅塞顿开。以前总把革命与恋爱对立起来了，看来是自己的观点有问题。邵式平的任务完成得好，工作做得漂亮，与胡德兰不无关系。胡德兰不但没有拉扯他的后腿，而且还鼓励他、帮助他、促进他，他俩都是自己很佩服敬重的革命同志呢。方志敏领悟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关键要看你找个什么样的老婆。

身边已经传来了邵式平如雷的鼾声。方志敏吹灭了灯。心想，明天就去找缪敏，一定要和她好好谈一次。

恋爱关系是确定下来了，方志敏感觉真是如同邵式平所言，似乎多了一股精神活力，走起路来也带了点弹性。而且越是深入了解缪敏，就越是喜欢这个朴素、勤奋的女学生。正是青春花季的年龄，许多女孩子都挑挑拣拣地做了新款的旗袍和裙子，打扮得花团锦簇一般。惟有缪敏，在一群群五彩缤纷的花蝴蝶中依然穿着老家带来的那几件老式衣衫，朴素得像一片单纯的绿叶，难得的是她自己那副怡然自得，落落大方的神情，使见到她的人无不佩服。

有一次方志敏试探着问起，为何不去添置件新衣？缪敏说不必把钱和脑筋都用到穿戴上去，功课学好了，事情做得漂亮，自然有人羡慕你。再者，她认为只有一心要嫁个有钱丈夫的小姐们才热衷于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行头，自己因为要革命，所以不在乎这些。方志敏听了，甚为姑娘的追求所感动。

不过他俩都迟迟不言婚嫁之事，俩人碰到一起，缪敏总是说学校里又有了什么新鲜事，校长曾华英像母老虎似地关着女学生们不让出去等等；方志敏则讲各乡的农民如何地要求减租减息、参加农民协会等等。局外人看见他俩，都闹不清到底是在谈恋爱还是在谈工作。他俩却坦然自若，觉得这样相处好得很。

朱培德搞了“礼送出境”以后，江西的形势急转直下，原先轰轰烈烈、鼓号鼎沸的大革命一下子偃旗息鼓、无声无息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站到一起。在这变幻莫测的局势中，遭到抛弃与屠杀的是那些往日里最为积极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中的中坚分子。陈独秀的宽容、联合、退让政策换来的是血流成河的牺牲。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感觉迷茫，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当了逃兵，而有人甚至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大革命的失败像是卷起了一层层波涛汹涌的激浪，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江流之中，被冲击、淘尽的是一层层的泥沙污垢，它们沉淀于江海之底，永远被遗弃。

就在这个关口，方志敏却和缪敏商定，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俩要结婚了。而且说办就办。

丘侷特别不能理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被朱培德追捕的都不能露面，下一步还未知前程如何，此时说要结婚，不是忙中添乱么？弄个家庭包袱背上，还怎么做革命工作？

方志敏说：“你的想法真真差矣！此时此刻我决定结婚，就是要表示我革命的决心！遇到这么个挫折算什么，朱培德要打倒，蒋介石也要打倒！我不但自己仍要革命，我的子子孙孙也都要革命哩！”

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缪敏不住地在一旁点头，听到最后一句，不由得脸又红了。

方志敏拉着她的手说：“况且，我还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心甘情愿与我一道过颠簸流离、艰苦生活的好伴侣、好同志。结了婚，就表示我们永远在一起，共同革命了，对不对？”

缪敏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方志敏说起话来也太赤裸裸了，以前倒看不出他对自己有这样深的感情，就是有，他也不肯表露出来。所以缪敏脸红归脸红，心里倒是舒舒坦坦热呼呼的。

婚事就在黄家巷58号办。巧得很，这个江西省委秘密机关所在地，这几天聚集隐蔽了好几位同志，像彭湃和罗亦农都在这里。彭湃特别积极，说拣日不如撞日，既然组织上已经批准，今天就办。并且请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当证婚人。

罗亦农说：“非常时期，同心同志，可喜可贺，这杯喜酒是一定要喝的，这个证婚人也是一定要当的。”

于是七手八脚地收拾了一间屋子出来。彭湃细细环顾了一番，说喜庆的气氛还不浓，又让机关通信员罗秉刚找了几张红纸出来，歪歪扭扭地剪了个大红喜字贴在墙上，屋子里倒真是显得红火多了。又张罗着铺纸研墨，说想好了两句话，务必要亲自写一副喜联送给新人。

大家都围过来看。彭湃的字好，这是出了名的。只见他稍稍凝神片刻，便提笔挥毫，一挥而就。

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
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

江西省委秘书长冯任歪着头看，琢磨着说：“不妥不妥，新婚大喜，什

么流血牺牲的，像是口号，不像喜联！重写重写！”

彭湃端着笔不肯让，说：“批评得没有道理，不能接受。什么口号不口号的，我写的全是方志敏心里想的。”扭过脸来让方志敏表态，“是不是？是不是？”

方志敏点头道：“这倒真是像我的决心。我革命不是为了结婚，而我结婚是为了更好的革命。这副联子写的倒也贴切。”

彭湃很得意，又拉着罗秉刚把对联贴上。大家都笑，说有了这副喜联点缀，这番才像是个办喜事的样子了。

罗秉刚说：“你们都呆在这里不要往外头街上去。也不能上馆子里去吃饭了，我去买点菜回来，自己做一顿喜宴。”大家都说这样办最好。

不一会工夫买了一堆生菜熟食回来，于是大家动手，一人做一个自己的拿手菜。倒也热热腾腾、香气扑鼻地摆了一大桌。这顿饭吃得十分热闹有趣。缪敏本来就不胜酒力，结果大家都要敬新娘子的酒，一巡下来，她的脸已经红得赛过天边的晚霞了。

晚饭过后，大家仍然兴致未减。彭湃说：“要是国民党的密探发现这么多人聚会谈天说地，就有诽谤国民党的嫌疑。”

于是冯任建议：“不如玩玩麻将牌，朱培德的这会儿可顾不上来抓‘赌徒’。麻将一响，还能遮盖着点说话议论的声音呢。”

大家说这个方法可行。于是去找麻将牌。谁知道这件处处都可见的东西，在这个院落里偏偏就是找不到。还是罗秉刚临时到隔壁熟悉的盐铺伙计处借了一副。

方志敏本来就不精于此道，玩得又有一搭无一搭的，手上张子极松，连连放了几张牌出去，倒被下家的罗亦农糊了。坐在对手的彭湃抗议道：“新郎官，会不会玩？不会玩换新娘子上来！”方志敏不肯认输，可是心思怎么也拢不到牌桌上。

彭湃道：“跟你玩牌活受罪，你输也罢了，叫我们也陪你输。”

坐在上家的冯任一边洗牌，一边瞧着方志敏那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说：“志敏，是不是又在想革命工作了？”

方志敏叹了口气：“没有办法，这工作者是往脑袋里钻。革命革到这一步田地，我脑子里乱得很。南昌城里形势变得这样快，我们思想准备也不足。也不能老躲在一处呀，吃吃酒、玩玩牌，只怕就此会消沉下去。农民们是听了我们的号召揭竿而起，可是现在要寻我们，却连一个都寻不见了，叫农民们再去相信谁？”

这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都沉甸甸地像是灌了铅，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凝固起来。

沉默了片刻，罗亦农说：“斗争的形势有了变化，斗争的方式也应该随之变化。我们应该商量一下，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最适当？”

彭湃说：“这次失败的教训怕是最深刻最惨痛的了，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也是靠不住的，国民党更是靠不住，不管是姓汪还是姓蒋，都是拿着屠刀追杀我们共产党人。所以我认为，能靠得住的力量只有工农。我们做农民协会工作的，仍然要去做农民的工作，而且要完完全全地把重点精力心思全部都放到农民身上去！”

方志敏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夹着一张牌使劲地敲着桌子：“对，对，城里呆不下去了，农村的情况要好些，应该马上到农村中去，做深入细致的农

民工作，组织中坚力量充分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等农村的事情做好了，再回过头来做城里的事情。”

冯任也点头道：“这个想法可行。志敏可以到吉安，那里受朱培德的控制弱，我们应该抢先一步去做那里的农民工作。”

彭湃说：“对，志敏不是还兼任着全国农协特派员的身份吗？就以这个名义去，一来做些调查，二来宣传农民。志敏你看怎么样？”

方志敏重新变得兴奋起来，说：“很好，就这样办，我去吉安。”

罗亦农说：“哎，你们只顾自己一厢情愿，也不照顾新娘子的情绪。方志敏是新婚燕尔，不应该分配他任务。取消！取消！”

缪敏很认真他说：“老罗说着说着就拿我取笑，我可不拉后腿的，正鹄有他自己的事要做。”

罗亦农笑了起来：“真是一对革命夫妇哩！倒是我错了？”

缪敏说：“自然是你错。你要取消正鹄的工作权利，只有蒋介石才不让人干革命工作。所以他要跟你发急，一点也不关我的事。”

这番话引得大家都笑了。罗亦农说看不出来，新娘子到底是女学生中的魁首，伶牙俐齿的。还没怎么着呢，就一口一个“正鹄怎样怎样的”偏袒起老公来了。

夜深人静大家散了之后，方志敏曾悄悄地问过缪敏，是不是真这么想。缪敏肯定地点点头，两只依旧明亮的眼睛直视着方志敏，轻声他说：“要嫁给你之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了，你做的事都有你要做的道理，都是为了革命的，我只有照着你的话去做才对。”

方志敏想，能娶到这样一位志同道合、善解人意并且全力支持自己的妻子，真是天大的福气。

第八章

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方志敏
被困吉安 朱成山告诉方志敏，像你这
样的共产党人都是榜上有名的，有一个
抓一个

要是以为朱培德只是搞搞“礼送出境”的花架子，只是把清党的重点放在南昌城内，那么十有八九又要犯“左”倾错误的幼稚病。蒋汪当时提出来的一个共同口号，直到今天都使共产党人没齿难忘，铭心刻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每一撇一捺都是用鲜血涂抹出来的，充满了狰狞的血腥味，凝固在空气与记忆中，久挥不去。

而共产党并非等闲之辈，更非沉默的羔羊。国民党的屠刀起了个与本意相反的作用，催化了共产党人的昂扬斗志，更坚定了他们革命信心。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们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迅速地集拢到一起，当蒋介石与汪精卫正在分别弹冠相庆之时，他们分几路秘密进入汉口，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举行了一次与确定共产党路线至关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因为周围环境险恶与时间紧迫，这次会议只开了短暂的一大，即在1927年的8月7日，通称为“八七”会议。在这之前，南昌刚刚爆发了一次伟大的载入史册的事件，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几年后把这一值得怀念的日子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三教街41号，解放以后改名为鄱阳街139号了，这是一幢很气派的三层公寓式洋房，当时称为怡和新房，是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后来又有英国人在这里开办了家惠罗公司做生意，多余的房子则专门租给在华外国人住。武汉国民政府聘请来的农民问题顾问苏俄人洛蜀莫夫就住在二楼高大宽敞的房间里。当时武汉三镇已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了，但是选择这样一个外国人居住区来开会，相对来说是要安全些。中国人对外国人历来都有一种遵从、容让、低矮的感觉，不管他国大国小、国富国贫。

尽管是动了脑筋挑选在这样一座有保护色彩的外国公寓开会，但是环境险恶不得不防，还是采取了种种的安全措施。如果到会的21名代表在同一时间拥进大楼，不免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为了这些人的进入，中央的内部交通还是花费了心思，用了三天的工夫，将这批共产党的首脑人物们一个一个地带进大楼隐蔽起来，散会以后又花了三天的时间分别将他们送出大楼。

二楼这间用来做会议室的房间很大很宽敞，尤其是临街的一面有着大排大排的透明玻璃窗户，让光线很充足很顺畅地照射了进来。房间里放着二十多张临时收罗来的各式各样的椅凳，显得有点杂乱。代表们缄默着陆续地进来，于是也有点杂乱地坐了下来。毛泽东来的比较晚，和出于考虑当时在党内的座次，他拣了一个靠近英式壁炉边的方凳坐下。李维汉担任会议的主席。

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之后，毛泽东已经按捺不住焦虑、愤怒的心情第一个要求发言了。

毛泽东的比喻一直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毛泽东很愤怒，批评党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迟迟无有决心，“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毛泽东形容当时的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虽然后来“像大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毛泽东痛惜中央直到最近才改变

策略，同意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但是国民党的大门已经关闭，时机错过。

说到农民问题，毛泽东感到不可理喻的是中央的态度，“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毛泽东说起话来一贯尖锐、准确、毫不留情面：“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抱怨自己在湖南做了一番调查所写的小册子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独到地强调了军事问题。他想不通：“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汪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提醒全体到会者，也提醒自己，“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以后他一直坚持着这一创造发明，直至胜利。

在这一天的会议中，批评是一种使用最多的形式，到会代表们差不多都使用了这杆武器。他们批评谭平山，批评中央，批评陈独秀，批评共产国际。幸亏有这许多铺天盖地、措词严厉乃至是痛心疾首的批评，良药苦口利于行，终于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领导，并且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

没有人通知陈独秀来开会，选举新的政治局委员时也没有人提他的名。他悄然无息地从党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去。

但是在批判了右倾错误的同时，“八七”会议却不知不觉地容许和滋长了另一种危险的倾向。以致在后来漫长的中国革命道路中，这种“左”比右好的错误观点同样造成了难以估量、难以挽回的损失与挫折。

正当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们集中在汉口这幢洋人的房子里制定以武装暴动为主要手段的计划时，方志敏正躲在吉安乡下的一间茅草屋子里，为找不到党组织而愁眉不展。“八七”会议的消息他一无所知，和党失去了联络更使他一愁莫展。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失去了眼睛与耳朵的又聋又瞎的废人，空有一身力气却寸步难行。

没有想到吉安的形势也变化得那样之快。初到吉安时正值夏收，农民们准备交纳地租了。

早在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党曾经信誓旦旦地对劳苦耕作的农民许下诺言，实行“二五减租”。这就是说，所有在革命领域内的佃农，自本年年起，将按上年的租额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农民们很快就细细地算过了这笔账，晓得了如果实行起来自己真的是有利可图，所以那时对国民党的印象还不错。但事实上比起平均地权的主张，“二五减租”仅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政策。可怜，就连这么一点最低限度的改良，国民党也不曾认真去做过。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已经快一年了，实行“二五减租”，仍然是贴在墙壁上那些陈旧标语中的一个口号，无论是李烈钧还是朱培德，从来也不曾有过一丁点实际的动作。

方志敏在吉安县的永和镇和莲花县的洋桥乡一带，对当地农民耕种土地的费用和纳租额做了一番调查。他发现农民租耕地主的一亩田，若是将人工、牛工、谷种、肥料各种费用总算起来，如果这亩田的收获物全归农民，那还是有些微薄的利润。但是如果是要从中缴去对成或者六成的地租，那农民们辛苦劳作了一季，反过来还是要吃亏的。亏本多少，各地并不一样，有的地方每亩田要亏本七八角钱，有的地方则亏去一块多钱，更有甚者要亏上一块

半至两块钱。农民对此叫苦不迭，可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状况，反而觉得农民嘛，世代如此，只得认命。

县乡的农民协会对此也着急，知道方志敏下来了，立即请他去给农民们鼓动鼓动。在群众大会上，方志敏没有说许多空洞乏味的理论，只是把自己在做调查访问时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话细细地讲给大家听。方志敏是从农村里出来的，自然晓得农民们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所以，他讲话，既生动又能煽动。他替农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贫苦农民，做牛做马替地主耕田，就算不望赚到什么，至少也不应该让我们亏本呀！”他替农民抱怨，“过去我们糊涂一生，不会打算，替地主耕田，还要替他们赔这么多的本钱，天下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吗？”像层层剥茧一样，他渐渐地说到了根子上，“我们农民越做越穷，越做越苦，从前，总以为是八字坏，命根苦，现在晓得原因在哪里了——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耕地主佬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说来说去，他最替农民实际着想，“现在的减租运动，当然还远远谈不上，我种出来的东西，应该归我所有——农民将来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才算得到解放了；现在只是要求替地主耕田不亏本罢了。”

方志敏的演说在农民们的脑子里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美妙的前景，农民们被鼓舞得情绪十分高涨。他们突然开窍，意识到了自己的拥有田地的梦想不是做不到。于是他们拿着各色的小旗，握着扁担锄头，跑到地主家门口去游行示威了。人多势众，绵延十多里远的游行队伍把地主老财们吓得要死，只有逃走的份儿。这时候别说是减租，根本就没有哪个豪绅地主能有胆量跑来找农民要租子了。

面对着农民运动少见的这种壮观图景，回想起在南昌省农协的工作经历，方志敏不由感触良多，后来在国民党的牢狱之中，有了空暇时间来回忆与总结，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自北伐军到江西以后，我是做了近十个月的公开工作。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的去进行工作——总之，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哪里会积聚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有什么意思。

用鲜血与性命替换得来的经验教训，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痛切，道理之透彻，痛改希望之殷切，赫然跃于纸上。可惜，有点好景不长，还没等方志敏在吉安的乡下完全领略透那种农民运动激动人心的威力，国民党的军队又杀了过来。在党的整个指导方针发生了偏向与扭曲之时，一县一乡的轰轰烈烈又能有什么用？席卷而来的国民党军以及所有的土豪劣绅开始了反攻倒算，腥风血雨整个地笼罩了江西的乡村城镇、港汉河湾。

朱培德在搞完“礼送出境”的把戏之后，腾出了精力，专心专意地对付起农村的红色政权来了。他密令国民党驻吉安的第七师师长王均，以召开治

安联席会议的名义对革命力量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一来，中共吉安党组织一下子就陷入瘫痪状态，党组织的负责人梁明哲、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商民协会会长晏然、农民自卫队队长钟翊卿均遭逮捕，随后农民自卫队又被王均的军队包围缴械。

土豪劣绅们更是杀气腾腾地卷土重来。他们左手拿着屠刀，右手举着黑名单，不但逼租夺佃，而且将减租运动中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统统列上了他们的屠杀名单中。莲花县的农民运动领袖朱绳武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大地主李成荫出重金勾结了湖南省攸县的反动军队抓住朱绳武。李成荫叫人把他绑在离城十里地一个凉亭里，恶狠狠地说：“我做梦都想咬死你！你带人抄了我的家，封了我的财产，还鼓动佃户们不交租不纳粮！这回可要看看到底是谁狠！看看到底是谁吃谁的肉！”说罢，真的上前咬住朱绳武，血淋淋地撕扯下大块皮肉来。李成荫狞笑不止，手下的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们一起蜂拥而上，残酷地将朱绳武破肚挖肠。朱绳武骂不绝口，活活痛死。

黑名单上还有莲花县的陈兢进、谢永鹏，安福县的李精一、朱德顶、彭学猗……无一遗漏。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等群众团体，如同一下子遭受到了灭顶之灾，在敌人的残酷打击与高压政策下，基本上全部瘫痪。

方志敏被吉安县一个叫吉元庆的农民掩护起来，没有遭到敌人的毒手。但是这种日子就像是天天吃一道无油无盐的白水煮菜一样，方志敏闷得差不多要发疯。吉元庆天天出去帮他打探消息，可是一个熟人也找不到。

吉元庆差不多每次回来也都是垂头丧气的模样。方志敏催促他说说外边有么子新情况，吉元庆说：“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你又要发急上火。”

方志敏更急：“莫非你不说我就不急啦？你说出来我也好对情况有个明了，也好有个知晓，闷在鼓里要憋死的。”

吉元庆没带来一个好消息。从他那儿听到的，不是某乡某人经不住考验，投到地主豪绅那边去了，就是某乡某人经不住挫折，丧志人庙当和尚去了。听着听着方志敏就烦躁了：“莫说了，莫说了，真丧气！”于是一个人皱着眉头闷坐着。

方志敏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气“友党”背信弃义，更气陈独秀和那个紧跟陈独秀的省委，都是他们软弱退让，才把事情搞成今天这种悲惨的局面。事情明摆着，人家有军队有枪，我们是赤手空拳空有一身好气力。当时，自己也还掌握着省农协，倘若允许有军队，放手让自己去干，那么每县组织一个营的农民自卫军是绝对可以做到的。算算这笔账吧，江西有81个县，也便可以组织起81个营来了！朱培德还敢“礼送”我们出境么？他那个第七师还敢如此穷凶极恶地屠杀共产党人与农民积极分子么？要是敢，恐怕要轮到我们的“礼送”他出境，“请”他先滚蛋了。可是自己不许自己有军队有枪，不晓得这是什么道理，连一个自卫军大队百把条枪也被命令统统交给人家不可。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结果，如今是连动都动不得了！

时光如流水，就这样闷闷地过去了十几天，方志敏住在吉元庆那里，人生地不熟连门都不能出。他觉得再也不能等了。与其这样束手待毙，不如闯出一条新路来。方志敏主意已定，说走就要走，吉元庆留也留不住，只得蒸了一些糙米饭，送他上路。

方志敏起初是打算悄悄地回南昌，看看在南昌是否能找到党组织和党内人员，可以先接上关系。但是走了没有多远，就发现情况比想像得还要糟糕。

吉安到南昌有好几百里路，如果走水路，顺着滔滔赣江急流而下直抵南

昌，也还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沿江的码头都设上了哨卡，盘查来往行人，有点嫌疑的立刻就用枪押走。船上也时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闯上去搜查，随便抓人打人如同家常便饭，随处可见。这样的码头是去不得，水路是走不成了，方志敏环顾四周，看见路边有一间简陋的面铺，于是靠近前去讨口水喝，更想打听点消息。

面铺里很冷清，光线极暗，方志敏犹豫了一下，抽身准备退出，却听得有人低低地叫了声：“方主席。”

方志敏一惊，下意识地回过头来，警惕地循声望去，只见灶后头一拐一拐地立起一个人来，仍然低声地说：“真的是方主席呀！快到这边来，这儿僻静，说话方便。”

方志敏定睛看去，依稀觉得似曾见过，但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了。那人笑了笑说：“我是朱山桥的，我叫朱成山，我在省农协听过您的讲话，所以一眼就认出你来了。你可真胆大，现在还敢到处走动哩。”说着，倒了碗凉茶过来。

方志敏见他已经认出自己，也不好再回避，又见他没有什么孬意，于是接过碗喝了一口，反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朱成山是朱山桥乡里的农协会会员，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斗地主反封建，抗租抗税样样都走在头里。这番大革命一失败，地主老财伙同着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头一个要抓的就是他。朱成山叹了口气：“我被他们打得要死要活，腿子骨都打折了。晚上押在柴房里，打算第二天就要被处置。幸亏那天夜里看押我的有一个是我的连襟，这才悄悄把我放了。我是死里逃生捡回来的一条命呀！”

方志敏点点头，又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搞？”

朱成山摇摇头说：“不晓得。我们乡里的农协会会员都被打散了，谁也没有了主意，寻谁也寻不见了。这个面铺是我一个亲戚开的，我先在这里躲些天。朱山桥是回不去了。”

方志敏想说几句打气的话，刚要开口又收住了。自己也是这样上下不得着落，此刻说点空洞的话不免显得太苍白无力了。于是也闷闷地坐在那里，只顾转动着手上的那只粗瓷碗。

倒是朱成山又开了口：“方主席，你可是打算往前走？”

方志敏不想瞒他，点了点头说：“是，我想去南昌。”

朱成山急忙摆手，告诉方志敏，南昌根本去不得。他听过路人讲，南昌城里的风声更是紧得很，封闭工农团体，捕杀工农领袖，每天都有人被抓进去。街道码头，到处都张贴着反动标语和杀人告示，街上巡逻的、盘查的，随处可见。“像你这样的共产党人都是榜上有名的，城里处处贴着告示，要送你们出境，抓住一个都有赏钱的。你要去，不是自投罗网吗？”朱成山极力劝阻。

方志敏当机立断，南昌去不成，那就回老家弋阳湖塘去，那里是自己最熟悉的一片土地，根基牢，情况熟，到了弋阳重起炉灶重新干，一定会干出名堂来。

朱成山按照他的意思，找了套破烂的衣服替他换上。头戴斗笠，脚登草鞋，方志敏装扮成贫苦农民的模样，独自一人出发了。

中篇

第九章

金香莲摸黑打开门，门外果然站的是胡子拉茬的儿子。一个木匠大步流星地走出了石镇街。方志敏对刘富信说：今晚我要住到你家去。一口棺材运回了漆工镇。

还是在方志敏整装去吉安做农民运动的时候，江西李烈钧的国民党一营正规军已经洗劫了漆工镇。当方志敏经过长途跋涉回到弋阳漆工镇，这里的大小村庄已是一片焦土，满眼所见尽是成堆的断砖碎瓦和东倒西歪的败壁残垣。在蒋介石“四一二”变脸之后，当地的土豪劣绅真是喜不自胜，立即拼凑了一支反动的地方武装靖卫团。他们着手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伙同李烈钧的一营官兵一起进攻红色的九区。经过一日的恶战，并未分出输赢来。农民自卫军求战的情绪很高，准备第二日再决一高低。不料就在这一天夜里出了个不该出的意外。

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方远杰求胜心切，带着一班人马连夜赶制排炮。这种排炮是土造的，炮筒内壁锈蚀得厉害也未加注意，只顾往里装硝。结果一点就炸了，把立在旁边亲自操作的方远杰炸得满身是血。老表们连夜把他送到弋阳县城的一家私人诊所。哪晓得地主老财的消息也来得快，立即派人给这位周姓的医生送了一份厚金，递了一个口话。姓周的医生给方远杰注射了一针什么药剂，方远杰便咽气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群龙元首，第二天靖卫团和军队又来打，农民自卫军乱轰轰的败了。这一败了不要紧，二十多个村庄的房屋统统烧毁，耕牛农具被掠抢一空。

目睹这种凄凉景象，方志敏悲愤难忍。天尚未全黑，还未到掌灯时分，残阳映照着一片断壁残墙，分外凄惨，远处山脊上裸露着大块大块的红壤在夕阳的照耀下仿佛是被血渍涂染，那一片的红土层红得让人触目惊心。方志敏拖着疲惫的脚步，寻小路摸上了湖塘村后的来龙山，一直等到暮色降临，夜深人静，才悄悄地下山摸黑进村。

走到自家那扇熟悉的大门口，四下望了望，并未有人知晓，这才轻叩门环，又叫了声：“姆妈！”

方志敏的母亲金香莲，这天晚上煮茶饭时就看见蜡烛头上结了个大大的烛花，她揉揉昏花的双眼细细地看了一遭，心里思忖，莫不是正鹄要回来？好几个月没有儿子的音信了，金香莲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她叨念给方高翥听。方高翥瓮声瓮气地说：“少去想他。那许多的穷人都要指望他呢，你是指望不上的，不想也罢！”

金香莲不再言语。乡下人天一黑无事可做就歇息了，但不知怎搞的她夜里就是睡不着，于是又起来用柄破芭蕉扇赶蚊子。正在此时，恍惚间听见门环响，再一凝神，果真是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轻声叫自己。她连鞋都顾不上穿，摸着黑把门打开，真是叫人又惊又喜，门外站着的果然是胡子拉茬、脸颊瘦削的方志敏。

方高翥也不曾睡着，只是怕听老婆叨念那个总也不知音讯的儿子，所以闭了眼躺着。见果真是正鹄回来，喜出望外，连忙起身把儿子拽进屋里，赶紧叫老婆去煮几个红薯给儿子充饥，一面急急地把近来乡里的事告诉给方志敏听。

“县上出了布告捉你，活捉赏洋一千，割头五百，已经来家搜过几回了，领头的就是黄家源那个豆豉眼黄保臣。”

方志敏晓得这个黄保臣。在弋阳高小时曾经和自己是同学，也曾经加入过九区青年社。真可谓大浪淘沙，如今已经分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黄保臣与地主邵襄臣的儿子一道，以保卫地方为名拉起了一支地主武装。所以在1926年冬天九区农会要捉一批作恶多端的地主豪绅进监狱时，毫不手软地把他也送进去了。“四一二”以后他被李烈钧放出来，落水之狗痛打不死，上得岸来咬人自然是更急更凶了。

方志敏晓得爹妈操心，于是平平淡淡地说：“莫担心，豆豉眼休想抓得住我，他是想赏洋想疯了。”

但当得知方远杰牺牲，方远辉被迫带着剩下来的人躲到山里头去时，心情就不似刚才那样平静了。方远杰和方远辉都是方高翥从小看着长大的，如今倒是白发人先送走了黑发人。方志敏听着爹爹一声重似一声的叹息，心里也烦躁得仿佛塞进了一团乱麻。

全香莲端来热腾腾的红薯，小心地问方志敏：“正鹄，这番回来还要干吗？”

“当然要干！”方志敏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不干，远杰不是白死了吗？就是不干，湖塘村的地主老财也不肯罢手的，世道就是这样，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没得中间路好走。”

干革命的决心方志敏是从来不曾犹豫过，干起革命也从来不曾惜命惜力打过半点折扣。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干法呢？

方志敏被爹爹秘密地安置到了莲家坞的一个看山棚里。这里离村子不远不近，万一村里有了动静，也来得及跑到山上去。白天他一个人躲在山上看书，天黑透了家里才能偷偷地送饭上来。干了几年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这番倒是第一次得了清闲。可是这种清闲越发搅得方志敏心事重重，烦躁不安。革命不能等待，不久，他让方高翥借着做农活的机会悄悄地送出信去，告诉熟悉相知的农友们：“志敏回来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土豪劣绅的靖卫团回来杀人放火，弋阳的农友兄弟们早已憋足了气，只是苦干没有带头的人。听说方志敏回来了，这鼓舞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仿佛是在迷路的黑夜里又看见了一盏明亮照路的灯。小窝棚里顿时变得热闹了。

见了方志敏，除了吐苦水之外，差不多每个人都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正鹄你倒说说看，这个革命到底怎么个革法？不是我们不干，是我们实在不晓得怎么干，这样做能有结果吗？”

方志敏说：“这是个最最要紧的问题。这么多天，我也一直在思忖这件事。这次我们吃了大亏了，以前那种方法肯定是行不通了。新的方法在哪里，要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努力去找。我看有一条顶顶要紧的，就是我们赤手空拳，人家手里却拿着枪，这样怎么行？我们要有人，也要有枪！不过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肯豁出来干？”

农民们瞧不上方志敏的这种怀疑态度，噙着嘴说：“正鹄，我们要不想干，还来找你做什么？你放心，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但是跟这帮靖卫团的账是一定要清算的！”

方志敏点点头，有这样一班好弟兄，何愁革命不得成功？当时方志敏提

出了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另起炉灶，从头再干！”

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星散潜伏在各地的革命者，一个个都聚拢到莲家坞的看山窝棚里来了。这其中，有从黄埔军校回来的邹琦，有被“礼送出境”的邵式平，有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配回省的彭皋，还有坚持在弋横山区打游击的方远辉、黄镇

中、雷夏、吴先民、邹秀峰、黄球、黄端喜、黄怀仁……像滚雪球一样，这班人马很迅速地就都聚拢到一起来了。

大家的心很齐，都赞同方志敏提出的“另起炉灶，从头再干”的主张。于是决定分头到各村去发动群众。短短的七天内，一下子就重新组织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农民协会也起来了。这是因为弋阳、横峰这一带的农运基础好。这里的农民群众在大革命前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又经过大革命的锻炼。靖卫团的反攻倒算、放火烧房，不但没有能够扑灭革命的火种，反而如同火中浇油，使得原先的农民积极分子更坚定，犹豫观望的群众也愤恨不已，跑进革命的队伍里来了。

莲家坞的窝棚内外都坐着人，方志敏在这里召开了一个很特别的“莲家坞会议”。大家许多日子互相不知下落，这一番相见都惊喜不已，恍如隔世一般，都说能活下来就有希望，就有奔头。

方志敏召集开会，头一个发言，他先环顾了一下大家，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真不容易，今朝我们又能聚在一道了。大家能来，说明我们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仍然还要干！干革命么，受点挫折算不得什么，一帆风顺的革命哪里会有？怕是满世界也找不到的。悲观动摇，灰心消极，怕也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干革命就得像种稻子一样，割了一季再种一季，总会有收成，是不是这个道理？”

几句开场白把大家心头里的火焰又点燃起来了。方远辉就坐在他的旁边，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腿说：“正鹄，跟着你再干是没有问题了，可问题是下面怎么个干法？”

方志敏点点头说：“是呀，我们的处境很困难，这一点大家也晓得，现在我们和上级党暂时失去了联系，我们有点像是没娘的佃伢儿了。”

吴先民举起了一只手说：“你就代表党，你就领着我们干吧。我们最缺的是领头人。”

身材很魁梧的邵式平只得坐在窝棚口，接着吴先民的话说：“指望那帮党的领导人，结果怎样？断送了革命！这些人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能再听他们的了，听了就是死路嘛！现在我们要细忖量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什么？”

方远辉说：“叫我说我们吃亏就吃亏在枪少得可怜，我们有人，可是没枪，靖卫团来了我们打不了，只有看着他们烧房子。真惨！”

邵式平一拍大腿抬高了声音说：“远辉这句话说的是那么回事，要我说，没有武装是个最最要命的问题。这件事做好了，别的就好办多了。我们自己要是有了一个团的枪炮，靖卫团算个什么？到了那时，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们了！”

吴先民说：“对！没有枪就叫吃亏。土豪老财们就是看我们赤手空拳所以才敢这么欺负我们，我们要是有枪了，世道都要变个样子呢！”

方志敏听得也兴奋不已，大家想的和自己基本上一样，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搞革命就得搞武装，搞武装就得搞枪。枪就是命呀。

可是，现在手上的枪，真是少得可怜。大家一合计，漆工镇暴动时所得的两条半枪还在，再就是邵式平前一阶段改组横峰党部时保存了三十几枝枪。要搞武装，这一点点枪恐怕是杯水车薪了。

方志敏很有信心地说：“好，我去搞枪！”

方志敏在从吉安回弋阳的途中，曾经绕道专门去了一趟波阳，为的就是枪的事。

波阳县在大革命期间组建了一个警备团，有一百多条枪，是一支不算小的武装力量。团政委叫胡烈，又叫李新汉，是共产党员，也是波阳县人。所以这个团一直是在共产党的掌握领导下。方志敏想，一百多条枪和整整一团的人，是多有力的一个力量，在对敌斗争中能起多么大的作用呀！怎样也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上去。但是不太清楚如今的情况。做事要抢在头里，先下手为强，方志敏当机立断，绕路坐船去了波阳。费了一番周折，先找到了胡烈。胡烈见到方志敏很高兴，拉着方志敏的手直摇。方志敏问起警备团的情况来，胡烈说：“问题不大，我说话士兵们都听，可以指挥得动。但这个事一定要经过县委，我是归县委领导，要服从县委的命令。”

方志敏沉吟了一下，觉得胡烈说得也是，于是去找波阳县党的负责人刘富信。刘富信也是波阳人，工作很勤快，脑子也灵活，自己在县里工作这半年，把老婆、孩子、丈人、丈母娘全搬到县城里了，一大家子人已经过起小康日子来了。见到方志敏找他，也是特别热情，很得意地告诉方志敏，波阳的情况全靠自己做统一工作，地主老财胡乱来的比较少，基本上是和平处理，不像其他县杀人放火什么样都有。方志敏一听就把眉头皱拢起来了，提醒刘富信不要对国民党地主阶级抱有什么幻想，否则要吃大亏的。

刘富信听了也不多言语，只是点头。随即问起警备团的事来，方志敏加重了语气说：“今天我可是以省委委员的身份给你交代这件事，千万马虎不得，不论遇到什么事，这个团的力量是一定要保存住，这是我们的宝贝。这一阶段由你负责，过些日子把它带到弋阳去，我们要把这个团保存下来发展下去，不能做叫党吃亏的事！”刘富信倒也没有犹豫，一口便答应了。所以方志敏这才把心放下来，办完了这件事急急忙忙地赶回弋阳来了。

“莲家坞”会议后，方志敏即刻动身往波阳赶，为的就是这一个团的力量。方志敏对它满怀着希望，指望着能依靠它作一番大作为来，所以恨不得肋下生翅，一步跨到波阳。

谁知走到石镇，一下子就有了麻烦。

从湖塘出发走到石镇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傍晚了，赶夜路多有不便，方志敏决定在石镇过夜。

石镇有一个老关系户，就是住在南关的菜农张老顶。张老顶孤身一人，以种菜为生，也会几下木匠活，揽到活就当木匠，没有活时就种菜。他跟万年、石镇一带的农会领导胡完生、黄土彪很熟。胡完生很想叫他入农会，他却摇摇头说：“我干不来那种打打闹闹的事。你们要干，我也不反对，你们要是遇上难事了，我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农会我是不入的，我一个人惯了。”胡完生骂他老顽固，他倒也不生气。胡完生知道他的脾气，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他的不入会，倒变成了一个有利条件。上级要是秘密地来人到石镇，不便公开的，胡完生就悄悄地领到张老顶家去住，一点动静也没有，万无一失的。胡完生发现了这点好处，后来也就不催着他入会了。

方志敏也曾在张老顶家住过，晓得张老顶为人厚道，非常讲交情，所以

对他也很信任。不料大革命失败，胡完生和黄土彪都被靖卫团捉住，绑捆得像只粽子，推到乐安江沉底了。张老顶赶到江边，连尸首也不曾收到。他连夜赶往南昌，把这个噩耗告诉了方志敏，让方志敏有个准备。方志敏送走了张老顶，不由得感触良多，就这么一位极普通极平常的庄户人，做起事来比党内一些口号喊得震耳的人还踏实，还让人信得过。有过这两次的交往，方志敏便决定去找张老顶。

因为去过，道路是熟悉的，拐过几条胡同，来到城南关，很顺利地找到张老顶的家。一敲门，来开门的果然是张老顶。

张老顶倒是大吃了一惊，连忙一把将方志敏拽进屋来，又张望了一下外面街道上的动静，这才紧紧地关门掩上。转过脸一边拉凳子给方志敏坐，一边埋怨道：“你真是好大的胆，现在还敢这么随随便便在街面上走动？方主席，我真是佩服你们这些做共产党的，我那两个兄弟死的时候，江水都淹到脖颈了，连句讨饶的话都没说！”说着，胡子拉茬的张老顶眼眶已经红了。

方志敏又感动又难过，他平静了一下情绪，说：“老顶，我要在你这儿过一夜，有麻烦没有？”

张老顶说：“麻烦怎么会没有？只是你晓得，我这个人是不怕麻烦的。你就安心地住在这里好了，不要说过一夜，过十夜也不怕的。”

方志敏很感激，一时竟想不出话来答谢张老顶。

倒是张老顶去端了碗凉粥来让方志敏填填肚子，又烧了锅水，用高脚木盆端了来让方志敏烫脚解乏。方志敏一边泡脚一边问他，自从胡、黄二人牺牲后，石镇的情况怎样了？

张老顶说：“是联防剿共团的天下。你这一问我想起来了，有样东西要你看哩。”说着，爬过棚顶上摸了样东西下来。

铺展开来看，原来是张告示，写得又黑又粗的“通缉令”三个大字触目刺眼。

赤匪头目方志敏，江西弋阳人氏，年二十八岁，知识分子。近从吉安潜逃，特饬各路关隘、码头、军民等人严加盘查，切勿懈怠，凡提供该匪行踪者，赏大洋叁万元，凡生擒该匪者，赏大洋八万元。

鄱阳、乐平、万年三县联防剿共团司令姜伯彰方志敏看完说：“没想到我还挺值钱。”

张老顶用手指头在布告上敲敲说：“八万元，我一辈子都挣不到呢。”

两个人都笑。张老顶又指指点点他说：“你这个名字我是认识的，这个钱的数目我也是认识的，姜伯彰的名字我也勉强认得。这一连起来看，猜都猜得出没有好事情了，所以我就给它揭了下来。可惜，联防团贴的也多，码头街口全是，揭不尽。”方志敏说：“再不去费那个力气了，也危险，叫人抓住了你就是亲共分子。由他贴着去吧，这番倒是晓得了自己的身价呢。”张老顶说：“这个姜伯彰鬼招式也来得多，你刚才进镇子时是啥样子？”

方志敏不解地望着张老顶：“没有什么嘛，就这么伙着人群趟进来了。”

张老顶说：“姜伯彰出鬼就出在这里，进镇不管，出镇盘查。你想，你明天出得去吗？”

石镇有东、西、南、北四道镇门，以往只有一班岗哨，松松垮垮地站着，进进出出的人基本不问。现在不同了，姜伯彰严令盘查，加岗加哨。尤其是出镇子的人更是控制，没有联防剿共团亲批的条子根本就不放行。所以，进来得容易，出去可就费周折了。方志敏的眉头紧紧地锁在了一起。波阳警卫

团的事也是迫在眉睫，去迟一步，恐怕就会生出变故来，明天是非走不可的。可是照现在这个情况，又怎么个走法呢？硬闯？想都不要想，一个人赤手空拳的如何敌得过几个持枪的士兵？既然是闯不过，那只有智出了。可是如何才能智出石镇街呢？两个人绞尽脑汁，足足想到半夜，但总算合计出一个办法来。方志敏说：“扯大旗作虎皮，明朝，咱们就赌一把，就用姜伯彰自己去吓吓他的兵！”

第二天清早，雄鸡刚刚鸣过二遍，薄雾笼罩着石镇街，朦胧之间，潮湿的青石板上传来了一阵有力稳健的脚步声，木匠打扮的方志敏向西关走来。

西关的两个哨兵站了一夜，已是疲惫不堪，见有人过来，光吆喝也不站起来：“做什么的？”

方志敏走到跟前，放下肩上挑着的一只木箱，里面斧、锯、凿、刨一应俱全，说：“做木匠活的。”

两个哨兵摆了摆手道：“有联防团的条子吗？没有不能过卡的，赶紧回去，别找麻烦。”

方志敏说：“手艺人，要做活挣钱呀，要不做就得饿肚皮。”

哨兵说：“我让你过了我就砸了饭碗要饿肚皮了。也不是我要难为你，只是因为上头有命令，近日不准随意外出。你要做活另挑个日子吧。”

方志敏胸有成竹地笑了一下，说：“两位老总有所不知，我这趟活也不是一般人家的活儿，我这是赶着往富林去替聂团总家屋子上梁的，这是专门定下的黄道吉日，不好随意更改的。”

哨兵说：“如今团总多的赛过牛毛，我们也管不了那许多。我们只能听姜团总的。”

方志敏笑得很有味道：“这就对啦，聂团总可以不管，姜团总的账总要买的吧？你二位可知晓，如今聂团总与姜团总是儿女亲家呀！”

两个哨兵有点吃不准了。一个问另一个：“是这样吗？”另一个犹犹豫豫地：“好像听说过，不过姜团总最近倒是嫁了女伢儿。”

这边正在纠缠着，只见张老顶急呼呼地向关口跑来。跑到跟前，大喘着气，从怀里掏出只信封来递给方志敏：“你看看，你看看，昨日姜团总写了个信捎给他亲家。一早你倒走得早，害我追到这里！收好，千万不能弄丢了！”

两个哨兵夺过来看，只见信皮上用正楷写着：“万年县富林反共清乡局聂子光先生亲启”。这俩人也不识几个字，倒是觉着姜伯彰的签名是十分相识，尤其是彰字的最后那三撇拖得很长，跟告示上的签名一模一样。一个哨兵把信恭恭敬敬地递到方志敏手上，说：“对不起啦，师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耽误你时间了，看在姜团总的面上，你就赶快上路吧。”

张老顶一边帮方志敏背上木匠箱子一边还不住嘴地埋怨：“哪个晓得你还在这里磨呢，误了吉时怎么上梁？”等方志敏走远了他还喊，“到了那里做活仔细点，聂团总的活儿马虎不得的！”

方志敏答应着：“晓得啦！”人已经快步走出去十几丈远了。

出了石镇直奔波阳，有多半天的路程，心急如焚，一路上也不肯歇脚。谁知到了波阳才知道，最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波阳的局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使得方志敏所有的希望都落空。

先去找胡烈，谁知竟无一点踪迹。方志敏心知出了变故，因为原先是跟胡烈交代过的，过些日子自己仍要来波阳取枪的。胡烈一定会在波阳等自己，就是人不在，做事细心的胡烈也会让人留信给自己的。可是这一下怎么就联

系全中断了呢？

方志敏警惕起来，没有敢在波阳县城多耽搁，拎起了木匠箱子寻到了上宦岭。那里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叫杨义兴，是波阳党组织的秘密接头点。

杂货店很冷清，大白天也没什么生意，方志敏四顾无人，便走进了狭窄的小店堂。店堂里也没人，只有一个女客坐在柜台里纳鞋底，看见有人进来，只是抬眼问了一声：“买么东西？”

方志敏轻声地问：“不买东西。老板在么？”

女客垂下了眼皮，使劲把鞋底的线拉得呼呼响，说：“没得老板。老板死啦！”

方志敏不相信，又说了一句：“我是要找杨义兴杨老板。”

那个只是重复：“没得，没得！没得啥子老板。”

方志敏失望已极，只是怏怏地转身出门，两条腿像灌满了铅似地拖不动，好不容易走到岭上，一屁股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再也不想动弹了。秋老虎依然是很闷热，从里到外燥热出一身的汗来。脑子里乱哄哄的，自己把所有情况都假设了一遍也没理出个头绪。这个波阳县搞的什么名堂嘛！下一步到哪里去找他们呢？真是如同大海捞针。

正在胡思乱想没奈何之时，忽然有人在自己肩头上轻轻地拍了一记。方志敏回头看，却是自家要找的杨义兴。方志敏一家伙跃身而起，一迭声地急问：“你躲到哪里去了？刚才那个可是你家媳妇？怎么说你死啦？”

杨义兴帮他背起那只做掩护的木匠箱子说：“方主席，请谅解，不得不这样说。我刚才躲在屋子后头小阁楼的木板缝里看着像是你，才追下来的。波阳党组织出了大事了。话很长，走吧，上我那儿细细地说给你听。”

波阳党组织的问题就出在负责人刘富信的身上。

波阳县的地主老财们没有大搞烧、杀、抢、掠，却玩起了更阴险狡猾的一手。他们派人递话给刘富信说，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刘富信参加革命，很大的成分是为了自己。东风刮得盛，就往东边靠，西风吹得烈，再往西边倒。说他是投机革命者，一点也不为过。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心里怕得很，到了这个关口，再当共产党可真的要玩掉脑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躲在家里不出去。丈人啰啰嗦嗦地埋怨个不停，老婆搂着佃伢儿哭哭啼啼地闹，家里迷漫着一股坟墓里的气味。刘富信想逃到九江去，可老婆孩子怎么办？不逃走，靖卫团回来了又怎么办？再继续干下去？他的胆都快吓破了，哪里还有这点决心。刘富信又愁又急，几天工夫头发都冒出了白根子，差点没去跳鄱阳湖。到底还是舍不得死。

刘富信像只没头苍蝇正走投无路时，波阳的地主武装靖卫团倒找上门来，要与他商谈妥协的事情。开出的条件是用波阳警备团来作交换，保证他刘富信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开始他心里倒也犹豫着犯嘀咕，这样做是不是叛变革命、出卖革命？共产党晓得了能放过自己吗？他还不曾理出个头绪来，结果换了老婆一顿臭骂。老婆一边数落，一边把眼泪鼻涕往他衣襟上蹭：“共产党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你还顾它！怎么就不晓得顾顾自家老婆孩子？给你指出一条阳关道你不走，非要钻死牛角尖不成？好好好，我带着佃伢儿跳江去，留你一个人死心塌地跟着你那共产党吧！”

刘富信叫老婆闹得心也乱了。一跺脚，横下一条心来：“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车到山前必有路，……”想起无数老话来给自己打气。终于去做了靖卫团的一条狗。

他照着靖卫团的意思，以波阳党负责人的身份下令把警备团的共产党员全部开除，撤了团长胡烈的职，换上了靖卫团派来的班底，把全团人与枪毫无保留地拱手交给了地主劣绅。

杨义兴说到这里，深深地叹息了一口气：“哎，你说这事邪不邪气？靖卫团也不曾来追，也不曾来打，可是整整这么一个有枪的团，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被断送掉了。”

方志敏气得脸色煞白。波阳党组织的种种情况他是考虑到的，可是一经证实，依然觉得不可接受，也不可饶恕。气急攻心，一阵止不住地咳嗽，咳出来的痰中竟有了血丝。

杨义兴赶紧扶他躺下。刚才冷若冰霜的女客这番急得忙前忙后，沏了碗红糖水端来，一边喂方志敏喝，一边歉意地解释：“兵荒马乱，店里什么都没有，寻了半天才寻来这点红糖，红糖补气补血，喝了也管用的。”

方志敏闭眼躺了一会儿，不甘心地又问：“老杨，你熟悉情况，你倒是再细忖量，哪里还能找到枪？”

杨义兴微微眯着眼苦苦思忖，过了片刻，忽然睁大了眼睛一拍额头说：“你倒提醒了我，记得还有十枝新买来的枪，藏在哪里不晓得，这事也是刘富信经手的，他一定晓得！”

“找他去！”一听说有枪，方志敏翻身就要起来。

杨义兴连忙捺住他说：“你不能去，危险太大。刘富信这条狗，什么事做不出来？”

方志敏说：“他只要怕死，我就有办法治他。”

杨义兴说：“行，我去找他，晚上让他到埠口船上去，我带几个可靠分子跟着你，不怕他耍赖。”

方志敏想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就辛苦你了！老杨，你一个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杨义兴说：“目前他还不太敢与我撕破脸，因为他的底细我全晓得，他心虚。他想要封住我的嘴，前些日子自己送了钱来，被我推出去了。所以现在在我老婆怕生人来。”

方志敏说：“嫂子是个好样的，警惕性真高。”

杨义兴的老婆脸就红了起来，端了空水碗扭身出去了。

杨义兴说：“你也别夸她了，叫她赶紧给你弄饭吃。我去找刘富信。你吃罢了就到埠口去，我们在那里见。”说罢，杨义兴向老婆交代了几句，就急急地下岭去了。

埠口是紧挨着鄱阳湖边的一个小渔港码头，原先太平日子里，湖水烟波浩森，波光潋滟，风帆片片，金星点点，太阳照上去如同撒了一层金粉，满湖跳跃，煞是生动好看。这偌大的一片湖水便是一座丰盛的米粮仓，浇灌着四下里几万顷的良田，滋润养活着沿湖百姓世代代生息繁衍。

方志敏赶到埠口时辰光还早。夕阳给风平浪静的湖面抹上了一脸的胭脂，变得娇红娇红的。湖上吹拂过来的微风，撩拨着方志敏的衣襟，给燥热的秋夜带来几分凉爽。原先入了夜，也有许多“鸬鹚排”出动，排头上照例是几只羽色黑亮的健壮鸬鹚，为防它吃鱼，被渔人用稻草芯小心地缚住脖子。排头上点燃着的饱含油脂的松柴在湖面上照出星星点点的亮来，撑排人一边撒网一边用竹篙捅着鸬鹚们下水捕鱼，能干的鸬鹚是渔人的宝，有时半夜就能捉着一筐鲜鱼上来。夜里的鄱阳湖依旧像白日里一样闹猛，一样生机

勃勃，充满活力。可是现在呢？连年的战乱波及着这片富饶的湖泽，湖里边有了靖卫团的巡艇，白天下湖要领通行的牌子，到了夜里一律封湖。所以湖水的晚景虽然依旧亮丽，却是了无生气，成了一片死湖。方志敏看着，不由得又叹息起来。

正在感慨不已，忽然听见湖边有人轻轻在唤自己。从旁边芦苇丛中飘出一只带篷的船来，杨义兴正伏在船舱里向自己招手。没等船靠稳帮，方志敏就一个箭步跨了上去。

杨义兴说：“那个狗崽已经带出来了，怕他耍鬼，所以临时变换了一下地点，就在前面不远处的芦苇滩上。”说着话，船已经无声无息地滑出水面好远了。

方志敏问：“不是夜里封湖吗？”

杨义兴冷笑了一声：“偌大个鄱阳湖，要几多人马才能封得住？再说了，他再凶，能玩得过我们喝着湖水长大的船老大？这湖能到了他们手上去？”船尾的老大一边点头一边摇橹，小船像只箭般犁开平静的湖面向前划去。

刘富信一个人站在芦苇滩中一块干燥的平地上，心里忐忑不安。他后悔跟杨义兴出来，可是又不敢不跟他出来。杨义兴虽然只是波阳县的一个交通员，可是人品非常端正，做事有根有据，平素里自己就有点怵他。他人缘好，湖上岭下有许多肯为他两肋插刀的朋友。所以自己虽投靠了靖卫团，可这个杨义兴是绝对不敢动的。刘富信想多留几条后路，能不得罪的人他是绝不想去捅马蜂窝的。正在胡思乱想，黑幕中一只小船已经到了跟前。从船上跳下一个来，月光下看得真切，是方志敏。

刘富信的腿先就软了，他想说点什么，喉咙里紧得像被一只手牢牢捏住，发不出半点声来。随后下船的杨义兴警告他说：“莫喊，喊了也无人听得见！不要自己寻死，送你喂鱼去！”

方志敏阴沉着脸，声音里浸透了寒气：“刘富信，你干的好事！”

刘富信勉强支撑着自己差不多已经站立不住的双腿，苦笑着说：“方主席，我实在是太难了，不逼到最后，我也不会走这条路。革命到了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总是安全要紧。你看，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流血事件嘛，人不是保住了么？”

“哼哼，怕送命，你来革什么命！要照你的说法，是不是你对革命还有功啊？”方志敏恨不得狠狠地揍这家伙一顿才解气，强压着怒火严厉地责问道。

刘富信一时搞不清这次见方志敏的意图，拼命地为自己辩解开脱：“我晓得，我做错了，我对党有罪。可我也真是迫不得已啊，方主席，有些情况您是不太晓得的……”

方志敏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说：“没得工夫来听你瞎编！我来问你，还有十枝枪哪里去了？”

刘富信这才明白方志敏突然出现的意图。他脑子动得飞快，心想方志敏多半已经晓得了，如若不说，今晚就怕回不去了，不如做个人情卖个好。于是声音也显得平稳了些。“原来方主席是问那十枝枪啊，枪倒是在，不过不在我手里，在茂源周星子那里。”

方志敏说：“你把那十枝枪交出来，就饶你一命！”

刘富信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可是，可是这十支枪他们也是晓得的，已经说定要交给县衙门结清手续的。”

方志敏终于忍不住了，逼近了一步说：“真是太岂有此理了！关于警备团你是怎么给我下的保证？那时你的保证怎么就可以不作数呢？跟反动派说件事倒是这样的守信用，你的屁股已经完完全全坐到反动派一边去了！你自己说，到底拿不拿出来？”

刘富信心虚又理亏，勉强地点了头：“好，我去取来交给你。”

方志敏说：“还有，我今晚要住到你家里去。”

刘富信吓坏了，连连摆手，把个脑袋摇得赛过泼浪鼓：“这怎能行，怎能行？波阳县城多危险，去不得的，去不得的！”

方志敏笑了笑说：“哼，越是那个地方才越安全呢。我就在你家里等枪，枪一天不到，我一天不走。要是在你家里出了纰漏，老杨他们就会找你去！我也会告诉靖卫团，是你让我住到府上去的。你逃得掉干系吗？”

刘富信没想到方志敏还有这一手，简直都要哭了，腿又软了，双手连连作揖道：“方主席，求您了，枪我负责去找，一定如数交到您手上。住到我家这件事可真的是太危险，我那宅子周围尽是靖卫团布的岗……”

方志敏不听他的，一摆手说：“就这么定了。老杨，送我们俩进城。”

杨义兴心中暗暗佩服，方志敏真是机敏，在这种危险时刻，住到哪里也不如住到刘富信的家中去，靖卫团不会去搜他家的，真是灯下黑，再安全不过。方志敏也真有胆量，竟敢到狼窝里去掏崽子，老虎嘴里去拔牙。这番治得刘富信完全没了主意，只得乖乖地听从方志敏的安排。

刘富信算是骑上了虎背。回到家只是跟老婆介绍，是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要住几天，好茶好饭的招待。倒是方志敏笑了笑说：“我叫方志敏。”他老婆又惊又怕又恨，追着刘富信到灶间，还没得哭闹出来，刘富信甩手给了老婆一嘴巴，压低了声音吼道：“嚎！嚎你妈个鬼！你真的要把靖卫团给招来？真的要把我的命送掉？把全家老小你爹你娘的命都送掉？”老婆一下子掩口噤了声。刘富信接着又说，“听我的。共产党和靖卫团，哪头都不能开罪，我们现在是钻了风箱的老鼠。姓方的住不了几天。把他伺候好了，让他走就完事！”解放以后，把刘富信当反革命打，他老婆说，他家还掩护过方志敏，刘富信是有功的。结果让刘富信又捡了一条命。这是后话。

方志敏在刘富信的屋里根本呆不住。刘富信前脚到茂源去弄枪，他后脚也就出了门。他想着要到街面上去转一转，了解点敌情与民情，走到哪里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哪能这般缩头缩脑地在刘富信屋里藏着。

方志敏找刘富信的老婆要了件细竹布长衫穿着，脚上登着一双半新的千层底贡呢面的布鞋，穿戴起来有了生意人的样子。街面上的路原来也是熟的，拐过两条弄堂，就到了十字街口的张记茶铺。

往日里的张记茶铺大概要算是波阳城里最为热闹的一处所在了。戏馆、赌场自然也是热闹，但总不比这家茶铺从早到晚都是人来人往，喧闹非常，吃茶的、讲事的、听书的、做生意的、当掮客的、会朋友的、拉皮条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这茶铺原是最乱最闹的地方，但也因此，四面八方的大道、小道消息差不多都在这里聚拢、传播，严然是波阳县城的一个信息交流中心。

不过这段时间非比往日，茶铺也冷清了下来，秋风吹卷着门口高高挂着的布幡噼啪作响，台阶上落了一地的黄树叶儿也无人去扫，店堂里只是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位老茶客。

方志敏挑了张临窗的八仙桌坐下，即刻有跑堂的沏上一壶茶来。方志敏

摸摸口袋，所带的钱已剩无几，于是只要了一客蟹壳黄，慢慢地吃着，眼睛扫着街外的动静，耳朵却竖着听几位茶客摆话。

几个老茶客如同屋檐下的家雀，看见有生客进来便不肯再多言语什么。方志敏听听，不过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鸡毛蒜皮事，不免有些失望。可正在这辰光，街口匆匆地走过来一个人吸引住了他的目光。这个人穿着一件对襟的黑布褂子，锁口的长裤，背着一只小布包，走到茶铺门口抬脸望了望匾额，犹豫了一下又往街南去了。就这一抬脸的工夫，方志敏看清楚了，差点没失口叫出来：“哎呀，这不是省委的特派员刘士奇嘛！”方志敏心中一震，连忙摸了几枚铜板放在茶碗边，急急起身撩开长衫追了上去。

刘士奇意外地见着方志敏，也是一阵惊喜，但立刻收敛住笑，环顾了一下周围，说：“走，找个地方说话去，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说罢，拉着方志敏就走。

拐了好几个弯，来到一间低矮的鞋匠铺，刘士奇一低头就进去了，转身招呼方志敏进来。再走过一条细窄的通道，爬上一段木梯，来到一间堆放着杂物的阁楼上。刘士奇说：“这里安全，没人能寻得到。万一有了事，还有个后门可以出去。”

方志敏把长衫撩在腰间席地而坐，急切地说：“士奇，有好几个月没有见着上级组织的同志了，自从到了吉安就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当了好几个月没娘的细伢儿呀！你不晓得我们这心里急得一串串地冒火。干革命不靠党、不靠组织怎么行？所以我们弄得做什么心里都没有个数！江西的党组织差不多都瘫痪了，一盘散沙似的捏不成个团。这段日脚熬得真是苦不堪言。好了，见到你就等于找到上级了，我这里也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哎，你快说说，上级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精神、新说法？快给我说说！”

刘士奇说：“你这许多话连珠炮似的，何曾有我开口的机会？”

方志敏笑了：“哎，我真是太高兴也太心急了。好好，下面都容你说。你说吧！”

刘士奇压低了嗓门凑近方志敏的耳朵说：“中央可有了大的变动，在做法上也翻了一个大的跟头，我就是奉省委的指示下来找同志们传达这个精神的，可巧遇上了你！我也高兴，真不晓得上哪里去找你们，怎么就这么巧呢。”

刘士奇说的中央有大的变动，一共有这么几件。一是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权，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方志敏这才晓得，陈独秀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弄出了个“二次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自然应该先是资产阶级把握政权，要待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那时无产阶级才能胜利，才能掌握政权。他从这个谬论出发，丝毫没有同资产阶级分裂，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与要求。也是因为出于这种理论，陈独秀从来都是反对共产党创建一支自己的武装军队，对于初期可以争取掌握的国民革命军，他也是大大方方地让给国民党去指挥，结果帮助国民党扩大和巩固了一支颇具实力的武装。陈独秀在资产阶级、国民党面前表演得像一个垂手恭听的小媳妇，而扭过脸来在自家党和工人农民同盟军面前却真正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婆婆。在北伐军胜利战取长江中、下游而农民军革命热情高涨时，他不放手武装农民、不夺取农村政权、不搞土地革命。结果使得如同潮水般涨上来的农民运动很快又退落下去。

方志敏痛心不已，自己满怀革命热情与坚定性，一心要跟着共产党走，结果糊里糊涂地干，糊里糊涂地失败，全是因为这个错误的陈独秀。

中央的第二件大事是召开了汉口的“八七”会议。刘士奇一字一句地背诵传达了会议最主要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刘士奇告诉方志敏，8月1日中央在南昌已经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以后全党都要走这一条路，眼前中央要求各地迅速策划准备秋收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迎头痛击。

方志敏一下子振奋起来。原来中央开了这么及时重要的一个会，决定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决定秋收暴动。眼下要搞武装斗争，要搞军队，要搞枪，这一点是清楚了，原先自己心里那点说不透、想不透的朦朦胧胧的感觉一下子亮堂了。吃了多少亏才换来这条宝贵的经验呀！方志敏也不无后怕，假若新方针迟来一个月，恐怕大家真的都要散了。这下底气足了，有了挽回农民群众恐慌和悲观的决策良药了，自己也就晓得应该怎样去干了。

方志敏感慨地说：“士奇，幸亏碰到你，知道了这么多重要的消息，一方面觉得这是一个巧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是不会垮的，这个新的方针是多么地鼓舞人心啊！错了不当紧，要改就行。这趟波阳真是没有白来，我得赶快回去，把这些消息赶紧传达下去，让大家都晓得，迅速行动起来。”

方志敏又把自己这趟来波阳的情况给刘士奇细细地述了一遍。刘士奇说：“志敏，你还真有办法，真能干。我佩服你，干的这几桩事和中央的指示精神这样地合拍子。”

两个人就在那间破阁楼上，低声地一直谈到黑天，这才分手。

方志敏一踏进刘富信的家，脸色这才严肃起来。

刘富信已经回来了，一看见方志敏赶紧解释道：“方主席，枪是有，一枝没少，还在茂源，只是我没带回来。”

方志敏的眉毛立即拎得高高地问：“为什么？你又想出什么花样来了？”

“不是不是。”刘富信满是委屈，急得脖子涨得老粗，“我去亲眼看了，十枝枪，都用机油封好，包着严严实实地藏在地窖里。可是我不能带呀。你想，我带着这十枝枪进城，还不早就给反动派截下来啦，送了我的命是小事，枪可真就保不住了，那我不还是没有完成好任务吗？我想，回来与你商计一下，看怎么着去取那十枝枪。”

方志敏看着刘富信那张沁出汗来的苦瓜脸，心想这事谅他也不敢扯谎。沉思片刻，心里飞快地转了几个弯便决定了办法。看到刘富信还在眼巴巴地瞅着他等着指示，便说：“行了，下面的事你不用管了。枪，我自会派人去取。要查出你在瞎编，那事情就完不了！”刘富信点着头，方志敏又抖抖身上的长衫说道，“你这套衣服我穿着还行，这次暂时不还了，算我借的，行不行？”

刘富信更是把头点得如同鸡啄米，心说：祖宗爷爷，只要不来要我的命，借什么都行！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方志敏便悄悄地动身走了。他不想让刘富信知道他的行踪，所以连招呼也不肯打。太阳当空时分赶到了茂源，没费多少周折便找到了原先茂源的农协委员周星子。一问，枪果然还在。方志敏很高兴，可是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这里到弋阳还有百多里路，这十枝枪又不是个小物件，如何运得走呢？

周星子说：“总是要藏起来才行，可这家伙块头不小，一个柴禾堆也藏不住。怎么藏好？”

方志敏说：“我有办法了。这里有点钱，你去帮我置几件要用的东西来。”

方志敏要的全是周星子想也想不出用途来的物品：十几斤臭猪肉，方志敏吩咐，味道越大越好；几丈白布；一盆新鲜猪血；最后要了一口薄皮棺材。

东西找齐了。最难弄的是十几斤臭猪肉，找来找去都是新杀的猪，一点味儿都没有。好不容易问到个信，茂源东头有家农户前天病死了一头猪，没敢吃也没卖，埋了。周星子惊喜地说：“就要它，就要它！”刨出来一看，臭气熏天，人都不能近前。人家也不要钱，躲得远远地掩鼻拿了回去。方志敏挺满意。

方志敏亲自操作。让周星子把十枝枪取来，用臭猪肉严严实实地包裹上，着细麻绳捆绑牢，又用几丈白布裹得不见头不见脚的，抹了点新鲜猪血上去，看上去像是从里面渗出来的污渍。最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棺材里摆平整。

周星子这才恍然大悟，真是心服口服。又连忙照着方志敏所说去雇了一条船。找几个人把棺材搭了上去，连盖都不肯盖严实了，让那臭气总也不断线地溢出来。

方志敏走的是水路，沿乐安江逆流而上。路上少不得有靖卫团、剿共团来盘查。但只要一听说是送一个麻疯病人回祖籍安葬，全都惟恐避之不及，更不肯上船细细搜查了。就这样，一路顺利，很平安地把十条枪运回了漆工镇。到了这时，方志敏才悄悄地擦却了额头上沁出来的冷汗。

第十章

“北乡王”张念诚择婿看中了方志敏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更能使磨推鬼
窖头会议

方志敏从波阳带回来的有关中央“八七”会议的消息和十枝锃锃亮的大枪，让农民兄弟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他们又聚在一起开会，一面听方志敏的传达，一面讨论组织秋收暴动的事。方志敏雄心勃勃头脑很热，他提出的计划是先打下弋阳县城，而后以弋阳为中心根据地向外扩展。

会正开得热烈，柴草门猛地被推开，吴先民喘着粗气连声说：“快上山，快上山！张念诚带着不晓得几多兵赶来了，这条狗鼻子真尖，口口声声要捉住志敏兄。快散吧！”

满屋开会的人都紧张地立了起来。”

“这条狗到哪里了？”方志敏沉着地问。

“快到漆工镇了！志敏，你先走吧！”吴先民急得直跺脚。方志敏说：“上山避一避！”一下子人便全撤空了。方志敏与张念诚的交往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绿波荡漾的信江流过弋阳，把弋阳分为南北两乡。方志敏的湖塘村在北乡，张念诚就是当地声势显赫的“北乡王”。方志敏12岁那年，张念诚出钱聘请了坐馆高桥的老秀才严常新到烈桥去讲课教学。

严常新教过方志敏的书。照那时一般农家的规矩，女孩是不上学堂的，一个男孩子读上两三年的书，识得名字，记得工账也就可以了。本来七岁入私塾的方志敏，十岁后便该绝了读书的念头。而在十一岁上，恰逢村里的私塾因大旱闭馆。方志敏不敢心存妄想，准备回家帮着爹娘割草放牛忙田里生活，这个要离村去高桥坐馆的严常新老先生，却找到了方志敏的祖父方长庚说：“你家正鹤呀，是个奇才。启蒙一年，就能背得《三字经》、《百家姓》、《昔日贤文》、《孝经》等等十几本书，寻常家伢儿学上三年也不过如此。我嘛，见奇才不栽培，枉为人师；你哩，见孙仔这般有出息，也要舍得让他读书。”

严老先生的话有分量有道理，家里便同意方志敏跟着严老先生上高桥去搭学。

不久，方志敏上学不小心跌了一跤，把手腕给摔脱了臼，疼痛难忍。张念诚知道后特地为他请医诊治。有人说，方志敏的运道好。

张念诚有自己的打算。大财主“北乡王”张念诚有钱有势，可就是还缺一个好女婿。他有一千金，虽然年未二八，但择婿已非一日了。挑来拣去，总也没有中意的。当他听说严常新要想带一个“奇才”来搭学，倒是有了兴趣。等见到长得脸相端方、眉清目秀的方志敏时，心中更是喜欢。又知道这孩子学识也好、聪颖非凡，于是立刻拿定了主意，派人到湖塘方家去提亲说媒。

方志敏的祖父方长庚和爹爹方高翥，听到这个信后并没有立即允诺。他们思来想去，觉得这个亲巴结不得。方家是靠做

田过日子的本分人，实在不想攀门高亲附势欺人，光在面上，烦在心里，没有什么意思。再者，自家平平常常过日子还罢，屋里哪养得起“北乡王”的千金小姐？方家合计了半宿，第二天很客气地给张念诚回了个信：“这亲

事，我们方家是求之不得呢。只是正鹄才12岁，年小不懂事，怕有个不好，我们穷仔不当紧，可小姐是个千金，吃亏不起的。是不是请张爷再望几年？”

张念诚觉得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不再坚持。可仍是心不甘，一转念又提出来要收方志敏为义子。方志敏觉得奇怪，说：我家娘老子健在，认这么一个‘朝爷老’做甚？方高翥夫妻俩觉得正鹄在烈桥搭学也欠了张念诚的情，勉强答应了下来，所以，按照规矩，方志敏要尊称张念诚为“朝爷”了。

到了1924年，方志敏已是25岁的年轻人了，和张念诚的关系却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那一年，方志敏为开展平民教育、宣传国民革命回到了弋阳。张念诚闻讯便主动来看他，并且似嗔非嗔地埋怨他是不是身居省城端架子了？

当时方志敏对张念诚的情感是复杂的，又是单纯的。在那样的年月里能看得起自己这样一个穷做田人家的仔，说明与一般豪绅还有所不同。方志敏为此还写过一封宣传共产主义的长信给张念诚，热心地劝其也能投身革命。这番张念诚责怪他失礼，方志敏也就歉意地笑笑说是自己忙得不得空，过几日一定过府去求教。接着，俩人又谈起了平民教育，方志敏借这个机会大大地宣传了一番他所热衷的革命事业。

张念诚表面上没有反对，但实际上也没有赞成。平民教育准备在湖塘办的“旭光义务小学”、“平民夜校”都因张念诚等一些旧学派的阻拦而流产。方志敏这才晓得，封建地主的势力是多么地顽固，单凭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幼稚想法真好比是一瓢热水浇在了雪山上，冒一丝几缕白气就不见了。

这个时节军阀们正在搞选举的把戏。张念诚一门心思要混上个国会议员，于是在选民册上做文章，以少报多，并且独揽了选举费，一心要将选举操纵起来。却不料方志敏怎能容忍这种污七八糟的做法，在中间横插进来一竿子，以致张念诚好梦落空。

方志敏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猪仔议员》，历数了张念诚的十大罪状。在当时的进步刊物《寸铁》上登出。《寸铁》这个刊名就是方志敏取的，是“青年学会”的一张八开传单式的油印旬刊。结果这一期四处张贴得最多，围观的人也最多。自然有许多选民在明白了真相之后收回了选票。

张念诚怎么能不气不恼？双方就这样反目为仇拉开了架势。

这一天，方志敏正在家中与方远辉、方远杰和黄镇中等人商讨“青年学会”发展骨干分子的事。就听有人叩门，一个乡丁送来了一份“请柬”，约方志敏即刻到漆工镇警察所商议选举的事。上面还用楷书写着：“谨备薄酌，恭候驾临”。

方高翥凑过来说：“正鹄，张念诚往日也不曾亏待你，你今日开罪他，怎样好呢？”

金香莲很担心，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还是不去为妥。”

方志敏并不怕，少年气盛，胆气十足，一边穿长衫一边说：“爹、姆妈，你们不晓得，张念诚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他今日骑到我们头上来，想唬住我们，镇压革命。他做梦！不去他有话讲，我去了看他能怎样！”

漆工镇警察所就设在镇上的老城隍庙里，宽大幽深的殿堂当议事厅用。方志敏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多半桌的人，全是乡里的绅土地主。张念诚坐在当中的一张紫红木太师椅上，劈头就责问：

“正鹄，古人曰：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先。又曰：君子群而

不党。这些教悔你都记着了么？你看看你自己，组织什么‘青年学会’，徒然以此为标榜，却不肯在做学问上下功夫，而颐气逞能，妄议县政，诽谤乡贤，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你读书读得怎么反而不通道理了呢？”

方志敏并不买账，也劈头问道：“请问，我妄议了哪些县政？又诽谤了哪些乡贤？”

张念诚说：“你把选票都弄到哪里去了？还说我是独揽选票，妄图操纵选举，这不是诽谤又是什么？”

方志敏一笑道：“如果是事实，那就栽不上‘诽谤’的帽子，你敢说这不是事实？再说了，我不需要捏半张选票在自己手中，选哪个不选哪个，是民众的权利。选票，自然也是在民众手中，要得了民心就能得了选票，不是这样么？”

张念诚有点发窘，用手指了指方志敏，没容他开口，方志敏又滔滔不绝他说开了。

“关于选举，民国缔造之初的临时约法上有明确的规定，说得清清楚楚，你有选举权，民众也有选举权，你可以搞竞选，民众也可以反竞选。你想强迫民众的意愿就是违背这个规定！”接着话锋一转又严词数落起来，“你看看你自己，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勾结官府，包揽讼词，劣迹斑斑，路人皆知，你做的哪桩事是为了民众？民众能选你这样的‘乡贤’么？”

屋子里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张念诚气得两手微微发抖，紧紧地咬着牙，平时哪曾遇到过这样的阵式，只有他骂人，哪有人骂他的？一时间心绪都乱了，一句驳词都想不起来。

方志敏还没说完，嗓音依然不减弱：“不是邀我来讨论选举么？我倒要问一问，选举费用，上面拨有专款，你为什么还要向地方上摊派？专款用到哪里去了？同时也告诉你，我们反对你营私舞弊，反对你借维持治安为名，建立什么地方自治武装，扩充你们私人的势力。再有，我们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平民教育，你有什么道理要横加刁难？”

张念诚是真的急了，一时间想不起更多的理由来，猛地站起来直冲冲他说：“我就是要你交出选票！我就是办自治武装！我就是不许你们搞什么平民教育！”

坐在他旁边的乡绅李普程赶紧一面劝他息怒，一面转过脸来板着面孔斥责方志敏：“正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能容得你如此咆哮公堂？”

方志敏冷笑了一声：“我也问问你，如今是什么时候？国民革命了，还能容得你们如此滥逞淫威吗？”

这时，庙门外人声鼎沸，方远杰他们怕方志敏吃亏，带着一帮子青年农民接应来了，一堆人齐齐地拥在门口。另一个叫齐川源的乡绅见事态闹大了，连忙出来打圆场：“算了算了，大家都不要发火，有事好商量，息怒、息怒！”

方志敏说：“好吧，既然你们无理可说，我且告退了！”说罢一拱手，带着方远杰们回湖塘了。

张念诚哪里肯罢手，写了状纸投到当时的县府里去，又附上

了方志敏规劝他支持革命的长信和《寸铁》上的《猪仔议员》作证据。张念诚的一口恶气出不来，一连送去了93张状纸。

“青年学会”也不肯示弱，晓得张念诚在告状之后也动手给县长写信，措辞很厉害：“如果你要方志敏坐一天的牢，我们就要你坐十天的牢……”等等。

当时的县长并非不想受理这桩理不清的案子。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孙中山已决定北伐，军阀们的统治地位已明显岌岌可危，革命的势力蔓延迅速。在这种大的氛围下，去处置一个连省里都闻名的革命党人方志敏就是太不明智了。只能劝说张念诚妥协，并且将虚报冒领的选举经费移作平民教育用。待北伐军打到江西，一时革命红旗招展，弋阳的农民就抓了他，后来解到南昌关押。

张念诚就此与方志敏结下了仇。

张念诚有钱。有钱不但能使鬼推磨，有钱更能使磨推鬼。他用重金运动了一个营的军队，亲自带领着直奔湖塘而来。

自然是扑了一个空。方志敏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刻撤了。张念诚的一股恶气翻来滚去出不来，湖塘村庄户人家的房子、树，样样都让他看着惹气，样样都使他觉得潜藏着仇恨与危机。于是放了把火。这一把火使得湖塘八十余家被烧毁有五十多户。

为寻枪去波阳颠簸了十多天的方志敏吃力地爬上了磨盘山南面 5 里的丁山村，但是湖塘村方向冒起的冲天烟火还是让他胸中一阵阵地发闷。做田人的屋子大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百年老屋，转眼间化为瓦砾灰烬，可想而知村里的男女老少会哭成什么样子，在咒骂反动派军队和劣绅之后，难免也要埋怨造反的。这就需要除了组织乡亲们度灾过日子，也得赶紧做解释工作。要做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

不过张念诚还是不肯放过他们。两天后，得讯方志敏可能在丁山村，立刻又带着那营兵马来跟踪围山。方志敏不得不再次转移。

连日的紧张和劳累，又引发了方志敏多年来一直患有的肺结核症，吐的痰里都带血，而且一吐起来止都止不住，脸色白得像纸。大家见了又急又怕，商议了一下，决定把他送到 30 里外的德兴县张村沙路他姐姐方荣姘家，那里离着湖塘有一段路，估计张念诚他们一时不会追过去。

方荣姘在方志敏少年时期就嫁到了张村的沙路，丈夫叫张国正，也是个老实善良的庄户人，夫妻俩晓得自己这个弟弟干的是正事，从来也没有打过横竿泼过冷水。这番看到方志敏病成这样，真是又着急又心疼，一面掉着眼泪给方志敏铺床休息，一面忙叫张国正去喊附近的郎中来诊脉。

沙路并不是个世外桃源，也不是个可以静心养病的地方。德兴县衙门也是天天派人下乡来抓人。通缉革命者的布告，一张又一张地张贴在村口的大道旁。这一带的地主流氓组织每个人在手臂上纹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为标记，也在乡下横行霸道要钱要酒，抓了陌生人就到县衙门去邀功。他们不知怎地打探到方志敏藏在这一带，于是气汹汹地纠集了一帮人带着梭镖砍刀就找过来了。

方荣姘得到消息快，不敢迟疑，立即扎捆了一张躺椅，张国正叫上几个靠得住的乡亲抬上方志敏就走。先到了祝家营，又由祝家营的亲戚张其德将方志敏辗转护送到紧挨着德兴的乐平县篁坞村。

篁坞村坐落在弋阳、德兴与乐平的三县交界之处，地处偏僻。大革命时，这村里的地主惧怕农民造反都跑光了，至今也不曾回来。村里六七十户人家大多同族同宗，外姓的人也不肯来。所以住在这里相对来说安静一点。

方志敏的病一要靠调理，二要靠营养，三要靠休息。穷人家生不起病。经过这一番的辗转折腾，方志敏算是命大，在篁坞村足足躺了二十多天，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生病期间，缪敏得讯后曾经赶到张村方荣姘家去看他，

很想留下来照料他一些日子。方志敏不同意，说：“同志们要晓得你为了我的病而丢下革命工作不管，岂不要笑话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革命总是要放到第一位的。”缪敏倒是把这几句话牢牢地记下了，所以也不再坚持，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回她的新工作地点波阳了。

病渐渐好转，耗去了许多的时间，再加上体弱不支，所以原计划中的秋收暴动并没有能够完成。

病愈后的方志敏又去了趟波阳。

在这一段时间里，弋阳、横峰一带的党组织都是归新的波阳县委领导。方志敏专程来波阳，一是为了汇报弋阳九区的工作情况，二是为了领取确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波阳县委机关设在城边的城隍庙二号，这里比较偏僻安静，一幢前后四进的大土屋，除了房东以外，就是县委机关的几个人，再没有别的闲人。缪敏也是前不久调到这里来担任文印工作的。

缪敏没有想到方志敏会来，不由得大大地惊喜一番。看着方志敏，气色也好多了，瘦削的脸庞上一双笑吟吟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头上戴了一顶藏青绒帽，一件青灰软缎的丝棉长袍恰恰合身。

方志敏让缪敏看自己的新装束，问像不像个阔佬。

缪敏点点头说：“像的。不过这么远，走得不吃力么？病刚好，身子骨还是软的呢。”

方志敏差点没哈哈大笑起来，说：“哪有阔佬是自个儿走着的？穿着绫罗绸缎，走的满身尘土，不是让人家一眼就看穿帮了？自然是坐轿子来。”缪敏这才放心。

方志敏在这里见到了赣北特委书记兼波阳县委书记林修杰，还有赣北特委军事部长周菽茵。

在这天晚上的谈话中，确定了方志敏由弋阳调横峰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原在横峰秘密工作的黄道则调弋阳。这主要是考虑到方志敏在弋阳活动的目标过大，危险性也大，并且被敌人围追过急的缘故。黄道也是同样，在横峰差不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是靖卫团排行榜上的首位。同时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应当是争取时间，努力发动群众，组织好暴动队伍，一定要尽力扩大暴动范围。这主要是出自考虑暴动地区过小而不易战胜敌人。

第二天，方志敏又急急地赶回了弋阳。这时敌情有了一个变化，张念诚请来的那营官兵因调防已全部退出了九区。地主老财们一旦没有了枪杆子武装做坚实的后盾，照样心里发虚。方志敏怎么肯放过这个机会，就由方远辉、黄镇中领头，组织了三百多人去烈桥捉拿张念诚。其中沿途的群众闻讯后不断加入这支队伍，浩浩荡荡达三千多人。张念诚得讯后连夜逃遁，先是逃到了南昌，后来又到了上海。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财主处在一个相当陌生的环境中，丢失了土地和财产，惟一的结果就是丢魂落魄，病死他乡。

遵照县委的指示，方志敏决定要召集邻近各县的党员骨干开会，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人员都很分散，并且有的因遭受失败而变得消沉。方志敏写了信派人送去。方志敏在信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在加入党的时候，就抱定了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没有这个决心，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暂遭失败的今天，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百折不挠，迎难而上，即使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如果有谁今天还不愿抛弃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谁就应该以实际行动接受这个考验。”

方志敏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基本上就是来源他自身的行动。在当时，他不是单纯地苍白无力地进行一些理论说教，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充满信心。他自身的所有行动就像是一篇宣言，一面旗帜，鼓舞和号召着千百万穷苦农民靠拢来和他一起前进。

1928年1月初，方志敏在弋阳窖头村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铅山、上饶、贵溪等五个县的党员会议。今天我们看到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邹秀峰、汪佑春、邵棠共12个人。这十几个人后来成为了弋阳、横峰暴动的领导与骨干。会议的地点是在窖头村一间不起眼的土房里。

方志敏的思想非常明确：国民党已经反动了，大革命遭到了失败。但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形势仍然存在。现在的办法，只有重起炉灶，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土地革命。这就确立了窖头会议的指导方针。

但是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讨论。例如在哪些地方组织暴动？大概要组织多大范围？什么时间暴动比较适宜？是一地先动还是满地开花？讨论这些问题花费了不少时间。整个会议很紧张，开了整整三个白天和两个晚上。许多人的思路都比较活跃，有的不免犯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兴奋地提出来举行全面暴动，各县普遍开花。后来这种意见被否定了。因为这个打算明显暴露出它的盲动性来，一是各地群众发动、成熟的条件不均衡，二是领导力量不足，怕不能顾及全面。讨论许久，最后终于确定由群众基础好、条件较为成熟的弋、横两县在年关首先举起义旗，揭竿而起。要求其他各地积极创造条件，视情况发展后再作决定。就暴动起义本身而言，这个决定是比较尊重客观事实的。

会议完成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制定了宣传大纲，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和武装工农群众，团结一致，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二是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和发动五县大暴动的决议，具体措施是“确定选择群众基础较好而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弋阳、横峰作为首先暴动区域，其他县积极准备”。

起草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大纲上规定了暴动的纲领。概括起来就是：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
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
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确定的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具体要做到团以下设排，排以下设班，每团30人以上。每个团员都要宣誓忠诚于革命事业，遵守如下公约：

绝对保守机密，不得走漏消息；
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团员；
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装；
大家齐心努力，听从上级指挥。

由于不久前波阳县委机关又遭到破坏，弋阳、横峰等地的党组织又一次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单独领导作战了。所以会议的第三项任务就是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五县党委会。选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

吴先民、邵棠、方远辉为委员，方志敏为书记。并且确定在未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之前，这个五县党委会为五县统一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在工作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暴动指挥部，方志敏任总指挥。

在会上几个委员做了明确的分工。方志敏化名汪祖海，负责横峰县楼底蓝家一带；黄道化名陈松寿，负责弋阳九区一带；邵式平化名余艳王，负责弋阳七区一带，主要任务是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窖头会议使弋阳、横峰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关键变化。革命不断退却的局面被终止了，革命力量开始向反革命力量主动逼近，由防御转为了进攻。

第十一章

黄道叫吴品秀去买一只大公鸡来，说
是要补身体 繆敏央求看守去买了点碘
酒，这样使她读到了一封信 赎繆敏，开
价四百块光洋，方志敏真的为了难

横峰县的黄道，比方志敏只小一岁，是横峰姚家垅人。父亲黄菊除了种田外，还开了个小小的中药铺，略通文字，也略识医道。黄道 14 岁时父母就替他订了一门亲。这在当地是一种习俗。年龄虽小但要先订个亲。女的叫吴品秀，家在离姚家垅 40 里的青板桥，那时的女孩子都要裹脚，吴品秀却是个大脚。村里有人议论，黄道却不在乎，还反对父母给妹妹黄梅贞裹脚。这桩“包办”婚姻在众多失败的事例中是一个例外，黄道公然言称喜欢吴品秀，又斗胆去找岳母，执意要让吴品秀也读书。后来在他的影响下，吴品秀和弟弟吴先民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黄道的书也读得好，他读过上饶鹅湖师范、鹅湖中学，隔了一年考上南昌二中。在 1923 年与邵式平一前一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史地系。

书读多了，自然就长见识，长了见识，思想就活跃了。要操纵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舆论文化宣传必定是一块不可忽略、不可大意的阵地。黄道在南昌二中念书时，与同学好友袁玉冰等一些，就开始做“知识救国、改造社会”的试验。他们读《新青年》等等先进启蒙读物，觉得还不尽意，于是酝酿成立了一个团体，先取了个名叫鄱阳湖社，后来更直截了当地把这个名改为改造社。在《本社的简章》上说的很明了，改造社的宗旨是要“改造社会”，“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改造社又办了个《新江西》杂志，黄道当仁不让地是该杂志的策划与撰稿。黄道的文章写得很多，笔耕颇勤，包括后来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始终不曾辍笔。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文稿看，他的笔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关于解放妇女、提倡新文化运动以至后期的纠正党内错误、肃反与阶级立场、抗日游击战争种种等，他都大发议论。从文稿的形式上看也是丰富多采的，诗歌、散文、军事论著、信函、教材等等，黄道无一不涉足。改造社的影响随着《新江西》的广为流传而扩大，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进步青年方志敏也是其中的一个。

1923 年秋，黄道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后，这个改造社因为其核心人物陆续都到北京上学，所以干脆将社址由南昌也迁至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办了个总社，又在南昌、上海等地设立了分社。这一年，他在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在这期间，他还和陈毅一起介绍了同乡邵式平入党。又和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等 12 人一同担任了江西籍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博物》的编辑。后来在“三一八”请愿活动中，黄道扛着大旗走在最前头。段祺瑞政府的枪弹打中了刘和珍，黄道的裤管上被打了个对穿险遭不测，幸未受伤。这以后，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仍回江西继续革命。他在横峰姚家垅创建本县第一个党支部。1927 年春天，黄道统领数千农民协会会员，以梭镖棍棒、鸟铳土枪为武器，声势凌厉地从四面八方包围并攻入横峰县城。县长从后门翻墙而逃，农民们就把县府改做了县农民协会。

翻开黄道的履历，着实辉煌的是，黄道还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

当时他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在起义前与罗石冰代表省委与前委代表刘伯承、聂荣臻一道开了个秘密联席会议，商讨地方党组织配合和支援武装起义的问题。分工给黄道的任务是组织工人、青年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担当起义部队的救护者与后继梯队。他们发动南昌人民捐款一万余元，与罗石冰一道送交起义部队。

大革命失败后，黄道在国民党的通缉下又悄悄回到了姚家垅。这时的党组织情况比较混乱，黄道在家“隐居”，如又聋又瞎一般，不晓得到哪里再去找党。党自然也不曾忘了他，没有多少日子，方志敏就亲自找上门来。

黄道的婆娘吴品秀，对黄道的感觉复杂得连自己也搞不清。

吴品秀是在17岁上嫁到姚家垅黄家来的。做了新娘子，样样都满意，公爹、婆婆慈祥可亲，小姑子拿她当亲姐姐待，丈夫黄道自是更不必说，相敬如宾且又温存体贴。没隔两年又添了儿子，全家上下都开心得不行。要说幸福，吴品秀非常自信，满村满乡还有比自己更幸福的吗？可就是在对待黄道这个事上，吴品秀似乎常常进入误区：黄道有时是个熟悉的亲人，有时却像个陌生的客人。要是黄道在家里住上一个时期，吴品秀就感到温暖贴心；可每当他刚住熟，不是说出去读书，就是说外出看朋友，一去就是几个月，吴品秀不免觉得孤寂冷落。在农村妇女吴品秀的眼里，黄道的心倒像是一口深不可测的潭水，在水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身影，晓得他心里是有自己的，可是除此而外还有什么，那就真是弄不清爽了。吴品秀觉得有的事不好理解，明明家里生活还过得去，丈夫却偏要到外头去东奔西走。有时盯着问问到底出去做什么，他总是含含糊糊地用话岔开，没有一句实话。吴品秀后来不问了，因为自己的弟弟吴先民总跟着黄道在一起。

1927年春末夏初，国民党撕破了脸，县里乡里的反动派也跟着张牙舞爪起来，跑来抓黄道和吴先民。这俩人得了消息都及时避开，结果就抓走了吴品秀和弟媳妇周嫦娥。吴品秀坐了一回牢，吃的苦自不必细说。一个月不到，黄道便策划着派黄端喜、黄球等农民猛将带着一千多农民冲进横峰县城，劫牢反狱，把几个被捕的人都抢了回来。吴品秀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过了一遍脑子，朦朦胧胧猜得黄道和吴先民做的肯定是正事。不然，为什么反动派要抓要杀他们，抓不到人就连他的婆娘也要捉去过堂审讯呢？而乡亲们却正好相反，拼死拼活搭着性命也要把自己和坐牢的人救出来。

5月里的一天深夜，黄道突然又回来了，并且还带了十几个朋友，悄悄地进了楼上书房。吴品秀思忖，他们做正事，反动派弄不好又会来寻茬滋事。心事重重，一夜也不曾睡好，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她就爬起来带着细崽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纳鞋底，防着有生人闯来。

怕什么就有什么。一行鞋底还未纳完，就听着门口有人问：“黄道先生在家吗？”

一个高个子的陌生人立在门口。吴品秀慌乱得心里“怦怦”直跳。昨夜黄道进了家门，别的不说，专门关照过：“风声很紧，门可要看牢。”现在这个陌生人一下子就闯进了院子，吴品秀想拦也拦不住，只得说：“先生走错门了吧？”

陌生人并不在意吴品秀的拒绝阻拦，反而笑眯眯地问：“你是黄道嫂吧？”

吴品秀更迷惑了，黄道朋友多，来来往往虽叫不上每个人的名字，但面孔是认识的。可眼前这一位，连见都不曾见过，他怎么能一下子认得出自己

来呢？

这个人说了不算，还伸手来抱细崽，又问：“是黄道的崽俚吧？看这双眼睛活脱脱地就像黄道呢。”

吴品秀急忙把细仔拉到身后，根本不想让陌生人的企图得逞。

正在相持中，楼上书房的窗户忽然打开了。黄道探出身子来热情地叫：“老兄，怎么这么早就来啦！快上来！”又对吴品秀喊，“品秀，是熟人呢，快请他上来！”紧接着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黄道他们一起跑下楼，拥着那位陌生人上楼去了。

吴品秀依然在院子里纳鞋底。少顷，黄道匆匆跑下来：“品秀，辛苦一趟，你去买只鸡来，招待招待客人。”

家里来了客，烧一只鸡敬客也是很平常的事。吴品秀答应了一声，抱着细崽就准备走。黄道又拦住了她：“忘了告诉你，要买一只大公鸡。”

吴品秀琢磨不过来，于是就问：“哪有买公鸡待客的？都晓得是母鸡补人嘛！”

黄道一时哑然，眼睛转了一下说：“莫管，客人喜欢吃公鸡。”

吴品秀想，哪有这样的怪人？晓得黄道的事问了也是白问，于是也懒得再问，径直走了。

当时村户人家，养鸡都喜欢养母鸡，主要是为了留几个鸡蛋换点油盐钱，养了公鸡也是为了配种与报鸣，所以一般都不肯出让。吴品秀后来找到种菜的老张。老张听了吴品秀学黄道的腔调不由得哈哈大笑，到底还是把自家那只报晨的大白公鸡卖给了吴品秀。

看见吴品秀拎回来的大白公鸡，黄道很满意，便叫妻子先用竹笼子罩在屋前。然后他又跑到灶房里东翻西翻，把吴品秀藏着打算过年吃的一坛子米酒拎到楼上去。奇怪的是，晚上掌灯以后，黄道又来找吴品秀讨了一束香走。吴品秀百思不得其解，平时看见家里女人们烧香许愿，黄道他们是要笑话半天的，今天的太阳是打从哪边冒出来的？吴品秀的好奇心促使她想探个究竟。于是楼上的人不睡，她也熬着不肯去睡。

可是在自己屋里，什么也听不清爽，吴品秀蹑手蹑脚地爬上了楼梯。四下里寂静无声，连只跳蚤蹦都能听得出。吴品秀不曾想到在自己家里也要偷偷摸摸，心里怦怦直跳。一不留神，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踉跄，跪在了楼梯板上，肩上披着的一件夹衣也滑掉了。书房里的灯一下子就熄灭了，她自个儿则是摔得眼冒金花，惊出一身冷汗。

“谁？”门开了，只听黄道低沉严厉的嗓音，紧接着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直直地照射在吴品秀的脸上。

看清原来是吴品秀，黄道的口气缓和了许多。他拾起那件跌落的夹衣给吴品秀披上，和声问道：“你上楼怎么也不说一声？摔坏怎么办？”这时吴品秀才看清楚，那个绊她一脚的东西原来是一包杂物，上面横着别了把油纸雨伞。

吴品秀一边揉腿一边怯生生地问：“夜深了，怎么还不困？要什么东西不要？”

黄道倒没有再多责怪她，一边扶她下楼回自家屋子，一边对她说：“不当紧的，你先困吧，我们还有点事。”

吴品秀躺在床上哪里睡得着，不知道自己丈夫搞什么名堂，总之是放心

不下。时间不长，听见许多人蹑手蹑脚地从楼上下来，一直到隔壁前厢的厅堂。接着，听见很熟悉的声音在问：“老方，这就开始吧？”

吴品秀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也不顾得刚才摔得腿疼，又摸索着起来偷偷地扒着门缝向外望去。

厅堂正面的墙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面红纸做的红旗，被明亮的油灯映照得四壁都生出红彤彤的光彩来。正中条案上搁着那只吴品秀与婆婆平日里用来拜佛使的黄铜香炉，炷香烟缭绕，黄道把晚上讨得的那束香全插在里头了。条案上还放着一溜蓝花瓷碗。自己跑了好几家才买来的那只白公鸡被缚得牢牢的，正伏在案桌下扇忽翅膀。屋子里站了一地的人，都被红旗映得脸庞红扑扑的，兴奋而低声地在商议什么，只有身影在土墙上晃动着。这时，一个身材很魁伟的人拎起了那只大白公鸡。吴品秀认识，这人是黄道的本家兄弟，叫黄球。黄球会耍大刀，会一些武艺，大家叫他“大刀黄球”，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他脾气爽直侠义，爱打抱不平，平时话并不多，碰上恶人作坏，他只有一句话：“妈的，叫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也真敢动手，吴品秀听说他曾经在外乡一拳打死过一个狗仗人势的账房先生，为此进过班房，上过刑，现在胳膊上还留着一块扎眼的伤疤。他也穷，组织农会时，就被乡亲们推选为农会主席，姚家拢的土豪劣绅自然是恨死他了。说起来，他还是吴品秀的救命恩人呢。头一个月前，吴品秀和周嫦娥被关进县大狱时，就是他和黄端喜带的头，招呼了一千多人把自己从县牢里抢了出来。

没容吴品秀把屋里的人都认清，只见黄球捏紧了白公鸡的翅膀，手起刀落，一刀把它的脑袋剁了下来。随即捏着还在挣扎的白公鸡，把鸡血一滴一滴洒落到那一溜蓝花瓷碗里。

原来他们在喝鸡血酒呀！先是那位白日里的陌生人喝了，接着黄道、吴先民、黄球纷纷端起碗来一饮而尽。然后大家轻声而有力地发了誓言，那场面让人看了真是又感动又庄重。

很快，人们就散了。当屋里只剩下黄道和几个人时，吴品秀忍不住推开门走进了厅堂。大家都愣了一下。黄道连忙走过来想拦着自家婆娘别再往里进。

吴品秀声音很轻但口齿十分清楚：“一鸣，你莫拦，你跟我实说嘛，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要准备上哪去？”

黄道晓得自家婆娘担心，所以更不想告诉她实情，只是轻轻地拉着吴品秀的胳膊说：“品秀，莫管这些事，管好细崽就行……”

吴品秀立在那里动也不肯动，说：“你不告诉我实情，我怎么能放心？”

这时，那位陌生人走近前来，和蔼地对吴品秀说：“黄道嫂，你放心，我们干的都是对穷人有好处的事。我们要在年前组织人分头去打反动派，夺他们手上的枪，端他们的老窝，这就叫暴动！”

黄道在一旁急拦道：“老方，莫跟她说这些。”

老方说：“黄道嫂是通情达理的，晓得了实情更会支持我们的。”

吴品秀不无担心地问：“那就是要开火哇，你们这帮人会打仗吗？”

“这有什么难的！”黄球的粗嗓门插上来说，“嫂，莫担心，胆小不得将军做，你和嫦娥还不是我们去打县城打班房抢回来的？我们人多着呢，那几个臭虫反动派不够我们捻的！”老方说：“黄球，莫把话说得太满了，说满了黄道嫂又该不信了。嫂子，相信穷苦人，相信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做不到的事！”吴品秀疑疑惑惑地看着他们出门。屋里只剩下黄道一个人。吴品

秀说：“那个方先生话说得真分寸，让人心服口服，不晓得他是哪个村的，从前也没有见过他嘛。”

黄道小声他说：“那就是闻名赣东北的方志敏嘛。明朝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吴品秀这才恍然大悟，心里敞亮了许多，也小着嗓子嗔怪黄道说：“你早点告诉我嘛！我要是早就晓得你是和方志敏一道做事，我也就不来多问了。弄了半天买个公鸡是为了喝鸡血酒也不肯早说，早晓得是要派这个用场，说什么也要去寻只大红公鸡来呀！白的总归是不吉利。”

黄道说：“又讲迷信了不是？喝鸡血酒只是一种样子，要紧的是把农民兄弟们拢在一起。”

吴品秀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后来自然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为党做了许多的工作。

经过这一番事故，吴品秀认识了方志敏。方志敏只要一到横峰，就必到姚家垅来寻望黄道，两个人一扯起来总要得半天工夫。吴品秀也忘不了专门去寻一只肥母鸡来给方志敏补充营养。

这次是为了召开窑头会议做准备，方志敏又专门来找黄道，两个人为了工作谈得忘了时间。早已过了晌午，吴品秀做的饭菜热了又热，催了又催，这俩人才暂告一段落从书房里下来吃饭。

刚刚端起饭碗，却见专门派去鄱阳联系工作的黄镇中急呼呼大步跨了进来，一见到方志敏，却忽然又愣在那里没有了话。

方志敏见他神色慌乱又紧张，连忙问道：“出了事了么？”

黄镇中不好不承认，点了一下头，却仍是不肯开口。

“天大的事总也得讲出来呀！”黄道在一旁也急得催促道。

方志敏毕竟是在血雨腥风中搏杀多年了，有思想准备。见黄镇中难以开口，便猜到决不是好消息，脑子里一下子就闪过了那张亲切熟悉的脸庞：“是不是波阳县委出事了？是不是缪敏同志出事了？”他连连追问。

到底也没搞清楚是在哪一个关节上出的岔子，但是波阳县委真的是又一次遭到了破坏。缪敏也同时被捕。这是11月18日的事。

在波阳县委秘密所在地的院子里，为了工作方便，缪敏认了房东老太太刘兰姣当干娘。缪敏年纪轻，又懂道理又有知识，刘兰姣很喜欢她，做什么好吃的，有自家女儿一份，就有缪敏一份。

出事的这天晚上一点征兆也没有。一伙法警进来就抓人，冷不防林修杰和周菽茵都被抓了起来。随后又冲到边厢房。

缪敏是和刘兰姣的女儿一道睡。已经听见院子里脚步纷乱，动静不对。她连忙起身来看，刚刚穿好衣服，两个法警端着枪就把门给踹开了。不由分说，用绳子把两个女孩反绑起来就推了出去。走到院子里才看见，刘兰姣也被推了出来。

到了县衙门便连夜过堂。缪敏被单独带进一间充满霉湿气味的房子。审讯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县科长。跟着，有法警把在住处搜查得来的一只藤条箱拎了进来。

看见自己的这只藤条箱，缪敏心中冷不防一惊。只怪自己太大意，方志敏上次让人捎来的一封信，此刻还藏在藤箱的夹袋里呢。

方志敏在这封窄窄的信上写道：

贞妹：

听说弋阳要捉你，我处则万分安宁。你在白色恐怖下开展秘密工作，随时都有危险，须得处处小心。望注意身体。

贞妹，是方志敏对缪敏化名李祥贞的呢称。缪敏拿到信后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都能背得下来了。和方志敏真是难得见一次面，所以见信如见人。以前方志敏嘱咐过，来往信件看完一定要烧掉，这是做白区工作的一条原则。可是缪敏实在是舍不得，拿出方志敏的信来，烧一回、淌一回眼泪。这封信是近期来的，缪敏想留着再看看。没想到这下可真的是闯了祸。缪敏后悔不迭，随即又横下一条心来，事已至此，无法挽回，若是敌人问到，那就矢口否认，说什么也不能招供。

法警用脚踢了踢藤条箱，示意缪敏自己动手打开。缪敏镇静了一下情绪，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打开了这只不大的藤条箱，她把换洗衣服拿出来堆在箱子盖上，这样就压住了那只要命的夹袋。又把书和作业本翻出来放到桌子上，又把衣服一件件抖开让那个科长检查，随后乱糟糟地堆在箱子上。

那个科长对衣服之类也没兴趣，倒是仔细地翻阅了一下缪敏的书与作业本。这些东西也是为了掩护身份早准备好的。所以那个科长看来看去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那个科长坐下盯着缪敏看了足足有三分钟，这才开口问道：“哪里人？”缪敏努力镇静着自己，谨慎答道：“弋阳。”

“为什么到波阳来？”

答词是事先想好的，但缪敏回答的仍然很小心：“我原是打算去考南昌女子职业学校的，听说弋阳去南昌的路不通，所以只得绕道波阳。”

“那怎么会在波阳住了这许多天？”

“其中有个缘故，到了波阳，因为途中劳累受凉，不觉就病了，所带盘缠有限，一个穷学生也住不起旅馆，所以就暂时住在我干娘那里。”

“我看你伶牙俐齿，倒是蛮能说的。”

缪敏咬着嘴唇不做答。

那个科长停了一下，突然单刀直入：“你与那两个男的是什么关系？”

缪敏好像想了一下：“哪两个男的？你问的是那两个邻居吗？从前不相识，来波阳住一个院子才认识，不晓得叫什么名字。”

那个科长又问：“你参加共产党了吧？”

这一着明显是诈问，缪敏想都不想，一口否认：“我一个学生仔，晓得什么是共产党。”

缪敏当时只有18岁，一副年轻的学生样。在单独提审刘玉姣时，刘玉姣也一口咬定，两个女孩子一个是自己的亲女儿，一个是干女儿，是个读书仔。敌人对缪敏没审出什么结果，就把她关在牢里。

黄镇中带回来的消息对方志敏如同晴天霹雳。毕竟这是自己的亲人啊，在那个年月里，抓住一个共产党的嫌疑分子，最便当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杀掉了。错杀一个老百姓如同不小心踩死一只蝼蛄。但如果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那可就是罪加一等，不免也要饱尝牢狱之苦。所以，国民党的官员们并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错杀误杀是常有的事。缪敏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闪动，这一下倒是如隔天涯了。

心里急，脸上并不肯露出许多痕迹来。方志敏极力镇静着自己，停了会儿方才问：“那么现在到底怎样了？”

黄镇中说：“被捕的第三天，林修杰与周菽菡就被杀害了。”说着，从口袋里掏了一份报纸递了过来，报角上有一则竖排消息：“11月18日波阳破获共匪秘密机关，捕获要犯两名，有事实证据，已执行枪决。”

方志敏心中一阵悲恸：国民党反动派不知枪杀了我们多少的同志。现在是天天在流血呀。

饭是吃不下去了，放下碗，心里沉甸甸的如同揣了一块铅。黄道也着急，指着报纸上那则简讯说：“就这么点点情况么？缪敏同志怎么没提到，她到底怎样了？”

黄镇中摇摇头，说：“就是缪敏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只晓得她被关押起来了。”

黄道直跺脚，说：“你说你办的这点事糊涂不糊涂？要紧的就是先要弄清楚情况嘛。是个什么罪名啊，有没有暴露身份啊，敌人打算怎么处置她，这些都要弄清才行。弄清了，我们才晓得下一步怎么走。”

黄镇中点点头说：“我是急糊涂了，一听到消息，头脑里就嗡的一下没了主意，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赶紧跑回来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再去一趟波阳，一定把事情弄清楚。”

方志敏叫住了他，但一时又无话。黄镇中立在那里等了一会，才听他说：“敌人没有杀缪敏，说明缪敏还不曾暴露身份，还有营救的希望。现在一是要弄清敌人是怎么看待她这个案子的，二是要想办法得到她被捕的口供，这样方能里外一致起来，免得说岔了。”说到这里，方志敏看着黄道又想了想，才慢慢他说，“我考虑先不要叫她家的人出面，家里人一焦急起来沉不住气，万一出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岔子，再搭进去一个不就更糟了？”

黄道着急地问：“那你说叫哪个去最合适？”

方志敏说：“缪敏有个同族同村的亲戚叫缪幼臣，在波阳城里做事，这个人同情我们，做事情也比较灵活，也认得一些人，我看找他比较行。”

黄道与黄镇中都觉得这个想法可以。于是方志敏要了笔墨铺开纸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缪幼臣的，写完未封口就交黄镇中带去，信里关照了具体事宜跟来人谈即可。另一封是用米汤写的。写在一张白纸上，干了就没有了字迹，到了收信人手里，用碘酒擦过，便显出字来。这个方法在当时用得比较广泛，后来被敌人破获了，受到了损失以后渐渐就用得少了。事情紧急，又怕夜长梦多，黄镇中藏好了信便连夜赶回波阳。

缪幼臣看了方志敏的信便跟黄镇中商量，黄镇中的意思是要弄清情况，第一步最好要见到她本人。缪幼臣说：“这也可以，我去试一试吧。”第二天买了点东西便找到县府牢狱里去了。缪幼臣借了熟人作幌子找到牢狱的看守，说要想见见缪敏。缪敏的身份并未暴露，只当作是个有嫌疑的女学生关押着。所以看守也不甚严密，又有很相识的人作保，也就同意了。不一会，缪敏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人倒未吃太大的苦头，只是脸色苍白，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显得更单薄、憔悴。缪幼臣喊了声：“妹子！”缪敏就哭了起来。

看守见他们俩一个哭一个叹气，也不耐烦，听听没趣就踱了出去。缪幼臣赶紧贴着缪敏的耳朵说：“老汪给你带信来了。叫我问你，你是怎么跟敌人说的？”

老汪是方志敏用的代名，缪敏也赶紧小声把审讯自己的情况简单扼要他说了说。

缪幼臣听了说：“这样说很好，千万别改口供。老汪叫你不要害怕，不

要着急，他们正想办法呢，来的人就住在我那里，等着你的口信就要赶回乡下去。你再委屈几天。”

缪敏点了点头，说：“你告诉老汪，可以叫我哥哥和我姐夫来，另外不要告诉我妈，她晓得了要急出毛病来的。”说罢，看见那个看守又踱了过来，连忙把缪幼臣递过来的一张字条掖在了衣襟里。

牢狱内外一通上话，明晓了彼此的情况，黄镇中和缪幼臣先松了口气，黄镇中连夜又奔乡下去了。缪幼臣隔三岔五地去探望缪敏。

缪敏情绪好多了，像吃了定心丸似的心里踏实了。回到牢房说关节疼，央求看守去买些碘酒来。看守也不疑其他，得了好处费，捎了一小瓶给缪敏。

缪敏一夜迷迷糊糊不敢睡得太沉，盼着天亮。因为只有天亮这一会儿，大家都在睡梦之中，无人走动，可以抽个空看那封信。

好不容易看到窗外微微有些发白，她便翻身坐起。不敢大意，又静心听听周围的动静。这个女牢并不大，也没有关几个人，看守把牢门锁了，廊上的铁门也锁了，自己揣了钥匙就靠在二道门上打瞌睡。四下里寂静无声。缪敏悄悄摸出小碘酒瓶子，倒在那张字条上，不一会儿，几行熟悉的字迹便清晰地显露出来。

信非常短，也没有署名，三句话三层意思。第一句是“按从前说的去做”，这个意思只有缪敏懂。从前他们商议过，每人自己都有一套公开身份，万一被捕就按公开身份去说，咬住口，不要轻易暴露自己，不可被敌人吓倒或骗住。这一条最重要，是能出狱的前提与基础。第二句话是“事情外面在做”。这意思也很明白，是指方志敏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工作，这是给了缪敏一个重要的行动信息，同时也是叫她放下心来，给她鼓气，组织上并没有将她忘记，正在竭尽全力营救。第三句话只有两个字：“保重”。笔划写得粗重，缪敏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只是两个字，她却从中读出来几百条内容，方志敏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全在这两个字里了。

自从黄镇中将牢里缪敏的情况带回来告诉方志敏后，黄道就一直劝他，务必应该去一趟葛溪缪家村，看望并且安慰一下缪敏的父母。方志敏想：于人情于道理，自己都应该跑一趟了，黄道提醒的对。

缪敏的本意是不要让父母晓得，老人做不了什么事反而伤心添愁，可是她哥哥缪镇东未能沉得住气。两个老人知道以后既悲恸又担心，赶紧催着缪镇东去波阳探监。

缪镇东到了波阳，通过熟人找到县衙的一位姓余的科长，请他代为疏通。姓余的科长审过缪敏，晓得这个案子不重，见家里人来求情，便狮子大张嘴，一开价就是400块光洋。民国27年间，在弋阳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年拼死拼活最多能挣60块光洋，月份钱不足六块。400块光洋，得干多少年才能挣足？余科长也是惯了，晓得一般犯事人的家中都急，只要把人救出来，卖房子卖地也干，所以他是丝毫不通融也不让价。这下缪镇东可就没了主意。

待到缪镇东又气又急地回到缪家村，正好赶上方志敏也来了。

方志敏第一次探望老丈人丈母娘，缪敏一家自然都很高兴，尤其是缪镇东。他晓得方志敏做过大官，这个妹婿不是一般的读书人，经手的钱也多，这下营救妹妹的钱也就有了着落。

他怕父母着急，没敢提赎金的事，只说见着缪敏了，情况还好。背转脸去他拉着方志敏说：“事情有了眉目了，只是人家要钱。”说着，伸出四个手指头来。

方志敏一看就明了，低着头不吭声。这事真的叫他为难了。

缪镇东见他久久不语，一点也不爽气，脸上就先有了不悦，问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倒先说出来听听，我妹妹是你婆娘，你总不能撂开手不管吧？”

方志敏说：“我要是不管，我到缪家村来做什么？”

缪镇东很焦急地问：“那你有主意了？到哪里去筹钱？”

方志敏摇摇头说：“我们也很困难，哪能拿出这许多的钱去填塞那些贪官污吏呢？”

缪镇东说：“妹婿，你一直在做共产党的官，穷是穷了点，可经手的钱还是有的。如今为了救人，用一点也是应该的。我妹妹不光是你的婆娘，她还是共产党的人呀，从这层意思上说，你动用点钱来救她也是可以的。”

已经不是一次了，每每说到钱，方志敏就发愁，不晓得为这个劳神的东西得罪了多少亲戚和乡亲。说什么的都有：“官做大了，眼光搭了架子啦！”“小气啦，一毛不拔！”方志敏苦口婆心地给人们解释，但是你不肯拿出钱来，总是有人不高兴。方志敏就觉得钱这东西真是讨厌得很。但始终也不肯让步，苏维埃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肯放到自己口袋里。

可是现在怎么办？缪镇东说的有道理。论公，缪敏是共产党的人，自然是应该救；论私，缪敏是自己的婆娘，救人是自然的。可这许多的钱从何而来呢？

方志敏说：“我们的经费也是拮据得很，40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若是能筹集到这许多钱，那能留作大用处。”

缪镇东一听这话就不对味，顶着说：“你的意思我晓得了，就是有钱，也要用在你的革命上，不好用在救我妹妹上，是吗？”

方志敏耐心他说：“你听我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缪敏被捕已经快一个月了，我们探得的消息也是她始终没有暴露，否则你就是拿了400块光洋去，人也赎不出来。所以眼下看，性命危险是不大的，只是人多吃几日苦头。再说，你细想想，你家里的境况，就是卖房子卖地，能一下子掏出400块光洋吗？倘若在这个问题上敌人起了疑心，搭了钱不说，人还是救不出来。所以，还得另想办法。”

缪镇东心想这个妹婿怎么这么铁石心肠，无情无义的？怎么说都不通融，便冲动他说：“我也算看透你了！看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气呼呼地甩手走了。

下半日，缪镇东一直不怎么搭理这位头一回上门的妹婿。夜里一觉醒来，看见方志敏还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东西，忍不住问了一句：“做什么还不困？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了么？”

方志敏点点头，等疾笔写完最后几句话，这才笑嘻嘻地回转身来对缪镇东说：“自然是好办法，我这不是正在写信么？”

缪镇东哼了一声，说：“一封信不值二钱重，哪里抵得上400块光洋！”

方志敏晃了一下手中的信说：“抵得、抵得，我说抵得就抵得，而且还有富余呢。”

缪镇东将信将疑地坐了起来，问道：“究竟怎么搞？一天到晚跟说谜似的。”

“你莫急火。”方志敏解释给缪镇东听，“我有一个朋友，姓王，是波阳县城里有名的绅士，虽然有钱有势，倒还同情革命，人挺正派的，尤其很

信任很欣赏我。你带着我的信去找他，请他去疏通，我的面子他是肯给的，而他的面子，县衙门也是要给的。这不比400块光洋抵事？不过有一条，因为这是签了我的名的信，所以一定不能丢失，落到敌人手里，就要出大的纰漏了。”

缪镇东兴奋得一下子困意全无。方志敏又问：“缪敏还有个姐夫在外面做事吧？”

缪镇东点头说：“是，叫汪辉昌，在九江洋行里做事，平时很少往来。”

方志敏想了一下说：“也得去找他。这帮子卖国党顶吃洋行这一套。看在你姐姐的面上，他不会不照应吧？我们双管齐下，把握就更大了。”

缪镇东藏好了方志敏的亲笔信，第二天就奔波阳去了。九江那头汪辉昌也出了面，到波阳县里找到这个姓余的科长，请他吃了一顿饭。王先生的面子很大，姓余的不好再提赎金，只得放人。汪辉昌早已雇好船，来接被关押了48天的缪敏回家。缪敏上船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打开那只失而复得的小藤箱，取出那封信来，蹲在船头上把它烧掉。

缪敏跟着姐夫回家，心里又有一层担心。自己和方志敏结婚，是很时髦的自由恋爱，家里并不知晓。一个女孩子家在那种年代敢自己作主嫁人，不晓得要招来多少责骂与白眼。自己的父母虽不是那种一点不通情达理的人，但女儿结婚也不能算是个小事情。真不晓得自家爹妈会怎么看。再者，这次被捕入狱，不晓得家里人要怎样地担惊受怕，也不晓得会不会为此就反对自己做革命工作呢？心里七上八下，几种念头交织在一起，结果是又嫌船走得快，又嫌船走得慢。

方志敏因为忙于农民暴动，在缪家村老丈人家没住上几天就赶回去了。所以缪敏回家并没有见上他。倒是看见自己爹妈又惊又喜地迎上来，说：“哎呀，敏儿你晚了一步，正鹄昨日刚走，可惜没能碰上一面哩。”

哥哥缪镇东跟在后面赞不绝口：“妹妹好眼力，我这个女婿能耐大得很哪！”

缪家对这个女婿真是很满意，有学问又有能耐，尤其是“一封书信抵400块光洋”的事，让缪镇东心服口服，回来一学给爹娘听，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也都高兴异常。缪敏看到爹娘喜形于色的样子，晓得家里不但对自己的婚事没有异议，而且还非常赞同，也就放心了。后来缪敏到了瑛山的张家村，见到方志敏，曾悄悄地问丈夫：“你是用什么办法把自己姆妈哄得那般满意的？”方志敏打趣说：“这不用哄，老话就是这样说的嘛：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我又不少胳膊不少腿，你姆妈怎么会不开心？”缪敏自然很高兴，红着脸说：“你做什么事都蛮有一套的，连哄我姆妈都很在行呢。”

第十二章

苦不堪言的中国农民实在没有路走，便去“造反”。方志敏在楼底蓝村跟农民们算了一笔账。方志敏笑道：这番才晓得，吴先民在外边讲民主，在家里不民主。黄道成了“陈郎中”。一个尖细的女人嗓子大喝了一声：都给我退出去。邵式平送了两句话给刘渗：感觉上要敏感一点，行动上要迟缓一点。

搞农民运动，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发动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说起来只是一句话，做起来却要难得很。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与文化积淀塑成了中国农民的复杂性，使得他们既勤奋又懒惰，既豪爽又自私，既精明又愚昧，既勇敢又胆怯，既善良又粗暴，既仗义又势利，既随和又固执，既合群又孤僻，既踏实又浮躁，既自有主见又宜盲目行事……所有的词汇在农民身上都能找到几分痕迹。但有一点是几千年来始终未曾改变过的，便是农民的生活终年是苦不堪言。大凡有了一点出路或有了一点钱的人，没有几个是乐意再去做农民的。

到了民国时期，农民的肩上更扛上了田赋、地租、灾荒等好几副重担。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经载文述说农民情况：

在许多地方正勒令佃户直接完税。汉中的贫农尽

管将收获尽数出卖，所得的进款还不够抵作税捐。当地一带好一点的水田，一年虽可收两熟，但收入的总数每亩不过五元，而田赋正税的负担普遍每亩倒要去了二

元。杂派和兵差每亩还要摊到四五元或七八元不等。一般农民断然无力可以长久地支持这亏本的事业。他们

最初出售田地，再则变卖什物，继而典卖房屋，无非为应付税捐以苟延残喘。随后田地无人过问，举地赠人且无人能要，房屋什物又无人肯买，贫农只得弃地不耕，卖儿女以作逃亡的费用。结果逃户应摊到的税捐还是

分配与未逃亡的农民，昔日仨人担负的，现在变为俩人的负担。因此更加催促了未逃的人家早日出走。

可以读出一幅血泪交织的离乡背井图。

再来看弋阳一带的地租。据民国 25 年的《江西年鉴》载：“上等田四六分成或三七分成。”即地主得六成或七成，佃户得四成或三成。中、下等田多系对半分成。地主只管出租土地，种子、农具、肥料等各种生产所需资料也是由佃户负担。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上一年，要被地主拿去一半以上的收成，再刨掉杂七杂八的费用，能真正落到手中的所剩无几。漆工地区有个贫农叫金化文的，因为“穷”，上了《弋阳县志》：“由于拿不出押金，只好打长工，全年工资 15 块银元，当时一块五元买一担谷，金一家五口，靠十担谷不能维持一年吃食，不得不借支来年工资，加上利息，过着寅吃卯粮的困苦生活。”县志又载：“由于粮食控制在地主豪绅手中，每到春、夏荒季，农民只得‘卖春’，忍受春、夏借一担，秋后还两担甚至三担的高利贷剥削，因而流传着‘禾镰刀挂上壁，饭就没得吃’的民谚。”

越来越沉重的田赋与地租，再加上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使得农民的生

活状况越来越恶化。当时上海的《申报》曾这样描述灾区：

灾祸频仍，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已绝。迨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人民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各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产生水藻之处，均有主营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要售二百文之多。更有甚者，某家乏食数日，小儿饥甚，啼哭索食，其母被儿逼缠不已，竟以泥做成饼形，持以给儿，希减其哭，亦云惨点。当时所见的灾民，忍饿既久，则鸠形骨立，偶一晕倒，口中必流清水而死。灾区既广，死之相继，尸体横野无人掩埋。

已是近山穷水尽之时，政府又来凑热闹。举一例：当时的宝鸡地区因灾患频仍，社会经济完全破产，政权复操之于军人之手，勒派款项，民不堪命，于是写了份恳请省政当局救济灾荒、制止派款的呈文，“兹录其呈陕省主席杨虎城呈”，摘原文如下：

……自十八年以来，四载奇授，八料未收，迄于今日，元气损伤，生机断绝，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饥民流离载道，日见死亡，悲惨之状，目不忍睹。然当求生不得，救死不暇之际，县府又将去年银行股东、契约登记、库券等各项尾欠，并本年白地烟款，以及重派田赋借款，并总约十余万元，严令各乡各里限期交纳。又以地方灾情过重，各款催收，供不应求，即将总部暨风翔绥靖部并张古曹各团提款副官、军需、护兵、马弁不下数十人，拨给各区各里，纷纷下乡催收，以致乡民畏威惊忧，迁徙流亡，日益见多，处处门户封锁，村村井灶无烟，凄凉景象，不堪言状。县府催粮催款之威严，真同人间地狱。每当更深夜静，县府会计老爷暨各副军、军需、法官会比，兵士法警数行林立，乡民木枷铁链，蜂拥堂下，人人荆棘，面带愁容，怨气所聚，烛焰色缘，竹板皮鞭，任意乱打，泪珠血点，滴地成斑，哀痛之声，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恐阎罗殿前无此惨凄也。……况时值隆冬严寒，饥既无食，寒更无衣，无亲可投，无家可投，各项派款又不因灾民而稍宽减，拆房变产，苦无受主，质儿鬻儿，不值一文，哀我灾黎，不死于饥寒，既死于款项。一口气读下来，有透不上气来的感觉。

活不下去，便卖农具、卖家产、卖房屋、卖田地，只要能卖的，无一不可变卖。卖到最后二穷二白了，便卖人。卖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举一例：当时绥远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周君有份实地调查报告，原文称：

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综计包头县共卖出三万余口，固阳县共卖出五千余口，萨县共卖出一万余口，武川县共卖出八千余口，归绥县共卖出五千余口，其他各县，均各卖出二千余口不等，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

各地农民如此，江西弋阳、横峰一带也没有例外。苦不堪言的重担像座山压迫着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又企图另寻出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寻来寻去只有一条路摆在了农民面前，便是“造反”

说起造反，农民们的心思又不整齐。方志敏他们分头下去做农民工作，自然是也没有少碰钉子。

江西的11月份，已是初冬了，气候变得阴潮湿冷。就是晴日里出个太阳，也是懒洋洋地打不起一点精神来。入了冬，田里的农活已所剩无几，年景收成不好，打短工的人家也少了许多。为了省粮食，许多穷苦人家一日只喝两顿掺杂了番薯、苦麦、豆子和野菜的糊糊，勉强捱日脚。横峰县农村的经济衰败，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贫困和痛苦，比起弋阳来，也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对于当时横峰的情况，方志敏在后来他的遗著中曾经有过一段描述：

正当大革命失败之后，横峰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都受到反革命相当的打击，有的罚过款，有的才从福建逃回家来，情绪不免低落了一些。而且我们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又没有前例可见，究竟做到做不到，不免引起群众的怀疑。他们说：“欠债主佬的债，会让我们平了吗？地主佬的田，会让我们分了吗？靠得住做到吗？”有的还说：“你是不是有谕子来的？没有谕子来，就是犯法的。”

从中可以透析出方志敏、黄道他们开展工作的难处来了。

方志敏到横峰后，黄道立即在打石坞召集人员开了个横峰的党员会议，把党员邹秀峰、程伯谦、黄球、黄端喜、钱壁、项春福、黄怀仁等人一一介绍给方志敏。这里头多数是相熟的，少数几个也是早已知名只是没有机会谋面罢了。经过这番劫后余生又能凑到一起，真是既兴奋又鼓舞。程伯谦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悄悄用衣襟擦掉，握着方志敏的手不肯放松，说：“志敏，反动派既然没能把我们斩尽杀绝，我们就要照你说的重头再来干，倒要看看最后是谁把谁给消灭掉！”

大刀黄球说：“方主席，你就是带头人，你说怎么做，我们就去怎么做。路再难也要走下去，种田人嘛，要别的只有两手空空，要命倒有一条！”

邹秀峰说：“我觉着又有目标又有干头了，前些日子找不到党的时候心里空落落地一劲发慌。现在又轮到咱们抄胳膊卷袖子地大干一场了！”

黄道拍拍方志敏的肩头说：“看见没有，我们横峰县的党员劲头足得很，个个是好样儿的，你就领着大家齐心干吧。我也放心了，我明天就到弋阳九区你的老家去，咱们一起发动农民，早日把暴动搞成功。”

会后的第二天，方志敏就装扮成一个走村串乡的货郎，挑着一副杂货担子到楼底蓝家去找黄道交代过的农运骨干花春山去了。

楼底蓝家，是楼底和蓝子坂两个毗邻小村的总称，这一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山村紧挨着弋阳县境。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黄道就在姚家垅、楼底蓝家这一带活动。1927年春末夏初，楼底蓝家村的农民自卫军曾经配合姚家垅的农民群众，参加了三打横峰县的战斗。所以，在这个地区有一批积极敢干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群众基础相对来说也好一些。但是，方志敏后来才感觉到，大革命失败留下的后遗症也波及到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

花春山早已得了讯儿，说县里有个领导要来，让他作点准备。会是谁呢？花春山和另外两个农运骨干蓝长金、蓝高茂聚在一起猜测了半天，也有猜出个名堂来。一连几天，他有事无事总到村口去转，眼巴巴地看着那条窄而长的山路，仿佛要一直看到尽头，但还是没瞧见个人影。

这天过了午，花春山挑着一副拾粪的筐子又到村口来了，远远地看见山路上走过来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近了看，这位货郎一顶半旧的绒帽戴在头上，也是半旧的灰布长袍在腰上掖住了一只角，一双鞋风尘仆仆，一看便是走了远道的人。

花春山看他，他也打量花春山。俩人不约而同地问：“唉，你是……”又不约而同地止住了口。尔后，俩人都笑了起来。

还是货郎先问：“老表可是姓花？”

花春山连忙答应：“是，是！”心里也认定了没错，这个货郎一定就是县里派来的领导了，所以赶紧指着自已又加了一句，“我叫花春山。”

打扮成货郎的方志敏也笑了，说：“我叫汪祖海，给你送点

货。”

花春山连忙接过担子，领着方志敏回自己的破草屋。

进了门，方志敏摘下帽子，笑眯眯地看着花春山说：“花春山同志，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志敏，汪祖海是我用的化名，这个情况也应该告诉你。”

花春山压根儿没想到会是方志敏来。在江西地区，方志敏这个名字，谁人不知晓？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远近闻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呀！花春山一时激动得不知怎么办好了，寻了一个粗瓷碗，激动地用巴掌擦抹了一下碗边的灰，倒了碗白水恭恭敬敬地端了过来。

方志敏连忙伸出双手接过，微笑着说：“春山，千万莫把我当客人，我是要住在你这个屋里的，这下既是同志又是兄弟了，莫客气才是真的。你坐下，说说你这里的情况。”

说到村里的状况，花春山就深深地叹了口气，一只手伤心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说：“哎，莫提了，现在不同从前了，什么都散了，农民协会散了，农民自卫军也散了，人心也散了。做田人不信革命了，骨干怕出头了，党员也不晓得怎样做了。老汪，你来了我就定心多了，你给我们说说，怎样做才好？”

方志敏点点头，沉思了一下问：“现在还有几个靠得住的骨干呢？”

花春山想了想说：“蓝长金、蓝高茂都是靠得住的，只是太少了。”

方志敏说：“不少了，你们三个就是三颗火种哩，再点燃三颗就有了六颗，六颗再点燃六颗就有了十二颗，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就成了燎原之势了。你去把他们找来，我们一起议事。”

蓝长金、蓝高茂住的地方不远，一叫都来了。方志敏和他们几个一起，首先把村里农民们的情况分析了一遍，给农民们作了个排队。最穷最苦、欠租欠债最多的排在第一队；也欠租债但勉强能维持的排在第二队；不欠租债靠自己能生活下去的排在第三队；靠收租债吃现成饭的排在第四队。排了队下来一看，全村几乎没有不欠租欠债的。

方志敏说：“我们就先从第一队开始做宣传。有顾虑不当紧，要告诉他们，世道总是要变的，先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

方志敏踏进了一户户低矮破旧的贫苦农民的茅草屋，在昏暗如豆的油灯下，和农民们摆开了老话。

方志敏问：“家里有几口人？种几多的田地？背不背债？”

农民们答：“我家吃口多，种的都是租来的客田，年成不好租又重，自然是要驮债。”

方志敏说：“一年一年驮下去，总也没个完了的时候，驮得不是越来越重吗？”

农民们叹息着：“有办法，穷人就是这条穷命，慢慢还吧，这辈子还不清，还有下辈子。”

方志敏问：“不想过舒但日子？不能让子子孙孙都永不负债？自耕自种，自收自用吗？”

农民迷惘着眼睛看方志敏：“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想都不敢去想啊。”

方志敏说：“这种好日子，就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租不能交，债不能还，地主的土地一定要拿过来分。”

农民似信非信地问：“租田交租，是几百年的规矩，破的么？”

方志敏是摸熟了做田的事，于是就帮他们扳着手指头算细账，算完之后说：“看见了嘛？佃一亩田来种，每年要亏一块到两块大洋。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分下来什么都没有得到还背了一屁股的债。这叫什么规矩？这种规矩要是不破，穷人还能有活路么？”

农民又将信将疑地问：“晓得了，你说的这个话，从前也说过，叫‘平债分田’。话是好话，可就是行不通呀。前一阵子平了债，现在又一切照旧了，而且要把免去的债统统翻借补上，我们更苦了。”

方志敏点点头说：“是，做田人更苦了，如果还不思变，那就只能一直苦下去。如果齐起心合起力来重新来过，总有一天我们要做成的。”

农民们有点动心了，又问：“就你一个人，怎么见得能做成？”

方志敏笑着说：“就楼底蓝家村也不止我一个人呢。你算算看，村子里是财主多还是佃户多？”

农民说：“自然是农民佃户多，这还用来问。”

方志敏说：“我们的人，全县、全省、全国到处都在，几个地主老财哪里是对手？要是先打心里胆怯了，怎么敢去跟地主老财斗？我们自己先鼓起劲头，拧成一条粗绳子，准能拉得过我们？所以，平债分田要搞，也一定能搞赢，革命也一定能成功。天下也一定得由我们穷苦人来坐。”

方志敏的话像是在柴堆上点燃了一星火种，给穷苦农民干涩枯苦的心田里浇灌了一汪注满活力的清泉水。农民们渐渐开始振奋了，说：“老汪，你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去叫别人也来听你讲。”

就这样，开始了滚雪球，农民们“你邀鸡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来听道理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几日，花春山兴奋地对方志敏说：“老汪，按暴动计划，30人以上结一个革命团。我们现在34人啦，我们可以结团了！”

结团要搞一个形式，农民们是很看重这个形式的。所以，必须把这个形式搞得庄重严肃。一般都是采取了喝鸡血、上名字的做法。

结团的屋里，要点上一对红蜡烛，烧起三炷香，一张大红纸上端端正正地写着结团的34个农民的名字。一坛酒是早就预备下了，旁边放着一只粗瓷海碗，喝鸡血用的大公鸡也早就缚得牢牢地塞在桌角下了。

34个人在地上挤挤地站了一屋。

方志敏环顾了一下，开口问道：“有铜板用，借财主佬债的，有几个？请举手！”

34个人的手一起举了起来。

方志敏又问：“自家有田做，要向财主佬佃田交租的，有几个？再请举手！”

依旧是34只粗黑的手又齐齐地举了起来。

“好！再问最后一句，”方志敏略略抬高了声音，“赞成平债分田的，请举手！”

话音未落，34只手再一次举起来。蓝长金性急，插嘴说：“怎么能不赞成，再也不能吃地主老财的恶亏了！”

问毕就一个接一个走到前面来宣誓，跟着方志敏念：“斗争到底，永不变心！”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然后，在红纸的名单上很认真神圣地画押上自己的手印。蓝长金把大公鸡宰了，将鸡血滴到那只大海碗里，兑上酒，每人轮流喝一口，这就算喝鸡血酒宣誓了。然后，编班排，选团长、

委员。楼底蓝家的农民革命团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在给农民组织起名字的时候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对于原先的称呼“农民协会军”，方志敏觉得弄腻了，人家一听就容易联想致大革命中农民协会失败的惨状。于是想了许多名字。最后定下来叫农民革命团，又响亮又气魄，大家都说好，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喊叫“革命”。

有了这个基点，再用“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新团”的办法，伸出网络去，四周村庄的农民革命团也紧跟着一批批地组织起来。于是，方志敏带了几个农民革命团的骨干从楼底蓝家村抽出身来，到各地去检查组织发动情况。带农民骨干出来，主要是为了言传身教，教会这些朴实简单的农民们掌握做群众工作的办法，使他们能尽快地独当一面，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再去宣传组织群众。

到了青板桥，这一带是分工给吴先民负责的。现在，他也弄了个代名叫薛子廷。青板桥是他的老家，人缘熟透，局面打开的也比较顺利。晚上方志敏住在吴先民家里。刚刚躺下，隔着木板墙就听见吴先民夫妻两个小声地在争执什么。恐怕是怕吵着别人，所以都使劲地压抑着喉咙，可是情绪都似乎挺激烈。吵着吵着，周嫦娥嚤嚤地抽泣了起来。

人家夫妻吵吵嘴，方志敏本不想过问，可是到了这一刻，再装聋作哑就不成道理了。于是他披上衣服敲敲木板墙，小声地问：“怎么弄的？先民，欺负婆娘了？”隔壁吴先民一声不吭，周嫦娥听见方志敏过问，起身把门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方主席，你来主持个公道，难道是我错？”

其实起因并不复杂，就是吴先民自作主张，瞒着周嫦娥把自己惟一的一件皮褂卖掉了。不过在周嫦娥家里，这件皮褂子就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

周嫦娥说：“还说男女平等哩，做哪样事也不同我讲。家里就这么一点值钱的东西，样样要拿去卖了，还过不过日子？卖的钱呢？一文也不曾见到过。这些都不要去说它，穷日子也好苦日子也罢，我总归跟你过就是了，我可曾说过一句二话？要紧的是眼看就到年底了，天气是越来越冷，这个关口上你把皮褂卖了，冬天穿什么？这件皮褂子还是祖上留传下来的，一直藏着，为的就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时候它好挡风御寒。你说你要是冻得爬不起来了，还怎么去做革命团的事？方主席，你来说说看，我是那种不懂道理的人么？为了你革命，我和品秀还被抓去坐回牢。这件皮褂子的事也是心疼你，倒反过来说我头发长、见识短。”周嫦娥一口气说了一大篇，说着说着自个儿又委屈地流起眼泪。

吴先民不耐烦，打断她的话说：“鸡同鸭讲，讲也讲不清爽。同你讲，你肯答应么？”又转过脸来对方志敏说，“志敏兄，莫听她啰嗦，好晚了，歇息吧。哎，女人的事，乱麻一团，哭一阵就会好，眼泪是水，过一阵子要放一点出来才肯作罢。”

方志敏笑得肚子都痛，过了好一阵才缓过气来说：“看来，吴先民只晓得在外边讲民主，在家里不民主。”

周嫦娥立刻止住了哭，响应道：“是呀，是呀，他什么都不同我讲，就是一点没有民主。”

吴先民小声地顶她：“你晓得什么叫民主？猪鼻孔里插根大葱，装得像！什么也不懂！”

眼看两个人又要顶撞起来，方志敏赶紧制止，很严肃地问吴先民：“为

啥想起来要卖皮褂子，卖了皮褂子做什么用去？”

吴先民怔怔地看了一会方志敏，叹了口气说：“你要不问，我也不想说的。要不说出用处来，这个婆娘又不饶。唉，我拿它去买了花枪、鸟铳了，要想暴动起事，农民手中没有武器可不行，这是最最关紧的事。”

这一番轮到方志敏不知说什么好了，心里头一阵一阵地翻热浪。多好的同志，为了革命什么都舍得，革命，焉有不成功之理？

方志敏没有再说话，默默地站起身，走回自己睡觉的屋子，从一个小布口袋里取出了几块光洋，交到吴先民的手上。吴先民刚想说点什么，方志敏板着脸孔严肃地说：“明天去把它赎回来。这是命令！”

离开青板桥后，又到姚家垅、葛源，一路看来，发展得相当有成绩，已经形成了一片不小的区域。

黄道在弋阳九区的工作也颇有成效。因为家里有间中药铺，耳闻目睹，黄道也学了一些医道皮毛，也能给人看治一些简单的病症。所以他就拿这个作掩护，一边给农民们看病，一边做鼓动宣传的工作。

上背村有个农民叫田长秋，家里穷得锅灶冰冰冷，没有什么能吃的可拿来煮的。一个细伢儿两岁多了还不会走路，瘦得像个麻杆，因为饿，哭闹得厉害，连夜里也闹哭，婆娘就埋怨田长秋。急得田长秋没有办法，趁着大麻亮跑到村里一家富裕财主的地头挖了半筐番薯。他以为是无人看见，不想刚下过雨，地下留下了一串串泥乎乎脚印。这个财主带了几个打手寻上门来，田长秋家灶锅里正煮着那半筐番薯，婆娘拿着一块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在喂细伢儿。堵了个正着，自然是一顿饱打，结果把个腿给打坏了。田长秋不能劳作干活，家里更是连一粒米也找不来，连老鼠都搬到别人家去了。婆娘拖着三个细崽回了娘家找口饭吃。

黄道晓得了，主动上门去给他看腿，弄了点松节油使劲来回搓，搓到骨头里发热，田长秋觉得腿好像轻松些了，对黄道真是感激不尽。黄道弄了个化名叫“陈松寿”，田长秋就管他称作“陈先生”。

田长秋说：“陈先生，多谢你还来替我看腿，我是个贼呢，名声不好，虽说是只偷了一回，这个帽子戴上就永世也摘不掉了。”

黄道明知故问：“只想问你一句，做什么要去偷？”

田长秋惨笑一下说：“没得吃啦，每年都是把青苗押出去换米，连押了三年，一年接不上一年，人家看我总也还不上，再也不肯押，连田也不肯佃我，没有路可走，只有去偷。”

黄道很诚恳地说：“兄弟，这步路走错了，但这不是你的错，是地主老财们的错，是他们不肯把田佃租出来给你，断了你的生路。春苗还长在地里就押了出去，等秋后收上庄稼，连本带利自己是一颗也剩不下。所以，田是最要紧的，农民没有田，等于没有活路。”

田长秋听得很认真，这里边来来去去的缘由，他从来也不曾细想过，总认为自己大生就是这种苦命。听黄道这样一说，一是觉得新鲜，二是觉得有道理。

黄道如同春蚕剥丝般循序渐进：“晓得了为什么穷，下面就该想想怎么办。偷，哪里是个办法？你总不能偷一辈子吧，你家没得田，儿孙们怎么弄？把副偷手传给他们么？”

田长秋直摇头直叹气：“只要是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去走这条不光彩的道。莫提了。陈先生，你给说个办法出来吧。”

黄道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还要造反，要造地主老财的反，要把田分了，把债平了，把我们穷人的负担给解决了。穷人有了自己的田，日子才能好过。所以，打倒土豪分田地，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要紧之处。穷人想过好日脚，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田长秋说：“哎，你说的是不是农民协会呀，以前不是搞过么，后来又败了？”

黄道说：“农民的人都在，怎么能叫败？这件事要是好做，不是几百年前就做成了么？因为农民受地主压迫几百年，造反也造了几百年了。地主老财能轻而易举地把田让出来么？这也是他们的聚宝盆，也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他们最怕最恨的就是农民造反，一有造反，他们就要拼命去镇压，保住这只聚宝盆和命根子。这就要斗争呀。”

田长秋犹豫地问：“我们能赢么？”

“能赢！”黄道非常肯定地说，“世道总是要变的，你看，闹民国，闹三民主义，军阀不是被打跑了么？没有什么打不倒的东西，凡是不合理的东西，统统都要被粉碎！”

田长秋听得心服口服，一瘸一拐地找穷苦农民串联去了。本来弋阳九区的群众基础就比较好，所以农民革命团也就像雨后春笋般地一堆一堆组织起来了。

但是邵式平在弋阳七区却受到了挫折。

七区有好几大族，其中有一族姓邵，还有一族姓汪，曾经为了几亩山地的事与九区的农民闹纠纷，已经好多年了，经常发生械斗，双方都吃了一些亏。本来都是穷，这一闹穷是不必说了，还团结不起来。邵式平到了邵家畈，晚上住在家里，白天就回乡去做工作。开始工作还算顺利，不料隔了几天，夜里邵式平刚刚到家，就听得有人敲门，敲的是又急又重。开门一看，是汪家畈的农民积极分子汪水龙。他跑得满头冒热气。

汪水龙急急地叫邵式平的化名，说：“老余，老余，快点离开这里，汪家畈的汪祖头带了百多人往这边来了。”

邵式平连忙问：“都是些什么人？”

汪水龙说：“汪祖头是祠族里边的，家里有些田，吃穿也不用发愁。族长一发号令，他就去跑动，找了一帮人，凶得很。难就难在这一帮人里边，有不少是平平常常的做田人，你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找我一起去，说要找你算账，我找了个由头就先跑出来了。你先准备一下快躲一躲吧，来者不善。我还要跑回去，和他们碰上面也不好。”

汪水龙急急忙忙趁着黑夜又走了。邵式平想，宣传农民的事本来简单，祠族一掺进来就会弄复杂了。农民在乡里，祠族是很有影响的，一般大的事情都由祠族来定，一姓一族。有困难有事情也都习惯让祠族来解决，农民再贫苦，祠族的观念与烙印却非常深刻。地主豪绅们也常常用了本家姓或祠族的法宝来左右农民。处理这种事也须得更加小心才是。

谁知今夜这帮人来得这么快，还未容邵式平想个透彻，门外已经脚步纷乱，呼呼啦啦地显出人群的影子了。

胡德兰这几日也在邵家畈住着，帮邵式平一道开展工作。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打门，脸色便显得紧张起来，叫邵式平不如先避开一下风头。

邵式平的脸色异常凝重，两道眉毛拧在一起，咬紧嘴唇想了几秒，说：“此时是走不脱了，不如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来意。你要是躲起来，他们只

怕就更有了理。这样，你到屋里去，没有事千万不要出来，外头我来。”

胡德兰转身进里屋去了，一颗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竖着耳朵贴在木板墙上听着外屋的动静。

邵式平镇定了一下自己，走过去把那扇差不多已快要被敲散了的门打开。一拨门栓，人就呼啦一下拥进来，把个不大的堂屋占上了一半多，这帮人还带着不少土造的棍棒，一些进不来的就挤在门外探头伸脑地张望。

人是进来了，却都不做声，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又盯着邵式平看。邵式平反倒有点奇怪，先开口问道：“你们是哪个乡的？要找谁？有什么事？”

人堆里有人就喊：“汪祖头！出来跟他搭话，我们要跟他算账！”

汪祖头从人堆中钻到了前面，两只胡桃眼饱鼓鼓地透着凶气，伸手就指着邵式平说：“姓邵的，我们就是找你来的！你存的什么心，吃家饭屙野屎，人在邵家畝，却去帮着九区的人说话。你又跑到这里来闹事，想把七区给搅乎成糨糊糊，想害我们七区的人才是真！我们早就得了消息，你和九区人结伙，实际上是要来造我们七区人的反，要革我们七区人的命！想分了七区的田给九区人种！”

人群开始骚乱起来，有的人就喊：“让他们九区把田拿点出来给我们也一样嘛！是不是？”人群中零三落四地就有人响应：“是呀，要分去分他们的田！”

邵式平大声地说：“分田平债，不是哪个区与哪个区的事！是穷人与财主之间的事！九区有田，七区也有田，但这田都不是穷苦农民的，都是地主老财的，分田就是要分地主老财的田！”

汪祖头对着大家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姓邵的还在帮着九区人说话！”又转过脸来冲着邵式平，差不多快要把鼻子抵到邵式平的下巴上了，“就算你们姓邵的答应，我们大汪家也不能答应！你是七区人的叛徒逆种，没有什么好理论的，今朝就是要把你赶出去！”

堂屋里的局势已经弄不住了，人群涌动，根本不肯听邵式平讲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了。汪祖头手起棒落，咣当一声，就开始砸起桌子板凳，屋里乱了。邵式平不经意胳膊上已经挨了两下子，被逼到了屋角。

正在此时，就听见一个尖细的女人嗓子大喝了一声：“都给我退出去！”

大家不由得一怔，手上的动作倒是不由自主地停下来。邵式平也一愣，循声看去，里屋的门开了，胡德兰双手握着一支叫不出名字来的旧长枪，横眉立目地站在门口。

看见枪，大家都怔住了。胡德兰端起枪，杀气腾腾地说：“汪祖头，枪你怕不怕？死你怕不怕？不怕就好！今朝叫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说着就瞄汪祖头。

汪祖头反应极快，看见黑洞洞的枪口朝着自己来了，“嗷”地一声，用力扒开人群就蹿了出去，跑得飞快，天黑也看不清路，连连摔了几个跟头，还是跑掉了。

胡德兰喝道：“还有谁来？”

领头的人已经跑了，这些找来的人多半也是乌合之众，一看那枝枪恐惧非常地在自己头上移来移去找目标，一下都呆了眼。人群呼啦一下就散开了，转眼之间屋里跑得一个人也没剩下。只留下邵式平和胡德兰两个人立在一堆碎物狼藉之中。

胡德兰“妈呀”一声就把那枝破枪给扔了出去，一屁股坐在地上，不住

地喘着气揉胸口。邵式平走过去捡起枪来，拉开枪栓看了看，说：“你好胆大，这根枪连个撞针也没有的，我是把它塞在床脚下了，你如何寻到的？”

紧张过后，胡德兰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又转红，身子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邵式平把她扶起来，拉过一张长凳坐下，这才缓过精神，说：“我哪里晓得是根好枪还是破枪？我也没有子弹，也拉不开这枪栓，只是想把他们吓走就是了。”邵式平说：“结果把自己也吓得不轻呢。”

胡德兰点点头：“真是后怕，这帮人要真闹起来，一枝枪是挡不住的，何况还是枝破枪呢。”

为了防止这帮人再来寻事，邵式平不得不转换了好几个地方。打开局面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邵式平在做另一桩事上却有了效果，这一效果后来发挥了很大作用，给暴动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当时在弋阳与横峰的县城里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驻军，县政府靠几十名自己搜罗组织的地方武装警察维持负责保安。只有在与之彼邻的铅山县河口镇上驻着国民党的八十三团。如果弋阳、横峰出了情况，八十三团要赶过来制止镇压，也不过就是半天不到的路程。所以这一个团摆在那里是一石三鸟，对弋、横两县的农民暴动运动威胁很大。

不过八十三团有个指导员叫刘渗，读过书，参加过北伐，崇拜敬仰孙中山先生，也同情共产党人。有了这么个背景，就有了沟通的基础。

邵式平与刘渗原来在南昌也是认识的，互相仰慕人品，谈得也十分投机。只是这近一年里风云变幻莫测，互相之间断了许久的音讯，有点不太摸底了。

邵式平想，这一步棋再险也要走，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反动，做好了这个团的工作，就等于给即将起事的农民暴动加了一把保险锁。

这一日，邵式平穿上了一件藏青蓝的条纹布长衫，走到河口镇外，从包袱皮里掏出双布鞋来，将脚上走长路穿着的草鞋换下。打扮得像个教书先生，便找到了八十三团的驻地。刘渗果然在，见邵式平来，颇感到意外。一边接他进屋一边问：“守一兄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邵式平晓得他人比较直爽，所以也不绕圈子直接开口道：“老弟，实不相瞒，今天是有求于弟啊，所以来了。”刘渗挥了挥手，让进来倒茶待客的卫兵出去，这才说：“事情小你是不会来，事情分量轻你也是不会来的。你的这个事，弄不好不丢脑袋就要丢官。”

邵式平笑他果然聪明，说：“你把什么都说破了，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你说了。”

刘渗也笑了，说：“容我猜一猜可好？”

邵式平一摆手说：“不必猜！”

刘渗的眉毛一挑，眼光犀利地看着邵式平。

邵式平凑近了一点，说：“猜中了，我不能告诉你一个‘是’字；猜不中，我不能告诉你一个‘不’字，这是规矩，你也懂的。况且知道的太清楚，对你未必有好处，日后要查起来，是说你知情好呢？还是不知情好？不如马虎一点，糊里糊涂就过去了。我有两句话要送给老弟，感觉上要敏感一点，行动上要迟缓一点。你觉得怎样？”

刘渗微微闭了下眼，点点头道：“守一兄为我想得很细，可以按你说的去办，从现在开始，我就什么都不清楚了。你放心，在我这里是什么消息都不曾得到，决不发一卒与你为难。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邵式平非常感激，稍停了会儿方说：“这样就很好。”

刘渗浅浅地苦笑了一下说：“你能懂就好，各为其主吧。”

邵式平说：“你那个主子是靠不住的。”

刘渗立刻瞪大了眼睛说：“各有各的信仰，人不能强勉。我也不要听你来做宣传，我也不能久留于你。守一兄，还是请回吧。”

邵式平也苦笑了起来，感激了几句便起身告辞。回来的途中一路叹息，要论人品、论秉性，刘渗算得是比较优秀的职业军人，可惜为国民党做事，不会有好结果了。

刘渗果然很守诺言，说话算话。在弋阳、横峰两县农民暴动起来以后，他未发一卒前往围剿。给农民革命军放宽了很大的活动条件与范围。只是他也因此而被罢免离职。

邵式平回来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方志敏与黄道，二人都很兴奋。大家把情况一汇拢，方志敏说：“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宣传发动的范围要更大些，参加的农民要更多些才好，要更多更细地再做准备。待时机一成熟，我们就揭开盖子来干！”

第十三章

蓝长金动手打了来收“煤捐”的“委员”

方志敏说：照往日所讲的那样，努力做

去，暴动吧 花春山呵呵地笑：郑队长，

似乎有点不胜酒力啊 六路起义大军来了

可是不料，近年关时，事情却出了意外，楼底蓝家突然爆出了火星来。

事情是由楼底蓝家的小煤窑引出来的。

江西境内的煤矿资源自古丰富，历来有“华中煤都”之称。煤质又好，色黑光亮，烧起来火焰熊熊而无烟气，地地道道上乘的无烟煤。那时，大的煤矿如萍乡、安源、赣西，都是由政府矿局或军阀把持。农民们迫于生计，也顺着零散的煤层露头挖掘出一些二窑来，掏一些散煤出来换点钱补充生活所需。

楼底蓝家村的西山上，就被蓝长金和几个贫苦农民用土法挖了这么个小煤窑。

农民们挖点煤，自然是很辛苦。每日里要脱得精光赛过一条鱼似地钻进狭窄如根肠子般细的小窑道。里边漆黑一团，又热又闷让人透不上气来，一盏昏暗如豆的小油灯支在一双赤脚底下，人也站立不起来，弓着个身子用镐在掌面上一下一下地凿，刨下几块来便拾到粗藤筐里。筐子满了，便用牙咬着麻绳拖出洞子去。一天累死累活地干下来，也不过卖个一两块钱，还得冒着随时被砸死砸伤的危险。官府里不管这些，只要是挖山里的煤，就要“上煤捐”。哪怕这个月一块煤也未曾挖得见，“煤捐”是一文也不能少的。

不过自从有了农民革命团以后，蓝长金他们对这笔捐税就一直拖着，再也不肯缴了。

旧历十二月初九，新历应该是1928年的元月中旬。县衙门的收捐委员舒步旺看看年关将至，想弄几个钱发发红利，塞塞腰包。便不顾天寒路冻，带着几个人跑来收捐了。

往日收捐的委员一到，端茶的便来端茶，递烟的也来递烟，“煤黑子”总是巴结他，指望他不要太苛求，手指头放松一些，少收一两文的煤捐。哪晓得今年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舒步旺辛辛苦苦爬上山来，人倒是见到了，只是一个个裹着黑破的棉袄自顾自蹲在窑洞口歇力气晒太阳，无有一人搭理他。

舒步旺抖惯了威风，一时也收不下架子，心里想，听说这帮人要造反，果真有点影子。不过哪回造赢过？又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总是不死心。不由得鼻子里哼了一声，拖长了声问：“你们谁主事啊？”

无人搭理他。

“蓝长金呢？”舒步旺晓得蓝长金是这帮人的头儿。

这回有人搭腔了：“在洞里。”

“叫去！”舒步旺喝道。

又没了响动。小北风刮得呼呼直响。

舒步旺歪了歪下巴，一个随员便跑到窑洞口扯着嗓门叫：“蓝长金，在吡？爬出洞来！舒委员来收煤捐啦！”又连着喊了几遍，便立在洞口等。

蓝长金是在里面。洞子有十几丈深，外面有人喊话，嗡嗡地也听不清楚，晓得是喊自己，也正累得腰背酸疼得赛过一只弓背虾，于是收了活，手脚并

用，缓缓地爬出洞来。一出来便冻得他一哆嗦，在里边出的一身臭汗一下子就使身子凉透了，有人递过破破烂烂的棉袍，他赶紧裹上，又用了根细绳子束在腰间，这才问：“哪个叫魂哪？”

舒步旺自己找了块干净石头坐着，还跷起了二郎腿，见蓝长金不肯过来打招呼，便不高兴，说：“每月只五块钱煤捐，还不按期缴纳，须我亲自来催。你们这帮穷鬼，骨头都懒得酥掉啦！”

有人小声嘀咕：“又有哪个高兴请你来！”

有人声音大一点，解释给舒步旺听：“近来出煤不旺，没得办法，凿进一洞又一洞，都是些石壁烂皮，不当煤卖不出钱来！”

舒步旺说：“有洞就有煤，有煤就有钱！要么你们就莫要挖，既然开了洞就要交捐来！”

“不信你可以进去自己张一眼啦，瞧瞧到底是煤还是石头。”

舒步旺冷笑了一声说：“莫在这里剃胡须子卖光嘴，我进去张一眼？要你们做甚？大白天说梦话骗鬼哩，你们自己张一眼望望，刚才蓝长金背出来的是什麼？这么乌黑瓦亮的也是石头么？”

大家又不吭气了，懒洋洋地斜靠着，舒步旺的话就像被一阵小北风刮跑了似的没反应。

舒步旺的脾气上来了，他抬高了嗓音说：“说一百句也没得用，官府管不了这许多，我们只管要捐。你们要是执意不捐，那也容易。”他扫了众人一眼，话音变得轻飘飘他说，“好办得很哪，把个煤窑封掉就是了。”

蓝长金的嗓子比他响，盖过了呼呼作响的小北风：“我们连饭都没得吃，哪里还有钱交捐？”

“那你再说一句，到底有没有捐的？”

“没得钱捐！早就告诉你了。”蓝长金把两只胳膊往怀里一抱，仰着头说。

“好，好！”舒步旺气得腿肚子微微有些发抖，脸都青了，指着那孔小煤窑跺着脚说，“封！把个臭煤窑子给我封了，看他们敢再挖！”

这一讲，挖煤农民们呼啦一下都立了起来，一人一柄土镐都抄在了手中，横眉立目。舒步旺的那几个随员根本没敢挪步子。双方相持在这里了。

舒步旺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指着众人骂道：“看这阵式是要抗捐不缴哇！好哇，哪个给你们吃了熊心豹胆？你们这帮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个个都是癞痢头上的虱子，好捉得很！今天你们狠，明天捉你们大牢里去，冷水刷油锅，慢慢地消遣你们，叫你们这班穷鬼狗东西坐到头发三尺长！”

蓝长金的火爆性子比他还烈，一开始还压着火，见他开了骂，这火腾地一家伙就蹿上来。蓝长金往前跨了一步，一只粗壮的黑手差点戳到了舒步旺的额头上：“你骂哪个是狗？你那是嘴还是屁股？要说是狗，你才是狗！狗仗人势，我要怕你今朝就不姓蓝了！”

舒步旺哪里吃过这种亏，嘴巴说不赢便动开了手，暴跳起来照着蓝长金的脑壳一拳就砸了过去。

哪承想蓝长金是学过几天拳脚的，一套“仙人拳”舞得不算太好但对付舒步旺是绰绰有余了。他见舒步旺的拳头已经到了自己的耳边，不慌不忙，伸出左手来一挡，舒步旺只觉着似乎是砸在一根铁棒上，自己的手掌胳膊已酥了半截。跟着，蓝长金的右手也到了，只是顺势往他的肋下轻轻一推。舒步旺踉跄后退几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那几个随员倒是反应挺快，赶忙

过去扶起他。

舒步旺晓得今天坏事了，这帮于穷鬼真是有心要造反。骂，骂不过，打也打不过。三十六计，只有走为上。他爬起身来，带着随员一头往山下溜，一头回转身来骂：“好好，算得你们狠！又敢抗捐不缴，又敢殴打委员，明天告到衙门里去，派兵来捉你们！叫你凶去！”

“你来，你来，不来你是狗！”蓝长金更不示弱，站在高处恶声回骂。

舒步旺跑远。这边有的农民开始后怕了，细想了许多以后说：“闯祸啦，这下可真是闯祸了！这个狗屎委员跑回衙门里去，不是好玩的。明朝真要发兵来，不是家破就是人亡啊！”

大家一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又一齐转向蓝长金，说：“你快出个主意吧，不能叫这只狗搬兵来！”

蓝长金想得比较简单，两只拳头一挥说：“怕他个鬼！我们抱农民革命团是做什么用的？去，敲起锣来，召拢各村的农民革命团，追上去截住那个狗委员，杀了他，看还有哪个能回衙门去搬

兵！”

农民们觉得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了，看蓝长金那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也都坚定起来。于是便有人飞快地跑回村子里，找出一面铜锣，一边敲一边喊：“革命团的人快来！革命团的人快来！县里的狗委员回去搬兵，要来捉我们啦，不能让他跑掉！快去捉他回来！”

急促的锣声和尖厉地呼叫声传遍寒冻冰冷的田坂与山坳，转眼之间，农民革命团的团员们纷纷拿着梭镖、大刀、扁担、锄头跑了出来，四五百人从田埂、山道上汇拢来，沿着大路去追舒步旺。

哪里还能追得到，舒步旺溜得赛过一只兔子，早已无了踪影。

追不上舒步旺，农民们有点惶惶然。这可如何是好？祸是越闯越大了。事已至此，蓝长金反倒不怕了，一不作，二不休，他把队伍拉回来，也不解散，集合在蓝家祠堂里。这一头叫人杀猪煮饭，准备吃饱了蓄足了精神明日里好对付官兵；那一头立即派人去找方志敏，请他回来主事。

在弋阳开会的方志敏闻讯连夜赶到了楼底蓝家村的蓝家大祠堂。

祠堂里点着火把，火光照着一张张紧张激昂的脸，看见方志敏到了，大家一阵欢呼围拢了上来。花春山、蓝长金、蓝高茂几个人都在，眼巴巴的神情中透着急切的期盼，注视着方志敏。

以前开窑头会议时，曾经议论过何时举行暴动最为有利。当时大家也谈到，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需要时间和过程，仓促起事。准备不足，难免要流产。大家又议过选择年关作为暴动的时机比较合适，地主豪绅们总是在年关近前时向农民逼租逼债，往往更容易激发农民们抗租抗债的斗争情绪。所以，方志敏一直打算要等准备得十分充分了才起事。

但是农民革命团一搞起来，农民们就有点沉不住气了。自己辛辛苦苦收种的粮食，多一半要装进手不动捻丝的地主老财口袋里，本来就愤然不平了，这下有农民革命团撑腰，底气更足了，哪里还肯服服帖帖顺顺当地交租纳税。于是能拖则拖，能欠则欠。楼底蓝家一带各村农民当时欠下弋、横两县豪绅地主的租债有千余担谷。不过被人催租逼债的滋味是不好受，于是总有人跑去催问方志敏，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掀开盖子”。农民们着急他说：“赶快发布个命令动手吧，再这样下去要逼出人命来啦！”方志敏总是要解释一番道理才能将迫不急待的农民们劝走。但是这次情况大为不同了，衙门官府

的收捐委员做了催化剂，楼底蓝家村的农民革命团已经骑上了虎背，想下也下不来了，此时要想再按捺下去再从容地去做准备显然是不许可了。年关已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弋阳、横峰地区就像是一个装满烈性火药的箱子，楼底蓝家村是这箱火药口上的一根导火索。方志敏沉思了片刻，坚定地说：“照往日开会所讲的暴动时应该做的事，努力做去。暴动吧！”

蓝家祠堂里一片欢呼，像是在寂寞的冬夜里滚过山梁一阵春雷，差点没把屋顶给掀开，农民们如愿已偿的心情可想而知。

农民造反，自古都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弋阳、横峰、贵溪、铅山这一带受农民起义风潮的影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唐乾符五年，农民起义军黄巢率部入弋阳，几年间起义军兵马周旋于此，后来杀了唐都兵司马张湍，黄巢方引兵北上。到宋建炎四年，王宗石率饶、信两州明教徒十余万人起义，一度攻下贵溪、弋阳两县，王宗石起义被镇压后，这两县的农民被官兵屠杀约二十万人。

元至正十二年，红巾军陈友谅攻入弋阳后又退出，七年后遣王溥重又攻入弋阳。红巾军在这里占据了两年光景，后降元。明朝的农民起义之事更是频迭。正德三年王浩八在万年起义，弋阳响应农民数万人。嘉靖四十年，闽广农民起义军在此与官兵激战，终不敌。到了崇祯十四年，徽州农民起义军在几年内于此地与官兵拉锯，当地农民参加者踊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坚持延续数年。

清朝顺治年间，弋阳北乡、贵溪等地都有农民起义事发生，杀知县、攻县城。到咸丰年间闹太平军，战火遍及乡县，这一带广为战场，四乡农民均有响应参加者。太平军败，农民起义军被清兵屠杀无计数。

农民起义仿佛成了传统，活不下去就造反。砍脑袋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再长一茬。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时方志敏们又扛起了这杆旗帜，与历次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完全崭新的尝试，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晚，方志敏召集了楼底、蓝子坂、姚家垅、瑄山等周围九个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在花春山家里开紧急会议，一致作出立即暴动的决定。方志敏又马上作了研究与分工。头一件事，就是派出人员连夜飞速奔赴各地，通知提前举行年关暴动。

正在开会时，蓝广平气急败坏地一头闯了进来说：“不好了，罗眼白罗广生纠集了几户有钱地主也在家开黑会，也杀猪吃饭，说是要去领官府来打我们！”

罗广生在楼底蓝家村算得上是顶奸猾顶死硬的一户财主了。收租子时谷米要用风斗吹过三遍、曝晒五日后方肯过秤，一点潮气都不能沾。叫佃户帮他点种蚕豆，数好了坑发蚕豆种，一粒蚕豆都不肯得多出来。他一双乌鸡眼长得眼白多占一半，眼瞳孔又小又圆，跟农民佃户一讲话就翻眼，一翻眼就只见他一片眼白朝天，所以农民们背底里叫他罗眼白。罗眼白最恨的就是农民协会，大革命时期是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把他家给抄了。罗眼白跑到祖坟地里偷偷大哭了一场，发誓要与农民协会对立对到底。农民们得势时，他还不敢怎么样，眼白子也翻得少了。等朱培德的兵马一过来，罗眼白简直高兴疯了，把旧账全给补上了。这家伙的鼻子也灵敏得很，早就嗅出农民们近来不大安分了。今天蓝长金带头打跑了舒步旺，他马上就得知了消息，自然是又恨又怕。想来想去，忍痛杀了一头猪，做了一桌酒，叫来了另外三户富裕的

豪绅。几个人交杯换盏，凑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整治这帮造反的穷鬼。几个人牙根都咬得咋咋响，商定了明日一早罗眼白就去县里搬兵。

他们动作再快，也快不过革命团的农民。再说，革命团刚刚揭竿而起，正想拿个谁来祭旗，罗广生正好就撞在枪口上。

花春山说：“长金，你带着人去，除了抓人，另外把他们手中的田契借据统统找出来，一总都带到祠堂来。我们既然掀开了盖子，就要干出点颜色来！”

蓝长金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立刻带着一队人手举梭镖大刀旋风般地刮了出去。不到一顿饭的时辰，四户聚谋的地主一个不漏地统统抓到。这几家是这一带几个村子里的首富，所以从他们家中抄出的田契借据也多，几百多份乱糟糟地堆了一地，每份上都印着暗红色的手指印。

农民们愤怒的眼睛里喷出火来，就是这一份份赛过利刃赛过绳索的田契借据，卡住他们的喉管，缚住他们的手脚，活不能，死不能，受苦受累一辈子，到头来仍然是饭吃不饱，衣穿不暖。今朝是要以牙还牙了。

有人将祠堂里用来煮粥赈灾的一口大铁锅搬了出来，然后动手将那一堆堆的田契借据扔了进去。花春山拿一束火把递给了方志敏，说：“老汪，你来，烧了这堆鬼货！”

方志敏高高地举起火把，人群都围拢了过来。有人搬了一张红木雕花太师椅过来，方志敏踩了上去，大声说：“老表们！农民革命团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起来暴动了！谁都晓得，我们穷得精光，我们租田租地来种，亏本赔钱，穷而借债，借债就更穷。我们还要交纳国民党官府衙门的七捐八税，加上连年的灾荒，哪里得活路？穷人的命不值钱，冻死饿死一个人就像是落下一片枯树叶，有哪个来望你一眼！现在，共产党教我们觉悟起来。我们只是要一点起码活下去的权利，要求不饿不冻，要求不吃树皮草根观音土，要求不卖儿子老婆，要求不吊颈投水。这点点要求哪里算得上高！”

农民们一齐喊响：“不高！不高！我们起码要活下去才行！”方志敏的拳头不断地挥舞着继续说：“对！要达到这个要求，就要革命。在我们未曾团结组织起来之前，豪绅地主们个个都像老虎，谁敢在他们老虎头上拔毛？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团结成一只铁拳了。谁说我们无力？谁说他们的统治牢不可破？谁说少数人应该永久统治多数人？我们一动手就可以把他们从高高的宝座上拉滚下来；从前我们的头被踏在他们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到他们头上去；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都不肯，现在要叫他们乖乖地拿出借据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祖谷都不肯，现在要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

说到这里，方志敏把手中的火把高高举过头顶。人群一阵欢呼，扁担大刀一片林立，几十双黑手连同铁锅抬了起来。方志敏把火把轻轻凑近去，火苗腾地一下就飞升了起来。这团火光熊熊地燃烧着，照耀着这间沉寂衰老的祠堂四壁，映照在饱经沧桑苦难的农民脸上，照红了黑冬冬的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了。不光是附近几个村的农民佃户们兴奋不已，就是大大小小的豪绅富户们也被惊扰得睡意全无，农民革命团的敲门声让他们心惊肉跳，颤颤发抖。死硬一点的不肯把契约借据拿出来，农民佃户们也没有什么客气好讲，先抄了家再说。把粮食和财物统统搬到了院子里。

蓝家祠堂里的人穿梭般地进进出出，一拨一拨的队伍被组织分配出去封查地主豪绅的财产田契，又一批一批地扛着抄捡来的粮食财物拥进祠堂，堆

放在大厅里，连个插脚的地方都快没了。花春山忙着登记入账，已是近年关了，这些粮食财物御寒的衣被都要赶紧分下去，让农民佃户们能暖暖和和地过上一个饱年，充分体现出革命的成果与效益来。正忙着，门口站哨的队员过来叫他，说是门外有几个人点着名要见他。花春山出去看，却是附近几家略有点家产田地的小地主，在寒风里哆哆嗦嗦地站着。一见花春山出来，领头的蓝缺嘴赶紧走上前先鞠了一躬，说：“花团长，求您开恩，我们这几个都是遵纪守法的，家里有一些田地家产，那是祖上留下来的，我们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您是知道的。你看看，我们把你们要的东西都带来了，我们这是争取主动‘投案’。”说着，几个人都从怀里将田契借据掏出来送到花春山的手上。

花春山翻看了几下，点点头说：“这样做我们是赞同的，可以减轻一些你们的罪状。但是不许隐瞒，我们农民革命团什么都查得出来，如有隐瞒不报的，罪加一等！”

几个小地主把头点得如同鸡啄米：“不会的，不会的，我们都是晓得的！”

花春山说：“晓得就好。回去吧！”

蓝缺嘴跨前一步，脸上好不容易堆出一层笑来说：“花团长请留步，我们还有一个很小的请求。”

花春山扭过脸来警惕地问道：“又有什么鬼事？”

蓝缺嘴吞吞吐吐他说：“就是，就是我们几个也想、也想‘上名字’，和你们一样。”

农民革命团的成员都喝过鸡血酒，在红纸名单上画押印过手印，这就叫“上名字”。这就把革命的与不革命的、农民与地主区分开来了。花春山听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想了一下才回答说：“上名字可以，不过要另上一个本子，你们是既和我们一样，又和我们不一样，和罗眼白罗广生他们自然也不一样了。”

蓝缺嘴几个一听说同意让他们上名字，自然是喜不自禁，至于上哪个本子是看不在乎的，于是连连点头作揖道：“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革命是件好事，我们也是要参加的。上了名字，我们就也是革命的了。”

花春山看着他们退了下去。回头讲给方志敏听，方志敏觉得上另册的办法不错，农民革命团刚刚开始，不能树敌太多，在地主富农中也要搞个区分。除了首恶必办，其他的可以不动。

第二日太阳出奇得好，一扫冬日里连天的阴霾潮冷。楼底蓝家村此时反倒宁静了下来，安逸得好像还在困梦里。祠堂里依然还有人在忙碌，却是摆了张八仙桌。

近中午时分，一队警察气势很凶地赶到了村子里，为首的是县里警察的队长，叫郑久派，穿着一身黑布衣褂，外面罩了件狗皮背心，长枪也懒得拿，叫别人背着。一进村便被花春山满面堆笑地截住了，说：“是郑队长啵？怎么还劳神您亲自跑一趟？弟兄们也辛辛苦苦。”瞧见郑久派疑惑地打量着自己，连忙又补充道，“我是村里主事的，我姓花。罗广生罗大财主昨天晚上茅房不小心把个腿给扭肿了，此刻正在家歇息着出不来门。叫我来接你们。酒菜都预备妥当了，吃完了饭再去办正事也是一样的。”一头说着，一头往祠堂里让。

郑久派一张嘴是吃惯了的，又是天寒地冻，早已走得他腰背酸痛，所以也不客气，一边跟着花春山进了祠堂，一边又问：“你们这里是怎么弄的？”

有人要造反哪？昨天把县里的那个谁谁来的？给打了？有这事没有？”

花春山一边答应着“有”，一边招呼人上菜。一队人围着三张桌子坐下。

郑久派说：“要过年的了，闹什么事！一闹事就要叫我们下来，都烦死了！”看见端上来油汪汪热腾腾的一瓷盆猪杂烩，便住了嘴，伸手去夹菜。

花春山弄了一坛子头曲，挨个儿给这帮人往大瓷碗里倒酒。原本是走了半大的道，又冻又饿，他们见了酒端起来便喝。哪晓得这酒烈得很，又是空腹，一下子就上了头。花春山殷勤得很，一个劲地让酒。结果菜还没上两道，郑久派的身子倒已经开始先坐不稳了。花春山还过去斟酒，看见郑久派顺手靠在长凳边上的那枝长枪，便招呼上菜的人过来把它拿走，埋怨道：“放到稳妥点的地方去，等下郑队长要是绊一跟头怎么弄。”转眼之间，这帮人便醉气醺醺的了。

花春山呵呵地笑，说：“郑队长，似乎有点不胜酒力啊？”

郑久派已经听不懂了，嘴边流着涎还在喝，蓝长金他们几个把他架走他也没闹明白。结果没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一队人马给缴了械。

此时，分散在其他地方的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雷夏、黄镇中都已接到了暴动总指挥方志敏的命令通知。刻不容缓，他们立即召集人马，原来秘密组织的农民革命团宣布公开，统一行动，举行暴动。

黄道、方志纯、邹琦在弋阳燕坞黄家、丁山、窖头、漆工一带；雷夏、舒翼在樟树墩一带；吴先民、黄球、项春福、钱壁、黄立贵在横峰青板桥、上坑源、茗山岗附近；程伯谦、滕国荣在横峰葛源一带，纷纷举起义旗。

暴动了的各村农民群众，自动起来进行了户口登记。农民革命团代替了村政权，一切由农民自己说了算。对作恶多端、态度又仍为蛮横的土豪劣绅，烧毁借据契约，没收粮食，交纳罚款，受广大农民群众的管制与监视。对于一般殷实户，只要承认革命法令，担保不做反动作，准其为老百姓。这一来，烧借据、毁契约、废除债务，劈仓分粮，农民革命团忙得不亦乐乎。暴动后的村子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妇女和老人纷纷走出家门，笑逐颜开；少年儿童也组织了起来，臂扎红带子，手持红樱枪，开始在路口放哨；年轻力壮的穷苦农民自然更是精神抖擞，肩扛梭镖鸟铳四下巡查，如今什么事情不经过他们同意就不能算数了。

也有封建势力厚实的村庄，豪绅地主也弄了个组织，试图与农民革命军比试对垒。结果农民们串联了好几个村庄组织队伍，一下子就把对方打垮了。在这几天之内，暴动区域已经纵横遍及百余里，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达六七万人之多。《弋阳县志》载：

武装暴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弋、横地区，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纷纷外逃，农民群众兴高采烈，派代表来暴动村庄要求支援起义。短短几天，弋、横两地的绝大多数村子都取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农村一片欢腾，烧毁

契据，没收地主豪绅粮食，缴出赃款，平分土地。正当赣东北这一片村子里闹得热火朝天时，在中原一线，蒋介石、冯玉祥与张作霖、张昌宗、孙传芳等也都正打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和汪精卫、李宗仁三方相执不下，争斗得如同一群叫春的猫，先是蒋氏扭扭捏捏地宣布下野，跑到日本去兜了一圈，后又弄得汪精卫无可奈何发表引退。桂系军阀以为已是稳操胜券，大权独揽了，却不料蒋介石又回马一枪，联合汪精卫复又重来。宁汉、宁粤为了个权字争执不下，北方局势却已开始告急。冯玉祥、阎锡山面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沉重压力叫苦不迭。此时的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各派为共同完成

对奉张的北伐，早日攻占垂涎已久的北京，因此亦暂获妥协。发布新的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令。所以此刻江西朱培德奉命将兵力集中于九江地区待命，暂无空暇顾及农民们的“乱子”。

趁着这一空当，弋阳、横峰的农民暴动开展得可谓是波澜壮阔了。

起义分六路铺开，据《弋阳县志》记载：

第一路，由邹秀峰、花春山、黄端喜、蓝广平等为指挥，以楼底蓝家为中心，向横峰县城周围出击；

第二路，由吴先民、黄球、钱壁、项春福、吴先喜等为指挥，以青板桥为中心，向铺前、霞坊等地出击；

第三路，由黄镇中、方华日、邵伯平、洪坤元、方胜喜、黄品珍等为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中畈、邵家畈、芳家墩一带出击；

第四路，由雷夏、余汉朝、彭皋、甘遇霖、方华根等为指挥，以樟树墩为中心，向弋阳县城出击；

第五路，由方远辉、彭年、舒翼、方远学、杨立程等为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德兴磨角桥一带出击；

第六路，由程伯谦、李穆、邱金辉、胡粹方、喻远才等为指挥，以枫树坞为中心，向葛源、黄村等地进击；

六路大军同时积极向外出击，声势浩大，捷报频传，不到一个月，弋阳、横峰地区，纵横百余里，炮火连天，风起云涌，到处是暴动的队伍，到处是革命的红旗飘扬。农民革命团掌握了乡村政权。

读完这段文字记载，其场面是可以想像的了。有一句挺流传的话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动派难受之时。弋阳、横峰的农民一闹“乱子”，自然让冤家对头叫苦不迭。民国17年2月5日的《中央日报》上，用粗黑的字体刊登了一则醒目标题：《赣省共祸未已》。文章简述了这次弋阳、横峰的农民运动，不过因其作者的角度、立场、视野的不同，所以可以感觉到的是一股仇恨、扭曲、无奈、焦虑以及还夹杂着几许的滑稽。文曰：

〔世界新闻社南昌通信〕近日赣东各县，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弋阳城中因防九区共党，每日雇人守城，到叶家壩即闻炮声隆隆。据云此次共产起事原因，系由弋阳之邵式平、方志敏与横峰黄道，接洽之久，乘党务停顿之际，伊等即分赴各乡，煽惑农民，谓年节在迹，尔等都是无钱用的，尚要受土绅盘剥。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把各人所欠的债，要求债主将借约焚毁，就算平了债了。一般无知愚民，听信其言，遂起暴动。当事发时，有某处将为首者捉获，送至横峰县，请求严办。詎知横峰县长审讯后，判称这种平债行为，是很有道理的，那不要紧，反将为首者开释。旋又会同驻县军官派队往查情况，军队到官山张家（此处地名有误），问众人所为何事，共党答以我们系无产阶级，现要各债主将已放的债完全平了，并要把他家里的稻子分给我们大家吃。……现共党聚有一二千人之多，以横峰官山张家（此处地点作者仍未弄清爽）为大本营。弋阳史县长已电请省政府派队剿办，一面电请驻饶团部队派队镇慑，事经多日，尚未见有一卒来戈，以致地方人心惶惶。……

不过再读下去就可以看出，地主老财们也不是光吃干饭的：

……本戈之八区联村御匪团办理有力，城池尚得无恙。共党雷夏策划樟树墩暴动，事为七里岗王家知悉，密派一二百人前往樟树墩，当即将雷夏父子、洪灰狗仔、祝焱四人捉至七里岗，即行枪毙。县中派人扛猪往王家犒赏，以资鼓励。现赣各县均发起武装自己，不日即可成立联村御匪团以自卫云。

七里岗的地主们要搞雷夏，颇费了一番心机。

第十四章

姜细崽来请雳夏，雷夏不疑有诈便跟着去了。吴先民与黄球被关在了天主教堂里。在方胜峰的破庙里，庞先飞说：搞暴动我是最有发育权。方志敏说：我们要准备做三件事。

雷夏在当地名气很大，农民们有句话说：“只要雷夏到，反动派就要跑，革命红旗哗啦啦地飘。”自从1926年漆工镇赶走了余巡官之后，当时邵式平便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任命他为漆工镇警察派出所巡官。雷夏脾气耿直，办事果断，毫不留情面，地主劣绅们提起雷夏来不说是胆颤心惊，起码也是又恨又怕。等到弋、横暴动开始，雷夏做了农民革命团第五路的总指挥，更成了地主劣绅的眼中钉肉中刺。要搞掉雷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在漆工镇，那里群众基础好，周围全是农民革命团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下手，地主劣绅真是煞费了苦心。

离七里岗不远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马王坡。马王坡有一个剃头匠姓姜，叫细崽。平日挑了个剃头担子走乡串街，倒也是凭手

艺吃饭。只是不肯学好，迷上了赌钱。人家劝他，吃是明功，穿是威风，赌是对冲，嫖是落空。他哪里听得进去，又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后来手艺也懒得做了，自己混得和乡里流氓一样。前一年聚赌闹事被雷夏教训了一顿，皮肉也吃了苦，就此怀恨在心。不过虽是恨，却也对雷夏无可奈何。依旧是赌，依旧是输。年关已近，不想已输下了二百多块光洋。赢家天天追在屁股后面讨债。姜细崽烦得要死，于是上七里岗的财主号称有银万两的王万元家借钱。他想借一笔小钱做赌本，弄得好几把就能翻回本来。不想手气背得很，就玩了一把，20块钱就落入了别人的口袋。又去借本，王万元倒是好说话，再借了20块给他。不想转眼仍是输得精光。这下王万元把笑面孔换了过来，立逼着他还账。姜细崽差点没哭出来，说要是有钱还会来借么？

王万元说：“没有钱还账，你说怎么办？”

姜细崽理亏气短腿软，服服帖帖他说：“你说怎样就怎样。”

王万元倒笑了起来，说：“你帮我做件事，40块钱就不要你回了。”姜细崽赶紧问是什么事，王万元说：“其实事情简单得很，就是你去趟漆工镇，帮忙把雷夏叫到七里岗来。”

姜细崽一听这件事便有些疑惑，问道：“叫他来做什么？”

王万元也不瞒他，说：“就是为了要教训他。这硬头鬼自己在漆工镇闹乱子还不算，还要想到七里岗来插一杠子。我们的房子和地都是世代代祖上传下来的，凭什么要分给那帮穷鬼？”

姜细崽有些担心，说：“他哪里会听我的？我叫他怎么能叫得动？”

王万元说：“我教给你怎么说，这个硬头鬼保险会来。”

有一点王万元没有给姜细崽说透，就是他打算教训雷夏是“教训”到什么程度。

姜细崽在赌场上混得说起谎来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脸不改色心不跳的，所以要他去骗雷夏也不是件难事。

他是挑着他那副久置不用的剃头担子去的。

雷夏是认识他的，见着便说：“这番晓得学好了？所以皮肉吃点苦头有

好处，长记性了。”

姜细崽恨得咬牙，脸上却笑着说：“是。还是雷队长帮助得好。我这番是专门来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帮助的。”雷夏一时没听明白，姜细崽赶紧又解释，马王坡和七里岗的贫苦农民也想弄个革命团，只是缺个权威去挑头，又不晓得该怎样搞，商议了半天，决定让姜细崽来请雷夏。姜细崽最后几句话说得既恳切又迫切：“雷队长，我们那边的人心里急得很，巴望着您早点去，革命团好早点搞起来。我们只有指靠您了。我们想要革命，不晓得革命要不要我们哩！”

雷夏根本就没有疑心其中有诈。姜细崽说来请他去组团搞暴动，正好迎合了他的想法。漆工镇的一把火已经点起来了，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扩大战果，扩大暴动区域，扩大农民革命团的范围。人家有这个要求专程来请你，你又有这个意愿，岂不是两下里一拍即合。所以雷夏既没有怀疑，也没有犹豫，并且性急得很，说动身就动身。带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的父亲雷老爹。雷老爹一直是农民革命团的积极分子，也差不多成了雷夏的得力臂膀。这一番听说雷夏要到马王坡去，倒是闪过了一个念头，晓得那里不比漆工镇，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想不管什么事可以给儿子出出主意，帮儿子一把，于是也跟着来了。

进了马王坡的村口，就看见前面晒场上集中了几十个人，拿着长棍短棒的家伙，一个个凶神般地盯着他们走近。雷夏这时有点觉得不对头了，便问姜细崽：“你们这里的农民不是还未曾公开么？怎么都集合拢了？”

姜细崽也沉不住气了，“哎”了一声就跑，钻到村子里转弯就不见了。雷夏顿时脑袋嗡地一炸，心说不好，连忙叫撤。哪里还能走得脱，立时后面又包围上来了几十个人，横眉立目地举棒就打。这些人都是王万元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下手既毒又狠。王万元说过，这番拿钱买得就是雷夏的脑袋。所以这班人一动起手来就往死里打。

因为是秘密来做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工作，所以雷夏连枪也不曾带，怕引起人家注意。这下被多于自己几十倍的敌人所包

围，真是寡不敌众。雷夏面无惧色，一个人同十几个人打，哪里能打得过，满头满脸都已被血浸透，一只眼珠被打出了眶，挂在脸颊上，另只眼睛被血糊封住，看东西都困难了，只得高声叫爹爹先跑。雷老爹要顾儿子，说什么也不肯先跑，毕竟年纪也不饶人

了，腿上狠狠挨了几下，一下就跪倒在地上，又是几排脚狠命地踩了上来，只听得咪嚟咪咯几声响，胸间肋骨立时就断了几根。雷老爹顿时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一同跟来的几个人要救雷夏，却已是力不从心了。一帮子流氓匪徒手执铁棒铁锹没头没脸地打来，只有招架的份。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几个人已是多处受伤，倒在地上昏迷过去。鲜血把多半晒场都染红了，好像是泼了一层红漆，又慢慢地渗透到土壤里，表面上只留下了几抹浅浅的痕迹。

王万元和一帮子财主劣绅高兴得简直疯了，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便能得手。叫人把雷夏他们几个捆绑起来拖到了村头的大槐树底下。雷夏性子烈，眼睛已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仍是暴跳如雷，骂不绝口。王万元叫人用铁棒撬住他的双腿，再搬来一扇石磨往上一砸，腿骨咔嚓一声立时就折断了。雷夏疼得昏了过去，醒来还是骂。

财主们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土坑，把他们几个都推了下去。王万元狞笑着

说：“穷鬼不是要闹翻身，闹革命么？到阎王老爷那里去闹吧！”

红土一锹一锹地封了上去，和血掺合在一起，分不出哪个是土哪个是血。土坑渐渐地平了顶，旁边的几个财主劣绅看着，心满意足地点头称是。王万元指指点点他说：“明年在这里种上麦子，长得一定比别处的肥壮。”

隔了一个多月，有人看见姜细崽吊死在马王坡村口的槐树下，浑身衣衫破碎零乱，僵硬的皮肉上渗出一道道血痕来，面目恐惧，疼人得很。村里人说，这是冤鬼找上门来了，被鞭答数夜，受不过，自己爬到树上吊死的。有人看着那棵树便疑惑，这么高，姜细崽是怎么爬上去的？

此间，驻河口的八十三团因按兵不动而被调防，刘渗因失职被罢免官职，并被关押起来。河口由新调防来的国民党三十一军的一个团驻防，并且迅速进入了戈阳与横峰两县县城，由于对农民革命团不知虚实，所以还未敢采取行动。地主劣绅们迫不急待地成立了一个“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搞了个靖卫团有二百多枝枪，配合国民党的正规军准备向农民佃户们展开进攻。

新驻横峰县城的国民党军连长冯从治读过几本兵书与《三国志》，又是新上任不久，邀功心切，一心要做点颜色出来，既给农民们瞧瞧自己的厉害，也给上司瞧瞧自己的手段。于是也想出了一个诡计，佯装自己这个连要起义，派人去找青板桥的吴先民，请他来受降收编。

吴先民也是想好处想得更多了一点。一个连哪，一百多枝枪哪，要是真的改编收容过来无疑是一支很强的力量，敌人就再也不能看轻了农民革命团。光想了有利的一面，却没有将事情翻个头儿再琢磨，好像这一百枝枪去了就能拿来了。大刀黄球也兴致勃勃。两个人就跟着来人上路了。

出了青板桥没多远，就看见冯从治带着十几个人迎在路边。因为这地方离暴动区域很近，冯从治怕遇上农民革命团，反把事情搞砸，于是稳住吴先民往前走，一路上还侃侃而谈他的从军治国论，又介绍自己这个连的情况。吴先民很高兴，也不怀疑他，急急地往前赶路，信心十足地准备去接受那有一百多支枪的队伍。

走出二三十里地，离县城也不远时，冯从治就变了脸。一声断喝，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早有准备，一下子就卸下了吴先民与黄球的武器，又用绳子把俩人捆绑了个结实。冯从治想，不如直接押到河口团部去邀功。于是又转道奔河口而去。

路边休息时，敌人将他俩缚在一处。黄球叹了口气说：“想不到落进了这孙子的圈套里。恐怕这一下真的是要革命到底了。”

吴先民小声他说：“别泄气，瞅着空子就跑，跑走一个算一个，跑走两个更好。”

黄球说：“这我知道。但是这帮家伙一路上前后左右地紧紧贴着你，又有长短家伙拿着，要跑怕是不容易。”

吴先民很正色他说：“还有一点最最要紧的，就是打死也不能投降，也不能说出我们农民革命团的秘密来！”

黄球说：“这我也知道。我黄球从来就不怕死，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河口，天色已近傍晚。冯从治把两个人押到了河口的天主教堂内。洋人盖的西洋式房子，装了好多坚固的铁门铁窗，想是跑不了人。于是自己就放心地带着人到团部去了。团里听说抓了两个共产党要犯，真是喜出望外，

立刻摆酒庆功。这也是个习惯，喜事要吃酒，丧事也要吃酒，来人要喝接风酒，走人要喝送行酒，成天无事烦闷了也要吃酒。这一吃便吃下去了好几个时辰。派人去看，两个犯人还老老实实地在屋子里蹲着呢，于是加了一个岗。夜已深了，跑了一天的路，喝了一肚子的酒，哪里还有力气再审，冯从治就下令先困一觉，明日里再作处理。

吴先民根本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和黄球两个人手背手地解开了绳索，松动了手脚，爬起来便打量关押自己的这间屋子。这间屋子挺大，南面是门，上着锁，门外有哨兵，其他三面都有窗户，镶着花花绿绿的玻璃，又有一排排的手指头粗细的铁条封着，像牢房似的。西面墙上挂了一幅圣母像，圣母从马槽里抱了一个小孩子出来，脸上苦叽叽地望着他俩。吴天民看了半天，心想，要跑只有从窗户里跑，于是伸手用力去拉窗户中封着的铁栏杆。不想这铁栏杆是个聋子的耳朵，一拉便有些松动。吴先民心头暗喜，怕门外哨兵听见，也不言语，只是摆手势叫黄球去拉。黄球力大，哗啦一下就给拉开了。门外的哨兵听见响动伸头来看，见他俩仍然背靠背地缩在墙根下，也没多心，又打磕睡去了。

拉下这一根铁条，栏杆之间的缝隙已够钻过去一个人了。吴先民也不客气，拉着黄球钻了出来拔腿就跑。刚从虎口脱险出来，哪里敢迟疑，黑天行路，什么也看不见，高一脚低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天虽是冷，却是跑得一身汗一身泥，呼吃呼吃直喘粗气，待到了青板桥，天已经开始放亮了。

黄球说：“娘的，竟敢设计陷害老子，老子捡回了这条命，下次就饶不了你个孙子！”

几件事一来，大家就都提高了警惕，晓得自己面对的这个敌人实在是太狡猾，遇事再不可大意了，脑筋里也多了几道弯出来。

冯从治发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来的两个共产党头目居然能趁黑夜遁了，煮熟的鸭子真的飞脱了手。这口气窝着出不来真要憋死。于是把一连人都拉了出来，跑到葛源去窜扰。他的兵武器好，乒乒乓乓地一放枪，一下子就把葛源这一路的农民暴动队伍给打散了。

农民革命团第三路指挥程伯谦急了，立即派人火速向总指挥部报告，要求集合各路大军夺回葛源。

“葛源街，三千烟。”葛源是横峰县最大的集镇，它位于横峰、弋阳、德兴、上饶四县交界的群山之中，山路蜿蜒，地形复杂，其中有一块二十多里的小平原，土地肥沃，庄稼茂盛，做革命根据地条件是理想的。当时，暴动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后来的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也设在了这里。方志敏对这一地区自然很重视。接到程伯谦差人飞报而来的信，不免头脑也有点发热，去找邵式平和黄道商量，这两个人也恰在火头上，求战的情绪特别地热切，都说敌人虽是有枪，但是我们农民革命团人多势众，以百对一，岂有不胜之理？于是就火速地通知下去，迅速集结万余农民革命团，向葛源进发。

哪个晓得农民打仗，原来就生疏，又没有纪律，嘴巴快的到处去嚷嚷。人还没有到，消息已经走漏。结果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了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就被敌人打了个伏击。一下子阵脚大乱，漫山遍野地乱跑，锄头扁担扔得到处都是，还有跑回来捡的，谁喊号令也不听，只顾自己瞎撞瞎跑。冯从治看见农民们确实是人多，自然也不敢恋战，主要目的是想吓唬他们一下，把农民们打散了，自己就赶紧撤回了横峰县城。

这一失利，方志敏立时感到了责任压人。指挥这样一支骤然集结起来的

庞大农民队伍，用以发动区域性的暴动，看来是可行的。但是要用这样一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没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队伍来对抗训练有素的国民党正规军，显然是要吃亏的，两下里实质力量悬殊，也是不好相比的。此时，方志敏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看来必须搞一支经过训练能征善战的队伍出来了。

可是这时，身边的几个人看到各路暴动形势受挫，中心地区不断被敌所占，心里都急得上火。尤其是黄球、蓝长金几个脾气更是急躁，挽起袖子挥着拳头围着方志敏说：“总指挥，怎么还不下命令举行大反击？我们人多，怕他做甚！要不然好不容易掀开来的大暴动，就要被敌人一点一点地打下去了！”

方志敏心里确实很犹豫，去硬拼吧，围打葛源就是个教训；不拼吧，眼前的局势怎么处理？熊熊的火焰是自己亲手点起来的，你往热火上泼冷水吗？那往火上浇油呢？更不行，几万做田人的性命不是儿戏，头脑再发热就更要吃大亏了。方志敏此时虽然还不曾有成型的主张，但已经开始冷静下来了，他立起身说：“把大家都叫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搞。”

一开会，那些容易激动人心、慷慨激昂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方志敏吸了一口气，瞅住一个吵吵嚷嚷的空隙说：“既然是来商量，就莫要光讲一家门的理由，要方方面面都想到才行。”

黄道问：“哪一面不曾想到？”

邵式平说：“我也觉得似乎缺点什么……”

黄道又问：“你也要说个清楚才好，到底是缺什么呢？”

方志敏说：“我来说，刚才说了半天，说的都是要求出去打反击，要求拼一场，要求痛痛快快地打一仗。”

黄球插嘴道：“是呵，总不能看着败下去吧？”

方志敏的表情很严肃：“拼一场固然是痛快，但要是打不赢呢？打不赢岂不是败得更快？已有教训在这里了，葛源这一仗，以为人多势众，其实没有训练过的农民军要想与国民党的正规军抗衡，几乎就是个败！这是拿血买来的教训，有谁能说不是？”

屋子里一片静寂，都在思索方志敏的这番声色严厉的话。

方志敏接着说：“我们搞暴动，搞农民团，都是没有先例的，没有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做是对，怎样做是不对。这个其实不怕。怕就怕错了还不晓得，还一味地去做，在送了性命去。农民们不去考虑这许多是可以的，放在我们头上就不可以！谁叫我们来当这个领导呢，领导不是说就能保证不出错不犯错误，但是接二连三地出错就不能允许了。弋阳、横峰这几万农民的身家性命，他们对革命支持与信任的程度，全都系在我们的身上呢。要晓得自己肩头上的担子有几多重，不要革命一来便脑壳发热，万事要考虑得越周密越好。”

邵式平说：“志敏的话是有道理的。现在，暴动中心地区是叫敌人给占去了一部分，可是要看到我们大多数的人还在，有死几个，这就是我们搞革命的本钱呀。要是一味去拼去杀，拼死好多的人，哭爹疼仔的，只怕更会挫伤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工作更难做。”

黄道点点头说：“我也有点想转过来了，凭我们的武器要是去拼，真是蠢得很。敌人恐怕还巴不得我们撞到他们的枪口上去哩。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们既不拼又不去打，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一天比一天猖狂地来进攻，农

民们革命的热头会不会渐渐凉下去？会不会对革命渐渐地失去信心？”

方志敏一拍桌子，抬高了声音说：“问题就在这里，今天招集大家，就是要商量个办法出来，又要叫暴动的火焰不能灭，烧热了的炉膛不能冷，但又要保存妥农民的力量，保存妥暴动的成果，有智有谋地与敌人作斗争。”

窗户纸一点就破，道理一摆就透。坐在这间小屋里的这些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都渐渐地琢磨过味道来了。小屋子里重新又变得热闹激烈起来。对于农民暴动和暴动以后的去向举措，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暴动时，农民领袖与革命农民的英勇、无畏、顽强，甚至投掷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无疑地其中还夹杂着混乱、失控、无序等种种复杂的因素。革命绝非是如同他们或我们所想像所期望的那样，一呼百应，从胜利走向胜利；实际上，革命的含义远非如此，甚至于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失败走向失败，在于自漫漫黑暗中长期而痛苦的探索，在于一个革命者真挚而顽固的追求。

三个臭皮匠抵过一个诸葛亮。很快，在七嘴八舌的踊跃发言中，几条很好的意见就出来了：首先是在农民革命团的基础上，各村各乡建立苏维埃乡村政权。如果敌人来了，就跟他们玩“白皮红心”，里外应付，实际政权还是在苏维埃手中。这样就能保护住暴动所取得的成果，保护住农民们的革命热情，保持住火热的炉膛不会冷。第二个主张是各路农军各回各村，一边做田，一边镇压地主劣绅，保护住农民的利益，自然是有点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味道。敌人来了就躲到山上去，叫他们村村扑空，什么也捞不到。最后一条很重要，方志敏提出来，一定要建立一支自己的“脱产”游击队，一面机动打击敌人，一面积极壮大自己。干革命没有政权不行，而政权没有枪杆子撑腰更不行。

从暴动进攻到有秩序地退却，从集中大规模农民革命团到组成小型灵活游击队，这是审时度势的需要。有了这个转变，弋、横暴动才逐步转向开始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武装队伍的过程。

游击队很快就搞起来了，由住过黄埔军校的邹琦负责。集中了步枪有二三十枝，编成了一个连，进行了有计划的正规化军事训练。吃饭、睡觉、训练都在一起。人虽不多，但建立正规军队的工作却是开展起来了。当时大家倒没有想到，这支小不起眼的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前身。

老表们为了防着敌人来烧来抢，保护自己的暴动成果，想出了一个“眺高”的办法。每个村庄每日里都派出了人放哨。眺高的人带上一枝敬神用的三眼铳，望见国民党军或地主靖卫团先打第一铳，差不多走近了再打第二铳，等到脚跟前了再打第三铳。听到第一铳响，村里的农民就开始作准备，等三铳一放完，全村扶老携幼牵牛挑担全都转入山里，走个精光。待国民党军队和靖卫团进了村，除了走不动的房屋炉灶，其他便是一无所获。并且号铳接号铳，坐在山头上眺高，便将敌人进兵来往的方向弄得一清二楚。后来基本形成了一个眺高、守夜、打号铳的制度。

转眼就到了1928年的春天，天气已渐渐回暖，山川田地已又披上了一层绒绒的绿。自从暴动转到了持久的游击战之后，斗争却是变得更为艰苦了。

朱培德的军队和地主靖卫团联手起来，开始大规模的搜山清剿。同时在他们占据的主要地区修筑了碉堡据点。要求各村都要有人出面与之接头，如果无人理睬，这个村子便日夜要遭骚扰。老百姓不胜其苦，自然有许多农民产生了犹豫与动摇。地主靖卫团也活跃起来，四下里派出耳目去，一有了动

静便给国民党军送信，像条尾巴似的紧跟在暴动队伍的后面，甩也甩不掉。方志敏他们钻进了山，有时一日里被追踪得要连续转移数次，险象环生。对此，方志敏感慨万分：“暴动以后，反动势力的压迫，日渐加紧，这个时候的困难，差不多是我们计划时所想不到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迫切的希望，就是要与上级党发生关系，一定有很好的策略指示我们，或者有很大的力量援助我们。”

这一段时期与上级党的联系，始终是时断时续。当时的形势下，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联络起来十分困难。再加之敌人的破坏，错误方针的干扰，党组织也常常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未免也有点自顾不暇。方志敏他们渴望着能尽快地和上级党联系上，他们在孤军奋战中所感觉到的一切困难，使得他们对这一点所抱的希望太大了。

先是江西省委的特派员饶漱石来了。他要找到方志敏他们也很不容易。见了面自然都是十分高兴，自然也带来了几许外界的新鲜空气。听了方志敏们的汇报，总结了一些经验与教训。呆的时间不太长，便又匆匆赶到别处去了。

过后不久，庞先飞来了。庞先飞参加过前一年底的湖北黄安暴动。暴动失败后，调任为江西团省委书记、代理组织部长。黄安起义的影响也是比较大，连县城都打下来了，后来也是遭到了国民党军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庞先飞来，大家都以为他参加过一次暴动，都想听他讲讲他们那边暴动的经过、经验、教训，出出好主意，给大家鼓鼓劲。哪个晓得他一看这块地方如今差不多也呆不住脚了，成天像霜打了似的无精打采。他的情绪给别人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有人说：“老庞是有经验的领导，他要说是不行，怕真的就是不行了。”

老是这样被敌人追得前脚撵后脚的怎么行？众人的想法也有不少纷乱，要紧的是先得让大家的思想一致起来。方志敏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弄得敌人还没拿你怎样，自己内部倒先乱了。方志敏决定，立即召开一次戈阳、横峰、德兴三县党的干部会议。会议地点，方志敏选定了方胜峰。

方胜峰地处弋、横边界，山峰不高，林木不盛，几乎藏不住什么人，不过也正因如此，敌人也没拿这个小山包当回事，既没修碉堡，也没设警戒。山上有一座荒废多年的古庙，已破旧不堪了，立在庙门口便能清楚地看到山下的动静，庙前庙后又又有三条小路可通下山去，遇到情况要撤退起来也很方便。

夏雨霏霏雾气氤氲。方志敏带着几个人趁着迷漫的夜色，辗转下了磨盘山。山路泥泞，滑腻难行，靖卫团与国民党军的士兵们都懒得出动了。方志敏他们悄悄地绕过了敌人的哨位，通过了封锁线，上了方胜峰。午后，分散在各地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赶到了。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邹秀峰、方志纯、庞先飞一个个地绕上山来，共有二十多个。也有得了通知不来的，多半是因为害怕了。庙里没有桌椅，有的人就搬了块石头坐着，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就坐在门坎上，有的靠在佛龕前面的石台子上。等大家都坐定了，方志敏清点了一下人数，说：“现在我们开一个特别会议。”

会议的议题其实就只一项，大家讨论，怎样应付当前这种严重恶劣的局面。

有半袋烟的工夫，破庙里肃静得很，谁都不肯草率地先开口，都在心里拿这个问题颠过来倒过去地思忖。议题只有一个，要议出名堂来却很难。

方志敏有点着急，催促着说：“怎么弄的，都赛过闷嘴葫芦了。平时话多的堵都堵不住口子，今天让你们说却又不说了？”

庞先飞咳嗽了两声，把手举了举说：“我先说点自己的想法。”庞先飞是参加过著名的黄安起义的，又是团省委派来的，大家还是比较尊重他，都想听听他能不能给指一条顺畅的道来。

“我先说说全国的形势。”刚开了这么一个头，他就长长地叹了口气，“大家都晓得的，近来革命暴动很多，河南河北、广东广西、鄂中鄂西，还有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大大小小总有一二百处吧，也遍及大半个中国呢。说起来倒也是蛮令人鼓舞的，可是现在又怎么样呢？差不多是都失败啦。为什么会都失败呢？谁都晓得的，我们的敌人太强大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装备太好，我们都有些什么？用原始的武器和人家的洋枪洋炮干仗，让这些散漫无知的农民和人家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交火。我们这样子蛮干，明摆着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哪有不碎的道理。说起来，真是叫人很痛心很痛心。”

好几个人跟着庞先飞叹息了起来，庞先飞接着说：“再看看江西，看看我们赣东北的形势。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晓得，只剩下磨盘山巴掌大的一块地区了，前山厨屎后山都闻见臭，就这么子，敌人还三天两头的来扰乱，真是如同破裤子缠上了腿，抖都抖不掉。”

方志敏看着庞先飞喋喋不休地还在说，几次想打断都忍住了。庞先飞的情绪一直悲观得很，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就是让反革命吓破了胆。对于继续干下去，只怕是连一点信心与元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想法也不是只他一人有，也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错误认识，只是程度上有深浅罢了。要让他说出来，说个透，然后把他驳倒，这样才能教育那些多多少少也存有这种错误想法的同志。但是黄道忍不住了，抬高了声音说：“老庞，说来说去，你到底想说哪样呢？形势嘛大家都晓得，现在要问你打算怎么做？拿个办法出来！”

庞先飞说：“莫急，办法自然是有。”

黄道说：“快说嘛。”

庞先飞很正色地说：“枪，埋起来；队伍，解散；一般干部，潜回家乡去；主要领导，在当地目标太大，转移隐蔽到上海一带去。”

大家都怔住了。悲观失望是有的，可是一旦真要听人说出“散伙”来，却也真感到意外而吃惊了。

邵式平有点疑惑自己的耳朵，所以又盯着问了一句：“老庞，你的意思是说散伙不干了？”

庞先飞肯定地点点头：“是这个意思。我也晓得，从感情上说，大家开始是有些接受不了，打个比方说吧，好不容易养了个宝贵儿子，喜爱得不得了，可是眼睁睁地却看着他夭折了，怎么舍得呢？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事实是很残酷的，它可不管你舍得舍不得，不行就是不行了。像目前这种局势，你再硬撑着下去，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庞先飞本来口才就不错，这番话他也是想了许久的了，放在肚皮里碾都碾熟了。他极力要说服大家，“再说，这也不完全叫散伙。只能算是临时的撤退。等到以后时机好了，埋在地下的枪还可以起出来，解散的队伍还可以召拢来，照样还是一支军队嘛，同时又保存了实力，有什么不好？扫仗也要讲个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和灵活机动嘛。”

黄道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庞先飞说：“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你这副腔调像是散布逃跑主义，散布对革命的悲观失望论呢？”

庞先飞说：“别乱扣帽子。我是走过好几个省、经历过好几回暴动的人了，我最有发言权。你就蹲在这山沟里，你晓得外头什么样？”

邵式平说：“莫吵。我来问你，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也是谁都晓得的，入党宣誓上说过的，只怕你还记得啵：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打倒军阀反动派。照你这样一来，军阀反动派还不曾打倒，丢下劳苦大众不管，我们自己躲的躲起来，跑的跑掉了，不是逃兵是什么？不是劳苦大众的叛徒又是什么？”

庞先飞淡淡一笑说：“老邵，你自己硬要往那个高度上拔做什么？我刚才不是说过了么，我们还是要回来的，队伍还是要重新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要打倒的。怎么叫做逃兵呢？能进能退才是大丈夫。”

吴先民说：“那，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组织队伍？”

庞先飞说：“自然是要等难关渡过，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之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

吴先民问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斗争，不组织队伍干，光是白天坐家门口晒太阳，天一黑了就跟老婆困觉，国民党反动派自个儿能倒么？局势能变得对我们有利起来么？”

庞先飞一时哑口了，觉得吴先民让他钻了个套，很不高兴。停了一下说：“我看你这态度有点不端正，哪个叫你去晒太阳了？哪个叫你去跟老婆困觉了？形势嘛，迟早总是要变的，敌人内部还要分化瓦解呢。”

邵式平说：“说你是逃跑主义你还不服气，自己不想动手去干，等着敌人自己起变化。敌人再变，反革命的性质也不会变，他窝里再怎样狗咬狗，对外对革命对我们都是行动一致的。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

吴先民说：“不革命的就滚！”

黄道说：“一箩筐稻谷，有几个臭瘡子不稀奇，来年照样种庄稼。”

庞先飞有点急了，说：“你们这种做法和情绪就是叫做冒险盲动，白白送死！白死了有什么用，革命不是照样不得成功吗？”

破庙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几个人说得激动地都站了起来，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后来说得急了，也谈不上什么理论道理了，嗓门抬上去了都压不下来。

方志纯使劲地摆手，让大家静一下，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话说的也有几箩了。现在你们都停下来，听听老汪怎么说，叫老汪拿个决定出来。”

方志敏用眼睛扫了一遍这一张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心头一热，如同寒冻腊月拂面而来一股温暖的热流，眼角不禁有点湿润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微微显得激动的情绪，平静他说：“刚才庞先飞同志讲了全国形势，又讲了我们的赣东北的形势。不过有一点没有讲透，我补充一下。这就是我想说一说，我们赣东北的老百姓是什么样的老百姓，我们的这支队伍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方志敏讲述了几件他的经历遭遇。

有一天夜晚，方志敏摸黑到了齐川源，刚刚和当地群众接触上就被地主靖卫团的爪牙探得了消息去报告军队。大队人马闻讯赶来捉拿方志敏。农民们从眺高的瞭望哨中发现了敌情，一声号铙响，老表们立即护送他到梅岭，安置在山上的一个窝棚里。不料敌人又跟踪追来，方志敏此时山路不熟，情况不明，很是危急。没有想到，山下村里六十多岁的于老爹抢在敌人之前爬

上了山，说了句：“老汪，快跟我走！”便沿着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山间细径，带着方志敏翻山越岭，绕过敌人封锁，把他送到了德兴县境内的沙坂扁担山上。这里山高路陡林密，根本无人来，只有沙坂邱家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敌人的烧杀掳掠，在这里搭了许多躲兵棚。许许多多的人住在这里，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村庄。沙坂邱家的老表们见到方志敏来了，打洗脚水的打洗脚水，让铺的让铺，让他好好休息，告诉他，到了这里就安全了，敌人不来，来了也抓不到一根毫毛。

又有一次，方志敏带了几个秘密下山到余家仓村，想召集几个积极分子议事。不巧，附近烈桥的国民党军突然出动，到余家仓“清乡”。得到消息时，敌人已快进村口了，转移是来不及了。余家仓的洪斌是个“白皮红心”的“清乡委员会”主任，动作很快，一把将他们几个推上了阁楼，一面踢倒凳子推倒桌子把家里的东西扔了一地。然后跑到门口去迎“清乡队”，哭丧着脸说：“长官，长官，快上我这里看看吧，你们弟兄在我这个清乡主任家里翻箱倒柜的，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么？”

这位长官朝里一望，果真是散乱的连脚也踩不进，忙说：“误会了，怕是搜方志敏搞的吧。”

洪斌却连忙把人家拉进来，又让座又递烟，仿佛舍不得这位长官走。后来又有士兵进来想搜，看见有长官在这里，也就退了回去。方志敏说：“这个洪斌啊，有勇又有谋，把个敌人耍得团团转。”

再有一次，方志敏到了横峰的霞阳村，正和村里的积极分子、农民骨干谈得起劲，不料消息走漏，军队又来包围了村子。一声号铙响过，老表们掩护方志敏上了后山。但是清剿队有地主流氓带路，道儿也很熟，跟着就爬上来了。追到三岔路口，忽然跑在最前面的士兵不追了，原来路边有不少散乱的银洋，被太阳照得耀眼闪亮。前面的士兵赶紧扭转身子去捡银洋，后面上来的也只顾得你抢我夺了。

原来，还是村里的农民群众拿从土豪那里没收来的银洋洒在了路上，这才使得方志敏们脱了险。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方志敏说得很动情：“不错，我们确实是极端的艰苦困难。来进攻我们的白军，总是两营或一团，欺我们战斗力弱，又弄得每村少则一个排多则一个连的驻扎，差不多将我们全部所有的村庄都扎满了。并且天天派队围山搜山，不消灭我们是誓不罢休啊，自然是弄得我们连藏身的地方也难找。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地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到树林里、岩石下，有时甚至是水沟的茅篷里去住。一天要跑几多次兵，晚间躲在茅篷里，也不可能睡个踏实觉，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与困难是无以交加的。但是，我要问一句，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仍然存在？”

破庙里静得地上掉一根针都听得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仍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方志敏，眼神中流露出一股热切的期望来。方志敏依然平静他说：“我晓得大家和我认识的一样，回答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老表群众，我们就垮不了。我再说一件小事，有次我见着群众的房屋被烧毁了，饭锅被打破了，只剩下半口锅，只得用三块石头架起这半口锅来弄饭。我说，老表呀，日子很苦呵。老表回答我，不要紧，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过了。大家想想，连群众都对革命这样地有信心，我们难道要落在他们的后头么？那么我们怎么还能称得上领导群众呢？”

庞先飞别转脸去，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看着外面庙檐不断线般地落下雨来。

方志敏微微提高了嗓音，平稳的语调中透出了一股斩钉截铁的刚毅与坚定来：“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是要同这里的群众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下去的。”

大家显然被鼓舞起来，会场上的气氛也活跃了几许，三五一堆地开始交头接耳起来。方志敏看了，心里有些感动。对革命能有坚定的信心，便是这场革命必定能够胜利的基本保证。见邹秀峰那一小堆人扎在一起议论得挺激烈，方志敏便喊了一声：“老邹，说出来大家听听，大家来议议道理。”

邹秀峰因为争执，脸都涨红了，额头上沁出一层汗，听见方志敏唤，便扭过脸来说：“老胡他们想的主意，我说不行，老胡不服呢。”

邵式平、黄道和众人的兴趣都被吸引过来，一起催促着说出来大家评断。

老胡有点犹犹豫豫的，邹秀峰就推他肩膀。

方志敏说：“大家只要把脑筋都动起来，这就应该受到赞扬，一个人说出一条主意来，我们就有了二十几条了，就算是有一半主意是对的，那也有了十多条。有了十多条好的能用的主意，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发展、不坚持下去呢？”

老胡看了一眼方志敏，又看了一眼邹秀峰，邹秀峰就又气哼哼地推他。

老胡说：“依我想，敌人现在的心思和兵力都集中在我们这块地方，就像箍桶似的，越箍越紧，把我们箍在桶里喘不过气来，可是这只桶的外面呢，敌人的兵力就空虚了。所以呀，我们可不可以带了枪，把敌人引到桶外面去，引出根据地，待他们走远了，我们再悄悄地回来。这也叫调虎离山。”

邹秀峰说：“这只老虎会听你的？你要是调不动他呢？反而连根据地都丢了嘛。”

老胡辩道：“怎么会丢了根据地呢，等敌人调离开了，我们不就又回来开展工作了嘛，根据地不还是我们的吗？”

邵式平想了一下说：“怕是不行。你走，敌人跟着你走了；你回来，敌人不也跟着回来了吗？还是没有把根子拔掉。”

黄道也同意邵式平的意见：“这样做被动得很，说起来好像是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实际上弄不好就是疲于奔命。敌人人数众多兵力足，我们人少武器又差，也容易被敌人吃掉。”

方志敏点点头说：“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离开根据地。对我们现在来讲，根据地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一是有革命群众基础，二是地形情况熟悉，这两点差不多可算得是了如指掌，也就是我们能活动能存在下去的基础。我们就像是河塘里的鱼一样，离开了根据地这块河塘，要不了三天就全得于死。如果跳出根据地转移到新的地区去，人生地疏，困难一定会更多。不要说引不开敌人，恐怕连自己也难以生存下去。种庄稼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了肥沃土壤，庄稼还长得好么？老胡，你再思忖思忖是不是这个道理？”

老胡说：“可是，现在天天被迫在屁股后头，连口气都喘不均，天数长了，不也要被拖垮掉？”

破庙里一阵沉寂，大家缄默不语。这是一个要害所在，敌人摆下了这层层包围的八卦阵，使得这片新生的根据地与力量屠弱、为数不多的这支暴动留下的队伍陷入了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摆脱不了这个困境，生存都是一句

空言，更不必说发展与壮大了。

许久不语的庞先飞突然龇着牙笑了一下，说：“这可就难了，恐怕一是要请来诸葛亮帮忙破阵，二是要有孙行者的本事，翻一个筋斗云出去才好。”他说完了，依然别转脸去看外面落雨，仿佛面前与身边不曾坐着这许多的同志。

他的声音不高，但话里的那股幸灾乐祸、冷嘲热讽的味道，是所有的人都明显觉出来了。

黄道呼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指着庞先飞的鼻子说：“庞先飞，你说这话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怎么跟敌人是一个腔调？”

庞先飞并不惧怯，一下子拨开了黄道指过来的手说：“我有没有说错？你凶个什么？再这样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各奔东西。”

庞先飞此时差不多已经下了决心，暴动太难，革命太苦，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桩事做的是最最划不来的。所以后来，他实在是既绝望又恐惧，也真是按照他自己所言，与共产党各奔东西，一直跑到国民党一边去了。

邵式平说：“我看你是叫敌人吓破了胆，还没有跟敌人交过手，自己就先胆怯了。”

庞先飞哼了一声，说：“就这样几十个人、几十条枪，打得过人家么？躲还躲不赢呢。”

这句话突然触动了方志敏。其实这些天来，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老是叫敌人这般撵来撵去的，哪里有个止境？要说起来，和敌人周旋到今日，实际上并没有与他们真正交过手。到底能不能打，要打怎么个打法，这些都要摆出来大家细细商议一下才好。

方志敏现在也不想太多地与庞先飞辩论，说来说去，都是一堆空话么。这一仗只要是能打好，庞先飞的动摇畏惧的言论，不言自灭，再也不会有人信。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创建的游击队与根据地，无疑会起到一种积极促进的作用。衡量来衡量去，打一仗看来是很必要的了。当然，硬拼是不行的。就这么点家底，可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方志敏没有理睬庞先飞，转过脸对大家说：“硬拼不得，不拼也不得，我们虽说是人少枪少，但是不是就一点也打不得呢？”

邵式平也兴奋起来了，他也被敌人追烦了，几次手痒难禁，但考虑准备得不充分，就没敢轻举妄动。这番听方志敏捡起了这个话头，一下子就撞到了他的心坎上，所以立刻就丢开了庞先飞，接上了方志敏的话说：“我看不一定打不得，据我了解，眼前敌人很分散的，声势虽大，分布力量却也有弱有强。只要我们不毛躁，仔细地选在他那薄弱的地方，狠狠地给他来一记，不见得打不赢他，打蛇也讲究个打在七寸上，主要是要选好机会。”

“对呀对呀！”黄道也拍起大腿来，说，“敌人看起来势焰熏天，人多势众，其实有一半是让他们用枪逼来的反水农民。敌人的主要力量是一个正规团，剩下的是地主武装靖卫团。凭我们现在的人马，要去打正规团不免有点盲动冒失，但是可以敲敲靖卫团的脑壳嘛。”

果然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十分的有兴趣。方志敏说：“还有一桩要紧的事，就是地主老财们会给正规团当‘眼线’，这也必须给它都搞瞎才行，否则我们一动，他们就去报信，我们吃亏大了。”

七嘴八舌又说了好一阵子，想了许多很好很具体的主意出来。方志敏十

分欣慰，这个会可没白开，主意与具体措施有了，更重要的是大家有了斗争的信心，此时的情绪与刚进得庙来时已大不相同了，连说话都眉飞色舞，抬高了声音，自信了许多。

方志敏说：“我们要准备做三件事。头一件，就是要打一仗。首先要把我们这支四十多人的游击武装集中，现在决定由邵式平代替派去德兴工作的邹琦指挥，打仗的事，再细细议一下。二一件事，便是打瞎敌人的‘眼睛’，这件事由我来做。刚才有的同志主张跳到外地去，这件事虽然行不通，但也有启发，我们也要准备新的阵地，到时候一打不赢，再打不胜，三打不得不转移的话，我们就有个新的依托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由黄道与邹秀峰到贵溪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同时，这次会议还议定了派人去敌人内部开展兵运工作，瓦解敌军，争取敌军起义。

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湿润的空气中透出一股清新的气息。不知不觉，满天乌云散去，一轮难得的皓月当空。夜色很静，夏夜里的蝉仍在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叫，大家从破庙里出来，兴奋得丝毫无倦意，抱着大干一场的信心，伴着高低错落的蝉声悄悄地下山去了。

第十五章

做田人学得了“民主”这个词，十分宝贝，参加打仗也要讲“民主”举手报名
公审“眼线”蓝缺嘴，当蓝长金去捉他
时，发现他已被吓断了气息 方志敏送
了顶高帽子给老嬷嬷戴，终于枪毙了五
叔方高雨

不晓得是什么原由，方志敏他们把那支四十多人的游击队命名为“土地革命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不管怎样，在赣东北地区就算是有了一支正式的红军队伍了。连长是胡德畛。不过这支队伍要打第一仗，头一个遇上的麻烦不是敌人，却正是他们自己。

在方胜峰的破庙里，定下来先打那股每日从过港埠出来扰乱作祟的靖卫团。地点选在敌人的必经之路金鸡山。这个地方，名字叫得蛮响亮，地形却不怎样。光秃秃的山并不高，除了山腰间有一些稀疏的树林与山竹外，要隐蔽许多的人是有点困难。队伍刚刚创建，讲服从命令少，讲民主多。“民主”到连打仗都要大家自愿报名，要是自己不愿意去打仗，那按照“民主”也只得随便他去。什么事情都得战士们自己情愿才行。做田人学得了“民主”这个新词，十分宝贝，动不动就要求讲一讲“民主”。这一番打仗是都跟来了，可是一看到金鸡山这样矮小难以藏身，都嘀咕开了，哪个也不肯上山。

这时，邵式平赤着脚，戴了顶斗笠，冒着连绵不断的夏雨和吴先民、花春山、邱金辉几个人早已到了金鸡山。结果等了许久，也不见部队开上山来。邵式平急得要冒火，赶紧一步一滑地往山下赶去。队伍果然在山脚下的竹篷巢歇息，胡德畛急得跺脚，但是战士们也不动弹。

邵式平问：“你们为什么不上去？”

胡德畛说：“真叫没办法，他们嫌地势不好，说要讲民主，不能命令着他们上去。”

“是为这个？”邵式平说，“我上大学读的是地理课，也算懂得一些地势地理吧。地势不太好，不过还有个人势，不晓得你们大家可曾了解。”

战士说：“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邵式平点点头，说：“好，我把情况简单地摆一摆。天天被敌人追在后头跑不是回事，所以要打一仗，要改变一下这种局面，这一仗打赢了好处很大。敌人现在分四路来进攻我们，就数金鸡山的这一路力量最薄弱，这就是我要讲的人势。我们就要打他，打这个最薄最软的部分。打赢一路，心里有数，就一路一路打下去，路路都打赢，暴动就有白闹一场，戈、横还是我们的。所以你们看看，地势差点算什么？敌人还有个人势差呢。你们再民主一下，打还是不打？”

战士们一听就明白了，一个个站起来说：“莫多说啦，光叫敌人追得吃野菜睡茅草，窝火都窝死了，今朝我们也要狠狠地追一下他们，出出气，让敌人也尝尝屁股后头有追兵的味道。”

邵式平立即叫胡德畛把队伍带进了山腰的竹林里。还没等队伍完全隐蔽好，瞭望的号铳就响了。

远处已是浓烟滚滚，烈焰腾空。敌人一路放火过来，从湖西到霞阳这段十多里长的一带村庄，已经成了一条火借风势、风助火势的火龙。从山上望

下去，只见成群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呼天号地的向山这边奔逃。紧追其后的是黑压压一片的上万名反水农民，被约有一连的地主靖卫团驱逼着从过港埠一路烧杀而来。

吴先民与花春山带着农民赤卫队来配合这次行动。按着计划好的，很快就先与地主靖卫团接上了火，虽然枪不多，打得倒挺热闹，又喊又砸的，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了。

后面跟着的那一大批反水农民差不多都是外埠的，给他们说的就是抢劫一空。他们也晓得抢人家东西不对，不过一来是有枪顶在脊背骨上逼着，二来是那种想捞点便宜外快的心里作祟，所以带了不少的箩筐、口袋，一进村就挨家挨户地去翻箱倒柜抢东西，凡是有一点能值上几个钱的物件差不多全给装走了。

邵式平不打算正面接触敌人，一心要打他个出其不意。带着队伍上了金鸡山就立即绕小路抄到了靖卫团的后路。靖卫团只晓得前头遇上了拦路虎，岂料到背后还有一支回马枪，一下子腹背受夹，顿时乱了阵脚。邵式平涨红了脖子大喊：“冲上去！给我狠狠打！”

战士们十分英勇，打仗凭的是一股气，这股气顶上来了，什么也挡不住。冲到近前连枪也不用了，举起大刀梭镖就砍就刺。前头的吴先民看到邵式平在后路打响了，靖卫团的人已经昏头转脑地不晓得是顾头还是顾腩。时机正好，于是他一声令下，带着几百名赤卫队员像股洪水般从山上冲了下来。两下一夹击，靖卫团溃不成军。

这边乱了不说，那些被驱逼前来抢东西的反水农民一听到枪声像蹦豆子般炸响先就慌了，再见到靖卫团败下阵来，赶忙把手中的箩筐、口袋全扔了，不顾命地四散奔跑，只恨爹娘少给自

己生了两条腿。跑在后面的人慌里慌张把梭镖、扁担捅到了前面人的屁股，前面的人以为后面是红军追来了，杀猪般地喊叫起来：“饶命呀，饶命呀，我是被抓来的！”边喊边没命地跑。

“农民弟兄们，大家都掉转头来打反动派呀！”胡德畛跳上路边的一处高坡地放声高唤。

前面被迫赶的几千做田人，这时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马上回过身来呐喊助威，漫山遍野像潮水般冲了回来。一时间冲杀声、呐喊声，已是此起彼伏，震撼山谷。靖卫团哪里还敢顾上细看，根本也摸不清到底有多少红军，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实在跑不动的，看见路边有稻草堆便一头扎了进去，以为是急中生智捡了条活路，可还是叫农民们给揪了出来。当官的声嘶力竭在喊“顶住”，根本无人肯听，结果被迫赶中的吴先民瞧见，一枪就给他撂倒了。

靖卫团这一下垮得一败涂地，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的士气自然就更高，大家兴奋得连饭也顾不得吃，一鼓作气追了50多里，一直追到戈阳县东门外才算作罢。意犹未尽，又放把火把东门外敌人的指挥所给烧了。

此时的戈阳县城已是乱作一团，兵败如山倒，挡也挡不住。国民党的县长李克明看见东门外火光冲天，已是吓得魂不守舍，也不组织兵力，也不弄清情况，连轿子也顾不上坐，自顾自带着几个随从亲信闻风逃出南门，径自过信江跑了。他这一跑，城里住着的豪绅地主、官僚政客、富商巨贾以及太太小姐们一并跟着狂逃。人多路狭，拥挤着过信江浮桥时，又有人被挤下河去落水淹死，哭叫声不绝于耳。其实这辰光邵式平带着队伍已经折回了竹篷

巢。

天已近黑，敌人的动作也很快，青板桥一路的敌军闻讯前来救援。被邵式平他们得到信，与吴先民、花春山们简单商议了几句，觉得可以打它一家伙，一来是士气正高，十分难得可贵，只可鼓不可泄，在这种情绪状态下打仗效果最好；二来有夜幕作掩护，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果然，这一仗连夜出动，一战将其击溃。敌人军心已散，黑夜中不知有多少红军与赤卫队，只听得四面杀声，令人胆颤。这种队伍拉上阵去，哪有不败的道理。

哪晓得人要走运也是挡不住的，队伍已打得士气旺盛如同一盆熊熊的炭火。刚打完夜仗又有人送信来，说漆工镇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咽不下这口气，要回县解围。邵式平想，正规军武器好、兵力足，但可谓骄兵必败，就乘他们没把这点红军队伍放在眼里，打他个措手不及也不是不可以。在队伍中“民主”了一下，这帮战士打上了瘾头，一听说又有仗打都嗷嗷直叫，也不肯静下心来休息。“民主”的结果是全体一致要打。于是连夜急行军，跑了80里路，抢在敌人前头赶到樟树墩，在敌人的必经之路设好了埋伏。

敌人从漆工镇出来回戈阳，走到樟树墩差不多正好是一半的路程，6月的雨季湿闷难禁，道路一步一滑泥泞不堪。再加上又是大白天走大路，敌人思想上十分大意，心想这帮子农民穷鬼拿着鸟铳、梭镖打打靖卫团还可以，哪里会自寻苦吃来碰正规军？所以怎么也没有料到在这里会遇上一支伏兵。这种状态下接火，真真是措手不及，只有一个输字。红军也不恋战，打垮了正规军就撤了，捡了个便宜。

这三战三捷打得自然是十分的漂亮，一仗便打掉一路敌人，一共有四路围攻之敌，只剩下的这路已是风声鹤唳，士兵们都在私下议论红军如同天兵天将，说得自己先乱了军心士气，被胁逼而来的一大帮子农民也都一哄而散，于是这支队伍也只好离开胡家墩撤回县里。

邵式平、吴先民和花春山几个人乐得是颠倒了日脚，白天黑夜地睡不着。这一下可算是打牢了弋、横这块立脚之地，打出了新创建红军队伍的威风，打掉了国民党军和地主靖卫团的嚣张气焰，打开了一条崭新的生存之路。

邵式平这路打仗连连报捷，方志敏那路“挖眼睛”也搞得有声有色。漆工镇一个专门四处收集情报、反攻倒算的恶霸，被处决在家门口的池塘边；仙湖那个常常替靖卫团带路烧杀的地痞流氓倒在小路旁的一摊污血中；姚家垅的富农黄振庐刚刚写好给反动军队的告密接头信，就被当场拿获，死在家中的八仙桌前。几处一搞，地主恶霸自然是又恨又怕，为了不招杀身之祸，行动也收敛了许多。而压抑了许久的农民们又活跃起来，纷纷来报告何处有敌人的密探与眼线，于是又得了许多的线索。

这天夜里，方志敏带了两个人悄悄地潜回了打响弋、横暴动第一枪的楼底蓝家村。事隔数月，楼底蓝家村已不知过了几遍的大火，烧得是残墙断壁，漆黑一片，面目全非。蓝长金和蓝高茂躲在山上的煤窑里，听说方志敏来了，连忙摸黑下山来见方志敏。大家一聚拢，连蓝长金那样的汉子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拉着方志敏的手半天不肯松下来。

蓝高茂说：“房子也被烧光了，粮食也被抢光了，反动派说，我们楼底蓝家村是匪窝，房子要过三遍火，人头要过三遍刀。我们的人马当时正好调去打八区的靖卫团，村子里就剩老弱妇幼，洗劫一空不说，死伤无数哇。”

方志敏疑惑地问：“这事早就觉得蹊跷，敌人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单单

就捡了你们攻打八区的辰光来了呢？没有眼线就解释不通了。”

蓝高茂跺着脚说：“你猜得一点有错，就是出了奸细，有人做眼线哪！”

方志敏接着追问是哪一个通风报信把敌人带进村来的，蓝高茂说：“就是那个主动前来交出田契借据的蓝缺嘴呀，你想都想不到这狗崽有这么恶。”

方志敏是晓得的，由于蓝缺嘴当时积极主动的表现，所以得到了农民革命团的宽大。他叹了口气，数九寒冬的蛇哪怕是冻僵成一条棍子也捂不得。

方志敏做事很仔细很谨慎了，挖眼线挖错了也不好，一定要证据确凿才行。所以又盯着问了一句：“事情确实吗？可有证人？”

蓝高茂说：“有人亲眼见到，哪里还有的假。那一日反动派拖着因为生病没跑上山的良全婆娘去强奸，正碰上蓝缺嘴领着一帮人抢东西烧房子。良全婆娘呼喊着重央求蓝缺嘴救救她，蓝缺嘴假装没听见，头扭过去理都不理。后来良全婆娘弄了个残疾起不来床，可脑筋不糊涂。等我们晓得了之后去抓蓝缺嘴，这狗东西腿脚来的个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到今天还没抓住。”

方志敏恨得直咬牙，说：“一定得找到他抓住了正法，要为良全婆娘出这口气，也要为整个楼底蓝家村报仇，更要教训教训像蓝缺嘴这般怙恶不悛的地主流氓。不打掉他，楼底蓝家村的工作就不好再恢复。”

听了半天没吭气的蓝长金说：“这件事交给我，我也憋了好几个月了，蓝缺嘴就是条泥鳅，钻到河塘的泥底下去，也要把他钳出来掐死。”

敌人有眼线，方志敏他们更有无数的农民老表传递消息，织成了一张大罗地网。蓝长金带着人发出传讯，四下查找，没有几天就有了消息，蓝缺嘴躲在了罗家岭他的一个亲戚家里。蓝长金得了信之后根本等不到第二天，当天一个人就去了。结果果然把蓝缺嘴像抓小鸡似的揪回了楼底蓝家村。全村人没有一个不恨这个引狼入室的恶棍帮凶，良全背着他婆娘去了。良全婆娘当面问蓝缺嘴：“可是你把反动派叫来的？可是你看着我被人拖走连救不救的？可是你点火烧得全村的房屋？”

蓝缺嘴已经吓得软瘫在地上，连说“是”字的力气都没有。大家一致同意公开枪决蓝缺嘴。不过等蓝长金上去拉他时，发现他已经断了气息。做了亏心事活活被吓死了。

“眼睛”就这样一只一只地被挖掉。本来事情进展得还蛮顺利，可是不久，方志敏却遇上了一个大难题。

难题出在他的亲五叔方高雨的身上。

方高雨原本家境也一般，不过他脑子快心肠也狠，分家后不知何故发了一笔横财，一下子就暴富了，接着置田放债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有了钱自然就更爱钱、更舍不得离了钱，早先农协闹免租免债，方志敏就为了钱财与他干过一场。

当时的方高雨并不把几个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放在眼里，他有他的理由：“世上哪有欠租不交的，欠债不还的理？今辈子不还，下辈子变猪变狗也是要还的，这是几百年的规矩了。”而且方高雨还把方志敏搬出来做他的后台，对着农协的积极分子说，“你农协归共产党领导，正鹄是江西有名的共产党，我又是正鹄的亲叔，你农协能把我怎样了？”

方志敏则在湖塘农协大会上当众表示：“方高雨既是财主，还要作怪，公然与农协唱反调，这已是罪加一等。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我的五叔，就徇私情拉不开面子来斗争他。”会后又立即叫人送信给方高雨，要他老老实实地服从农协决议，交出契约借据，拿出银洋粮食来助民度荒。

方高雨凶得狠，竟破口大骂道：“这个反贼翻脸不认人，革命革得连亲叔都不认了，真真是读书读到脚背上去了！”

方志敏的其他叔伯们去劝，方高雨根本不打照面，你从前门进他从后门出。

农协主席方远杰上门去找他算账讲理，方远杰的父亲方高显是他的大哥，所以方高雨跳脚大骂：“你也是我的亲侄子，正鹄也是我的亲侄子，你们这都叫革的什么命？单单会找你亲叔呀！怪不得前些日子东头的母鸡都打起鸣来变了雌雄，世道乱啦！世道乱啦！”

方志敏晓得之后也气得要命，心说你这么顽固反动，不要说你是我亲叔了，就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把你揪出来。决心已下，便带着方远杰和许多农协会员到方高雨家里拔钉子。

方高雨把门闭得紧紧的，一点声息都没有。喊了半天无人搭理，方远杰急了，抬脚便踢起乌漆大门来了。这一阵猛踢，方高雨终于沉不住气了，闷闷地传话出来：“我犯了你们农协会什么王法，要这样来闹事？”

农民们气得按捺不住了，听见他开了口，结果火气比他还旺：“少废话，把契约借据交出来再说，要不然，扒你的门墙揭你的瓦！”

方高雨眼珠一转又想了个缓兵计，不敢硬顶就想软拖，听听外面似乎一直没有方志敏的声音，以为他没来，便借口说：“要我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行，只是你们说了不算，让正鹄来开一句口，要他定下来才行。”

方志敏一直在外面，一看自己这个亲叔简直像块牛皮糖，又硬又赖地耍滑头，又开出这种自以为聪明的条件，于是立即开口大声说：“方高雨你听好，限你立即开开大门，答应农协的一切要求！不答应，后果你自己负责！”

方高雨这才晓得自己失算了，无奈何，只得软下来哀求道：“正鹄，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一个祖宗的份上，一笔也写不出两个方字来，你就抬抬手，放过我这一次吧。”

方志敏哪里肯通融，早就觉得这个五叔给方家丢死了脸。一大家子革命，偏出了他这么一个顶头瘟。全村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呢，所以一步也不肯让，大声说：“方高雨不服罪不认错，怎么办？”

外面的人一起沸腾起来：“把他捆起来！”“送他坐班房！”“决不能放过他！”边喊，边有人翻墙进了院子，开了大门。

当众人一拥而进之时，方高雨正手执一柄菜刀，红着眼睛从里屋冲了出来，照着方志敏就砍。大家立即围了上去，夺下菜刀，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直到此刻，方高雨才算是没咒念了，把借据田契交了出来，又忍痛拿出了十担谷子，作为农民协会的活动经费。

这一回，方志敏是赢了，不过从此以后，亲叔侄之间便结下了深深的怨恨。而且方高雨是变本加厉，恨透了农协会和农协会员积极分子们，并且六亲不认，将事情做绝。

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塘村遭到了血腥洗劫，方志敏的大伯、也就是方远杰的父亲方高显，和湖塘村的农协会员方华义、方高烈都没来得及逃脱，惨遭杀害。方高雨却觉得抬头出气的日子来了，携带全家潜离了湖塘去投奔了靖卫团，帮他们作恶。所以这次方志敏开始“挖眼线”，方高雨也是其中的一只。

本来这件事并不难办，抓方高雨也没费多大的周折。但是抓到方高雨后，难题却出来了。方高雨说：“你们抓我容易放我难！不管怎么说，我是正鹄

的亲叔叔，他还能一刀把我杀了不成？他爹他娘会肯？祖宗会同意？你们要私下把我处置了，正鹄肯定放不过你们！”这番话连他自己都觉得说得理直气壮，抓他的几个人便犹豫，于是把个方高雨带了回来，交给方志敏处理。

方高雨前脚押到，方高翥后脚就来找儿子求情了：“正鹄，不管怎样讲，他也是我的亲弟弟，是你的亲叔叔呢。教训教训他可以，只是还是饶他一命吧。”

方志敏想，自家爹爹便是第一关，这一关要过不去，后头就更不好说了。于是拉着爹爹坐下来摆道理：“爹，你是明理的人，我干这么多年的革命，你是从来也没扯过后腿拦过路。这一次我只问你一句，你细忖忖，远杰、远辉、志纯的爹爹是不是你亲大哥，是不是我亲大伯，是不是方高雨的亲兄弟？”

方高翥一时开口不得。要论起道理来，这个弟弟也真是舍不得，大哥方高显被靖卫团捉去，死得那样苦，他不去救不说，也不当仇，还当亲去投奔杀亲之敌。这不是心都长在外面么？还上得祖宗坟么？那一趟，自己和正鹄娘要不是逃得快，只怕也是难逃魔掌，只怕今日里也不能和正鹄坐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讲话了。

方高翥还有一层担心，说：“唉，正鹄，爹也晓得你做事说话都在道理上，于情于理方高雨都饶不得，可是你晓得的，你那个祖母那把岁数了，只怕受不得这种刺激，到她那里怎么讲得过去？我回去，还不让她骂死呀！”

方志敏看到老实的爹爹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于是又劝慰道：“爹，祖母要骂人，你就躲着她一点，等她过了这阵气平息了，也就好讲了。实在不行，你就全推到我头上，让她来找我骂好了。”

方高翥叹着气走了，哪曾想，刚刚送走自家爹爹，老祖母又巍巍颤颤地摸上门来了，进了门自然脾气还不小，一个劲地叫：“正鹄，正鹄，晓得要躲我了是啵？翅膀硬了，连我都不认了是啵？”

方志敏晓得这番的阻力比自家爹爹还要大，老祖母年迈高龄，你跟她是气不得急不得。她的工作若是做不通，只怕是硬杀了方高雨，也会落下怪话来。方志敏一时还不曾想出好主意，老祖母已经摸索着进了屋。

方志敏连忙迎上去，搀扶着老祖母坐下，又赶紧倒了碗水来。说：“嬷嬷，我在呢。你先坐下来落落汗，喝口水解解乏。”

老祖母推开他递过来的茶碗，没有一丝笑容说：“正鹄，我今天是特地来向你求情的，给你五叔留一条活命。你不念他是你的亲五叔也罢，可你得念念我总是你的亲祖母吧。”

方志敏一时倒想不起话来回答，真为难。只得一边拿过扇子来给老祖母扇风一边说：“嬷嬷年龄大了急不得，先歇歇，急要急出毛病来的。”

老祖母见他殷勤，气倒也消了一些，也拉着方志敏一同在身边坐下，说：“你也坐坐歇歇，我这几个孙仔年纪都不大，做的事体是蛮蛮大，不要累坏了才好。”话语里一半是关切一半是骄傲，让方志敏听了也觉得热呼呼的，到底是自己家亲祖母。于是又去拧了一把凉毛巾，亲自为祖母擦汗。老祖母自觉也是舒心，接着又说，“我讲呢，正鹄还是我的正鹄，哪里会做叫我不开心的事。”

这话头似乎又要扯到方高雨身上去了，方志敏连忙转移话题，说：“嬷嬷，你晓得人家说你什么？”

老祖母很诧异：“还有人说我？”

“是啊，”方志敏假装板着脸说，“说我家老嬷嬷样样明白，就是偏心呢。”

老祖母哪里晓得方志敏是在给她兜圈子，自作聪明地问：“你是说我偏你五叔？”

方志敏哈哈地笑了起来，老祖母更加疑惑地望着他，一碗水端在手上半天也没顾上喝一口。方志敏边笑边说：“你是偏我呢，是不是？人家就这么说呢，‘光晓得正鹄长正鹄短’，别的崽怎么不都问问？”

老祖母一把夺过方志敏手中的扇子扇了起来，哼了一声说：“哪一个吃饱了嚼舌头？兵荒马乱的年头，你们几个孙仔总在外面东跑西躲的，哪一夜挂念着都困不着。都是我的亲孙仔，哪一个不是方家的亲骨肉？旁人怎么能懂。”

方志敏连忙赔笑道：“是哩是哩，那是外人讲话，听了不信就罢了。远辉、志纯都讲嬷嬷好呢。”

这一说也提醒了老祖母，想起孙仔来牵挂得紧随即便问：“他两个跑到哪里去了？也不晓得来望望我。”

方志敏说：“远辉跟邹琦到德兴去帮种田人议事了。”

“邹琦？就是上过讲武学堂的那一个吧？”老祖母问道。

方志敏佩服老祖母的记性，索性送顶高帽子给老人家戴戴开开心：“嬷嬷真真是样样都弄得清清爽，这大年纪，记性这般地好，旁人哪里能比。”

老祖母心里自然是有了几分开心又有了几分得意，于是又问：“志纯呢？”

方志敏说：“他倒离这儿不远，不过不晓得你老人家来，所以有赶过来看你。隔些日子他要去贵溪，帮那里的种田人起事。临走前总会去你那里的。”

老祖母点点头：“我还留着点大米粿，他最喜欢吃的。”

方志敏心头一动，立刻接上话尾：“大米粿呀，我也顶爱吃，还有远杰也是最喜爱不过的……”说到这儿，突然刹住了口，语调一变，很沉痛地说，“唉，一说就忘了，好像远杰还在呢。”

老祖母自然就想起方远杰那副生龙活虎的模样来，又连着想到方远杰的父亲、自己的亲生大儿子方高显，想到如今已是黄泉路断，再不能见，早已是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不曾想到哇，倒是白发人先送了黑发人，我那远杰孙仔走得可怜，他个爹爹走得更是苦呵。我这把有什么用的老骨头倒还在，不如去拿我换了他们来。”

方志敏觉得有些真相也是要说给老人家听听的。平时说得少，是怕老人家操心劳神，今日要再不说，恐怕工作就难做通了。于是一面给祖母擦眼泪，一边说：“嬷嬷，你晓得我大伯走得冤枉，走得好苦，可你晓得五叔是怎样跑去对仇人讲？他讲：‘杀得好！他家里还有三个仔是‘共匪’，死了一个还有两个，要统统消灭了才称心如意！’”

老祖母也不是一点是非都不分，道理上她是明白的，只是情理上过不去，所以听见方高雨竟如此不顾亲情，也是恨得不行：“唉，要细细思忖起来，你这个五叔也真不是个东西。一家人都晓得个革命，就他为了几块花边光洋恨透了革命，恨得连亲哥哥、亲侄子都不认。说起来，真是没了良心，哪里还像我们方家的人。”

方志敏很认真地说：“嬷嬷，这里头没有兄弟、叔侄的关系了，这是反革命对革命，只有阶级关系了。”

老祖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没有想到哇，你祖祖留下七男二女，本来也算得是个人丁兴旺，谁知弄到这般田地，一想到我倒要看着你五叔先走一步，以后不晓得怎样去见你祖祖呢？”边说边哭，流下的眼泪擦也擦不及。

方志敏晓得，毕竟五叔也是老祖母的亲骨肉，祖母舍不得也是情有可原的。想到这一层方志敏又更加恨方高雨，害了自家众多的亲人，还要让年迈的母亲牵肠挂肚，满腹的愁肠无可排遣。方高雨做人做到这一步，乐趣与亲情已是荡然无存，只怕也是做到头了。

方志敏又拧了凉毛巾来给祖母拭泪，轻轻地抚着老祖母瘦弱的肩膀，说：“嬷嬷，莫要太伤心，哭坏了身体孙仔可当不起。我家祖祖为人做事只有方正二字。人人称好。你想想，要是老祖祖还活着，看到五叔做下这样有道理的恶事，不说是气伤了心，也一定会骂他出祠堂的。”

老祖母深深地叹息着，摇着头说：“提不得了，你祖祖的那副脾气，眼里哪能揉得进这颗沙子。唉，这个五仔作孽呵，我这个当姆妈的想护也护不得了。”

方志敏和风细雨地劝慰老祖母，轻轻地说：“嬷嬷，要论起来，家里人、家里事都好讲话，五叔总是亲五叔，他对我也不是有过一丝好处。嬷嬷你要是说声饶了，孙仔还敢动？可是现在你再看看，这个五叔害人是害到众人头上去了，作恶是作到革命头上去了。大家不肯依，革命不能饶。嬷嬷你替孙仔思忖思忖，放在孙仔身上怎样做才是好？”

老人家听着听着，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摇摇头，孙仔所讲的道理与对儿子的亲情缠扭在一起总也理不出来，一时间心里边什么滋味都有，只是哭个不停。

方志敏也叹了口气，劝道：“嬷嬷，五叔的事，我们方家的人已经管不了了。老祖祖就是在九泉之下晓得了，也决不会怪你老人家的。”

老祖母巍巍颤颤地站起来往外摸索，说：“正鹄，我误了你的事了，我要回去了。”没有再提方高雨一个字，只是老祖母的步骤迈得更乏力了，背景也显得更苍老了。

方高雨这只“眼线”终于挖掉了。周围四乡里的土豪劣绅看到方志敏真是做的出铁面无私，大义灭亲，都晓得了厉害，顿时收敛了许多。原似封冻的局面也终于有了松动。

第十六章

周坊农民革命团取了个名字叫“十三太保” 抓着了四条“水蛇崽” 翁志高暗中设计打周坊，却不料反青了黄遭的“圈套” 方志敏发愁的是仗好打，有的“文章”却难做

在方胜峰破庙里开会时布置的几件事，差不多都有了成效，弋阳、横峰地区的局面重新有了新的起色。这样相比之下，黄道与邹秀峰在贵溪开辟新根据地的工作进展得就显得缓慢了。

进展缓慢，自然是因为困难太多。此处不似彼处，贵溪与弋阳、横峰的情况差别很大。其实要说起来，贵溪的农民运动闹得也挺早，还冲上龙虎山捉过张天师。但其中出了一个很大的岔子，这便是在1927年5月，贵溪地区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江宗海被李烈钧的部队残杀。江宗海遇害之后，贵溪的农民运动差不多就瘫痪了，无人操持，无人起头，形如一盘散沙。地主、流氓与封建帮会势力却扩展得很厉害。所以黄道、邹秀峰虽说是来了个把月，也只是摸了摸情况，一锅温吞水还一点没有要滚沸的意思。

方志敏心里有点着急，但也晓得，这种事情急是急不出来的，也不是赶几个夜班可以做出来的。想着还应该去看一看，心里有了数才能挑出一把开锁的钥匙来。

当初方志敏与黄道选中的地点是贵溪的周坊。按理说这个地方作为开辟新根据地的基点是有它的优势的。周坊处于贵溪、万年、余江的中心，四周多山，尖峰刺天，林木茂密，地势多变。从军事这个角度上讲，这块地方倒是进可攻、退可守。贵溪与余江、万年连起来便形成了个三角板块，东与弋阳、德兴相接，两下一并，便占了信江八县中的六县。这样若是能形成一气，回旋的余地就更大了。

黄道在贵溪周坊的白沙岗，依然还是用挂牌行医作掩护，昼伏夜出地进行活动。看到方志敏来，自然十分高兴，连忙把他迎进屋，又去把邹秀峰和邵忠、邵棠兄弟俩找来。等大家坐定了，黄道便先开了口。

黄道说：“志敏，你真真是想不到，我们弋横暴动对这里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头一开，方志敏便兴趣浓浓地催促：“你快摆出来听听，究竟有一些影响？是好是坏？”

黄道说：“好坏都有。好的影响是，这里的农民群众暗中得知了弋横暴动的消息，晓得了烧毁地契借据、打击上豪劣绅的种种事情，都觉得很过瘾、很出气，也都跃跃欲试，鼓起劲来了。表面上看周坊虽平平静静无声无息，但内底里已不是死水一潭了，暗中的急流已经有了奔涌的迹象。”

方志敏觉得这消息很是鼓舞人心，脸上挂着微笑，催着又问：“那糟的一面又是什么呢？”

黄道说：“弋横暴动的消息传来，农友群众的情绪受到鼓动，但另一方面也等于给地主老财们敲了一记警钟。这帮家伙立刻就警觉起来，鼻子灵得赛过狗，动作也快，剑拔弩张地把团练之类的反动武装也办起来了，对于我们外来活动的人员也非常注意，所以在这里不能像弋阳、横峰那样大刀阔斧，大张旗鼓地干，弄不好就要出事。”

邹秀峰接上话尾说：“是的，这里的情况我们也议过几次了，都认为一

定要小心谨慎，要不然，事情尚未有眉目，倒先被反动派抓走几个、杀掉几个，对群众的情绪影响就太大，这样就更不容易开展工作，也就更不好起事了。”

方志敏说：“是，我们的骨干都像金子一样宝贵，保存住了骨干就等于保存住了革命的火种，赔本的事不能做。这里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反动派的势力既明显又嚣张，要多打牢群众基础才好。”

邵忠和邵棠在周坊的工作开展得也不是十分畅快。兄弟俩虽然祖籍周坊，但因多年随父迁居外地，返回周坊开展农民运动，不免有初来乍到、摸不到锅灶的感觉。因此也不能像弋横那样，迅速地组织起农民革命团。

方志敏沉思了片刻，说：“武装是最要紧的。看来周坊这里比较关键的一条就是，地主劣绅已经晓得了要用武装保护自己，并且行动了起来。而农民们还没有。要尽快地把农民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武装打垮反革命的武装。”

邹秀峰又说起了周坊一带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情况。贵溪县里的地主靖卫团成立得早，团总叫翁志高，凶悍霸道，鱼肉乡里。老百姓心里生恨，却是强人棒下无真言。在周坊村边岭脚底有一户财主恶霸周龙太，农民们恨之入骨，给他起个绰号叫“水蛇崽”。周龙太家里一共兄弟四个，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又与翁志高挂上联系，打探消息送情报，成了周坊一霸。农民们恨他们，但更怕把他们闹翻脸，惹祸进门，闹个不休，无安生日子好过。有的农民势单力薄，还要求得周龙太们的庇护。所以虽是又恨又怕，却是不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

黄道说：“此地的情况比较特殊，敌对封建势力显得较强，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开展像弋阳、横峰那边搞的‘上名字’运动，也不好公开打着农民革命团的旗号。想来想去，只能弄点‘十三太保’、‘九友结义’、‘一百单八将’这类帮会团体的名称作掩护，这样可能隐蔽巧妙一些。”

方志敏说：“这是可以的，到哪一座山头唱哪一方山歌，要是硬斗，只怕会输个精光。”

接着就议定了，头一步仍然是要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发展骨干力量与积极分子，然后展开“上名字”运动，打牢群众基础。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随时准备“掀开”盖子。同时又商定，邵棠在这里已经引起了贵溪地方封建势力的注意，再留下去工作困难会更大，也很不安全，决定调他去红军团工作。另派李尚达、程伯谦、方志纯前来，加强对周坊一带农民暴动的领导力量。

经过这一总结、调整，贵溪的工作开展得快了起来。以周坊为中心辐射出去，贵溪的塔桥、泗沥、横山一带，余江的象鼻湾、画桥、大桥一带，和万年的富林等地，都有了秘密的党支部。“上名字”活动自然也开展得很蓬勃，在贵、余、万地区搞起一大片。刚开头，上了名字的农民们心里总有点不够踏实，晚上也不太敢走夜路，为防身自卫，有些人弄些小刀、匕首一类的小玩艺随身带着。后来觉得弄这些东西不过瘾，又搞起了大刀、鸟铳什么的。有了一点搞武装的萌芽。

周坊的农民革命团开始取了个名字叫“十三太保”。原本是个障眼法。谁知周龙太和他几个兄弟晓得了，也硬要参加。他倒并不十分清楚这个“十三太保”是做什么的，一心想着的是多抓一股势力在自己手中。因此他非常蛮横地说：“假如不让我们兄弟几个参加，那上了名字的人就不用想活！”

哪晓得黄道知道了以后很高兴，正好将计就计，说：“不但让他上，而

且让他上在前头。”好多人疑惑不解，黄道笑着抓出一只药葫芦出来打比喻，说，“这水蛇崽四个就是我们的一柄遮风挡雨的伞呢，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贴张标签是万金油，他怎知道我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水蛇崽们亲自卖药，敌人还会来细查么？”大家都说很妙。

在开展“上名字”的基础上，黄道他们还是用喝鸡血酒的形式，组织贫苦农民搞起了农民革命团。工作基础好的村，还把赤卫队也组织起来了。到了1928年的冬季，周坊附近几十里的地区，农民革命团已经成为半公开的组织，每人都做了一套对襟衣服，胸前做了七个扣子，准备了红领巾和红绑腿，再加上一个青布包袱和一把弯柄伞，这叫做“青布包袱弯柄伞，对襟褂子共产党”。

过了阳历年，转眼就快到除夕了。暴动还未“掀开”，却不料在这个当口出了事。事情就出在水蛇崽周龙太身上。

为了筹集暴动置办武装用的钱款，农民团用打土豪的办法，选择了几户家财富有、百姓中声誉差的地主作对象来打。周龙太贪财，觉得只要分得钱，管他是打谁，不过这家伙脸皮甚厚，不管是打谁，也不管是谁打，只要他得知了消息，便理直气壮地来讨要份子。

快年年底，暴动的盖子也计划着要“掀开”了。周坊的农民革命团计划了一阵后，打了一户家产颇为殷实的恶霸地主。刚刚行动回来，周龙太带着周龙虎、周龙豹闻着腥就来了。进门便吵嚷着要分东西。

黄道没在。邵忠白了他一眼，说：“谁叫你来的？”

“这还要谁叫？”周龙太拉了张长凳一屁股坐了下来，说：“只要打抢劫，人人都有份。这是老规矩。”

邵忠说：“老规矩不顶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新规矩？”周龙太鼻子里哼了一声，满脸是瞧不上的神情，“有我们在这里，哪个敢立新规矩？是不是？”还转过脸去问周龙虎与周龙豹。周龙虎与周龙豹便跟着乱嚷嚷了一气。

这时的农民革命团已不是刚刚成立时那样嫩弱。当时，一旦有了麻烦，还要利用周龙太去推挡一阵，核心的秘密虽不让他们知晓，但也不惹翻他们。现在都要“掀开”盖子了，还有谁会买这几家伙的账？有这几个人在，也碍手碍脚的实在讨厌，也到了锄掉这一拨毒枝毒蔓的关口。所以他们闯上门来后，便没有人给他们好脸色看。

邵忠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这里是你们嚷的地方吗？”

这一声断喝，把周龙太倒吓了一跳。他一看邵忠的脸板得铁青，身边立着的七八个农民，也都是竖眉横目。这周龙太是蛮横惯了的，顿时也把脸一沉，斜着眼说：“老子不是来跟你比喉咙的！告诉你，分也要分，不分也得分，只要我上了名字，我就要分！”

邵忠冷笑了一声，说：“想得倒美。你倒说说看，你水蛇崽给我们分了什么？”

周龙太历来只晓得巧取豪夺，哪有分东西给别人的习惯？听邵忠这一问倒先愣了一下，随后哈哈一笑，满不在乎地说：“你去四乡里打听打听，有谁敢找我们兄弟要过一文钱的？”

邵忠说：“老皇历翻不得了，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

周龙太步步紧逼：“现在又怎样？”

邵忠一字一板地说：“新账老账一起算！”

周龙太顿时跳了起来，手指着邵忠说：“好，好，算你姓邵的有种，我单要看看你如何跟我来算账。三天之内，你好！等好！”说罢，带着周龙虎、周龙豹跺脚便走。

出了门，周龙虎说：“大哥，怎么出来了呢？‘里子’留下了，‘面子’掉光！”

周龙太瞪了他兄弟一眼，说：“你晓得啥，你看看今天那副阵式，要动起手来我们未必能赢。好汉不吃眼前亏。没听我撂下话么？‘三天之内再见！’我早就疑心他们背后有人作鬼，看来真是不假。”

周龙豹不开窍，还盯着问：“有人作鬼？啥人作鬼？”

周龙太说：“除了共产党还能有谁？而且坏就坏在那个走乡串户的姓陈的郎中身上。”

周龙太晓得自己没有猜错，所以同时也下了决心。回到家头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写信给翁志高送去。信虽是半通不通，意思却很清楚，一是说周坊发现共产党了；二是让翁志高赶紧派兵来。

信送出去后，周龙太又立即派人到县里去买回两门土炮。他打了个如意算盘，倒也作了两手准备，并且还放出风来说：“来讲和就罢手，不来讲和，就让你们尝尝土炮的滋味！”讲和的条件也升了格，已不是分分东西能满足了，而是要把那个姓“陈”的郎中交出来，送到靖卫团手中去。

黄道说：“先不要理睬他，我们抓紧时间准备，莫要为了这几只癞蛤蟆坏了大事。”

两下里就僵持住了。

转眼过了清明，不想从弋阳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调到红军去的邵棠在作战中被俘，解到弋阳城里，被敌人挖肠破肚，死得十分壮烈。尸体运回来，在邵家设了个灵堂。大家去祭奠，看到这副惨状，如同火中浇油一般，一致要求马上“掀开”。黄道与邹秀峰们一商量，觉得条件已成熟，立即分头布置下去，轰轰烈烈的周坊暴动便掀开了。

这边周龙太剑拔弩张了许多日子，等着赤脚鬼们来攻，却一直没动静，弄得自己也疲塌了。这一日忽然见邵忠来了，心里突突地翻了好几个跟头，不晓得邵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邵忠倒是不卑不亢，先作了个揖，开门见山地说：“我家的事想必诸位也晓得了。杀来杀去地白伤了许多性命。我也算想通了，为什么非要干戈相见呢？圣人说得对，凡事还是和为贵。所以这番来不为别的，借着祭奠家兄，略备了几杯水酒，请诸位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议议和的事，今后仍是兄弟一家。可好？”

周龙太眼睛乱转了几转，在邵忠脸上也瞧不出什么破绽。听邵忠说得合情合理便一口答允下来。

邵忠讨得了讯便走了。周龙太家的四兄弟周龙云有点怀疑，说：“这帮子穷鬼都是蛤蟆吃秤砣铁了心的人物，怎么会讲起和来了呢？莫非其中有诈？”

周龙豹说：“四弟太多心，请我们去吃水酒，去便是了，怕他怎的？”

周龙太想了想说：“我谅他不敢作怪，他家邵棠刚死，哭还来不及呢，还敢再惹事？他长几个脑袋？恐怕真是怕了。”又拍拍周龙云的肩膀说，“你看看，这四乡村里有几家不怕我们的？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如今连邵忠也怕了。”

周龙云摇摇头说：“要是这样倒好了，千万莫要笑不成反讨个哭才好。”

周龙太说：“每人都把家伙带上，多备些子弹，多带几个人。他要敢玩硬的，也不是玩不起，怕什么？”

到了定好的日子，周龙太兄弟四个带着人果真来了

邵棠的灵柩停置在堂屋中央，条案上点着一对白蜡烛，供着一炉香。除此之外，静悄悄的并没有动静。

周龙太不由自主打了个激灵，壮着胆子大声地问：“邵忠！邵忠兄弟在么？”

话音未落，邵忠便从后面转了出来，双手抱拳道：“正等你们几位，到齐了便可开席了。请，请！”边说边把几个人让到了后进院子里。

后进院子里露天放了好几张台子，许多人已经端端正正地坐齐了，看来真的只是等他们几个人了。又有几个人迎上来，把他们兄弟四个分别让到四个桌子上，带来的人也被引到旁边的屋子里去了。

周龙太大摇大摆地拣了空凳子坐下，嘴里还说：“不打不相识，都是乡里乡亲的，客气什么呢。”只听得有人在耳边说：“只怕是想客气也客气不了了。”他诧异地扭脸去看，却是自己最怕最恨的“陈郎中”。

周龙太晓得不好，伸手要摸枪，两只胳膊却被人铁钳子似的死死夹住，动弹不得。化名陈郎中的黄道却笑吟吟地撩起他的衣襟来，把枝枪顺顺当地就摸走了。再看周龙虎等几个人，也是如此轻而易举被缴了械。这下输得太惨，好像是专门给人家送枪来似的。

“水蛇崽”周龙太四个立即就被枪毙了，拿这几个作恶多端的恶霸流氓来祭奠了邵棠的亡灵。周坊的反动团练闻讯后还企图反抗几下，让农民革命团一鼓作气也给打垮了。周坊这个讯号一发出，各路暴动也都跟着挑出红旗。

翁志高自然不肯作罢，狡猾的是他气势汹汹地突然出动了一下，烧杀了一阵之后很快又缩回县城去了。黄道心里着急，这样子怎么打得着他？

只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翁志高偌大的家产房宅，由他父亲与他弟弟掌管，这两个人也是仗着翁志高的势力作威作福，在地方上自成一霸。老百姓恨，也是敢怒不敢言。黄道想，正好一石二鸟，镇压这翁家父子二人，为民出气，也作个钓饵引这翁志高出县城。

翁志高果然中计。兄弟被农民革命团抓住镇压了，父亲跌跌爬爬地跑到县城去报信，见翁志高还犹豫，便又哭又骂，要替小儿子报仇。翁志高也恨这帮赤脚鬼居然敢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晓得马王爷到底是长了几只眼，便叫来团里的秘书立即传令下去，后日里准备出兵周坊。

翁志高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个随行的秘书刘万泉，竟是共产党的人。打周坊的计划不但传到了靖卫团，也传到了黄道那里。黄道喜得眉飞色舞。但当时新组成的贵溪游击队只有 16 名队员，于是连夜派人去找方志敏搬兵。兵是很迅速地派来了，但与靖卫团比人数也有限，看来要想面对面地干或是打伏击，恐怕都不能万无一失地取胜。于是黄道和邹秀峰、方志纯几个细细商量了一个计划，定下来一个“酒肉计”。

刘万泉按黄道的密示，将翁志高和靖卫团的一百多人引到了桃源胡家村。这里也早就布置好了，找了一户大宅院，安排下十几桌的酒宴。5 月份的天气已经转暖，这帮兵一上午扛着枪走了几十里路下来，早已汗湿衣襟，又饥又乏。他们看见胡家村这般周全地招待，也不客气，见吃便吃，见喝便喝。

翁志高起先还不敢放下警惕。刘万泉亲自服侍他，倒酒上菜，说：“团总，我看我们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忧心过重了，走了这一路，哪里见到有一个共产党的皮毛？眼见为实，都听人传呼得厉害，实际上是共产党玩的迷魂阵，就是想唬住我们在县城里永不出来。这样好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乡下干。你看看，慑于你的威望名声，共产党与赤脚鬼们全跑的一个不见了。他们这是怕你呀！不过这次既然出来了，就不能放过他们。来来来，酒足饭饱我们找他们去！”刘万泉一张嘴不停地说来，把翁志高灌得头重脚轻，一下子就喝倒了。刘万泉找了张躺椅，扶他睡下，不一会便鼾声如雷了。

等翁志高迷迷糊糊地要醒来，这才发现自己连人带躺椅让人捆了个结实。自己的弟兄们全给捆得像一只只粽子，挤堆在一旁，只有那个刘秘书刘万泉与几个好像是农民头儿的人谈笑风生，将自家靖卫团的四十多杆枪一一验过。翁志高晓得又输了一着，不服气也不行。

翁志高和他的靖卫团给消灭掉了，红军第七连宣布成立了。到1929年7月，以周坊暴动为起点的贵溪暴动达到了高潮，参加暴动的人数达七万多人。接着，弋阳、横峰、上饶湖村等地又搞开了秋收暴动。一个暴动接着一个暴动，既呼应又促进，推波助澜，逐渐连成一片，使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三倍以上。

根据地在扩大，政权组织与党的组织也在建设之中。1929年2月成立了信江特委，方志敏代理书记。当时包括弋阳、横峰、德兴、贵溪、铅山五县，4月江西省委派了唐在刚来任信江特委书记。到年底又发展了上饶、余干、余江等县。10月份正式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团主席。

叫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组织逐步建立，关系逐步理顺，烦恼也接踵而来。当时的信江特委属赣东北特委领导，赣东北特委又是隶属于江西省委。复杂便产生于这层层的关系之中。

方志敏在1930年6月8日起草了一份给江西省委的报告，报告了信江党和红军以及当时的局势。他用了一些篇幅专门提及省委、赣东北特委与信江特委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说谁，但不满与牢骚已是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来。

有的事确实让人感到很费解，本来形势发展不错，工作也卓有成效。方志敏这样写道：“信江方面的党，一方面努力与上级机关建立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加紧工作。在长期激烈的斗争中，我们本着在斗争中所得到的经验，领导民众作艰难困苦的奋斗。到去年11月间已有了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上饶、余干、余江等县委，及万年特别区委，信江苏维埃政府也在党的领导之下巍然建立起来了。”下面紧接着方志敏的笔锋一转，因为此时出了件使信江党委颇感意外的事：“正在这个时候，忽然由东北特委转来一信，说省委决定将信江特委取消，信江各县的党由东北特委指挥。”

再紧接着，方志敏对这个东北特委的印象便跃然纸上：“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匪军从东北进攻，他们也未曾给过我们一信，并且我们在他指挥的时候，以及他过去对信江党的影响，使信江党的工作，冤受了不少的障碍。”

“障碍”有几种。举一例：在筹备第一次全信江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请省委特派员到会。因为当时信江特委与省里的联系都要由东北特委转达，所以去省委请人自然也要经过东北特委再转呈上去。派去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时，东北特委反倒将交通员所带的路费支去用了。方志敏对此也是

早有感觉：“东北特委呢？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员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交通路费扣留。”交通员身无分文，自然寸步难行，不能再去请省委派人来，而大会在省委迟迟不到的情况下也只得匆匆召开了。

举例二：东北特委对信江党的看法似乎也是成见很深。东北特委也曾介绍过几位同志来信江地区参加工作，不过他们把派去信江工作，是叫做“充军”。唐在刚被派来之后，所见所闻与自己在外界听到的传闻相差甚远，所以很奇怪地表露过：“省委派我来时说，信江党是建筑在封建基础之上，只要我能纠正这个封建错误，就算极大的成绩，实际信江党的基础并不算坏，此话不知从何而来？”

似乎这是一种传统风气。你干得越欢实，搞得越起劲，成效越显著，那么在背后说说风凉话、敲敲小边鼓以至下脚绊子的人就越活跃。自然，只要你什么也不干，不要去组织农民团，不要去打靖卫团，不要去扩大根据地，就不会有这许多扰人烦恼的闲话与动作了。

由于“冤受障碍”，方志敏也不肯咽下这份委屈，于是秉公直言：“接到东北特委来信，我们认为与党的前途有关，同时通告不由省委直接通告我们，而由东北特委通告我们，在组织上也未便遵照。同时省委在1928年春，从不肯再派一人来信江巡视党的工作，我们派常委以及书面报告，又不肯相信，总一味坚持成见，对我们误解，这样对党对革命，都绝对不会有好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派书记去省委当面报告，并将信江革命经过以及实际情形，用书面密写呈省委请求转呈中央，在未接着代表到省以后的省委指示，信江特委暂不取消。一定待省委接着我们的报告和我们代表的报告，省委的指示才是根据实际情形指示我们的，我们才敢遵照执行。”幸亏方志敏有这份勇气顶住。江西省委也是有勇气，改正了原先错误的决定。方志敏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据代表回来报告，省委因不明信江实际情形，所以决议取消信江特委，现在明白了信江特委有存在的必要……省委很承认我们把实际工作呈报中央的精神……”

方志敏似乎是占了上风。其实后来他就发现，这就如同做长篇文章一样，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作了个序。后面有许多的文章出题之难，难到叫你无从下笔。虽然是在十分艰难险恶的形势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你也得匀出相当一部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出来，去煞费心思地做这些难作的“文章”。

第十七章

龙志光听了杨莲花的话，带青弟兄们
闹了个起义 方志敏说：方志敏他有事
没来，让我先来讲几句 奔袭景德镇，战
士们都换上了银质的红五星
弋阳县志载：

1928年12月至1929年3月，苏区党和方志敏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成功，周志群部十一连、十二连方志敏起用投诚的下层军官充任红军指挥员，使部队战斗力得到加强，成立了四个连，番号是一、二、三、七连。

这段文字很短，但其中却是起伏跌宕。在这过程中，方志敏也险遭谋害。

1928年冬天，正值天寒，国民党军重新调配兵力对新生的根据地开始了第三次局部“围剿”。这次起用的是国民党金汉鼎所属十二师三十六旅的周志群部。

周志群部是个杂牌军，从贵州地区拉过来打红军。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和杂牌军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大，不光是受到排挤和歧视，而且对士兵的薪饷粮饱，更是一层层地克扣。周志群部开到江西，好几个月不曾给士兵发过一文钱的饷，这且不说，时届天寒，士兵们的身上连御寒的棉衣也穿不上，还穿着那套从贵州带过来的单衣单裤。那些贵州兵叫苦不迭，怨声载道，打仗作战的心思先就减去了好几分。

周志群部的一些当官的看到自己的下属与士兵们日子过得清淡无味，思乡厌战的情绪渐渐浓烈起来，心下不免恐慌，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到处抓一些贫苦的妇女来，给下层军官做老婆，以图安抚军心。

抓来的这些妇女中，有一个叫杨莲花的，当年才18岁，是横峰三区明山岗的人。年纪虽轻，心里却是很有主见，倒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杨莲花自幼就失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弋横暴动中受到革命的熏陶，很快就成了一名开展妇女工作的积极分子。敌人糊里糊涂把她抓来，哪晓得这个女孩子不声不响地就把工作做到了敌人内部。几个月后，便出了件叫人震惊的大事情。

“娶”杨莲花的是三营十二连的一个排长叫龙志光。龙志光晓得像自己这种芥末大的个杂牌军官要讨个老婆真是不易，所以待杨莲花倒是百般爱护，说什么听什么，把自己当兵的那副粗野性子先收敛了起来，脾气软得像根面条。杨莲花哭了几次，也明白这不是个办法，见龙志光倒也还通情达理，凡事也不强迫自己，于是慢慢地和他说起话来。说起来才晓得，龙志光原本家境也很贫苦，人家说“好男不当兵”，龙志光叹了口气告诉杨莲花，不当兵没有活路，就是为找一口饭吃。

思想有了沟通方才有交流。杨莲花想天下穷人是一家呢，便把自己所晓得的一些革命道理拿来讲给龙志光听。一讲起来，便是又有事实，又有论点，又有论据。龙志光这才晓得自己讨来的这个老婆居然还懂这么许多的事。这些事，他是既见过也听过，却从来没想过。这番才浅浅地晓得了一点，穷人为什么受苦呀，红军为什么帮穷人呀，国民党为什么是穷人的死对头呀，等等。龙志光对杨莲花佩服得不行，自己倒也感触到这革命真是了得，这么年轻的一个乡里女孩子，一旦参加了革命，所言所行便大大地改了个模样，令人刮目相看。自己听了还不过痛，又叫来与自己谈得来的几个排长和士兵，

经常聚在家里听杨莲花说根据地与红军的新鲜事。慢慢的，这些人的脑子里多了一层东西，心思也开始活跃起来。

过了几个月，龙志光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调防。杨莲花说：“要调防你自己走，打红军我是不去的，我也不离开老家。”龙志光左说右说，杨莲花就是不允。

龙志光急了，说：“我就是个穷当兵的，上司让开拔就得开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我又不能在这里守一辈子。”

杨莲花说：“当什么兵不好，非要当这灰皮兵。真有钱的瞧不起你们，没钱的穷人也骂你们。”

龙志光一个劲地在屋里转圈，脑门上沁出一层细汗来，说：“那你要我咋办呢？”

杨莲花很干脆他说：“投奔红军去呀，也当当咱穷人自己的兵，有多舒心畅快。”

龙志光一下子钉在屋子中间，半天才犹犹豫豫地问：“人家能要我们么？”

杨莲花说：“怎么不要，革命队伍的大门是敞开着，只怕你不去呢。”

龙志光舍不得杨莲花，也觉得当这种兵又窝囊又背时，听杨莲花说了红军与根据地那许多吸引人的事，终于动了心。杨莲花一撇嘴说：“你就这么单枪匹马地自己跑呀？”

龙志光到了这时候，全听杨莲花的了，听她又不乐意，连忙问：“那你说怎么才好？”

杨莲花说：“要想当红军就要做个好表现出来，拉一拨子弟们过去，也是你立了一功。”

龙志光那些要好的弟兄也是当够了这受气兵，也晓得了天下还有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向往得很，经龙志光一串连居然全都愿意。于是他们一起鼓动了连副杨延辉，在弋阳七区的程家桥带着一个连全都哗变过来。

与此同时，邵式平通过内线做了三营十一连一个中士班长匡龙海的工作。当这个连奉命开往德兴县磨角桥要镇压农民暴动时，匡龙海和他串连好的一帮弟兄抓住这个机会，在一个深更半夜里假传有红军前来袭击的消息，引起一片骚乱。匡龙海趁乱开枪打死连长，就地宣布起义，带着七十多名士兵，连夜投奔了红军。

这两支连队一过来，红军的力量顿时扩大了好几倍。但是随后问题也就来了。

哗变与起义过来的队伍并没有进行改编，也就是说，其编制与内容依然照旧，结果把旧的一套关系与作风全部带过来了，只是名义上挂了个红军的牌子。关于这一点，方志敏后来承认是个“极大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经验，处理旧军队手段太软，迁就太多，影响与改造甚少。

这批新加入红军的士兵，赌博、抽大烟、打人骂人样样齐全。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农民出身的红军官兵更是看不惯。军民之间、新旧军队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更严重的是，派他们去打仗，打了一天，只见十二连中有些人把枪只朝天放，一个敌人也没有打着。后来又派他们去攻打德兴黄柏塘的一个据点。结果到最后，倒是侧翼配合的红一、二连攻下了据点，守据点的靖卫团却给十二连放跑了。仗打得不怎样，倒晓得闹饷闹赏，如是不顺他们的心，便说出无数的牢骚怪话来，也不服从杨延辉和龙志光的指挥，不

守纪律，不听劝告。虽说其中只是几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当油了的老兵痞子作怪，但是影响极坏。

于是有人建议，把十二连调到东坑、小坞一带，缴械遣散算了。方志敏犹豫不决，主要是顾虑到自己的队伍枪支弹药均不如十二连，士兵的战斗力亦没有他们强。缴械怕是缴不下来。再又感觉这样做未免过于简单草率，传出去会把敌人弃暗投明的路子堵死，不利于争取敌军起义的工作。后来想，还是派一些红军干部进去掺沙子搞搞言传身教。

这个决定一做，那些兵痞们更是不满，哪里容得外人进来。事情糟就糟在一开始没有早动手整编改造，此时已经有了养虎成患的痕迹了。这几个兵痞又煽动了一伙人，跑出去暗中勾结了正欲前来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搞了个反水计划，打算乘着开五一庆祝大会，刺杀了方志敏，消灭红一、二连，然后重新投奔国民党。

不想事情做得不慎，消息走漏了。戈阳三区的苏维埃主席宣永昌晓得之后，惊出一身冷汗来，急急忙忙来找方志敏商议。方志敏听了消息后，沉思良久，颇感踌躇。宣永昌拿出两点意见来，一是不同意方志敏去参加五一庆祝大会，这是从考虑安全出发，不能说是小题大作，没有道理。方志敏是整个赣东北地区的核心领袖人物，要是在他身上出点纰漏，这种损失是不可言传的。第二个意见是借着开会的机会就把这些滋事分子收拾掉算了，快刀斩乱麻，留着这个脓瘤子迟早要冒头，不如先割了去，长痛不如短痛。

对于第一个意见，方志敏很快就否定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召开五一庆祝大会，是一件很隆重很热闹的事。大家都晓得方志敏要去。到时候看不到他的影子，岂不觉得奇怪？在自己根据地的土地上，要说出胆怯来，岂不让人笑话？方志敏不愿意这样被误解，也不愿让战士和群众感到失望。不过，逞能与大意自然更是要不得，既然已经晓得了这些人想玩点阴谋，必要的防范自然也是要有有的。

对于第二种意见，方志敏思来想去考虑得很细。宣永昌说的有道理，这帮兵痞哗变过来是出于投机，如今企图哗变过去也是因为投机，这些人从来也不是革命的同路人。但是，他们是打着起义的旗号过来的，在他们的真实面目没有完全暴露之际解决了他们，会不会产生另外的副作用？原本想投奔红军的人会不会觉得共产党、红军靠不住？给他们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影响？在操场上解决比较混乱，会不会误抓了好人而放跑了反动分子？原本是纪念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使根据地军民都很新鲜的节日，结果弄成了鸿门宴，老百姓会怎么看？杂七杂八的问题就像炒豆子一样在方志敏的心里蹦来蹦去翻个儿。宣永昌见他久久沉思不语，晓得这个决心难下。又等了片刻，终于看到方志敏一直紧绷着的脸色松缓下来。方志敏态度很平静他说：“按照布置下去的，会议还照常开。这帮人的问题，放到会后去解决。”

五一节的那天，正是赶上个好天气。五月的阳光温暖柔和地照在身上，很是惬意。几朵洁白的赛过羊群的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活泼得好似几个着白纱裙的女孩子在跳舞。吴家墩的河滩上布置了一个简朴的会场，搭了一个台子，摆了张方桌和几条长凳。但是气氛却是营造得分外热闹，插了不少三角小彩旗，锣鼓也一直敲个不停。

部队已经进入了会场，红一、二连各占了左、右的两块位置，中间的位置留下来给十二连。这也是有道理的，今天的大会有两个内容，一是庆祝五一；二是欢迎反水的士兵兄弟加入红军队伍。十二连是被欢迎对象，所以坐

在中间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这样一来，从局势上看，他们是处在红一、二连的左右夹击之中了。

过了一会儿，几位和普通红军战士穿着一样的干部走上台去坐定，接着便宣布大会开始。先就请老汪同志讲话。

十二连的队伍中显得有些骚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地四下打听，方志敏到底来了没有。

台上的老汪说：“诸位红军同志，方志敏临时在洪家村有事绊住了脚，要过一会儿才能到，现在我先讲几句，等他来了他再讲……”站在台上讲话，台下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老汪的眼里。

十二连的那几个家伙听说方志敏一会儿才能来，于是决定沉住气等下去。不等也得等，他们暗中约好准备里应外合的国民党军还不曾到，自己要先动手不免力量单薄了一点，子弹是早已推进了枪膛，只等村子外面枪声一响，这里也就立即开火，刹那间便能叫吴家墩的河滩地上血肉一片，尸藉遍地。

不料这一决定等下去，却是等来个彻底的失望。直到大会宣布结束，坐在台上的人已经骑马离开了会场，他们连个援兵的影子也没有望见。其实事情并不复杂，来接应的国民党军是初进苏区，人地两生疏，把约定好的地点吴家墩听成了胡家墩。一字之差，相距数十里之遥。等到进攻之敌在胡家墩扑空后再奔向吴家墩时，根据地的赤卫队员们早已在中途扎了个“口袋”等他们钻人。不要说十二连的那几个心怀鬼胎的家伙等得心焦，连这边早已埋伏好的赤卫队员们也等得心焦，不晓得这帮敌人何为失约，迟迟不来钻口袋。吴家墩散了会，这边赤卫队才与接应之敌接上火。红一、二连撤出会场后，又极迅速极隐蔽地抄小路赶到了这股敌人的尾巴后面。这下打了个夹心板子。敌人虽是武器好兵力强，却也经不住这左一拳右一脚的，仓皇之中只得退出苏区。

使十二连的那几个反动分子更为懊恼的是，弄了半天“老汪”就是方志敏呀，真是后悔不迭。又见来接应的部队被打了个伏击，晓得事情已经败露。这帮人狗急跳墙，恶从胆边生，就在红军宣布要缴他们枪的当天夜里，一不做二不休，公然开枪打死了杨延辉和派来工作的好几个共产党员，趁着黑夜逃窜而去，重新反水为匪。

这件事到最后还是牺牲了十多个同志，不能说不是个教训。

但是，周志群部的这个三营实际上已沦为一个空架子，十一连、十二连先后起义与哗变，剩下的一个九连军心浮动，士兵们三天两头拖着枪跑到红军这边来。周志群无奈，把这个空架子的营远调到南城去搞整编。而此时的红军独立团却是力量猛增，由原来不足编两个连的建制扩大到了三个连，为后来建立红十军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真心真意来投奔红军的起义官兵，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与熏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红军中的军事骨干。红军作战练兵，也正缺乏这样的人才。匡龙海、龙志光等一些人都当上了红军的师长、旅长，营、团级的干部就数不胜数，成为最坚定的革命分子。方志敏对于这一部分军官士兵也有过一个评价：“他们历次作战，都很坚决勇敢，为赣东北苏维埃立下了不少可敬的战功。”

在1930年5月间，信江特委在指挥红军作战中，采取了一次很重要的行动，这便是攻打景德镇。

这期间爆发的蒋、冯、阎之间的军阀混战正处于白热化状态，他们把兵力与精力都集中到了中原地带。从客观上讲，实际上是减轻了前一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苏区与红军也学会了石板底下生豆芽，一有了空隙便不屈不挠地钻出压顶的石板来生长。趁着这一有利形势，中央苏区发展得很快，各地红军发展胜利的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赣东北。信江特委也认定了这个形势很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与壮大。不过中共江西省委在1929年秋遭到破坏之后，特委与上级党委失去联系将近半年。对当前总的任务还不明确，对上级的意图完全不知晓，所以究竟如何行动，似乎又有点放心不下。但这也像种庄稼，时节不等人，不抓住眼前这个机会，就可能坐失良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作出了这样两条决定：一是由新派来的特委书记唐在刚专程去一趟上海亲找党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二是在未得中央指示之前，红军独立团相机出击景德镇、浮梁、乐平、开化这个三角地区，在乐河、昌江流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两点决定考虑得比较细致，既注意到了与中央的精神合拍，又照顾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景德镇当时是全国的四大瓷都之一，以盛产瓷器而闻名于世。在景德镇，从事瓷器制做的工人就达好几万，瓷器工业也就成了景德镇经济发展的一根重要支柱。南来北往的客商众多，富贾豪绅云集，是个富得流油的风水宝地。这一仗若是能打好了，首先是政治影响非常之大，谁都能晓得了共产党的力量非同小可，再也不是在磨盘山里与靖卫团转圈子了，现在连景德镇也敢碰上一碰。其次就是能在军事上造成向安徽发展的势态，扩大红军的影响，扩大根据区的活动范围。当然，地盘越大，活动起来自然是对红军越有利，越活。最后一点也非常要紧，景德镇是个丰硕之地，吃下这块肥肉，经济上便能宽松一下，大大地缓解一下苏区目前存在的经济困难。好处很多，但正因如此，国民党自然也将这块地盘看护得十分严紧。所以，打景德镇可不像在信江地区打个据点那样简单，不作好充分的准备，十有八九要输了这着棋。

为了行事谨密，唐在刚在取道九江去上海途经景德镇之际，随带两个同志去与浮梁县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不久，浮梁县派来联系接应的同志到了。

来人叫马步英，方志敏见了很高兴。还是许多年前，方志敏从上海刚刚回到南昌，与马步英曾一同落脚在南昌《大江楼》报社，还有邵式平，几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相知甚熟。马步英当时还很年轻，是一个渴求新文化知识的爱国青年，一双机灵的眼睛里总是闪耀着求知的欲望。方志敏参加革命比他早，差不多就像老大哥一样给了他许多的教益教诲。马步英对那段充满革命热情的生活印象颇深，一直怀念在心。所以这次能见到方志敏，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方志敏拉着马步英的手上下打量，感叹不已：“哎呀，这才几年的工夫呀，那会儿在南昌，明明记得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嘛，激动起来连走路还一蹦三跳的呢，现在竟然连一点毛躁的痕迹都看不到了，成熟多啦。这干革命一是磨练人，二是改变人。”

马步英笑着说：“我就是要想变得像你那样成熟老练才好，在我们景德镇地区也搞一个根据地出来，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出来。”

方志敏赞许他说：“只要雄心在，何愁事不成。这次请你来，就是商量如何打景德镇的事。另外你晓得不？邵式平也在这里呢，一会儿他也来，正好见见面。”

马步英更笑得厉害，说：“嘻，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和邵式平已经见过

面了，也多亏了碰上他呢。”

说起来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因为进攻景德镇的事要求十分机密，马步英是化装成一个渔民，在夜里用鸬鹚排偷渡过敌人封锁的乐平河埠。进入苏区后，也不肯暴露真实身份，结果被几个扛红缨枪的儿童团员扣住了，怎么看他怎么怀疑。马步英又无身份证明又无路条，还一个劲地打听往芳家墩的路怎么走。芳家墩是红军军委会的驻地，几个小孩子警惕性高得了不得，生怕马步英跑脱，又叫了赤卫队来。赤卫队一点不敢松懈大意，派了专人押解，把他当做可疑分子一村送往一村，一站送往一站，一直送到了漆工镇附近信江特委新的驻地黄家源。没想到在黄家源却意外地遇上了邵式平。邵式平听说押解了一名可疑分子来，便出来看，不曾想是多年不见的马步英，两下里都来了个意外的惊喜。

马步英说：“多亏碰着邵式平，不然的话，那几位警惕性颇高的赤卫队员还不晓得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不过，后来送我来芳家墩的路上却是热情得不得了呢。”

马步英对景德镇的各种情况知道的都颇为详尽，并且带了一张地图来，地图上对景德镇上的主要建筑与兵力布置都标注得十分清楚。方志敏拉过地图来仔细地看，一面听着马步英的介绍，一面还发问。

因为蒋介石要打冯玉祥、阎锡山，原先驻守在镇上的国民党正规军都已经调到津浦线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镇上现存的武装力量仍不可轻视，其中伪保安队有二百多枝枪，伪警察总局、警察队、消防队各有四十多支枪，伪警察总局下设两个分局，也各有四十多枝枪，再加上伪法院法警、税警的枪支，共有四百多枝，大约相当一个营的兵力。这些兵力都分驻在伪浮梁县政府、伪警察总局和湖北书院等四个地方。

马步英在地图上把这几块要紧的地方指给方志敏看。接着又说这些地方官兵的生活规律。这些人原本出身都是些流氓地痞，混到警察局、保安队里，差不多也就是干干敲诈勒索的事，仗着一杆枪到处横行。到了星期日一放假，除了留下站岗的动不了，其他人差不多全一头扑到赌场、烟馆与妓院里去，通宵不回，玩得精疲力尽，星期一回到驻地也还要再蒙头睡上一大。

方志敏对这个细节很注意，又再问了一遍。马步英很肯定他说：“他们还管星期日叫做‘开斋日’，到了这一天什么任务都派不下去，活脱脱的一伙酒肉之徒。”

在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会议上，大家议论得十分热烈。马步英又介绍了他们做的充分准备，地下党组织工人群众中的骨干力量与积极分子作了迎接配合红军到来的准备。同时还专门侦察勘明了一条由明口、山查、东流，沿安徽边界山区南下的小路，可以极秘密极迅速地接近景德镇。

方志敏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在探讨比较、反复权衡之后，慎重他说：“攻打景德镇，需要制定一个周全的大计划，景德镇离根据地比较远，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脱离根据地主动出击。这种长途奔袭，一定以速战速决为宜，打的就是一个‘快’字。另外敌人的兵力、枪支、武器装备都不在我们之下，所以这一仗还要打一个‘奇’字，以智取为上，不可力夺与强攻。根据敌人的规律，进攻的时间定在星期一的拂晓。敌人经过一大的狂嫖滥赌，思想与防守都是最为松懈大意的时候，此时要打，时机最好。”方志敏说完，大家都同意这个指导思想，于是又说起具体的行动细节来，会议一直开到夜深。

出发的日子定在7月5日。一大清早，一切都还笼罩在朦胧的晨曦中，

方志敏就集合队伍，给红军独立团的一千多人作了个简短的动员后，队伍踏着晨露出发了。

离开芳家墩后就开始急行军。进入乐平的洛口时，忽然遭遇到许英靖卫团的狙击。原来这帮地方反动武装发现有红军从洛口渡河而过，便偷偷地埋伏在大路两侧，乒乒乓乓地打起枪。方志敏不想与他们久缠，于是急令一个连从正面佯攻，另外两个连左右迂回过去。这股杂牌部队也不经打，左右一夹攻立刻就垮了。红军打完了就又以急行军的速度往前赶。傍晚时分，到达乐平与德兴交界的乡墩段家。过了段家便是敌占区，部队在这里作了稍事休息，并且改换了伪军服装与番号，由龙志光率外省籍战士编成先头部队开道。

事情原很周密，不想却露出一个破绽，险些坏了大事。谁也没有留意，有个战士在换装时忘了把自己草鞋上系着的红绒绳解掉，依旧穿在脚上，却被段家的一个地主注意到了。见开来一支部队，急急匆匆也不找他们地主乡绅，这人就跑出来看，一眼看见了那战士脚上一束亮艳的红绳，便疑云大增。他倒是也有警惕性，立即跑回屋子去写了份情报密信，叫人飞速抄近路送到浮梁县政府去，提醒注意一支来历与去向都不甚明了的队伍。

他的密信发出去的同时，这边队伍毫无知晓又赶紧出发了。

不想夜里下起倾盆大雨，真是一身湿透，两脚泥浆，但是事出紧急，速度不能减下来。一夜冒雨行军，说不尽的泥泞崎岖，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离景德镇只有五里路的里村。此刻的雨倒是停了，空气新鲜湿润。战士们一夜行军，却毫无倦意，精神抖擞地等着总进攻的命令下达。马步英把前来接应的内线引来见方志敏，策应准备也早已做好，当部队分四路向沉睡的景德镇发起包围进攻时，路路都派上了十分熟悉向导。万事俱备，欠的只是东风了。

其实就在此时，段家那个地主的密信也送到了浮梁县政府。只是侥幸的是，送信人只晓得把信送到传达室也就算交了差事。不想这封要紧的信也如同县长和警察们一样，搁在那里便睡起大觉来了。等到红军真的开进了市区，这边却还是静悄悄的无一点动静。

时间尚早，街上空无一人。龙志光和先头部队由工人向导带着朝保安队疾行而去。保安队门口的两个哨兵正睡眼惺松，看见有队伍径直奔来，糊里糊涂地连忙立正敬礼，被冲上来的战士缴了械。进入营房更是毫无阻拦，所有的人都在睡梦中当了俘虏。

保安队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解决了，其他各路在向导和内应的协助下，也顺利地解除了敌人的武装。真是比意想中的还要顺利，除了敌人在河西的四个哨兵听到动静后携枪溜走外，其余无一人漏网，四百多枝长短枪也尽收囊中。景德镇还有号称“三尊大佛”、“十八罗汉”等等的土豪劣绅，也没有来得及跑掉。红军没收黄金、白银与现金有一百多万元。

这一仗，使根据地扩大到赣北，苏区纵横五百余里，人口增加到一百多万。由于景德镇瓷业工人的踊跃参军，独立团从原先的一千多人扩大到四千多人，有了步枪八百多枝，差不多成了一个小富裕户。战士们还换上了新做的军装与绑腿，子弹带也是崭新一色的，帽子上配换了新发的银质红五星，闪光程亮，精神得很。方志敏们雄心勃勃，高兴之余又计划着一鼓作气，在皖赣边境地区再拓宽出大片苏区来，建立巩固的政权。

可是，唐在刚从上海带回来的中央指示，却使方志敏大感意外。

下篇

第十八章

李立三雄心勃勃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临出发前，周建屏捻灭了刚刚点燃的烟，说：戒烟了，能把队伍完整地带回来再开戒。毛泽东在肯定了自己的同时，也肯定了方志敏

建党时间并不算长的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真是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迈得如此不易。如果真是一个顽童学步，摔几个跟头走得不稳后果无可厚非。可一个政党表现出来的幼稚与左右不定向的摇摆所造成的后果，决不是摔个跟头后扶起来，拍拍腿上的灰土便可算了。这是要用共

产党员、红军战士、革命群众的人头与鲜血去作代价的。

陈独秀摔了一个大跟头，革命志士的鲜血流成了河，他哼哼不服地走了。现在在首席位置上开始指挥的是李立三。

李立三的热情非常高涨，对于求得革命胜利的迫切愿望有点像是一位处于热恋中的毛脚小伙子。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确实使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工人运动与群众斗争有了醒目的发展，这些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向往梦幻般的社会主义的倾向也在迅速增长。李立三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层，可是，同时又被他忽视掉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更没有形成那种被认为是呼之欲出的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李立三雄心勃勃，他觉得他看到了革命高潮已经在迫近，看到了全国革命胜利也已经迫近，他甚至看到了“全世界的大革命”即将到来。这些憧憬仿佛是一支支令人难以抑制的兴奋剂，李立三雄心勃勃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计划及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计划。

根据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各地红军开始行动起来。当时江西省工农苏维埃政府也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布告上说：“两年以来，与敌人艰苦奋斗、肉搏血战，发动了土地革命之高潮，取得了赣西南暴动之胜利。现赣东北土地革命的斗争，与红军攻城的胜利，南浔路、景德镇、九江等处之工人斗争，走上了直接与统治阶级冲突的形势，整个的江西区域有六十余县的赤色版图，有四万以上有组织的革命群众，反动武装日益削弱，革命的工农武装日益扩大而集中，统治阶级的灭亡，实是必能的事。”鉴于对形势的这样认识，所以这份布告提出的号召是：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武汉及其附近各省首先胜利，完成苏维埃的胜利。给红军提出的要求是：扩充红军到100万。

唐在刚就是带着这种指示精神从上海回来的。

特委书记唐在刚调到信江地区来一年多，方志敏感觉和他同处的一直不错。唐在刚也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1923年他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有一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老黄牛精神，执行起党的指示来可谓是“不折不扣”。再加上李立三的那套“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来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想法使他感到热血沸腾，信心十足，所以一下子就合上拍了。这却和方志敏他们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

为了要配合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图计划，唐在刚带回来的指示是：“丢了信江根据地，也要西越鄱阳湖，饮马长江水，争取九江、南昌的胜利。”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要他们的这支红军独立团开去攻打九江，

配合其他红军队伍夺取南昌。

景德镇向西便是鄱阳湖，要越湖去饮马长江，进攻九江路径是方便的。方志敏怕唐在刚轻易地命令红军贸然行动，所以提出事关重大，必须要召开特委会讨论，又力主新扩建的红军必须回中心苏区整训后方可出击。这两条理由无可挑剔，唐在刚同意了。于是部队撤出景德镇，回师苏区。

唐在刚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根据中央指示改组了信江特委。这一改组的结果便使得在特委会上，方志敏、邵式平和黄道处在了少数的位置上。

特委会上的争论不言而喻是十分激烈的。

头一个发言的自然是唐在刚，他很详细地传达了李立三的意见：“立三同志指示，目前的形势是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因此必须猛烈地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以至数省的首先胜利。交给我们赣东北党的任务是迅速攻占九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南昌，配合洪湖、湘鄂边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的红四军进攻武汉。可以说，这个任务是无比的光荣，所以独立团应立即向九江开进。”

等他说完，方志敏提出了异议：“九江是全国重镇，谁都晓得，敌人是重兵扼守。而且九江又是位于水陆交通的枢纽上，调兵遣将可以做到迅速方便。攻打九江十分不易，弊大于利，以我们这新建的四千红军去冒险，还要渡过可算是天然障碍的鄱阳湖，实在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值当。”

邵式平表示同意支持方志敏的意见，接着说：“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嘛，我们独立团是靠什么才能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是靠坚实的群众基础，可谓是地利人和；二是指挥要正确，能打该打的就一口吃掉，打不过打不了的就暂时避开，不能拿我们的一点家底去硬往人枪口上撞。这就是经验，丢了这些，只怕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

黄道说：“革命要拼命，但拼命不是革命。该拼命的时候不拼命是逃跑主义，不该拼命时瞎拼命是冒险主义。我们搞了弋横暴动后有这样的经验。当时，要是照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只图拼个痛快，那就没有从进攻到暂时退却的转变，也就不能保存下实力，组织起一支红军队伍，更没有现在的这块赣东北根据地了。叫我看，不看敌势不看地势去攻打九江，明摆着就是死拼，就是冒险。”

他们几个都是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军独立团的领导人，说话有理有据，既有分量也有说服力。要按他们说的把会开下去，打九江的事十有八九是不能通过的。唐在刚站了起来。

他心里有点着急，也夹带着一点气愤。这几个赣东北的老领导执行起中央的指示来怎么这样拖拖拉拉。他稳了下情绪，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讲的可不是我自己的意见，而是中央的指示，是立三同志的指示。中央认为，现在全国已有十个大块根据地，已有了十四个军的红军，将近十万人的队伍，这股力量还是蛮强大的。并且根据国际与全国的形势，决定了要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全部的红军都要集中攻取中心城市。”唐在刚渐渐提高了声音，“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人看事情看问题狭窄得很，只看到一个独立团，只看到一个赣东北。说了半天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那么这又叫什么主义呢？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难道连中央的指示都拒不执行吗？”

这话说分量已经是很重了。方志敏此时的心情复杂得说不清楚，既生气又犹豫且又感到难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能不服从党组织的指示？何

况还是党中央的指示？但正因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又怎能看着党的事业、革命的实力将要蒙受损失而不据理力争呢？过去在南昌，也曾经因为自己坚持着不向“友党”缴枪而受过警告处分。但后来证明，当时的中央执行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自己是因抵制错误而受处分的，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这一次，自己感觉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最起码是脱离实际的。那就算是自己再受一次委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里，方志敏坦然地说：“执行中央的指示，固然是应该做的，但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而强要执行，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唐在刚说：“怎么是不负责任呢？首先我们是要对中央负责嘛。”

方志敏说：“因为实际情况很清楚，在总兵力上是敌强我弱，在武器装备上是敌优我劣，在我们自己力量达不到的情况下去攻打九江，焉有不吃亏之理？再细想一下，如果根据地保不住，红军力量保不住，又怎样去夺取全国的胜利？”

对这些意见唐在刚并没有显出十分的意外，反倒浅浅地笑了一下，说：“你说的这些顾虑，中央事先就考虑到了，晓得会有人拿它作理由，所以很有预见地对我们提出了即使丢了信江根据地，也要饮马长江、攻取九江的要求。”他见方志敏仿佛还想说什么，连忙一摆手止住了，自己继续侃侃而谈，“中央的意图已经对我们指示得非常明确了，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什么是大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大局，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就是大局。比起这个大局来，我们赣东北只是个局部，是个很小很微不足道的局部。”他伸出一只小拇指来解释这个比喻，“不能只看到一个赣东北，一个信江地区，不能搞一时障目。只要全国胜利了，何愁赣东北不胜利？对于中央的指示，我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下面我看还是讨论一下如何具体执行中央的这一指示吧。”

大家一表态，在特委会上方志敏他们成了少数派。唐在刚还算满意地看着通过了这个决议：独立团马上向九江、湖口开进，兵力不够，后方迅速再动员赤卫军和少先队 100 个连加入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和邵式平、黄道几个人表示服从特委的决定。不过，方志敏随后又很慎重地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求红军队伍先进行整训，因为补充新兵太多，真正打起仗来会感到十分的困难与生疏；二是建议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由即将去中央受训的邵式平带去转呈，进一步陈述我们的理由，希望中央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改变决定。

对于这两点建议，唐在刚同意了。

整训独立团的工作，是方志敏亲自领导的。一连拔除了好几个据点，又一次打下了弋阳县城，新战士们在实际战斗中受到了整训与锻炼。随后，队伍在芳家墩整编，由团扩建成独立师。新委任的师长是周建屏。

后来的 1938 年 6 月，在追悼周建屏病逝的大会上，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军民演唱的一首歌中有这样几句：“艰苦卓绝，屡建奇勋，浴血沙场，献身革命，时代的先驱，民族的英灵，让我们踏着您的脚印前进！永远前进！”这差不多就是对周建屏一生的总结与歌颂。

虽然周建屏的祖籍在江西省金溪县，不过他却是在云南省宣威县倘塘村出生的。父亲周义忠当时是清末政府的一个地方小官吏，一家食用基本可得温饱。周建屏原先叫周宗尧，字兴唐，后来从军投戈，为表达救国救民之抱负，才改做“建屏”，有建立南疆屏障的意思。

1892年出生的周建屏，18岁就进入了滇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和北伐战争。早在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他便在朱德部下当连长。后来几经波折，又有一段解甲归田的失意时期。由于苦闷，还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立志报国，在寻寻觅觅中却总也找不到报国之路。1926年底，在南昌他重新遇见阔别多年的朱德，并且在朱德的教育培养下，戒除抽鸦片的习惯，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在南昌起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

周建屏是行伍出身，打仗很有点办法。1929年9月党派他到弋横苏区，帮助建立并加强这里的红军队伍建设。后来方志敏对他到来后的工作评价是，“他领导红军打了许多胜仗”，成为“创建红十军的一个主要领导者”。

周建屏虽然年长于方志敏好几岁，但很佩服方志敏的领导才干与其优秀的人格魅力。在唐在刚主持的特委会上，他也支持了方志敏提出的正确意见，但在会后，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应该就是天职，所以也不得不服从特委的决议。

部队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周建屏来找方志敏。方志敏刚刚交卸了军委会的工作。周建屏觉得有一些问题与想法，还想再跟方志敏聊聊。

好长一段时间，俩人围灯而坐，缄默不语。想说得很多，却不知从何说起，以往每次出征前的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感觉荡然无存。尽管表面上两个人都显得很平静，但谁都清楚，每个人的心里起伏着是何等剧烈的不安与忧虑。方志敏因为有肺病，从来也不抽烟，今天却想开戒了，伸手向周建屏讨烟。

周建屏没有给他，自己也把刚刚卷好点燃的一支烟给捻灭了，说：“戒烟了，从今天开始说不抽就不抽了，等打了胜仗，能把这支队伍完完整整地带回来再开戒。”

方志敏好像是从肺底深处把一口浊气深深地呼了出来，也没有接周建屏的话语，似乎是没头没脑他说了一句：“唉，这点家底呀。”

两个人又陷进了深深的沉默之中。

其实方志敏想说的并不只是关于这点家底。在当时，他并不能完全清楚准确地指出李立三所领导的中央的指挥之错在哪里。但是，他从赣东北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凭直觉已经意识到了这次周建屏的领兵出征与往日的不同，前途中凶险莫测，困难重重。可是他不想说，对于中央的指示、领导的决定，他没有在背后议论的习惯。但如果不说，那就眼看着自己与同志们共同创建的这支红军队伍撞入到虎口狼窝里去。方志敏心里的矛盾，此刻就是连周建屏也未必能完全理解。

夜已经很深了，方志敏终于站起来揉了揉麻木的腿，准备送周建屏：“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带队，担子很重啊！”

走到门口，周建屏停住了脚步，憋了许久的一句话终于脱口而出：“明天的这个仗，我真不晓得怎么打！”

方志敏沉吟片刻，说了分量颇重的四个字：“相机行事。”

对于这句话，周建屏觉得自己不仅是听懂了，而且是理解的。他与方志敏虽只共事半年多，却在一起大大小小地打了许多仗，对于方志敏的那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尾巴，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的一套战法还是相当熟悉，并能运用自如的。方志敏在实践中创造并总结出

来的这点经验实在是非常宝贵，非常灵活。后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对这几句话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方志纯给他作了详细的解释：“扎口子”是指围歼小股敌人；“打尾巴”是指袭击敌人后卫或掉队散兵；“吃补药”是指用缴获来武装自己。显然毛泽东觉得这几条与自己的那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军独立师从鸬鹚埠渡过乐河，压向乐平。拿下乐平县城后，捉获并处决了德兴、余干、乐平三县的靖卫团团总蔡子贻。红军在乐平住了七八天，除了筹款外，还帮助乐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从德兴县尚和张家迁回县城。然后，周建屏指挥着部队直进波阳。在这里收缴颇为丰硕，除了一批根据地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外，还有三匹高头大马和一头全身棕红的大骡子。周建屏喜爱得不行，把这头骡子连同马夫一起给留下了。

再往西去，渡过鄱阳湖就是九江了。周建屏在这里发了一道停止前进的命令。转头向北，包围了与九江隔湖相望的湖口县城。他决定先打湖口，来一个小的试探后再作决断。

周建屏把独立师师部与一旅驻守在离县城十余里的江桥镇上，由四旅在二甲吴村一线担任主攻，七旅警戒在都湖路上。这一仗打得实在是危险。战斗打响后，从湖口方面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声。周建屏凝神倾听了片刻，便心头一惊，晓得对手很硬，武器装备相当好。便立即命令一旅增援。不想两个旅都退了下来。周建屏遇到的对手是鲁涤平的警卫团、宋子文缉私营和几个县的警察部队，有二千余人。真是一场恶战，战场上的局势已经起了变化，原先准备进攻的红军退下来，占领了江桥镇旁的高地与山包据守。而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追上来包围了周建屏的这两个旅。周建屏下令死守，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以便突围。两军对垒，兵力悬殊，死守又谈何容易。打到下午4时多，太阳依旧高高地悬在天边不肯下去，红军的子弹都已经消耗殆尽。弹尽粮绝，惟有死拼了。正在此时，也亏了担任警戒的匡龙海的七旅及时赶到，见情况危急，立即拉开千余人的队伍从外层包围了敌人。说起来，他们的武器不过是些梭镖大刀，但是那股不怕死不要命的劲头实在真叫敌人肝胆俱颤。也就是靠着这股子英雄气，两下一夹击，结果反败为胜，把那两千多敌人给冲散了。江桥一仗下来，缴获不少，但红军也付出了伤亡一百多人的代价。

此时，周建屏接到了返回根据地的命令。他立即率师撤回根据地。部队在这里准备整编扩军，成立红十军。

方志敏抱以很大期望的邵式平也从上海回来了。带回来的却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立三路线的正式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方志敏真是感到了莫大的失望与震惊。在万年县富林召开的特委扩大会上，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但几乎是没有有什么效果，唐在刚再次作出了向九江进军的决定。

新编红十军仍是由周建屏担任军长，前委书记邵式平担任政委，原独立师编为红十军第一师，下辖一、四、七三个旅，共六千多人，各种枪一千六百多枝；一旅长是晏文清，四旅长是龙志光，七旅长是匡龙海。此外还有由赣东北各县地方武装一百个连编成的新兵师，由闽北独立团编成的补充师，这支队伍十分庞大，人数达到三万余。

二次进军九江的是刚刚编就的红十军主力第一师，实际上主要打仗也就是靠这个师。

方志敏对此自然是焦虑而不满，他曾经说过：“红军去打波阳（执行攻打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唐在刚所主持的赣东北特委对方志敏的态度同样不满，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重要领袖之不易说服，实为一时不易纠正之最大原因。我们确实感觉着中央路线在此间不是接受与否的问题，而是成为玩弄与试验的牺牲品了。”

幸好是“成为玩弄与试验的牺牲品”，才使得赣东北这块来之不易的红色区域没有沦陷敌手。

邵式平、汪金祥等人在1944年写的《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中对这一时期的经历作了客观的描述：“在苏维埃政策、土地政策、政府工作上等均未改变。在军事行动上，打到鄱阳湖边，还未冒险越湖；攻击九江，亦不坚决截断长江；虽攻占景德镇、波阳、彭泽、马当、秋浦、乐平等城镇，并未攻坚打硬，反而避攻万年、贵溪、都昌、湖口等坚固城市、尤其蒋介石大举向我进攻时，我即星夜退军，回到苏区，并在有利条件下主动打击敌人。这些都不是遵照立三路线指示做的。”赣东北根据地虽然是受到了立三路线的干扰，但并没有完全按李立三的想法与要求去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定的损失。之所以未完全执行立三路线，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方志敏他们对这条错误路线的严重抵制。当时闽浙皖赣的党组织与主要成员有相当长期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在实际行动中能机动转变，减少损失；再一个原因就是并没有钦差大臣直接监督。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回过头来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就是在1930年的1月，方志敏坚持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那篇很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这样写道：“……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肯定了方志敏。”

第十九章

从共产国际回来了一个王明；于是曾洪易在赣东北挥舞开了“三板斧” 吴先民说：再也想不到的是自己干了一辈子革命，到临了会被当做反革命坐进了共产党的牢里 红十军和新红十军

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那一份情是太复杂了。说它是导师？老大哥？朋友？似乎都不准确。

共产国际是站在很高耸的阶梯上，从很遥远的位置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的。它怎么能完全地了解在幅源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它觉得它始终是胸中有数，是小葱拌豆腐一样的明白，因此它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去做了。从陈独秀开始，李立三、王明、博古、李德，一个一个地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使用共产国际的指令与经验开展对国民党的抗争；以致所有的组织、纲领、方针、路线以致小至“苏维埃”这个名称的使用，都自异国他乡原汁原味地借用挪搬过来了。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最终想法，在当时并没有能被人洞如观火地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他们掌握的可以与中国的蒋介石或其他别的什么国家及政党前来讨价还价的一只砝码。他们并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并建立一个政权的打算和计划。这一点做法延续到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苏联人给蒋介石政府几乎 2.5 亿美元的援助，而给中国共产党送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就在全党执行李立三路线时，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了。在这以后，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长期呆在苏联，回国内实际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第一次回国一共呆了两年零六个月，但他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损失却不是可以用时间来估算的。

共产国际成了王明的上方宝剑。王明比李立三更有权威性和震慑力还在于他还有自己的一整套说起来头头是道的理论，这在许多土包子出身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间是算得上鹤立鸡群的。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完全地驳倒他的那套说法。正是因为盲目地信仰与服从，才使得被称为“王明路线”的那一套错误做法得以迅速地流传和执行，以至于红军最后到了除了战略大撤退而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回过头来再瞥一眼六十多年前的这一幕时，你就会从心底里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冷静与智慧，佩服他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而做的不懈的努力，后来“力挽狂澜”这个词用得真是恰如其分。其实最难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其他的人说这块杂色布是白的时，你偏坚持咬定它是灰色的，而表面上看去灰与白的区别并不很大。

王明不是一个人从苏联回来的。他的那伙人中都夹杂着一种颐指气使的味道，对于他们嘴上时常挂着的那许多听起来令人生畏的理论名词，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没有谁能与其比拟。所以大有“钦差满天飞”的架式。1931年7月，王明把持下的中央也给赣东北根据地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叫曾洪易。

这一段时间里，赣东北领导层中的组织人员变更显得十分频繁。在曾洪易积极改组过的赣东北省委之上，还有一位可以决定一切的中央代表，这就是曾洪易自己。其实也就全是他说了算。在这种一言堂的态势之下，错误与失败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葛源往西走不上几里路，便能见到一大片枝叶茂盛的枫树林。到了深秋时节，枫叶由绿渐红，被风一吹，林子骚动，火辣辣的一团赛过烈焰升腾，煞是好看。此地也因此得名枫树坞，赣东北省委、省苏维埃机关就设在这里。曾洪易来了之后也住在这里。他认真地下了一番功夫，作了一番准备，两个月后，在葛源召开了赣东北省的第一次党代大会。

曾洪易在苏联读的那些书本上的名词词汇没有浪费，他的一套又一套的马列理论使得在赣东北土生土长的党员代表听得目瞪口呆。虽然有如听读天书，但也不由得佩服这位新来的中央代表学问深奥，难免有些自叹不如。但在这位中央代表的话锋转向赣东北工作时，农民代表们也瞧出来了，这位吃过几天洋面包的人对大伙儿的工作极不满意，他那张有点瘦弱白皙的脸渐渐地涨红了起来，像只煮过了的蟹。

“你们赣东北的党是什么党？”曾洪易的声音变得尖厉了起来，“开会时吃烟的吃烟，咬耳朵的咬耳朵，搞得像家里一样随便。哪里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哪里还像个共产党？说你们是拉亲带故搞起来的同姓党、家属党、祠族党一点也不过分。从本质上说，你们搞得就是个封建主义的党……”

“你们赣东北，打仗弄了几句顺口溜，什么叫做‘扎口子、打埋伏’？什么叫做‘打小仗、吃补药’？这根本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扣你个小点的帽子，也是地方保守主义的军事，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

“你们赣东北的土地法，搞出来却是富农土地法，不晓得是维护谁的利益。列宁是怎么说的？要反对富农，中立中农，团结贫农。你们却颠三倒四地让地主富农也分田。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富农路线是什么……”

曾洪易仍在尽力地发泄他的不满。方志敏他们的眉头却渐渐地锁紧了起来。

方志敏是兼任代理红十军政委的职务，与周建屏一道带领红十军转战闽北，历时45天，收获颇丰，前前后后打了十一仗，仗仗皆胜。尤其是打下了闽北重镇赤石街，缴下的银元与黄金拉都拉不完，方志敏把自己的坐骑都让了出来专门驮银元。回到根据地，长期企盼的中央代表已经来了，方志敏以为是加强了组织力量，喜上加喜。可是高兴了没几天，反而感觉出这事情怎么越来越难弄了？

曾洪易的三板斧砍得可真够凶狠的。头一招便是改组了省委的党、团组织以及军内领导。从名单上看，除了方志敏、邵式平等几位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无法排挤出局，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等人的名字已经见不到了，连黄道也被他想了办法调到闽北去了。现在所能看到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中央或别处调派来的。曾洪易无形中在本地干部与派遣干部中划了一条线。他在省委常委中也学着中央的样子搞了个三人主席团，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他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这个三人主席团之上，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方志敏现在还有一个省苏维埃主席的名分，但差不多也是枉担了虚名，实际上对党与军队的事情他已很少有发言权了。在这次党代大会上，对一些干部再次作了调整，可以说曾洪易实际上已经在组织上完全地控制了赣东北省委和红十军的领导权。

曾洪易的第二板斧是指挥打仗。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其他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防止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连为一片，国民党军布置了近两万兵力于信江沿岸，又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向前

推进，对苏区实行钳形包围。

曾洪易坐在苏区中心葛源那间闻不到硝烟的农舍里，指挥着红军的千军万马去与国民党军厮杀。曾洪易用的是王明的那套理论与做法，口号是“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王明实际上是把在苏联院校里的那套战术理论，拿来运用到了拿着梭镖、大刀、步枪作战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

方志敏和邵式平终于忍不住找到了曾洪易，企图能说服他改变点什么。

曾洪易有个习惯，吃过中饭要小睡一会儿，午睡的方式也很正式，不是随随便便在哪里靠将片刻、把眼眯上个五分钟就成的那种，一定得有张床，床上得有铺的有盖的。他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晓得他这个习惯，在这段时间里不来找他。否则打扰了他，整个下午就像是鸦片瘾上来了一般，精神不好不说，脾气也会搞得很糟糕，要拿脸色给人看的。方志敏和邵式平心里想着事，偏就疏忽了这一点。结果一敲门，曾洪易上来就没有好脸色看了。

曾洪易披了件细布褂子立在门口，并没有让他俩进的意思，不过也没有发作，只是淡淡地问：“有什么急事吗？我还当做是国民党军打到山里来了呢。”

方志敏晓得他是说风凉话，不过不想都站在院子里说很重要的话题。正在犹豫，邵式平已经一侧身子不请自进地迈脚踏进了屋，那副大块头的身板不轻不重有意无意地撞了曾洪易一肩膀。曾洪易一时没站稳，往后让了一步，方志敏也就跟了进去。

方志敏开门见山他说：“想跟你再说说下一步的作战任务。”

曾洪易站在门槛边上并没有随着他们进屋，听方志敏这样说，只是撇了下嘴角，两只手抱着肩膀说：“又拿你们的那套保守主义的做法来进行游说？”

方志敏耐着性子说：“打仗要注重实际情况，这儿日的情况你也都晓得了吧？把红十军拉往西南方向的金溪、资溪、余江一带，正好是钻进了敌人的堡垒丛中，屡战不利，伤亡惨重，我们不能眼看着将这支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队伍消耗光。应该换一种打法了。”

邵式平说：“你再看看位于我们东北方向的皖赣、浙赣边界，在婺源、常山、江山、屯溪这一线，敌人的兵势比较弱，而且没有修筑堡垒，非常有利于我军的出击，以东北调动西南，在周旋中机动歼敌，应该是上策。”

曾洪易说：“说来说去，你们总是想见了敌人的碉堡绕着走。我就闹不明白，怎么面对敌人的堡垒，你们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恐惧畏缩呢？”

方志敏仍然还想说服他，所以压着火给他解释：“其实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装备差一大截子，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既无炮兵，又无重火力武器，要想进攻坚实易守的堡垒，花费的代价难以估量。这几日的作战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这仗太难打了。刚才老邵说了，皖浙边界是敌人兵力部署的薄弱位置，我们如果在这里出击，一是有怀玉山为依靠，有利于部队的回旋迂回，生存面积大了许多倍；二是兵力直指金华、杭州，给这一带敌兵造成威胁，相应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三是在占领皖浙边境后，巩固扩大苏区，再经仙霞岭与闽北苏区打通，这就创造了从侧面与中央苏区打通的条件。”方志敏说得很实在也很诚恳，他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跟曾洪易意气用事，仗打得不好，流血牺牲的都是自己的战友兄弟。要尽力说服曾洪易，尽量地减少这些无谓的牺牲。曾洪易有决定权，只有他才能修正眼前这条错误的作战方针。可是，要曾洪易否定自己

原先作出的决定，又谈何容易。

曾洪易微微眯缝着眼，并不打断方志敏的长篇大论，仿佛听得很专注，仿佛有所心动。连方志敏一时都猜不透，在那副薄眼镜片后面深藏的是一种怎样的眼神。

其实曾洪易打心眼里就从来也没能瞧得上过这一批在赣东北的潮湿红壤上跌打滚爬出来的革命者。居然跑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和自己面对面地高谈什么革命与战争。不错，曾洪易也承认，这些干部有革命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不乏盲动性，有不怕死不怕难的精神，但是缺少军事理论与正规教育。作战是什么？不是大刀会民间帮派组织一窝蜂地闹事，这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与研究的学问。自己在苏联学了好几个星期，还没有学完单兵训练作战这一章节。来赣东北几个月，最大的感触是这里的干部思想与眼光都太狭窄，只晓得个这里信江一条河，只晓得这簸箕大的一块根据地。老实说，要与他们沟通想法，简直就是困难极了，听他们讲话，比听苏联人讲俄语还要难懂。

曾洪易回味着自己的感受，方志敏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完全弄明白。他也并不想弄明白，有什么必要？应该是自己说了算的。

曾洪易说：“志敏同志，不是我要给你扣帽子，但你所说的这些，根本就是逃跑主义的表现，不想办法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反而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你自己说说看，你这叫什么行为？”

邵式平说：“硬要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不是败家子又是什么？”

曾洪易的声音严厉尖锐起来：“你就晓得你这点家底，你晓不晓得要服从中央？要服从王明同志的指挥？敌人明明在这边，你偏要跑到那边去，你去跟谁打仗啊？说你是逃跑主义你还不服，坚持反对攻打堡垒，这同时也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你们赣东北的立三路线还很有市场嘛。你们在思想上不要搞得马马虎虎的，要完全地扭转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上来。这也是我给你俩的一个警告！”

方志敏没有想到曾洪易一下子就把话题给转了，几顶大帽子也扣了上来，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心里早已憋着的一股火一下子就升腾了上来，正想说什么，邵式平却抢在前头了：“你警告谁呀，我也警告你一句，你这么干下去，队伍全要被你糟踏完，根据地也会被你糟踏完！我是军委会主席，我要对部队每个士兵负责，要对赣东北的革命事业负责，这么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曾洪易紧逼了一句：“你要怎地？”

邵式平一步也不让：“我要把部队撤回来，我有这个权力。”

曾洪易冷笑了一声说：“你有这个权力？哪有这么便当的事，是谁给你的权力？告诉你，我现在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宣布撤消你的军委会主席的职务。”

没有想到谈话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曾洪易在指挥作战中表现出来的固执己见更是令人吃惊。为了坚持他的“持久围困堡垒”的方针，敌人在哪里筑堡垒，就把红军调到哪里去攻打。敌人在贵溪夏家岭修了一座四丈多高的碉堡，非常坚固。曾洪易立刻就来了劲儿，命令红军和地方独立营、游击队、赤卫队全调上来打，打了四五次也未能攻破。那是一场怎样的血战呵，那只高大灰黑色的碉堡虎视眈眈地俯瞰着周围的一切，从那漆黑的枪眼里喷出一道道的火舌来，碉堡前的一片开阔地上早已是尸横遍野了。前面的战士负伤牺牲了，后面的战士还想冲上去抢

救回自己的战友，却又接二连三地被打倒在战友的身旁。血流成河。事后人们打扫战场时，发现烈士们匍匐着的泥土已经被鲜血浸透成了紫褐色，用铁锹挖下去一尺多深，都不能看见原色的土壤。

就这一仗，部队便伤亡了千余人。更令方志敏他们痛心不已的是，花春山、龙志光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牺牲在夏家岭的碉堡前了。

事与愿违，红十军不仅没能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也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经过半年多的浴血苦战，赣东北根据地却越缩越小，只剩下一个横峰县城和弋阳、贵溪、上饶、德兴、乐平及铅山等一带纵横二三百里的地盘了。

方志敏还没有来得及再找曾洪易理论，曾洪易的第三板斧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舞过来了。

“肃反”这个词，也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挪用过来的，其操作内容差不多也是一种仿制品。也许事情开始时的出发点和愿望都是美好的，但是到后来事态的扩大与发展已如同野马脱缰般难以控制。祸起萧墙，殃及池鱼，由赣西南党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倡导的这场运动很快就蔓延到了各苏区根据地。

其实要说起“AB”团来，方志敏还是很知底细的。1927年的1月开始，他就在南昌与“AB”团的头目段锡朋交过手。时间不长，到了4月初，南昌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四二”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分子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当时只有段锡朋及几个骨干出逃在外，其他人捉的捉、押的押，一下子就让这个寿命仅仅存活了三个月的爪牙组织寿终正寝了。方志敏感到最为疑惑不解的是，这个“AB”团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当初都没能形成气候，怎么事隔这几年又冒将出来了呢？但这又是从中央传来的指令，方志敏不敢有太多的怀疑，同时说服自己，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时不好打折扣。

曾洪易的神经又绷紧了。

方志敏始料不及的是，事情会是从吴先民身上发作起来。

其实好几个月之前事情就露出端倪来了，只是大家都以为是工作上不同意见的争执，谁也没把它当做一回事。

恰恰就是这样低估了曾洪易。

是赤色警卫师夜袭周坊的那天夜里发生的事。

既然是袭击，又是夜战，对部队要求自然就十分严格。本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部队悄悄进入埋伏地点，对于周坊的钳形包围也即将完成，眼看着周坊之敌已是瓮中捉鳖了。谁曾想就在这最后的关口，一声刺耳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周坊守敌顿时警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不顾死活地开始了疯狂地射击。夜袭计划随着那一声枪响顿时化为泡影。

部队撤下来后，当时任政委的吴先民就立即着手进行了响枪事件的调查。但是，调查出来的结果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一位半个月前入伍的新战士由于紧张不小心扣动了扳机，造成了枪走火。吴先民处分了这个战士和连排干部，并且把调查结果汇报给了上级。

曾洪易看到了这份汇报，他足足盯了半个时辰没有开口，然后派人去叫来了吴先民。

曾洪易说：“吴先民同志，这份报告是你写的？”

吴先民晓得这位曾经到过苏联的中央代表花样很多，而且对赣东北的本地干部一向看不大习惯。所以很谨慎地只回答了一个“是”字。

曾洪易用手指头用力地弹了弹那页薄薄的纸，说：“你不觉得太简单了吗？”

吴先民以为是嫌报告写得太简单，于是解释道：“事情本来也不复杂，就是这个新战士闯的祸，已经都问清楚了，也作了处理。”

曾洪易一下子用力地把那份报告掷到了桌子上，大声他说：“你到底是革命警惕性松懈，还是完全在帮敌人说话？”

吴先民一下子愣住了，他觉得曾洪易说的简直是有点驴头不对马嘴，而且一时也闹不清楚这位中央代表的葫芦里究竟打算卖的什么药。于是站在那里没有吭气，充满了疑惑与不解的眼光看着曾洪易。

曾洪易越发地怒不可遏，他非常敏感地感觉到了吴先民的沉默中所包含着的那一种不服与冷淡。他忍不住要咆哮，他也知道那句老话，有理不在声高。但他此刻要借助高亢愤怒的声调来压倒吴先民，击破吴先民的沉默。

“这里头的文章哪有这么简单？连我都能一眼瞧出来，如果不是有‘AB’团分子捣乱，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AB’团分子就在你们的队伍里进行破坏，你们居然一点没有察觉？你们的警惕性到哪里去了？你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你这个政委是怎么当的？”

吴先民说：“曾代表，你是不是把这件事情闹复杂了？事情出了，确实很令人恼火，但我们也详细地调查了，出事的是一个新战士，没有经验，太紧张……”

曾洪易挥着手打断了吴先民的话：“什么事情想要找个二三十条理由还不容易？我不要听你这一套啰嗦，你给我把那个家伙抓起来，好好审一审，那个班长、排长也都要抓，都是一伙儿的。他们互相包庇、作伪证，专门来搞破坏，一看就是个‘AB’团分子，而且你们那里的‘AB’团分子不止这几个，有相当大的一批！”

吴先民又一次吃惊地愣住了。武断、专横、独裁、霸道、蛮不讲理……他不知道用哪一个词来形容面前这位中央代表，他只看见中央代表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原先那张略显文弱苍白的脸庞因为激动而变得扭曲，两只不大的眼睛拼命地瞪着自己，仿佛恨不能一口要把自己吞下去才好。

吴先民终于也忍不住了，一句话脱口而出：“哪有那么多的‘AB’团？你说是他就是啦？总要有个证据吧，都是些农民，种田的人，他们晓得什么是‘AB’团？”

曾洪易的眼缝里闪着光，仿佛终于抓住了猎物似地指着吴先民说：“你敢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我看你也差不多了，难怪你那里会闹出事来，根子就在你身上！要查先要从你查起。告诉你，回去先给我把那批人抓起来，你要敢不抓，我就抓你！”

曾洪易说到做到，真的下手了，给吴先民扣了顶“改组派”的帽子抓了起来。吴先民哪里肯服，一句口供也没有。曾洪易气急败坏，把吊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等等酷刑都用上了。吴先民有个笔记本，上面记着赤色警卫师和上饶县各区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等干部的名字。曾洪易拿到之后仿佛是捡到了宝贝，一口咬定这就是份“改组派”的名单，按照名单去抓人。严刑拷打、指名逼供，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了。并且在审讯时先宣布：“只要说出一个名字便可以宽大。”有的人打熬不过便胡乱说一个，以为能放了出

去。谁知道曾洪易每每都是拿了口供就杀人。

方志敏后来回忆时写道：“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在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

老实说，方志敏对当时中央的肃反精神并没有完全的怀疑，他怀疑的只是曾洪易在赣东北地区的做法。当曾洪易打着中央的旗号来压制他们的反对意见时，方志敏只能是无可奈何了。

但是当他听到吴先民被关押起来的消息时，一时吃惊得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首先产生的第一个怀疑是：是不是搞错了？来送信的是管监狱的胡道远。胡道远是一个人悄悄地来找方志敏的，他说吴先民被打得很凶，他怕是这里面出了岔子，让方志敏赶紧去看看。消息是不会错了，方志敏紧跟着产生的第二个怀疑是：吴先民会是反动派吗？他马上又回答了自己，这决不可能的。可是眼下这是怎么弄的？方志敏着急地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便脚步匆匆地向监狱走去。

曾洪易为了搞肃反抓人关人，在根据地搞了几十所大小不等的监狱，并且还设立了审讯室，里面绳索棍棒一应俱全，搞得十分恐怖。关押吴先民的这所监狱离省委机关不远，原是一间地主家的宅院，虽然已经很破旧了，院墙却仍很坚固。曾洪易就是看中这一点，把他认为是重大要犯的人都关押在这里，派了一个班的战士荷枪实弹地看守。

胡道远掏出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打开了门，一股混杂着血腥气、潮湿气的霉味扑面而来。屋子里面很暗，稍稍停了一会儿，方志敏才看清靠墙边的地上铺着一堆杂乱的稻草，一个衣襟破碎的人蜷缩着半卧在草铺上。这才几天的工夫，方志敏此刻看见的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充满干劲、神采飞扬的吴先民了。赤裸的双脚上铐着一副崭新的铁镣，这是曾洪易下令专门打制出来的。显然是用过刑了，衣衫破处裸露出一道道的血迹伤痕，又与布褂子粘在一起扯不下来，一动便浑身疼痛难禁。吴先民已经憔悴得脱了人形，除了那双眼睛还依然让方志敏感到熟悉，此外哪里还能使人认的出这就是不久前还指挥赤色警卫师英勇作战的红军政委吴先民呢？

胡道远拿了张小凳子让方志敏坐下，自己就悄悄退了出去。

方志敏晓得问题很严重。从感情上来讲，他觉得吴先民是太委屈了，恨不得立即就派人来给他治痛疗伤，宣布给他平反。但从理智上来讲，方志敏不想马虎，战争时期的情况毕竟是很复杂的，许多情况令人料不能及，他需要冷静地把事情搞清楚，拿着事实依据去找曾洪易。

方志敏很严肃地问：“吴先民同志，你到底是怎么弄的？你给我仔细讲讲。”

看得出，吴先民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声音里夹杂着哽咽，但仍不失平静他说：“给我安的罪名是‘一贯反对国际，反对中央，反对省委’，说我妄图改组省委，在赤色警卫师里和上饶县搞分裂党的活动，另外军事上不服从指挥，打夏家岭时说我按兵不动。抓我时说的就是这些。”

这些罪名都是空壳子大帽子，方志敏要的是具体事实。

“哪有什么具体事实，还不是他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老实讲，他给我安的这些罪名我是一个也不承认，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讲瞎话，到死我也不能乱讲乱说。”

方志敏点点头，放缓了语气又问：“事情是怎样开头的？”

吴先民说：“为了处理那次夜袭周坊枪走火的事，我与曾洪易争执起来。

不晓得这个人心胸怎么这样狭窄，作风怎么这般霸道，根本没有理好讲，说你有‘AB’团你就有‘AB’团，事实没有，我怎么能说有？他就说我也是‘AB’团的后台。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曾洪易就是要排斥与他说不到一起去的干部，排斥赣东北的老人。赣东北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么个魔障！”

“不要乱说。”方志敏打断了吴先民的话，他不想再让曾洪易抓到口实。再者，他也觉得这样在背后议论中央代表不太合适。

吴先民挣扎着撑起身子来勉强靠着墙，喘着气说：“不叫说就不说了，我只有几句话，就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干革命干了这许多年，也抓了无数的反革命，到临了自己会被当做反革命关进共产党的牢里。”说完这几句，已经撑不动了，咕咚一声重重地跌靠在草铺上再也不愿开口了。

方志敏的眼眶立即就湿润了，他也没有再问什么，他相信吴先民说的一切。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去找曾洪易，把人放出来。他默默地弯腰脱下自己脚上的一双半新的布鞋，又默默地给吴先民穿上，这才光着脚起身走出了监狱。

曾洪易起先为了赣东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的迟缓开展很是发愁，方志敏、邵式平这几个人基本上不支持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审案子，但差不多经他们审的人以后都放了，说是没有证据。曾洪易为此很恼火，同时也挨了中央的批评。中央批评赣东北的肃反工作只有“零星的破获”，要求必须“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上去。现在挖掘出了吴先民这个案子，曾洪易自己觉得对中央也算交代的过去了。他也很不喜欢吴先民这个人，仗着自己打下了这块江山，地盘熟，人头熟，不大把自己这个中央代表放在眼里。枪打出头鸟，铲除了吴先民，以后看谁还敢公开地与自己作对。要杀吴先民的决心是早已下了，但他不愿早跟方志敏他们讲，虽然同在一个饭锅里搅勺，同在一个党的领导下做事，但是他心里泾渭分明，从来也没信任过方志敏这一拨人。就像今天，方志敏跟随着胡道远刚刚踏进那间阴暗霉湿的牢房，曾洪易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他没有动步，也没有发火，吴先民已经是掌中之物了，方志敏这一关迟早也要过，以静制动吧。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削了几片用井水冰过的甜瓜，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吃着，吃得很斯文，完全是坐在莫斯科餐厅里的那一副派头与感觉。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曾洪易知道这一定是刚刚从吴先民那里过来的方志敏。他依然坐在凳子上没有动弹，这是他琢磨出的心理战术，你越是急切地想要敲开这扇门而遭到了冷遇，你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就越加会锐减，你好不容易鼓舞起来的激昂情绪也会相应减弱。曾洪易对于这点深信不疑。他等到外边的人敲了四五遍，仿佛已在犹豫是否再继续敲下去时，这才恰到好处地站起来去开门。估计得丝毫不差，门外确实是带着一脸焦急而来的方志敏。

方志敏好像并没有在意敲几下门这个问题，一进来就说：“你怎么把吴先民给抓起来了？抓吴先民是错误的。”

曾洪易说：“你说抓错了我不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可以理解的呀，感情上面子上都过不去，和吴先民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都不晓得他是怎样一个人，完全被他蒙蔽了。”

方志敏说：“正因为和他相处的时间长，所以对他才真正了解。吴先民如果要是反革命，那洪洞县里是真无好人了。这样随意乱抓人，不重证据，只凭臆想，老百姓会怎样看我们共产党？你晓得不晓得，老百姓会寒心的。

现在外头已经有这样的议论了。”

曾洪易说：“这更加说明反革命分子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造谣生事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再说，你怎么晓得我抓吴先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我抓他？”说着，曾洪易拉开了抽屉，取出一叠审讯口供来，拍拍打打着翻给方志敏看，“这些全是证据，都是反革命分子自己承认的参加改组派、‘AB’团的口供，总头目就是吴先民。”

方志敏晓得他那些口供的来源，里面水分极大，可信的成分能占着一半就很不错了。他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再去审一遍这些招供的人，取得最可靠的证据材料。可是当他提出要再审时，曾洪易轻描淡写他说，犯人已经都被枪毙了。这就是说，曾洪易手上拿着的就是惟一的证词了。不信也得信了。

方志敏真是气坏了，他强忍着一股股往胸口上撞击的怒气，说：“吴先民过去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不会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吴先民的事，我来担保！说他是反革命，难免不是反革命的诬陷。”

“你来担保？”曾洪易斜着眼乜了方志敏一下，“同志，我看我要用肃反的眼光来看你了！”

就这一句话，再争辩也没有用。方志敏不但没有能解救得了吴先民，反而被曾洪易安上了一顶“对肃反工作怀疑动摇”的帽子。同时被下令停职隔离检讨的还有邵式平。

这一天的天气闷热难禁，说是下雨又没有成形的雨滴，说不下雨，潮闷的水气包裹着一切，连头发梢上都湿漉漉的。天刚蒙蒙亮，吴先民就被押解出来了。依旧是那身血迹斑斑的灰色红军服，没有戴帽子，零乱的头发差不多已经让汗水与血渍都粘糊住了，脚下那双半新的布鞋分外引人注目。他大概也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时刻了，那双闪亮的眼睛环顾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把家乡的山山水水永远地印刻到脑海中。他没有在意那一排尖锐的枪响，最后吸引他注意的，是葛源村口上那片充满生机绿荫婆娑的枫树林。

当年秋天，那棵被用来捆绑吴先民行刑的大树落叶落得最早，第二年也迟迟发不出芽几来。老百姓说，这是浇灌了吴政委的血呀，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曾洪易在排枪响过后，又睡了个回笼觉。打这以后又新添了一个毛病，每天早上到了钟点便再也睡不着，要听到枪毙犯人的排枪声响过，接着的这个回笼觉便会睡得更加有滋有味。曾洪易从这每日的枪毙人的枪声中获得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快感，他的那急速膨胀的权力欲与表现欲都从这里边得到了满足。

曾洪易在下令杀害了吴先民后，叫人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了三天。他写了篇《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同志的启事》，在团省委机关报《列宁青年周报》上发表，其中说道：“最近赣东北获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肃反胜利，无疑的这是因为赣东北的党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曾洪易的口号是：“以肃反的胜利争取红军的胜利！”在他的这个口号的引导下，肃反运动迅速地被简单化和扩大化，整个赣东北根据地的“反革命”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上饶县一位农民上山砍柴，扁担两头绑了两个柴堆，形象一个“A”字，被认定是“AB”团的联络暗号。捉来杀掉。

闽浙赣省军区有一个为红军培养司号员的司号连，学员都是些青少年，喜爱活动做游戏。曾洪易控制的省政治保卫局把他们当反革命抓，一百多号

人最后杀得只剩下八九个。

弋阳余家仓村里群众上山躲自匪，被曾洪易他们知道了，认定是“AB”团要搞破坏，抓到的普通老百姓无一幸免。

余干县警备大队的罗英，是地下党员，率领一百多名警备队士兵起义投奔苏区，这一百多人连同罗英的妻子儿女，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全部枪杀。

当地著名的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余杰、洪坤元、蓝广平，红十军参谋长舒翼，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组织部长张天松，闽北苏维埃的创建人陈耿、徐福元，以及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和红军团以上干部，都被肃反掉。在群众中有吹口哨、敲扁担、扎裤脚、扔石头等等，只要被看见，就是“AB”团的联络暗号，也被肃反掉。甚至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干部与交通员也被调回苏区加以杀害。弋阳、德兴、乐平的县、区、乡干部大部分被肃反掉，仅弋阳一县就设监狱17所，关有“AB”团、“改组派”、“罗章龙派”、“第三党”、“铲共会”等等五花八门的犯人一千一百多人，被杀掉的有三百余人，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老百姓说：“曾洪易是吃共产党的饭，干国民党的事。敌人办不到的事，倒是他统统给办到了。”

对于肃反斗争，方志敏自己认为是“热心参加的”。但是他没能料到的是，为了吴先民的问题，方志敏又一次背上了一个处分。在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并不能清楚准确他说出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处，还不能有条有理他说出一番铿锵有力的理论来驳倒曾洪易。直到三年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国民党寂寞的牢房之中回想起这许许多多的枝枝蔓蔓来，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现在肯定他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方志敏此时所留下的这段话，应该还不算太迟吧。

1933年初的冬季显得是那么地漫长和寒冷。过了阳历年不久，中央的指令便传到了赣东北。电令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南渡信江，到中央苏区去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令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等随军前往。

曾洪易拿着电报足足看了有半个时辰，脸上的颜色由青变白，又由白变紫，最后涨红了脸失声叫道：“那我们怎么办？这不明显着是让我们唱空城计么！莫非是中央苏区重要，我们就不重要了？抽掉了大梁房子还不是要塌掉？”紧跟着就是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也不布置执行，也拿不出个新主意来，整个的人好像是失了魂似的不晓得做什么好，连中央代表的架子也顾不上端了。

方志敏接过电报，细细地念了两遍，心里也不由得瞪顿一下，变得踌躇不定。局势是明摆着的，敌人已是重兵压境，准备向各根据地开展新的“围剿”。在这个节骨眼上抽调走红十军，势必削弱闽浙赣这一带的对敌斗争力量，严重些将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而且在他个人看来，中央的这次调兵未必就十分正确。目前国民党军置重兵于信江沿线，红十军应向浙西皖南地区出击，乘敌人纵深堡垒尚未形成之际，跳出圈子开展游击活动，这样也才能更好地配合中央红军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瞬息之间脑子里已经闪过了许多的念头，但是方志敏紧咬着嘴唇没有轻易开口，一切都必须服从中央，服从大局，这个念头开始牢牢地占了上风。

曾洪易眼巴巴地望着他，见他半天不说话，着急地催道：“快拿个主意

吧，主力部队抽走了，我们怎么办？”少顷又吞吞吐吐他说，“是不是给中央回个电报，讲讲我们的困难？”

方志敏停了片刻说：“中央如果不困难，怕是也不会发这份电报来了。”

曾洪易也没有再说什么，布置部队的工作统统交给了方志敏。

部队出发的这一天，正值农历的大年三十。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一团一团如同棉絮般在空中飞舞，染得天地河山一片洁白。

告别餐也吃过了，部队在风雪中集合出发。不知为什么，方志敏这一番留恋牵挂的心情特别重，特别舍不得与邵式平他们分手。红十军这一开拔，他顿时觉得心里空落落地像是缺了好大一块。这是由自己两枝半枪起家闯天下建立起来的武装啊，说走就走了。

方志敏没有骑马，和大家一起默默无言地往前走，送了一程又一程。漫大的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轻如羽片般地飘舞着，堆积在细长的枝头上沉甸甸地压弯了树干，踩出来的一行行脚印很快又被雪花覆盖住了。往日里波浪翻滚的信江变得安静了许多，水天一色，行人罕迹。

方志敏终于在信江边上站定了脚步。部队就要在这里准备南渡信江，到贵溪的上清宫与中央红军会师。大家都无言地在雪中肃立着，临别前的片刻时间，使人觉得既短暂又漫长。方志敏也觉着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是这一会儿却始终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想说的话题始终都在回避，不想说的话真是想不起来说。就这么默默地握着手，默默地把他们送上了路。一支队伍迅速地消失在风雪弥漫之中，无踪无影。方志敏仍在江边高坡地屹立了许久许久。

红十军南渡后，方志敏便回过头来着手处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原有的闽浙赣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组建新军，即新红十军。

当时赤色警卫团只有一千五百多人，明显不足以撑起一个军来，因此又从各县的独立团、营中抽调了一批人员与枪支，整编扩充为两个师，即二十八师与二十九师。后来又成立了一个三十师。新红十军开始由匡龙海代理军长，聂洪钧任政治委员。不久中央派了王如痴来，担任军长兼政委；以后又派了刘畴西来。

到了年底，中央要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不知为什么没有叫担任中央委员的方志敏去，却把什么也不是的曾洪易叫回去开会。曾洪易走了的一大好处就是，重新由方志敏再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紧跟着根据地的工作就随着主要领导人的易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转变。

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念了他的那本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会后不久，他就到莫斯科去了，严格他说，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后来的一段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并不在现场。但是，他身后的那条又粗又黑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仅把红军送上了战略大撤退大转移的长征之路，而且断送了整个的闽浙赣根据地。

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同时也传到了闽浙赣。在军事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口号是：“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为阻止殖民地道路与实现苏维埃道路而斗争”等等。在这同时，方志敏为了调动和分散向苏区推进之敌，组织起挺进队到皖南开展游击战争，被中央批评是“分散保卫苏区力量的错误行动”。这样一来，新红十军与各县地方部队只得遵照中央的指示，把兵力集中在敌人即将要正面进攻的方向修建堡垒工事，可谓是处处设防、节节防御。这以后，根据地出现了一种奇特但又是令人可歌

可泣的现象，成千成万的群众被动员起来修建赤色碉堡，对革命战争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对中央及红军的命令要求表现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精神。老百姓没有学过一天的军事，没有上过一堂建筑课，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建出了成百上千个坚固的堡垒。而新红十军的全体官兵在与敌人“堡垒对堡垒”的战斗中也进行了殊死搏斗，丝毫没有考虑到自身的生存价值。

1934年的3月初，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从铅山的河口镇分两路开始进攻横峰县城。东路进攻之敌没有想到在行进到猪头山时，却遇上了新红十军的横峰独立营的拼死抵抗。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其实坚守阵地的只有两个班，却将他们阻挡在猪头山前40天而未能前进一步。猪头山有五百多米高，三面悬岩，仅南面有一条小路可供上下。横峰县的老百姓在山上修筑了坚固炮台与工事。这些堡垒工事白天被敌人轰垮，一到夜晚，便又有几百名老百姓背着木头、石块上山抢修。第二天敌人看到的依旧是一座完好的堡垒，阵地前依旧布满令他们寸步难行的地雷。这两个班的战士消灭了七百多名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在下了撤退命令后，活着的12个战士将一根麻绳垂到山下后而攀绳后撤。不料只下来七个人，绳子就被敌人的炮火打断。留在山顶上的五个战士立即砸烂武器，用石头砸，用牙咬，最后都纵身跃下了悬崖。连敌人看了，都不知是敬佩还是恐惧。

从西路进攻横峰的敌人也在赭亭山遇到了抵抗。赭亭山从山上到山下，共有三个关口，根据地地方武装的两个排在山顶上修了炮台，在每个关口修筑了工事。他们面对两个团敌人的进攻坚守了半个月。敌人每天出动飞机进行轰炸，最后好不容易攻上山顶，包围了炮台。敌人再也没有料到，仅剩的几名活着的战士竟毅然点燃了最后一箩火药，以身殉堡，结果围困在炮台外的一百多名敌人也同归于尽。

上饶县老鸦尖的炮台被称为是红色英雄炮台。它是用红石建成，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生辉。敌人的进攻开始后，向它打了上千炮，打塌炮台一角后随即派一营人冲锋上前，仍然遭到了守堡战士的英勇还击。当天晚上，上饶县委、县苏维埃的领导同志带领一百多名群众，每人身驮重石，从后山爬上1500多米高的老鸦尖，连夜将炮台修好。第二天敌人又来打炮，白天被打坏了，晚上依旧修好。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到了第五天，敌人重新调来了一门野炮和两门迫击炮，连续不断地轰击炮台。炮台的上层被打塌，周围修筑铺设的壕沟鹿砦被轰平。此时，炮台内只剩下了三百多斤的黑硝和两百多个地雷。退入炮台下层的战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等敌人靠近炮台后，将这些黑硝点燃。地雷的爆炸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冲天而起的火光浓烟在几十里外都能看见。烟云散尽，炮台已夷为平地，一切都没有留下痕迹。

方志敏后来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这样讴歌了红军战士：“总计敌人攻我这个赤堡，打了一千余炮，而我15枝枪的守备队，竟坚持抵抗了五天，最后以身殉堡，比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济南城和沈阳城，还没有打几十炮，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却无抵抗的溃窜，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无愧的了。”

第二十章

共产党与红军面临着的问题已不是求发展了，能否生存下去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谭家桥一仗，再也没有料到会反胜为败。七天内四次受阻；刘畴西说：部队疲倦，本日内不能前进。金竹坑只有一个排的敌兵在把守，可是又有谁知道。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开始一渡赤水。

1931年日本军占领东三省并觊视华北进而攻占整个中国的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蒋介石的面前放着日本人与共产党这两大对头令他寝食难安。权衡利弊，蒋介石决定先安内后攘外。他大约觉得日本人只是图谋他的江山，而共产党搞不好要了江山还能要他的命。他亲自督战，调集一百万大军包抄围剿红军，下决心势必要趁这个机会剔除这心腹大患。

共产党与红军们真是到了举步维艰的时刻，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求发展了，能否生存下去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共产党里能人多，历来的经验教训也提醒他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民心所向就是抗日。抗日不抗日是衡量一个人及一个政党爱国还是卖国的鲜明标志。在中央苏区已经感到形势相当吃紧时，仍然派出了一支部队，打出的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同时企图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态度。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是由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组成。在1934年的7月，从红都瑞金出发，穿越闽境，经浙西、皖南、赣北，三个月后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在11月份与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及新红十军的主要领导就在此时加入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列。当时谁都没有能立刻意识到，他们踏上的将会是一条怎样的征程。

党中央对这支六千人的队伍寄予厚望，所造声势大大超过实际力量。临出发前赶印出来的各种宣传文告就达160万份，足以供应先遣队的散发张贴。

开始时，一切如同预计的那样，国民党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吸引过来。不明底蕴的国民党军没敢轻举妄动，只是伸出触角来试探了几下，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不过是一支区区六千余人的队伍，其中有一半的士兵没有武器，是端着梭镖大刀走上抗日前线。所携带的宣传品及后勤物资又是如此之庞大，成为了这支队伍行军作战的沉重包袱。国民党在有被愚弄的感觉中清醒以后，立即转化为疯狂的围追堵截。

在当时那种敌强我弱的大格局下，这支队伍从一开始便处于处处受制的地位。走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部队中出现的问题也显得很严重了。途中红七军团领导发了一份近八百字的长电给军委，汇报这段时间的部队情况，通篇笼罩着一股无可奈何的情绪：七军团自瑞金出发，至今将近三月，在此长途行军与作战，一般的都沉溺于疲劳状态中，日常之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已全部停顿，自渡闽江以后一般工作更差了。特别因桃源战争未解决以后，如湖、大陈几次本可全部消灭，但都不能完满取得胜利。更因为战争后对伤员亦无适当安置，甚至有一二次因战争情况而失落，因此部分的是怕负伤以足

减低战斗情绪。这表现在每次战斗中，本有利条件中，在每次战斗中高级干部之严厉督促，可是仍未能提起全体人员之一到兴奋。在战斗中干部的伤亡较大，部队组织因变动太快，以致散漫，新干部有不知其所属人员枪弹数目，所有落伍人员数日后不能清查，特是多余枪支有整担抛弃于途中，其后竟不讲话，且纪律亦是松懈。再则近来因伤病员日增，总计随队重者百数，轻者则四五百之多，军团病者及伤员全依赖部队自行扛运，运输员缺乏，而以战斗员扛运，因这不但减弱部队战斗力，且健者亦逐渐病，而轻者则反加重，因是行军非常迟慢，以不足三千二三百之部队，而行军长经却八小时以上。各团之人数仅五六百之多，而直属部队却占一千三四百人，直属队虽经数次减少，已至不能再减除，因伤病员外，每次能参加战斗者，枪数不满一千以上，故每次均不能完成军委所给的任务。……

情绪处于如此萎靡状态的这支部队游戈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怎么能叫人不揪心？说了这许多，恰恰漏了汇报最为要紧的一点，便是身为这支队伍的最高几位领导，情绪波动起伏之大，行动作战决心之犹豫，争吵埋怨之时有发生，都是以往所少有的。在后来朱德在给军团领导寻淮洲、乐少华的电报中已经是很严厉地给予了提醒与警告：“尤戒意志不专，行动无计划，作战无决心，这是最影响士气，疲劳兵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所以对于军委领导的这番苦心，仍是收效甚微。

好不容易到了10月底，红七军团终于进入方志敏等领导创建并发展起来的闽浙赣根据地。方志敏组织了根据地的军民热烈欢迎这支风尘仆仆的队伍，并且一下子送来了一千多头猪和几万双草鞋慰劳部队，使得历尽艰辛的战士们士气大振。在休整期间，中央决定，将新红十军与先遣队合并，组成红十军团。军团领导很热情地邀请方志敏去参加了他们的总结会，很虚心地听取了方志敏的意见与建议。方志敏却没有料到，在这里又碰上了曾洪易。

此时的曾洪易依旧为中央所信任所重用，这次的身份是随军中央代表。并且在中央颁发的训令中赋予他有与军团长、军团政委三人决定和处理重大军事政治问题的一切权力。

一身皆是权力，曾洪易的精神面貌却大不如从前。脸色灰里透青，说话有气无力，尤其是原来那两只凶煞的眼睛如今好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衰得如同大病初愈。原先一天到晚说得滚瓜烂熟的那些革命理论与革命口号一句也听不见了。

开完总结座谈会出来，军团参谋长粟裕和方志敏一道走回驻地。方志敏禁不住他说：“以前曾洪易不是这个模样的，哪里容得别人批评他的不是？我看他心思有点不大对，在会上大家那样凶他说他，他也仿佛有点心不在焉似的。”

粟裕在会上也是批评曾洪易批得比较凶的一员，听方志敏提的疑问，冷笑了一声说：“方主席，有许多情况你是不太知晓，现在中革军委命令咱们两支部队合编，你也就是新成立的红十军团的领导了。有些情况应该向你汇报的。你奇怪曾洪易怎么会这样？其实事情很简单，他就是得了个战场恐惧病。”

方志敏倒是头一回听到这么一个新鲜的名词，不由得重复了一遍：“战场恐惧病？”

粟裕说：“在福建水口那次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当时他脸都吓黄了，钻在一片灌木丛中死也不出来，身上被树枝划得左一道右一道，也顾不得了，

我们拉他都拉不出来，告诉他飞机早已飞走了他也不信。后来好不容易钻出来，嘴巴抖得连话都讲不连贯。真是，头一次看到他那副熊样子，哪里还像个高级指挥员。”

方志敏点点头说：“怪不得他拼命地要到我们闽浙赣根据地来，还直接发来了电报要我们派部队去接他，他大概认为这里比较安全。”

粟裕说：“就是这样，根本就没有心思也没有胆量与国民党的部队再打仗，一天到晚就是快跑。到后来自己还专门给中央发了份请求暂离部队调地方工作的电报。你想，主要领导都这样，怎么去指挥下面的战士浴血奋战？”粟裕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接着说，“方主席，在会上你大概也瞧出来了，除了曾洪易消极动摇，军团几位领导之间也很不团结。”

方志敏说：“大敌当前，自己如果再不抱成一个团，这仗是非败不可的。”

粟裕说：“怎么抱成团？这个班子搭配得就是这样勉强，不晓得到底是谁领导谁。军团政委乐少华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晓得一些军事理论，更主要的是他对中央的指示命令执行起来真真叫做不打折扣。可要命的是中央远在千里之外发号施令，你执行命令也要看看实际情况怎样呀。他不管，叫他上东就上东，叫他上西就上西，东边是条河也要蹚过去，西边是座山也要攀过去。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事情就越加不好办。这种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态度倒未免不是错误的。这还不算，主要的他还瞧不起军团长寻淮洲，一开会就吵架。寻淮洲虽然年轻，但打仗确实有一套，心里也急得上火，俩人吵得不可开交。曾洪易就看热闹根本没办法指挥了。”

听粟裕一口气说了这许多，方志敏才晓得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存在的问题真是比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另外，因为红七军团是以老红十军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所以方志敏还有一层特别的心思，原以为又能见到邵式平他们了，谁知道这番希望却落了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当时的中央以交换经验为名，早将他们都分别调离了红十军。军长周建屏调去学习，邵式平与方志纯都调离了部队，所有营以上干部也都撤换了。方志敏感觉到战争期间人员变化真是频繁，见不到他们心里也不免有点失望与惆怅。不过方志敏并没有意识到，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能够与自己相处多年的战友见上一面。

听着粟裕给自己介绍着情况，方志敏又感觉到了走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年轻军官还是很简单的。年龄虽轻，为人办事却很稳重老到，言谈之中流露出来的那一份焦急心情不言而喻。方志敏颇有感慨，如果乐少华他们都能像他一样，那部队的局势与情绪恐怕也不会消极到如此地步。

并没有容得方志敏想得大多太细，更艰巨的任务很快就摆在了面前。

11月4日，中央军委发来一份加印“火急”的电报，对组建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指示得非常详细：

A、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七军团编为十九师，暂辖两个团；十军团编为二十师，辖三个团，军团部兼二十师师部。十军团长以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二十师师长、政委。

B、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为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

C、七军团的改编整理与补充，应由军区及新的军团与十九师的首长负责进行，并在一星期内完成。

D、新的十军团的目前任务：

1.十九师为整理后，应仍出勤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

2.二十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

3.两师执行各任务时，统应受军区、军团指挥并求协同动作。

E、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委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通电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

方志敏拿着这份电报看着，半天不做声。两支大部队合编在一处了，是力量壮大了，还是目标更大了？眼前的敌人军事力量已强于我们几十倍了，仍旧用大兵团作战能行吗？这样一个大兵团孤独地深入敌人腹地，敌情是那样复杂多变，环境是那样困难险恶，可是几乎它连一点机动权力都没有，严格地受着千里之外的中央与中革军委的控制，这样会不会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这些问题，方志敏只是很疑惑，但怎么办？自己一时也拿不准主意。明显感到处理不当的，是关于中央对寻淮洲的安排。这一改编，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改为了师长。这次安排的干部，刘畴西、乐少华都是喝过几天洋墨水，吃过几天洋面包的，中央是不是以为他们受过专业军事训练，仗就打得比别人好呢？

想是想了许多，方志敏一时却不愿意说得太多，尤其是这种新合编的单位，本来已经闹得很凶了，自己要是再掺合进去，能有利于团结吗？方志敏想，眼下就是要考虑打胜仗、打好仗，提高士气，夺得哪怕是暂时的战场主动权也好。

其实此时，离中央及中革军委撤出瑞金向湘西转移，早已过去了二十多天了。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已经沦陷于敌手。主力红军开始了闻名于世的战略转移，后来被大家习惯地称作为长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却仍然在要求着这支新合编的部队要创造与保卫苏区。11月18日，方志敏及红十军团的几位主要领导都看到了这份电报：

（甲）根据目前闽浙赣形势，二十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两师分散行动亦不能有利地打击敌人与顺利地创造新苏区，现为有利地保卫闽浙赣苏区以调动敌人，创造新苏区壮大红军，决定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常间挺出铁道以北。首先活动于开、遂、衢、常间，并一部积极破坏铁道，威胁衢州，调动围攻闽浙赣敌人，集结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

（乙）为了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

（丙）军区、省委仍留闽浙赣苏区，不应移闽北，由你们选定军区司令员，以独立师为基干，继续领导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苏区。

（丁）十军团的出动，你们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解释工作，绝不是退却逃跑放弃苏区，完全是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造新苏区。

（戊）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在当时，谁也没有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电报对于以后的挫折与失败所起的决定性的错误作用。形势日趋严重，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却还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与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要求这样一个庞大的目标绑在一起打运动战。事隔39年后，朱德说：“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总司令说的是对的。

方志敏觉得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了，要抽空到磨盘山麓的丁山红军医院去与伤病员告别，嘱咐医院要认真做好伤病员的转移和掩护工作，为革命保存好这批火种；要想方设法把在肃反扩大化中无辜受到审查的干部解放出来，补充到部队中来；要抽调相当一批地方干部随军北上，任务是沿途开展群众工作，设想着到皖南去开辟和建立新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乡亲们的工作，要让他们在部队走后迅速疏散，但是一定不要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要告诉乡亲们，缪敏和孩子们依然留在苏区，红军也是一定还会回来的。

方志敏最后一次站在葛源的红军操场上给大家讲话。秋风猛烈地刮过，卷起了漫天漫地的枯枝黄叶，吹得树梢屋檐一阵阵的呜咽。满脸是泪的乡亲们聆听着方志敏那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默默地将他那宣言般的演讲记在心里：“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为了可爱的中国，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就要离开亲爱的苏区了。目前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相信久经战斗的闽浙赣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还要回来的。这一天，决不会是很远的将来。”

部队撤离后的第三天，葛源陷落。闽浙赣省委转入磨盘山开始进行游击战。

葛源陷落，方志敏是估计到的。但出乎他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是，曾洪易终于跑掉了。

起初，曾洪易是留下跟随闽浙赣省委一起行动的。在受到大家的批评以后，他的情绪更是低落得如同沉到河底的一块石头，天天关在屋子里唉声叹气像棵霜打过了的白菜秧子。等到大部队一开拔，他似乎是彻底地绝望了，其实当时他手中还有一个师与许多游击大队可以用来保护省委和与敌作战。曾洪易感觉是完全被抛弃了，他咬了咬牙，终于下了叛变的决心。走之前又做了几件事，先是以“苏区粮食困难”为由，命令红军战士疏散离队；再以“共产党员应该以身作则”为口号，强迫党员干部回家；最后说“游击队、赤卫队不会作战，而且暴露目标”，解散了成千上万的地方武装。党员干部与红军战士们一回到家乡，即遭到敌人的追捕与杀害。曾洪易做完了这几件事，这才心安理得地到南京去了。

接到11月18日中央军委那份电报的同一天，红十九师已经在寻淮洲、聂洪钧、刘英的率领下，夜出怀玉山，向浙西进发了。晚上电报来了，方志敏他们看到中央军委要求红十军团全部出动的命令，立即着手准备。六天以后，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和重新担任军团参谋长的粟裕率领军团部及红二十师也踏上了征程。

半个多月后，两个师在黄山附近的汤口会合。部队到了汤口，照例是打土豪、分浮财，镇压了几个民愤大的恶霸地主，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于是又趁势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散发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布告与宣言，声势搞得轰轰烈烈，一批被抓来修公路的青年民工当场报名参加红军。老百姓都晓得红军是要求抗日的，一心要打日本人的，只有蒋介石在玩弄两面三刀的把戏。

部队停留在汤口休整，国民党军自然十分关注，天天派了老式的侦察机在汤口上空慢腾腾地转悠，总想打探点什么消息出来。一直尾随的国民党军王耀武补充旅也不甘落后，频频地派出便衣暗探来作些侦察，被警惕性很高的哨兵捉住了好几个。很明显，汤口也并非久留之地。

队伍很快到达了黄山北麓的苦竹溪。这时，蒋介石已经调集五个正规师、

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分左、中、右三路围追包抄过来。形势一下子就变得更加严峻。

“怎么办？”方志敏立即召集几位军团领导，在行军途中召开一个“飞行”会议，研究眼前的局势与对策。

局势是明摆着的。这支抗日先遣队总共只有一万多人，还不及敌人的一个师的兵力强。并且现在已经不是在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根据地圈子里，要迎击敌军，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刘畴西在闽浙赣指挥打仗喜欢一味地硬打硬拼，以前方志敏几次劝他都没什么效果，这次大约也真是意识到敌我悬殊太大了，紧皱着眉头也不肯说话。方志敏看了看他，忍不住点了名问道：“畴西，你说说看，打得打不得呢？”

刘畴西模棱两可他说：“打得打不得？大家说说看。”

寻淮洲说：“要我看，敌人也不是一点空子都没有，咱们钻他的这个空子，可以打一仗。”

方志敏勒马缓行，点点头说：“要想在皖南打开局面立住脚跟，只跑不打是不行的。淮洲说的有道理，大家来找找看敌人到底有没有空子让我们钻？”

“怎么没有？”稍稍落后的粟裕催马追了几步上来插话道，“就是王耀武的这个补充旅，追了我们有些日子了，打他就行！”

寻淮洲说：“对，我也觉得打他比较合适。根据情报，追剿我们的兵力虽多，但其他都还是距离尚远，一时半会对我们构不成大的威胁。惟有王耀武这家伙邀功心切，追我们追得如此之紧，反而显出他已是孤军突出了。”

乐少华白了他一眼，说：“可是王耀武的这个补充旅是蒋介石的嫡系，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虽然只是三个团，但和我们三个师的兵力差不多，咱们的武器还不如他呢。要想打他，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寻淮洲也不肯看他，脸对着方志敏回答他的话说：“装备上是有差距，但是咱们占着一个优势，就是地形对咱们有利。”

方志敏很有兴趣地问：“你打算选在哪块地方？”

“拿地图来。”寻淮洲扭脸叫自己的通信员，又勒住缰绳，翻身从马上跃了下来。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跳下马来，聚集在铺开的地图边。

寻淮洲指指点点他说：“我想就在乌泥关设伏最好。这地方是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是一路的小山坡，中间是一条公路，在这里设伏，就像扎口袋一样。”

方志敏很有点兴奋，说：“走，我们再到实地去看看。”

乌泥关离谭家桥约莫十里左右的路，骑着马一会儿就到了。几个人看过，都同意在这里打一仗。打胜了，对打开局面，提高部队士气都大有益处。

但在兵力部署上又发生了争执。刘畴西主张将二十师、二十一师放在右侧，准备作正面攻击，把十九师放在左侧，待正面打响后，或截敌归路，或防敌向太平方向溃逃。按他这个布置，十九师没有放在主攻位置上。

寻淮洲有点不高兴，说：“我们师战斗作风顽强，野战经验也丰富，作主攻比较合适。”

乐少华不同意，说：“你争什么争！二十师、二十一师合起来战斗力不比你强？虽然是新建师，但也打过几仗，打得也很英勇。”

寻淮洲也不肯让步，说：“你们那里新兵多，但真打起来靠新兵还是靠老兵？不要老是好表现自己。”

乐少华很生气，说：“你不表现，你争什么主攻？”

大敌当前，方志敏不想让他们又吵起来，打断了他俩的话说：“要分析起来说，十九师是老红十军的底子，转战各地，打的硬仗也多，我看担任主攻是可以的。”

刘畴西摇摇头说：“还是把二十师、二十一师摆在这个位置上好。大家不要争了，我是军团长，军事上我说了算。现在开始分头去准备。马上进入情况。”他低头看了下腕上的表，“明天凌晨一点，各部队进入阵地埋伏完毕。”

真是没有想到，阴沟里也能翻船，这么有把握的仗，居然打掉了底。

本来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三个师当天夜里就静悄悄地进入了埋伏阵地。第二天的上午，约莫9点多钟的光景，太阳懒洋洋地爬上山顶，王耀武的补充旅便在公路上露面了。

阳光下，敌人的队伍松松垮垮地拉得很长，走的速度可不算慢，估计再有一刻钟，这帮家伙就差不多要钻进方志敏他们的包围圈了。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等着，心里盼着他们快些，再快些，钻到口袋里来。

不曾想就在这紧要关口，不知是谁的枪抢先了一步，颤抖的手指意外地扣动了扳机。这一声枪响，如同是给敌人送了一个警告。敌人的前卫部队立刻停止前进，一支队伍跑步离开公路，飞速去占领离他们最近的一处高地，其余的敌人很快在公路的两侧展开，叭叭叭打起枪来。

到了这个时候，这仗不打也不行了。刘畴西下达了命令，由伏击转为进攻。此时的敌人虽然占领了制高点，但因事出突然，显得分外惊慌失措，打归打，却一时也乱了章法。可是又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按照刘畴西的布置，十九师除了用一个连控制乌泥关的制高点外，主力却被摆到了乌泥关以南的悬崖陡壁地带，英雄显得无用武之地，兵力一点也展不开，急得寻淮洲直跺脚骂娘。

国民党军打得也很顽强，仗着武器好，地势对自己有利，便寸土不让。这次派出追剿先遣队的队伍，不久前刚刚接到了蒋介石亲发的督令：奋勇作战而获战绩者赏；行动迟缓，畏缩不前者，以贻误战机论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况且仗着人多势众，狠不得一口水将眼前的这股红军给吞下去。

先遣队的二十师摆在了首当其冲最为险恶的位置上。这番却是用了柄绣花剪刀来宰牛。二十师里新补充的战士比较多，没有打过什么恶战硬战，也不太善于打阵地战，几种因素加在一起，要顶住敌人凶猛的进攻已相当吃力。枪管打得发红发烫。一块块的山石被打成了粉末，飞扬起来如同撒了一层的粉雾。坡地上山顶上的碗口粗的树木全被炸飞，燃烧出一股股浓烟与焦糊味。敌人调来了好几门迫击炮，咣咚咣咚赛过炸雷一般，炮弹像雨点般倾注在这块不大的阵地上。二十师终于抗不住了，阵地被蜂拥上来的国民党军冲开了一个口子。这便一发不可收拾，口子越撕越大，开始短兵相接。敌人像蝗虫般拥了上来，许多战士连刺刀都来不及上就与敌人扭打成一团，滚在一处，难分敌我。

激战中，十九师原先固守的制高点也终于被攻陷。寻淮洲急得眉毛都吊了起来，嘶哑着嗓子喝令身边的一排人随他上去夺回制高点。寻淮洲喊叫着，举手就提过了一挺机枪，居然一个人用手托着，边射击边跃出了掩体向敌人冲去。一排人紧随其后。溃退下来的战士意外地看见师长带着人马亲自冲了上来，仿佛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扭转身子又冲了回来。敌人哪里见过这般

不要命的指挥官和士兵，一下子就泄了劲，仓促地退了下去。寻淮洲刚刚冲上山头，一排子弹扇面般地扫过来，就听他哎呀一声便跌坐在了地上。身边的通信员急忙冲了过来看，肚子上已经被子弹炸开了一道口子，往外喷涌的鲜血顿时将棉衣浸透，血肉模糊的肠子已经涌出了腹腔，断成了几截。就这一瞬间的工夫，人已是面如泥色，说不出话来了。此时心里倒还明白，勉强做了个手势，叫通讯员把他背了下去。

从上午打到黄昏，二十师、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敌人突破，阵地战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乐少华、刘英都已先后负伤，师团领导干部伤亡是历来最多的一次，全军伤死有三百余人。仗打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再打了，失败已成定局。

刘畴西尚在犹豫，还想抵挡一阵，方志敏急得两眼充血，哑着喉咙说：“不能再打了，敌人的援兵就要上来了。现在赶紧布置撤退，能保住多少实力就保住多少！”

血色的太阳已经缓缓地滑到山坡那一边去了，金色的余辉洋洋洒洒地泼在乌泥关上，枪声炮声停息下来，四下里安静得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不知从哪里飞来一群在寒冬中饥不择食的老鸦，旁若无人叽叽喳喳地停息在满目的焦土枯枝上，吵闹个不停。

先遣队终于撤了下来。王耀武的部队也被打得够呛，伤亡与红军相差无几，再也没有力气来追。

乌泥关一仗打得元气尽失，士气低落得仿佛在雪地又下了一层霜，指战员中不满与埋怨的情绪像空气般地在部队中弥散开来。第二天在陶村又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遭遇。实际上这是给了军团领导一个翻身的机会，如果能吃掉这一团敌兵，对于提高部队士气与斗志，不言而喻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先遣队有相当于三个团的兵力，虽然在谭家桥的乌泥关受到损失，但要打掉这一个团也还是有把握的。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陶村一仗又没有能打好。其实一开始，军团首长指挥上的错误失当就已显露了出来。在指挥用兵上，刘畴西犹豫不决拖泥带水。对付敌人的一个团开始只用了一个营，后来看看不行，又加了一个营上去。兵力都消耗了，仗也没有打好。当时部队的情绪一时变得激昂愤慨，许多受伤的干部都从担架上翻滚下来，摸出枪来请战杀敌，有的甚至哭喊着要求军团长力战。刘畴西犹豫了片刻，还是命令把部队撤了下来，任你苦苦哀求也没什么用。事实上刘畴西此时一点也不愿再战，几次受挫，已经将他原有的那点精神与锐气消磨殆尽。他这才感到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军事作战指挥理论似乎在这里有点用不上了，至少是屡用屡错。他没有深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对行军作战却产生了一种无名的烦躁。他也深感自己身为军团之长，责任重大，一万余人的身家性命全然系之一身，且又屡战屡败。为了减少牺牲与损失，刘畴西下了决心，一路避战。用后来方志敏的话说，则是“虽经过大小十余战，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部队翻山越岭、马不停蹄地行进了十多天，既无休息也无整顿，人疲马乏。在这样的疲倦奔波中度过了1935年的新年。

新年过后没几天，先遣队经浙西开化的西坑口，来到了遂安的茶山。部队疲惫已极，早早就布置宿营休息了，军团领导却必须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再次讨论大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

方志敏的眼眶有点湿润，刚才得到消息，被担架抬着行军了好几天的寻

淮洲，结果不知怎么弄的从担架上颠簸下来，还是牺牲了。方志敏心中的痛楚之感已无言可述。他又抬眼看了看来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团领导。半个多月的辗转迂回，吃，吃不好；睡，睡不好，似乎每个人都憔悴得变了个人形。被称作“独臂将军”的刘畴西，精神状态比身体情况还要差上一大截子，铁灰着脸，紧锁着的眉结就一直没有松解过，一条空荡荡的袖管用前甩后地没有着落。每逢遇敌打仗，方志敏就恨他那副愁眉不展伸伸缩缩的犹豫劲儿。

刘英在谭家桥战斗中也负了伤，由于失血脸色显得苍白暗淡，一动弹就疼得他丝丝地倒吸冷气。看的出来，他咬着牙坚持着，眼下整个部队的困难处境比自己的伤口重要得多。一想起工作与打仗来，刘英觉得反而能减轻一些伤口带来的疼痛。

乐少华依然躺在担架上，谭家桥战斗中，他的右胸受了伤。受伤之际，听见有人喊：“敌人上来了！”他跑不动，又不想被敌人抓住，于是抬枪给了自己一下。这一枪打在肺上，好歹被战士们救下来，捡回一条命。现在人是清醒的，实在也是因为年轻，伤口还能奇迹般地恢复过来。只是不大能讲话，微微闭着眼在想着什么。

变化最大的就是粟裕了。胡子已经长出了好几分长，毛毛碴碴地像一片不曾收割干净的庄稼地，二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四十都不止了。两只眼睛虽然还是依旧有神，却也是血丝纵横，让你看了不能不惊。嘶哑着嗓子说话显得有点吃力。此时坐在那里用黄裱纸卷起一小撮好不容易找来的干烟丝，点着了吸。

屋子里一阵沉寂。已是数九寒冬，外面滴水成冰，可此刻屋里边的气氛，冷得似乎也能结出冰来。刘畴西只是淡淡他说了一句“大家谈谈吧”，就不肯再开口了。

方志敏觉得刘畴西说的太简单，于是又补充道：“其实形势大家都很清楚，眼前差不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队的情绪恐怕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主要责任应该在军团领导身上。但是我们还有人，还有枪，做楚霸王是不行的，战士们也不会答应。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开辟出一条生路来，把这支队伍保存下去。叫大家来开会也就是这个意思。”

打头炮的是粟裕。他把烟掐灭了，很认真地看着大家说：“这一段时间仗打得怎样，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要想能顺利地活动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真是有点石板底下捂豆芽的味道了。我觉得眼下如果分兵活动，倒是比较适应形势的。分兵之后，目标小，行动灵活，可以在敌人的空隙之中钻来钻去，敌人要打这样的小部队就如同是用拳头砸跳蚤了。具体地来说，我建议可以这样安排，我和刘英到浙江行动；方志敏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回闽浙赣根据地，那里基础好，回去了犹如鱼得水一样；刘畴西与乐少华同志应该留在皖南。这样兵分三路，也可以减轻敌人追赶的压力。船小好掉头，就是因为大兵团行动，我们吃的亏也太大了。”

他刚说完，刘英就吃力地把手举了举，很费劲他说：“我同意粟裕的意见。这段时间整个兵团一起行动，既不灵活，目标又大。兵分几路也许会好些。”伤口的疼痛使得刘英没能再多说，但意思已经表述得很明白了。

担架上的乐少华睁开了双眼扫视了一遍大家，微微地点了下头，声音很低地挤出几个字来：“我也同意。”

方志敏不这样想。其实几天来萦绕在他脑海里的也就是这件事。分还是合，成了问题所在的关键。他想了许久，把分与合的利弊两面颠过来倒过去

地考虑着。此时，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这副担子究竟有多重。有的时候，真的是压得他有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但是方志敏对于分兵的顾虑太大了，部队分散了还能再聚集起来吗？中央对改变大兵团作战也没有明确的指示呀？只要能回到赣东北那块老根据地，总归会有办法想的。自己对那片土地是太熟悉了，想起它来自然就有了信心，有了勇气。也许，全军回到赣东北去才是上策。

在开会之前，他的这个决定已经想得基本差不多了。所以在会上表述时，显得有条有理很有说服力。

尤其是刘畴西，听到方志敏认为中央并未给予改变大兵团作战的指示时，不由得点了点头。看来是非常赞同这条意见的。所以当方志敏说完，粟裕还想再申辩一下自己的理由时，他站起来摆了摆手，不容分辩他说：“志敏同志说得很对，当务之急，便是要给部队找一处安顿修整的地方，兵力一分散就等于散了架子，还怎么修整？怎么去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要再争了，明天就动身，回赣东北去。”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后来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个决定是何等的错误。

方志敏在狱中痛定思痛，很冷静地反省了这一酿成大错的决定，很深切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红十军团在皖南行动一个多月，没有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队伍确是疲乏不堪，战斗情绪和战斗力也降落得很。在如此情形之下，找一个地方休息整顿，当然是必需的。但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所。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当时，我却只顾到军队的急需休养，就没有严重注意上列的困难，依着从前斗争的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一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1月10日，先遣队离开茶山，全军返回赣东北。历时50天的皖南行动便告结束了。

从遂安的茶山到赣东北，其实要说起路程来，总共也不过二百多里路，急行军两天差不多就可以到达了。可是事情的困难程度却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这条不算很长的路上，敌人层层设障。布满了荆棘陷阱，纵横十几条的封锁线如同犬牙交错，数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凶猛地向着红军扑来。距离先遣队最近的敌人追剿队与红军仅仅只差半天时间的路程，几乎就是一步之遥了。从茶山出发，先遣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七天内四次受阻，真是到了寸步难行的境况。

第一次受阻是在开化县的大龙山。先遣队刚离开茶山的当天，就遭遇上敌人二十一旅的四十团。敌人有备而来，气势汹汹，恨不得一口吃掉这一支疲惫憔悴不堪的红军队伍。先遣队不敢恋战，趁着夜幕迅速改道青岭顶的山脊荒径转移，好不容易甩了这股敌人。但是，担任侦察和掩护的一个连却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第二次受阻于开化的徐家村。原来计划部队要昼夜兼程，经化委德苏区回到赣东北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此刻，时间就意味着生命。12日下午，部队行至扬州。此时，只要越过南华山即是化婺德苏区了。可惜刘畴

西又顾虑到队伍疲劳，下令宿营。错着一步，满盘皆输，等第二日上午行至徐家村时，敌人早于红军半小时到达。这是浙江保安部队的一个团，抢占了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山高路窄，红军无法展开。刘畴西不敢恋战，时断时续战至傍晚，立即布置十九师作掩护，大部队连夜绕向西行。

第三次受阻是在德兴县的港首村。指战员们情绪低落，部队疲乏，行军速度大为减慢。三个师的队伍拉了几十里路，首尾不能相顾。到了15日的中午，作前卫的十九师刚抵港首，便与国民党军的四十九师遭遇。十九师当时掩护着有方志敏、粟裕带领的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任务很重，根本不能与敌纠缠，也是边打边撤。虽然摆脱了追赶拦截的敌军，但是由于与二十师、二十一师的距离相差过长，被敌军拦腰切断。此时的先遣队被分为两截，先头的十九师与方志敏他们已经到了陈家湾村。而落在后面的主力部队因敌人的拦阻改道向南，直到深夜，才缓慢进至凤阳坞。

第四次受阻是在德兴县的张家坞。16日，方志敏在陈家湾等候主力部队与刘畴西他们，两眼几乎望穿也不见他们的踪影，方志敏心急如焚。形势已不容再等下去了，方志敏果断决定令粟裕、乐少华、刘英等率部突围先走，自己留下等待部队。方志敏一直担心刘畴西的犹豫迟疑，估计到别人无法催促他，只有自己留下来担此重任。事后证实，当晚出发的先头部队八百将士由于抢先一步，终于突破了敌人设在董家坊至暖水的封锁线，安全地抵达赣东北苏区。按照方志敏临行前交代的，让粟裕他们过了封锁线等待主力部队一起前进。可是等到下半夜并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又等了一天，依然未见踪影，一直等了四天，音信全无。情况不明，粟裕的担忧不言而喻，开始还听见山那边隐隐地传来炮声，不久也沉寂了下去。粟裕和刘英他们便知道事情不妙。到1935年2月，以这支突围部队为基干组建了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挺进浙西南，历经三年的艰苦战斗，终于开创了一片崭新的闽浙边游击根据地。

就在粟裕他们与方志敏挥泪告别的当天，刘畴西带领的红军大部队又在张家坞遇上了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的狙击。刘畴西与王如痴指挥着部队左打右突，好不容易撤了出来，但是二十一师却被分割在了黄土岭的北侧，主力部队只剩下二千人左右。天色快要擦黑时，才摆脱了敌人，战士们跑得气喘不接下气，三三两两地在路边靠躺着，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没有粮食来煮饭吃，许多负伤的战士也得不到很好的包扎与治疗，纷纷靠在地上呻吟着。这时，方志敏派来联络的人才找到了他们。联络人掏出方志敏的催促信递给刘畴西，并且告诉他，方志敏专门留下来在等主力部队，要刘畴西指挥部队务必于当日通过乐平、常山之间的封锁线。刘畴西看了信后沉默不语，王如痴问他走不走？他看着停息在村口路边的士兵和伤员半晌没有说话，少顷，皱着眉头说：“还走吗？我看今天就算了吧，你看看部队现在的状况，怎么走得了？”

王如痴想了一下说：“部队是疲劳得不行了，天天这样又打又跑的，铁人也吃不消。不过眼下敌情严重，今晚不走，只怕又会发生变化。”

刘畴西不以为然：“不见得吧？总有空子好钻的。再说今天让部队好好休息一夜，明天才有力气行军，再遇到敌人不还要打？你看现在一个个这副模样，枪都端不动了，怎么打？”刘畴西咬了咬牙，狠狠跺了一脚，说，“传令下去，就地宿营。”又从小本上撕下一面纸来，草草地写了几句递给方志敏派来的人，说，“你再跑一趟，告诉方主席，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

进了。”来人无可奈何，揣好了字条便急匆匆走了。

刘畴西再也没有想到，就在他迟缓的这一夜，敌人的四十九师、五十七师、补充第一旅、独立第四十三旅、浙江保安纵队师等共十四个团已分路赶到，将强于红军七倍的兵力从扬州到港头、从陇首到暖水、从分水关到童家坊一带，密密麻麻地布置了几层包围网，把刘畴西他们围困在了方圆只有十五里左右的怀玉山上。他延误了这一夜，就再也未能突出敌人的重围去。

方志敏在收到刘畴西写来的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有再犹豫，转身带着跟随自己的十来个人再次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此时他仍怀着一线希望，想找到刘畴西和主力部队，迅速突出重围，把这一支队伍带出来。

严冬里的怀玉山，已是银装素裹。时缓时急的雨夹着雪总也不停。这里岭岭相间，相传有九十九个山谷，但是荒山野林，几十里都没有人迹，找不到老百姓，也找不到粮食。破衣烂衫的战士们此时还穿着草鞋，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走在布满冰凌雪碴的山间小路上。此时除了需要面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饥饿、寒冷与死亡也都成了方志敏他们需要面对搏斗的敌人了。

方志敏终于找到了刘畴西和剩下的这两千多人。

刘畴西没有说什么。方志敏也顾不上批评责怪，看着他们一个个形同枯槁有气无力的样子，话到嘴边又于心不忍了。事已至此，别无他法，至关重要的就是找路突出去。

方志敏说：“四下里都是敌兵，看来蒋介石不把我们统统吃掉是再也睡不着觉了。”

刘畴西插了一句：“哪能这样便宜了他，咬着骨头也要崩掉他一颗牙！”

大家心思重重地低着头，没有人笑得出来，方志敏接着说：“我们得到暖水地区去，那里有块游击区，有群众，有地方党，到了那里问题就会变得好办一点。”

其他人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来。大家都觉得，要听了方志敏早走一步的话，何止如此？于是部队又改变方向进入东屋亭、何林、桂湖一带。哪晓得敌人在这里搞“移民并村”，山沟里竟看不到一个山棚，找不到一位老乡。部队在山里边转了差不多近一天，后来在源头附近终于找到了一位年迈体弱的老人。这位老人姓张，敌人搞移民并村，他没有走。老人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总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要死得死在老屋里。躲过了搬移，现在隔三岔五有儿子偷偷地送一点干粮上来，再劝，老人也不肯挪地方。这时他碰到了红军。

几个战士怎么叫他，他也不肯开口。方志敏闻讯从后面追了上来，凑近了老人耳边轻轻地叫了几声：“老爹。”张老爹听出是当地人的口音，便微微睁开了双眼，映人眼帘的是几张瘦削憔悴的脸，又黑又脏，如同野人一般，惟有灰布军帽上的那一颗五角红星，还是那般耀眼夺目。张老爹疑惑得很，只顾盯着那红星打量。方志敏立即明白了他的心思，连忙又说：“老爹，我们是红军。”老爹居然笑了笑，说：“当真是红军呀？”

几个战士都高兴了起来，说：“这还假的么？真是红军。”

张老爹又问：“那山里一直响枪，就是你们在打？”

方志敏点了点头，说：“是，老爹，我们伤号很多，敌人追得很紧，你晓得有没有路可以出得山去？我们想过婺源、德兴去。”

老人又把眼眯合上，半天没有开口。旁边围着的几个战士不由得着急，

叫了几声，被方志敏伸手制止住了。他从老人那双不断眨动的睫毛上看出老人正在费力地从脑海中搜寻这条路线。果然，老人重新又睁开眼时，眼神中已有了希望。

张老爹比划着说：“这里再往西去，是高竹山，那里有条山垄，叫金竹坑。白匪们虽然也在那里修了碉堡，但是山深林密，再加上满山长了许多竹林，很容易藏人的。就从那里过，通过了古镜头就快到你们要去的地方了。”

战士们听到指出了这样一条既隐蔽又可行的路，都高兴极了。方志敏也很兴奋，立即叫人去叫落在后面的刘畴西、王如痴他们赶紧上来，大家好商量一下。

刘畴西听方志敏说过之后，有点不放心，又俯下身子大声地问老人：“那里有几座碉堡呀？”

张老爹说：“这条路我熟，年轻时候经常过的。至于碉堡，是新修的，我并不曾看见，是听我儿子他们讲的。所以闹不清有几座，好像说只有一个。”

方志敏说：“莫管碉堡啦，一个也得过，两个也得过，总不能在山里困死。快下命令吧。”

刘畴西又有点踌躇。王如痴也不高兴，瞪了他一眼，说：“已经无路可走啦，好不容易捡着一条道，还拖拖拉拉地做什么。”

刘畴西说：“那就走呗。”

张老爹听见他们说要走，用胳膊撑起身子一面要起来一面说：“这条路埋在草丛树林里，难寻得很，我来给你们带路。你们

自己走不到，又要花许多工夫。”

此时能有向导带路，真是如同绝途中铺出一条生路来。这正是方志敏他们所急需急求的。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方志敏立

即叫人扎一条担架来，很坦诚地对老人说：“老爹，天寒地冻，本是不该惊动你老人家的。可不瞒你说，我们真是需要您带路呢，几千条红军兄弟的性命都在这里啦。”

老爹苍老的脸上浮起一个微笑，一边躺在担架上，一边说：“我都晓得的。你就只管跟我走。没想到老了老了快不行了，还能立上一功呢。”

部队的行进速度明显加快了。干部和战士听说找到一位老向导能带着队伍通过封锁线，精神都为之一振，几天来的紧张与疲劳仿佛都丢在了脑后。天黑时分，已经走到了金竹坑的坑口，前面也望得见几座黑黝黝的碉筑爬伏在夜色之中。

天已经完全黑了。敌人确实也听到了动静，但是并不敢出来，连连叫喝了几声，无人应答口令，立即就开起枪来。头一阵子枪声挺密，一下子打伤了刘畴西惟一的那只好手，通信员、警卫员一把扶住了他就往回撤。前卫部队也撤了下来，后面就乱了，不知道敌情究竟如何。连日来见敌就绕仿佛成了习惯，这次又打都不打就撤了下来。后面的部队稀里糊涂也就跟着撤了下来。方志敏、王如痴他们仓猝间只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又看见刘畴西负了伤被架了下来，只好带队撤回了源头。给张老爹留了十块银元，把他送了回去。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撤，便是封死了自己惟一的一条生存之路。当时把守金竹坑的敌人只有一个排，又因天黑，敌人根本不敢出来，只会碉堡里乱放枪。千余人要打退这一排敌兵，应该是有把握的。可是，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部队终于陷入绝境之中。

国民党军的几个旅调兵遣将，纷纷向怀玉山这块不大的地盘压来。包围圈日益缩小，几次组织突围都被打散。这支饥饿、疲惫、寒冷、残缺不全的红军队伍不断地被分割、被冲散，伤亡已是不可计数。

1月23日，方志敏将身边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把司号员、饲养员、通信员、担架队员全部编到连里。直到这时，方志敏也没有丧失求得一线生机的信心，他仍然是想着要把这支部队带回去，带回老区去，哪怕是只剩下一个人。

其实差不多已经完全出不去了。敌人把这几块山头封锁得水泄不通，连一只蚂蚁爬过都要检查一番似的。果然，中午行至八际，便遭到敌人拦阻，刚一接火，后面的追兵又至。这一下便被敌人纠缠住，打了五个多小时，子弹所剩无几。刚刚撤下，又遇另一部敌兵，再打，已是精疲力尽，只有再退。队伍就无目的无秩序地满山乱跑，躲到树林山沟里去了。

夜色如同扯开了漫天无际的黑色丝网，慢慢地覆盖住了山脊、谷底和丛林，一轮微露黄晕的月亮挂在了冬天枯静的树枝上，白天呼啸不停的北风仿佛也吹乏了，此时不知钻到哪里去了。白雪辉映着月光，四周的景色显得这般朦胧宁静，没有了风声，没有了枪声。细细地透着月色看去，山野仿佛成了一张很美的画儿。

夜已经很深了。方志敏从隐蔽的地方缓缓地走了出来，叫着身边的几位战士，捡了两堆枯枝干柴，在山顶上点起了两堆篝火。月夜的雪地上，这两堆跳跃欢舞着的火焰透出一股熊熊的暖意来。方志敏攒足了劲在山顶上四下呼唤。敌人暂且远去，他想把白天打散了的队伍再齐集起来。此时的方志敏连冻带饿，站都站不稳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股子气力，拼命地呼唤着：“同志们，靠拢过来呀！快出来靠拢过来——”一声声的长嘶不断地在裸露的山崖上碰撞、跌荡，激起一阵阵回音。

附近凡是能动弹点的红军战士听到这熟悉而沙哑的声音都搀扶着慢慢走了出来。有许多战士负了伤，体力已经衰竭，又加上几天没有吃到一点东西，倒在了灌木丛中就昏睡了过去。方志敏清点了一下人数，能够行动的不过只剩下八十多人了。就这八

十多人，也因疲乏饥饿，走起路来如同踩在棉花堆上一样打晃，差不多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此时的方志敏，头脑依旧很冷静。他一面鼓励大家要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坚持到突出重围；一面指挥着身边的机要人员和警卫员把所带着的文件、密码都找出来烧毁，决不能泄露给敌人。方志敏和战士们商定，天亮后再寻路突围。

谁知天亮后，敌人也改变了战术，由包围封路转为了搜索烧山。敌人逐山逐垄、逐树逐草地搜，搜完了又遍山漫野地放起了大火，一时间山谷里浓烟滚滚烈焰腾腾。许多干部战士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被敌人捉了去。到后来，刘畴西被捕了。王如痴也被捕了。

这就回到了开头出现的那一幕上。

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真切地述诉了当时的心情：

我躲在树林里，真是心痛如刀割！几次想拿起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但转念：自杀非共产党员应取的行动，这次遭了失败，就悲观不干了么？不！还是要干！损失了这部分队伍，凭着咱们半年一年的努力，仍是很快可

以恢复起来的，怕什么！悲观什么！总要记住这次血的教训，努力地干！忘餐废寝地干！不怕不成功的！本来我是可以到白区去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一部分队伍回赣东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又刻不容缓的要执行，所以决心冒险很快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因此，我与刘畴西同志冒雨冒雪，不分昼夜地爬山越岭，要偷过敌人封锁线！虽然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打破脚；虽然整天冻得发抖，虽然每晚不得睡眠，人是疲劳到万分，但我总是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愈要干，愈苦我愈快乐。想至此，我独自微微地笑了。“反动派呀！反动派！这次，我们若能逃出罗网，我们要与你拼一死命！不打倒你，我们是不会停止的呀！”我躲在树林中冻得浑身发抖的时候，总是独自细声的自语！

1935年1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赫然印出了一道黑体大字：《俞济时生擒方志敏》。电讯如下：

本社29日上海专电：杭电，俞济时晚急电省府，28日在怀玉山西暖水村之程家湾获刘畴西。29日晨7时半，俞督部搜山，方志敏率四匪徒逃于程家湾，被俞生擒……

这则短短的消息中有两处严重失实。一，方志敏被捕的准确地点是在德兴与玉山交界处的陇首村附近的山上；二，方志敏并非“逃至何处被生擒”，而是由于警卫员魏长发的叛变告密，敌人复又搜山而被俘。

此时此刻，粟裕带着突围出去的八百将士已经在苏区焦急地等了快七八天了，音信全无。“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我们，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情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回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粟裕他们苦盼苦等的一线希望就这样破灭了。方志敏是在傍晚时分被两个搜山的国民党兵偶然发现的。方志敏从隐蔽的草窝里站起身来，拍落了肩上的尘土草屑，从从容容地走下山去。太阳已将落山，天色又变得阴暗起来，灰色发黄的云霭中包裹着的雪花，又开始慢悠悠地铺天盖地般地洒落了起来。

“那是太阳——”方志敏扭过脸眯起眼远远地望去。眼前只有茫茫的天与地。

这是1935年的1月29日。

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开始一渡赤水。

尾 声

我不敢说我能 方志敏留下的一笔遗产

70年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流逝过去了。在历史的长河里，使人一次又一次发出相同的感叹：70年是多么的短暂呵，真可谓弹指一挥间；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恰恰会觉得这70年显得如此的漫长，漫长得竟不曾给我们留下什么痕迹，一切都被岁月遮掩与改变了。

还能记起70年前发生在中国这一小块贫穷落后的土地上的这段往事吗？

还能记得当初也曾在这短暂的舞台上辉煌地展现过自己的主角们吗？

我不敢说我能。

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在地记下了他们，记下了仍在这片土地上飘浮游荡的魂灵；记下了一个个生于这片红土而逝于这片红土的普通农民；记下了终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融于这片红土之中的英灵：

赵醒侬：江西南丰县人。是方志敏入党介绍人。1922年11月受党团中央派遣回江西从事建团建党工作，是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1926年8月10日，在南昌被北洋军阀逮捕，9月16日被杀害。

方远杰：方志敏的堂弟，弋阳九区农民运动领袖，1927年在作战中负伤牺牲。

雷夏：弋阳八区暴动领袖，1928年被害。

涂克鹤：1930年到赣东北苏区，任红十军团长、师政委等职，后在战斗中牺牲。

黄球：弋横暴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1928年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李新汉：又名胡烈，江西波阳县人，曾任波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任红军团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闽北崇安作战牺牲。

吴先民：江西横峰县人，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的创建者之一，1932年在扩大化肃反中含冤而死。

杨莲花：江西横峰县人，普通农民，1928年被敌人抓去，杨莲花抓住机会说服龙志光起义。同年6月第二次被捕，不幸被敌人杀害。

邹秀峰：江西横峰县人，弋横暴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曾任信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闽浙赣省委常委等职，1935年作战时牺牲。

邵棠：江西贵溪县人，贵溪农村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1929年在烈桥战斗中被捕，惨遭杀害。

花春山：江西横峰县人，横峰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历任红十军连长、营长、团政委等职，1932年10月攻打夏家岭炮台时牺牲。

程伯谦：江西横峰县人，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闽浙赣苏区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底被反动派杀害。

龙志光：贵州人，周志群部起义领导人，曾任红军团长、师长等职，1933年牺牲在贵溪夏家岭。

钱壁：江西横峰县人，弋横暴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1928年2月被捕，惨遭杀害。

胡德畛：江西星子县人，参加过“八一”起义。1928年春到赣东北，任游击队连长。同年秋因病被俘，坚贞不屈，在弋阳县烈桥壮烈牺牲。

唐在刚：四川开江县人，1928年底被中央派往信江地区任信江特委书

记，方志敏率先遣队北上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1月在横峰磨盘山战斗中英勇牺牲。

周建屏：又名子炎，江西金溪县人，1929年后派往信江苏区，是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938年6月在河北平山县病逝。

黄镇中：江西弋阳县人，闽浙赣苏区创始人之一，曾任德兴县委书记，后来在扩大化肃反中含冤而死。

邹琦：江西弋阳县人，闽浙赣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历任红军五分校校长、闽北分区组织部长，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等职，1935年被俘，第二年4月被害于江西南昌。

黄道：江西横峰县人，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任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闽北特委书记、闽赣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等职。1939年在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因疗伤被特务注射毒针暗害。

方远辉：方志敏的堂兄，闽浙赣苏区创建者之一。先遣队北上后，留下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遭反动派杀害。

聂洪钧：湖北成宁人，1931年5月被派至赣东北苏区工作，历任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红十军政委、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湖北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等职，1963年病故。

王如痴：湖南祁东县人，1934年10月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十九师参谋长，1935年1月被俘，同年被害。

刘畴西：湖南望城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1929年被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1934年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军团长。1935年1月27日被捕，同年7月被害于南昌。

寻淮洲：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长、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等职，1934年12月在谭家桥战斗中牺牲。

刘英：江西瑞金人，历任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委、浙江省委书记，1939年在丽水被捕牺牲。

乐少华：浙江宁波人，当时任红十军团政治委员，解放后去世。

邵式平：江西弋阳县人，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共产党，是戈横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1934年参加长征。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江西省委第二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1965年3月病逝于南昌。

方志纯：江西弋阳县人，赣东北苏区创始人之一。曾任赤色警卫师政委、红31师政委兼黎川县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于中央党校等学习。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省长、省政协主席、中纪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顾委委员等职。

缪敏：方志敏的妻子，1929年4月入党，曾多次被捕，在狱中表现顽强，后被党营救出狱，到延安后不断学习与工作，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上饶地委组织部长，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1977年7月病逝于南昌。

最后的一笔：

方志敏：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留下珍

贵手稿《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共十三万多字。仅此而已，别无任何遗产。

